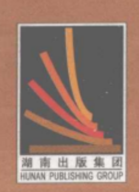
隐秘的乡村

阿贝尔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一名土司后裔怀恋田园的挽歌

我一直都住在岷山和涪江峡谷，住在出生地，像一棵青稞，别无选择。很多年过去了，我的乡村还在，但曾经为我创造出“对岸”的碧绿河流却被疯狂的采金毁灭了。在隐秘的乡村里，我忍受着记忆的疼痛，我必须写下这些文字，写下一个上游人对上游的叙述与想象……





ISBN 978-7-5355-5506-9 定价：28元

隐秘的乡村

阿贝尔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秘的乡村/阿贝尔著.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355-5506-9
Ⅰ.隐… Ⅱ.阿…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4010号

著　　者/阿贝尔
出 版 人/黄楚芳 李永平
出品统筹/臧 杰 薛 原
责任编辑/张一帆 丁丽丹
装帧设计/良友书装·李 欣

出版发行/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邮政编码 410007）
选题策划/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出　　品/营盘兄弟文化（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太平路33号（邮政编码 266001）
订购电话/010-65523381 0532-82933205
印刷装订/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1194 24开
字　　数/150千
印　　张/10
ISBN 978-7-5355-5506-9
定　　价/28元

目录



一个村子的注释

山根里

即是后院。废弃的圈道，或直接就是一片柴林。荒。一点不像旧时城里的后院。没有天井。残坟的断碑做了路石，但坟的意味还在，夜晚的恐惧还在，鬼的传说还在。

果木肯定是乔木。苹果和梨不是主流。柿子和杏也不多见。还有板栗和枣。主流是樱桃树。正当青壮年。花开得雅，结果却足够张扬。色，嫩黄，或殷红。

小块筋竹林是后院的帽子。断墙里旁出的春笋是故人的夙愿。早春的后院洒满山地的太阳，孩童和老妪滚在柴草里，裹在阳光里的全是温暖的荒凉。

院坝里

即是前院。一半泥地，一半竹林。猪圈和马厩在侧边。石磨和红苕

窖在竹林里。卵石垒砌的围墙开着路口，篾笆做的门扉随手开关。依墙而立的樱桃树李子树繁茂风骚，与竹林相映成荫。魔芋在墙根蚯蚓耕耘过的腐殖土里动画一般生长。像蛇。墨绿。水性。恐怖。

杀猪是最精彩的一出戏。交错的手脚。喊叫。超宽大的板凳。血盆子。呻吟。铁青的刀。洒在地上的血。池塘一样的木桶。沸腾的水。强烈的膻味。

铡马草的图画则颇有边地风情。傍晚。喂草，铡草，装草。时或掌着马灯。宁静，祥和。

夏秋天，水捞柴占据了整个院坝。堆山塞海的。竹林里，石磨边，果木下。要是遇到涨大水多的年份，一山山的水捞柴就会码齐屋檐，码齐树梢。孩子们爬上柴山，便可以轻易上到房背，上到树枝。水捞柴不都是自家的，大多是临村亲戚熟人寄放的。



◎院坝里

山环当头


© 山环当头

房子的当头。侧面。一堵偌大的外墙，矩形上面外加一个三角形。粉刷过的石灰已经褪色。或许新刷时就不是雪白，用的石灰是石灰厂丢弃的废料。

狭窄的屋檐下，从秋季开始就码满了水捞柴，先是高到房顶，再慢慢减下来。刚上学没几天的孩子爬上柴墙，用木炭歪歪斜斜地写着“毛主席万岁”，酷似岩壁上的古代象形文字。

也有泥地，石墙，果木。墙外是邻居家的菜地。鸡跑过去啄菜，回来必定病死。那些搅拌在米饭里的毒药，狗都分辨不出。

当头就当头，不知为什么叫山环当头。也不知道是“山环”还是“山黄”。小孩问大人要钱，大人必说，前（钱）是胸膛后是背，要钱就是砣子（拳头）会。如果说哪家子有钱，那家子必说，有钱得很，钱（墙）都从山环当头冒出来了。村里人说话“an”“ang”不分。

路　口

村口的口。

在下院子。左边石墙，右边石墙。石墙高几丈，都留着石门，一边是胡家院子，一边还是胡家院子。几棵老核桃树立在墙边，遮天蔽日。老

核桃树满身疮痂，那是年轻时候吃腊八饭烙下的伤口。瓜藤爬满石墙，瓜儿吊满树枝。南瓜，丝瓜，福寿瓜。

有好事者拿红油漆在墙石上写了“路口”二字，念书的娃娃路过，总要高声念叨。遇到口吃的，便会如此念道：“这，这，这路，路口呢。”有端着土碗喝玉米面拌汤的大人看见，也学着口吃念道：“这，这，这路，路口呢。”久而久之，大人们见到口吃的娃，都抖着嘴唇惹道：“这，这，这路，路口呢！”口吃的娃脸哗啦红到了耳根。

晒坝里

生产队的晒场。中心是三合泥地，外围是泥地。四周是保管室、猪牛圈道和竹林。道路从前面穿过。

晒坝里是村子的中心。分粮分钱在晒坝里，分花生分核桃在晒坝里，开会斗地主在晒坝里，看戏看电影在晒坝里。小孩藏猫猫也在晒坝里。生产队的铁钟也挂在晒坝边的一棵老死的樱桃树上，队长拿斧头敲，就出工啦，开会啦，分东西啦，看电影啦，听广播讲话啦……



◎晒坝里



晒坝里有三个时候最闹热：打麦子、分花生核桃和开批斗大会。

打麦子在六月。猪圈旁的青苹果刚指拇大，大人孩子都偷着吃。打麦机轰隆隆响，白牙齿一样的链条哗啦啦转动，鼓风机吹得麦壳子飘到了青皮树底下，麦秸杆堆成了山，高到了竹林的鸟窝。孩子们在麦杆山里打滚儿，抱麦杆的小青年小媳妇也在麦杆山里打滚儿。

分花生核桃多在月夜。月光如丝如绸，铺在石板路上，挂在樱桃树椿芽树上。整夜都没少脚步声。孩子们没有睡意，大些的在晒坝里藏猫猫，小些的围着大人转，要吃到花生核桃才肯回家。

批斗大会不纯粹，多一边撕玉米或抹(ma,脱粒)玉米一边开，但气氛上来后，依旧不失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全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包括吃奶的娃。尽早接受狂风暴雨似的洗礼是非常必要的。“把地主老婆子王赵氏揪出来！”客串的公社干部或大队革委会主任一声喊，民兵排长带着几个贫农子弟一哄而上，像老鹰叼小鸡一样将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揪上了台子。低头，哈腰，坦白，认罪。王赵氏有什么罪？她的男人1945年就被疯狗咬死了，据说是个地主。公社干部在传达中央文件。社员们手头一直没有停下活路。没有人揭发王赵氏。“把教唆犯李光权揪出来！”又是一声令下，又是民兵排长挺身而出，又是低头、哈腰、坦白、认罪。李光权有什么罪？李光权的娃放学路过农科站，肚子饿了，偷了两包嫩玉米吃。据说是李光权教唆的，据说破坏了科学实验。大队革委会主任在读毛主席语录。没有人去管把头低到胯裆的教唆犯。

晒坝里是舞台，村里人却只有做看客和配角的份。

青皮树底下

从路口出村，就是青皮树。

青皮树是村子的标志，也是卫士。带刺。叶青，果青，树皮青。果像药柑，又不是药柑，也可以入药，但不稀奇。

每到秋天，树下总躺着一堆堆的青皮果，被人踢来踢去。踢到路口，踢到金洞坡，踢到晒坝里。最终变黄朽掉，像烂橘子。

青皮树是胡玉培家的，但却不见胡玉培家拿它的果做什么用，倒是孩子们发现了它的用途：做子弹，做炮弹，做皮球。青皮果指头大的时候，孩子们就打下来做子弹。正上着课，突然就飞出一个青青的果子，打在某个女生的后脑勺。也有打在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后脑勺的，女老师当然没有见过这等神奇的青果。更多的时候，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追打、嬉戏的场面可以想见。青皮果有弹性，怎么打也不会打疼人的。再长大一些，青皮果便拿来做皮球了。还真能拍。在水泥地上，效果最好。那段



◎青皮树底下

时候，孩子们把青皮果带到学校，逗得别的孩子羡慕不已。黄了朽了的青皮果只能是炮弹，扔出去，自然是要开花的；不仅开花，还会发出刺鼻的臭味。多么有威力的生化武器呀。孩子们揣了炮弹，在机耕道追打，在田间追打，一伙追打另一伙，火药味比用子弹时要浓得多。

无论怎么说，“青皮树底下”都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地名。“去青皮树底下看看，你老子背柴来了没有？”“青皮树底下有人在打架！”“我看见民兵排长拿着麻绳走青皮树底下过去了。”“你妈跟安华珍在青皮树底下摆条。”……在无数这样的话语中，青皮树底下都是以一个准确的地名呈现的。

金洞坡

长满黄荆子、马桑子和憋辣子等灌木的坡。不是土坡，是石子坡。堰在上面，路在下面。路边上时常滚落着河卵石。金洞子还在上面。外面宽阔得可以摆下几十桌酒席，里头狭窄得一个人也只能侧身通过。黑暗。即使打着火把也看不见深处。深处有水，打个石头进去，听得见咕咚响。

金洞子是人工开凿的，目的当然是取金。取金的人早已不在，留下的洞穴却叫人神往。

金洞坡还有蛮坟，修堰挖出来的。雕有神秘文字的青石围砌成的矩形。白骨已经稀有，但清晰可见。有人在夜晚看见穿白色裹裹裙的女子成群结队从蛮坟出来，飘到路上，载歌载舞。有人断定蛮坟是古代氐羌人的墓葬。也有人反对，说它要比氐羌人早得多，是古蜀人的墓葬。

金洞坡是出村路上可以最后看见村子的地方。出了金洞坡，就算出了村子。回到金洞坡，也算回到村子了。天黑过后，小孩接大人，最远也接到金洞坡。

从归属看，金洞坡属于胡玉贵家所有。作为柴林。金洞坡有村子里最

好的刺莓，为了吃到成熟的刺莓，没有一个孩子怕过鬼。

挑水路

像一条尾巴，挑水路长在村子的上院子。

挑水路是一条草径，面着石子。两旁依旧是石墙。石墙里是菜园子。还有麻地。石头生了青苔，石墙长了草，长了臭老婆子，爬满瓜藤。

正宗的挑水路是指从上院子到江边的路。不长，就百十来米。但真正挑水的路则是从每家子水缸开始的。



◎金洞坡

清晨和傍晚，挑水的人络绎不绝。空桶出，满桶进。长耳朵的木桶。工艺讲究的铁钩铁扣。艺术品一样的野桃木或梨木扁担。咯吱咯吱的响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江边只有一个码头，伸进江水许多，为的是打到好水。男人一只手抓住一只桶，一蹲一起，一蹲一起，扁担也不放下，

就能打满水。女人则需要放下扁担和桶，拿木瓢舀。

从江边上到河坎，要爬坡度很大的石梯路，矮个子和技术不到家的，水桶时常会撞在石头或土坎上，水花四溅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扁担滑了肩，水桶滚下了河。

遇到下雨，又是一道风景。戴斗笠的，披蓑衣的。烟雨蒙蒙。湿润，祥和。

早先，挑水路有一个坪，坪上安装有一台抽水机。每到夏天，抽水机就啵啵啵响。柴油洒在地上，很香，也很工业。抽水的人是来自城里的老甚。说是老甚，其实就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小伙。孩子们总爱围着老甚，嘴里念叨："老甚啵啵啵，老甚啵啵啵……"孩子们的念叨，在热气腾腾的机器旁显得十分油腻。后来，老甚真的老了，娶了一位村里的回乡知青，过



◎挑水路

上了幸福生活。

三杨盖

山杨盖，也可能是山阳盖，三羊盖，山羊盖。全当音译。

站在挑水路，便能清楚地看见三杨盖。几十丈的河坎，刀砍斧劈的。没有山羊，也没有山杨，有的只是几挂阔叶青藤，几笼灌木。

三杨盖不是土盖，也不是石盖，是沙石混合盖，是锈石盖。很久很久以前，涪江的一次或几次泛滥形成的沙地。那时河床很高，江水还在对岸。后来，河流开始向村子倾斜，洪水开始刨挖，沙地开始一点点倾倒。再后来，河床严重下切，便有了三杨盖。

别看有灌木有青藤，从三杨盖底下经过，随时都能看见有飞石落下，有沙层崩塌。

三杨盖的河里最好钓鱼。石巴子，红尾巴最多。也有白片子，但得放长线。涨水天的鱼特别好钓，不用钩，不用线，只需在一截箭竹上绑一团蚯蚓，一条条鱼便被哄上岸了。鱼竿拿在手上等鱼上钩。鱼儿上钩的感觉特别的刺激。

龙嘴子

并非龙的嘴巴。涪江一个拐弯处的一片河滩。一个比喻。一个被河雾遮去了一小半的大圆。

同样是河滩，龙嘴子却没有盘龙坝、中坝那样幸运，成

为一座城市。河卵石，河卵石，河卵石，龙嘴子是河卵石的博物馆。还有一种来自高山的叫羊巴莱的灌木，春夏生长，秋冬干枯。大洪水过后，受伤的羊巴莱向着一个方向倒伏，悲怆的壮观，壮观的悲怆，像被激情浩劫过的贝多芬的乐章。深冬时节，冻雨纷飞，或是雪花飘飘，飘在碧蓝的江水里，落在枯干的羊巴莱身上，茫远，萧瑟。那是龙嘴子本色的风景。

1976年学大寨，学沙石峪青石板上夺高产，问荒滩要粮，龙嘴子在炸药包响过之后，在鸡公车碾过之后，在人欢马叫之后，变成了沙地。龙嘴子破天荒地长出了花生、土豆和玉米。收花生的场面像一支欢乐颂。“只许肚饱，不许怀揣”，龙嘴子初露共产主义的曙光。1981年8月，包产到户的前夜，大洪水洗劫了龙嘴子，洗劫了初露的共产主义曙光，龙嘴子变回了荒滩，变回了河卵石的博物馆。



捞柴是龙嘴子一道独特的风景。夏秋时。涨水天。人山人海，遮住了偌大一个河滩，遮住了半边河。男人捞，女人背。也有女人捞的。所谓捞，就是踩在水中，将绑有绳网的长杆扎入深水里，等柴满了，便收起来。不是浮柴，是沉甸甸的实柴。麻绳织的网，钢筋做的圈，枫树做

的杆。为了捞到更多更大的柴，也有光了身子，水踩齐腋窝的。好柴只出在一两个河段，人都往一块撵。密密麻麻的人，密密麻麻的网子，密密麻麻的木杆。有捞到野生动物的，有捞到猪牛腊肉的，甚至有捞到死人的。捞到死人，往河里一推，死人便又跟洪水走了。很多人都吃过捞到的野物和腊肉。据说还有捞到领章、帽徽和人民币的。

洪水滔天。人多了，滔天的洪水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捞柴多在雨天，密密麻麻的人还都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披着塑料布。那些时候，龙嘴子就是一个世界。水送来喝，饭送来吃。夜里也不走，照着马灯。也有夜里江水暴涨淹了整个龙嘴子的，乱脚踏水，一片大呼小叫。为了逃命，人们不得不放弃柴山，放弃背篼、马灯和柴网。也有因涉水过深或起心太大为了抓住一根松木而被洪水卷走的。每每那时，人们只有目送的份。有骑在木头上漂流一两里路才沉没的。救命的喊叫被浊浪撕得粉碎，弥漫着蚯蚓的腥味。

锅砣漩

障子崖底下的一个大漩涡。筏子客的鬼门关。筏子在历经一个胆战心惊的险滩过后，总有冲不出锅砣漩的，在沸腾的回水里打转，直至解散成一根根木头。筏子上的人一个个跳下水，奋力挣脱漩涡的纠缠，游向岸边。总有没能挣脱漩涡的，沉了底，喂了鱼。

也涉及到漩涡的对岸。沙滩。石滩。草滩。有一年洪水过后，锅砣漩出了沙金，肉眼都看得见。有拣到一大捧沙金的，有偷了沙回家淘的。沙金多，但只是很细的一线。俗话道，金隔一层纸。等生产队知道，封存起来，已经没有多少油头了。开放后，有人拔了草皮，竟然也淘得不少沙金。只是颗粒特别的细，像麦麸，叫麦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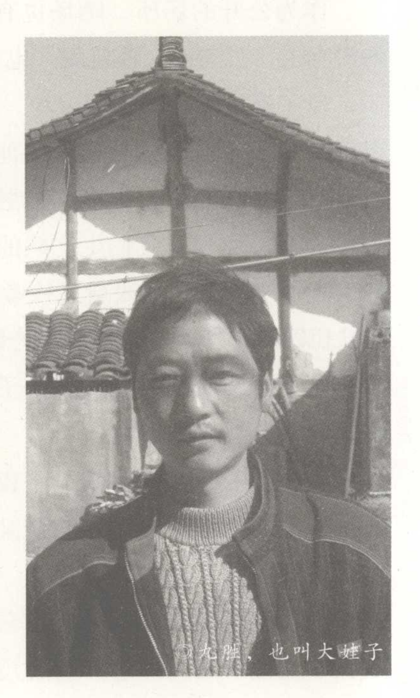
我的公开又隐秘的乡村

乡村是无盖的浅缘的盆。只是盆，不是桶、瓮、罐之类的深邃容器。乡村是公开的，路、路口、石巷、生产队的晒场、竹林间长了星宿屎和魔芋的空地、水渠、河岸、过渡的木船、从东西两个方向通往公路的岩路和土路……无论在阴雨天还是在碧空万里的大晴天，都是属于社员们的脚步和目光的，包括从城里来的寻尸者和钓鱼子。社员搁下刮得溜光的土碗，走出老朽的木门，穿过村子，沿着堰渠或机耕道，去到麦地、稻田、沙地、河滩、山坡——扛着锄头，赶着牛，背着背篼，或者背着淘洗过的莴笋、包儿白、萝卜和刚下树还沾着露水的樱桃，走岩路，绕上公路，去到十五里外的城里。莴笋、萝卜、包儿白、樱桃是公开的，公路是公开的，城里东门外的菜市是公开的，社员的秤斤和城里人的眼睛也是公开的，可是，社员心头有个疑糊，一个揉进了惧怕的疑糊，这疑糊是隐秘的，带着政治的硬伤，随时可能被割掉尾巴的硬伤——资本主义的尾巴是遗忘在伤口的不锈钢镊子。

其实，任何地方都是公开的，一块田地，一片河滩，一截小路，一间草屋……没有一个人在场，或有更多的人在场，都可以被看着是公开。一个人在场，最多两个人在场，便是隐秘了，别说偷，偷青玉米，偷花生，偷人，单是在桑树下独坐，隐秘就已经非常绵密。一个地方的隐秘

来源于这个地方的人。不是一群人，是一个或两个人。人的内心和行为让隐秘浮现。一个饥饿的社员从薅秧草的大部队溜出，钻进旁边的玉米林偷吃红苕。一个小孩在河边坐到天黑，溜进沙地，爬上核桃树，把熟透的核桃摇落一地，再匆匆捡起。公开的玉米林和核桃树因了饥饿者和小孩的光顾，才变得隐秘。

我们总是在傍晚去到生产队的晒场玩逮猫猫。晒场是生产队的首都。林犬娃、玉儿子、九胜、小猫猫、金犬娃也陆续到场。先是喔喔粉儿，手心手背，一个个出局。再是剪刀、包帕、锤子，出局两个，剩下一个“猫”。猫的眼睛被沾满鼻涕的手巾蒙住，再转过身，不是猫的（应该是人吧）便去找地方躲藏。有时也用脏兮兮皱巴巴的红领巾。猫是弦，我们是离弦之箭，分别被射往草垛、高圈、苎麻地、魔芋地、王生喜家的土墙、邓开英家的柴垛。“来得了不？”“来得了！”猫开始行动，四处搜寻，摸到谁，谁就当猫。我怕草垛子里的老鼠，怕苎麻地和魔芋地里的蛇，怕王生喜家土墙上的蜈蚣，怕邓开英家的哑巴，我只有躲在小猫猫家的高圈里。小猫猫家的猪以为我是来给它喂食的，欢快的摇着尾巴，嘴里还不断发出哏哏哏的叫声。猪的叫声欺骗了狡猾的猫，他从旁边走过几乎没往里面看。逮猫猫，一种遍及世界的儿童游戏，完成的却是从公开的地方向隐秘地方的转移。暴露，揭露，发现，被捕，照耀和躲避照耀，遗留了人类童年时代最幽


◎九胜，也叫大娃子

暗的心理特征。

晒场作为公开的另一种形式（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召开社员大会。我的婆婆，地主老太婆，三十年前就死了划归地主阶级的男人，却还是不能免除被批斗的命运。晒场上坐满了人，堆满了玉米。“把地主老太婆王赵氏揪出来！”基干民兵呼啦冲过去，以饿狗抢屎的姿势，提着老太婆的衣领连拖带扛，将她拽上台子。低头，弯腰，认罪。社员都在撕玉米，没有口诛笔伐。被揪斗过的还有我的二妈，富农子女；我的大爸，地主分子。另一种公开形式就是分花生，多在月色朦胧的夜晚，从下院子分到上院子，或者从上院子分到下院子。我们小孩子，忍着瞌睡等着吃花生。

作为公开的场所，晒场也有演出，但不多。知识青年，加上初中班的男女生，三句半，莲花闹，也有舞蹈（《社员都是向阳花》）。“有个孔老二，鼻子流过河，眼屎两大坨，心里怀鬼胎，到处操游说，具体啥板样，很难说恰当，卖国贼林彪，跟他一个样……”掌声响起来。铁姑娘抗美的成都口音最响亮，洋味一直散布到林犬家的燕儿窝街沿。放电影也是一种公开，不只对我们生产队的人，也对竹林盖和河那边的人。河那边的人先是坐渡船，后来就过铁索桥。石头、麦草、背篼、木头都是坐凳。放映机四周是革委会干部、生产队干部。小英，一个已经发育的女孩，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扎两条辫子，在放映机旁边张望。我多么想是她的弟弟九胜，坐她的腿杆。

晒场也有隐秘的时候，午夜或者雨季。批斗会散场，没有硝烟，有的是散落的玉米壳和出没的老鼠。叽叽叽，老鼠从屋梁下来，在社员的热屁股里饱餐，偶尔还有麻雀、相思鸟，跳跳跳，一边躲避老鼠，一边啄吃洒落的玉米籽儿。电影散场，留下的是石凳、草把和花生壳核桃壳。多么像遗址。北风肆虐，卷起垃圾。有人窃窃私语。成都女知青黎和回乡男知青肖在保管室的土墙后面恋爱。搂搂抱抱肯定有，亲嘴肯定有，抚

摸肯定有，因为本能，因为对本能的压抑。这样呼吸急促、心率倍增的时刻，晒场是最为隐秘的，而最最隐秘的还是他们欲望澎湃又恐惧万分的身体。雨季，晒场长了青苔，拌桶长了菌子，保管员闭了门，在里面偷吃集体的花生。这样的隐秘是微弱的，未必是为了安抚饥饿，多半只是为了嘴香。

在乡村，公开或隐秘的还有柴林。青杠林。红菌子、鸡蛋清、鸡蛋黄、吊脚蜂、土鳖头、蜗牛、板栗、木栗是公开的。我们满山遍野跑，采蘑菇，扯猪草，砍柴，打板栗，都是公开的。甚至连遇见鸡蛋清和鸡蛋黄的幸运都是公开的。从金洞破到岩背后，我们在青杠林遇见牛，遇见放牛的小英和披蓑衣的一把手胡玉元，他们公开的嘲笑我们，说我们捡的菌子有毒，吃了会脸青面黑，长出獠牙。胡玉元参加过黑水战役，在城里南街有个女人，退役后带回一颗手榴弹，在龙嘴子炸鱼，中了邪，拉了导火线不知道扔，把右手炸掉了。青杠林的隐秘首先在吊脚蜂，它们的房子多结在黄荆子丛里，路过，冷不防飞出来，专钻裤裆，从生殖器拿出箭，锥你的生殖器。箭头毒液的配方更为隐秘，让你的胯红肿，几日不消。吊脚蜂也叫裤裆蜂。裤裆蜂真是魔鬼身材，样子可人得很，屁股翘翘的，性感得叫人跑电。如此美妙的身体，我不知道它与什么蜂做爱。只有土鳖头和马蜂才能左右这般妖娆又剧毒的身体。

青杠林的隐秘也在我们小孩子。男孩和女孩。搂木叶。烧火。深秋，殷红的木叶萧萧下，面在山坡，风一吹，太阳一照，干透了，搂回家。生火，像洒了油肯燃。搂木叶的享受不只在烤火，也在睡在木叶里打滚。要是跟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睡在木叶里，那就最享受了。四周是光秃秃的青杠树，身上是暖洋洋的冬阳。女孩子要看你裤裆里的曲蟮，你也想看女孩子花裤衩里的嫩姜。曲蟮吃嫩姜。无知，但有隐秘的冲动。那样的时辰，整个青杠林就你和女孩，你们在木叶里结婚，生孩子，将一种公开的生活隐秘地过——也可以说将一种隐秘的生活公开地过。

小庙和坟场是村里人精神的公开地和隐秘处。小庙建在村外不远的传统灵地，砖，瓦，木料，泥塑的观音，红（布），香蜡纸钱，供品。不属于公益事业，自然靠不到社会资助，靠善男信女自已掏腰包，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没钱没物出力。所谓传统灵地，不外乎就是老庙旧址，山的走向，水的流向，人的去向，一一考究。修庙是公开的，与建房一样，掌墨师是掌墨师，帮手是帮手。庙子立起，照样跑梁（一种带有巫术性质的风俗），“登上楼梯第一步，菩萨老爷保佑村里人大发大富……”一直说到第十步第十一步，说到掌墨师登上屋梁。掌墨师提着升子（一种古代容器），走在中梁上，抓起升子里的五谷、花生、核桃和镍币往下撒，边撒边念专门的谱子。婆娘娃娃在下面哄抢。

烧香是公开的。烧香意味着一切，拜佛，拜观音，拜菩萨。但许愿是隐秘的。一个人的“愿”从身体的隐秘处出来，通过嘴，化成言语，化成菩萨能听懂的言语，被菩萨掌握、保佑。在城乡，香客都是另类，唯物主义教育排斥唯心、排斥迷信。即使烧香公开了合法了，但在香客内心，小庙还是隐秘处，跟精神深处的暧昧相吻合。小庙的隐秘还在别样，流浪者的旅店，行乞者的餐馆，是否还有偷情者的温床不得确知。路人或村里人偷吃一两样供品是不足为怪的，菩萨不仅不惩罚，还会保佑，珍爱生命呀！但对于偷吃者本人毕竟是隐秘之为，不只牵涉到食欲，还牵涉到道德。通常的道德是，与菩萨争食物肯定受罚。在小庙偷情虽然有点过分，但真的有了，菩萨也不会怪罪，没有爱的繁衍，哪来这些信徒？再说菩萨是宇宙的通透，跟情爱不应该是对立的，看见情爱，看见制造情爱，菩萨应该高兴才是。说到底，菩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还是人为的，还是道德。

坟场的公开与隐秘不在乎季节、天气。坟场的公开从造坟开始，好几个全劳力，好几样铁器，为棺材准备空间——当然是隐秘的空间。公开的高光部分是葬礼。吹吹打打，哭哭啼啼。柏木棺材、棕绳、杉木杆子、

鞭炮、衣食杯盏、打狗馍、刀头肉等所有葬礼不可缺或的细节都是公开的。隐秘在葬礼之后，在起风的夜晚，在与死者对应的那个活在的人的失眠和眼泪里。某某夜里，死者为那个人托梦，而梦是奇幻、恐惧又令人兴奋的。活在的人梦醒后哭泣，隐秘像一根钢针扎在他最敏感也是最肥沃的神经上。后来的公开像坟场里飘落的青杠叶，干枯，一张一张，看得见背面的叶脉。那是死者的周年或者春节什么的，死者的儿女从四面



公开隐秘的村子

八方回来，烧纸，磕头，放鞭炮，敬烟酒。等与死者相对应的那个人也成为死者，坟场便成为了最终的公开，或者最终的隐秘。出太阳或者下雨，冬天或者夏日，便可以想象了。

乡村还有两件隐秘的事：喝神水和喊魂。神水在小庙旁边，应该是山泉，清澈，味甘，矿物质溶解度大。村里的佛婆婆病了，不吃药，喝

神水好了，叫人都去喝。年轻人信科学，当成笑话听。中老年人病了，想尝尝，毕竟可以不花钱。有喝神水把病喝好的，也有把病喝严重的，但传说的都是喝好病的例子。几十里、上百里外的人都来找神水，提着军用水壶，背着瓦罐，表情是朝圣的。喝神水是公开的，但信与不信是隐秘的。喝冷水怎么能把病喝好，也是生理学的隐秘。一个孩子过渡船受了惊吓，回来后萎靡，就是丢了魂。大人便去到草码头，喊小孩的名字，长声声喊，一路喊回家，“水平子喂，水平子，你快回来呀，你快回来！”就这个节奏。喊了，回来看，孩子好了，振作了。魂是隐秘的东西，但喊魂是公开的。天麻麻黑的傍晚，魂听从召唤，穿着蓝咔叽衣裳，从野外回到了孩子的身体里。

后山

出了后门，便是后山。

一垛墙，两堆坟，三棵板栗树，几笼筋竹子。但要上到后山，还得爬几段坡路。坡路两条，成倒八字，起点都在后门外，去向却各不相同。不是机耕土路，不是石梯子路，而是黄土甬道，是草米子路。个别路段甬深高过了牛，高过了人，甬顶又长了草长了树，人赶着牛走在里头，像是在过隧道。一些路段过分狭窄，牛走在里面，满满的，大一点肥一点的，肉就会被土坎刮着。草米子是一种石头风化过后的颗粒。走在草米子路上，像走在豌豆上一样，稍不小心就会跌倒。

青杠林是后山的裙裾，也是后山的阴部。

菌子是青杠林的仙子，野蜂是青杠林的妖精。

菌子是后山最低等的生命，但她们娇艳又娇贵。红菌子最多。玫瑰红。性感。安吉丽娜·朱莉或玛丽莲·梦露的红唇。开放了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刚出腐殖土的，如伞，如柱，如乳。晨露挂在上面，晶莹剔透，带色，带味，带粘液。是青杠林，青杠菌却不多见，见了，就特别激动，特别珍爱，哪怕在险峻的崖上也要爬上去采。我们叫青杠菌青杠子儿。最稀罕的是鸡蛋清和鸡蛋黄，跑遍整座后山也只是偶尔能捡两

三朵。鸡蛋清呈乳白色，苗条，但一点不显单薄，朵子顶部带一点点草黄，气质儒雅高贵，非常类似于那种出身名门、教育良好而又天生丽质的女人。鸡蛋黄是男性的，柱子茁壮，乳白，朵则蛋黄，看上去极富包容性。但鸡蛋黄的男性也只是江南的男性，不缺乏秀气。

无论鸡蛋清还是鸡蛋黄，都格外水淋，滑腻，粉，带着几丝梦幻。见到她们，采到她们，也会感染上梦幻。

吊脚蜂是仙女，细长的美腿，窈窕的腰身，丰满的翘臀，但又不是拉丁世界的荻安娜或童话王国的莲花仙子，而是《西游记》里那种妖仙。吊脚蜂住在黄荆子一类的灌木丛，稍有风吹草动，便结队出击。吊脚蜂飞翔的姿态端庄优美，一点不失霸气，蜇起人来，又一点不失魅力；她蛰你，像是在吻你，丰润的唇，消魂的秋波，妖冶的脸蛋，她耍美人计，她把像她美腿一样秀气的毒箭刺入你的血肉，一点不失妖孽的毒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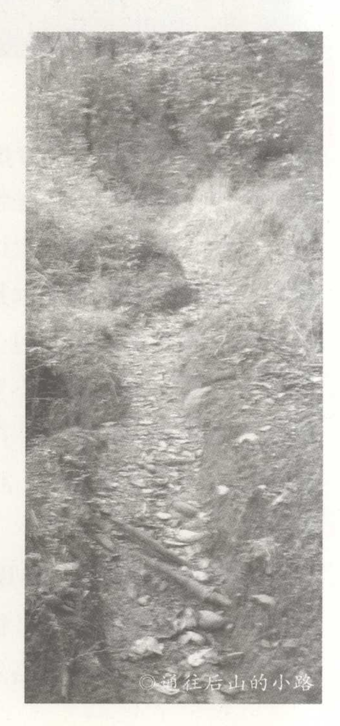
土鳖头是土匪，圆滚滚的，肥得流油，平常躲在泥穴里不轻易行动。偶尔行动，便疯狂地打财劫色，把地痞流氓的本色显示得淋漓尽致。

马蜂包在后山的核桃树上，也有在老青杠树上的。马蜂硕大，敏捷，剧毒，又异常地团结。马蜂是帝国主义者。占据一棵树，就等于占据一片林，没有谁敢惹。那些斗胆披了蓑衣戴了斗笠烧蜂包者，大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出笼的黑压压的马蜂吓得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多日噩梦不断，就是跌在核桃树下肥沃的苕藤里，被马蜂蜇得鼻青脸肿，奄奄一息。

青杠林的美丽与腐朽、神秘与恐怖远不止菌子野蜂一类，还涉及到我的爷爷。据传先前的后山是老林，密不透风，阴森恐怖，老青杠树大得要两人合抱，时常有虎豹豺狼黄麂子出没。与虎豹豺狼一同出没的还有我爷爷。我爷爷是桂香楼一带的大地主，但也只是一个民间立场的地主，从不与官府勾结，唯其如此，官府对他耿耿于怀，想方设法暗算他。我爷爷出身秀才，懂游击战。“你有个龙安城，我有个青杠林，你有个平武县，我有个不见面。”这流传下来的民谣就是对我爷爷的写照。

后山无名，但后山的许多细部却有名。崖背后。龙嘴子。李桂莲家柴林。大柴林。老鹰岩。金洞坡。桅杆坪……大柴林是我们家的柴林，而今我的父亲就在那里，像一根老朽的山药躺在夹着页岩风化的沙土里。老鹰岩就在村子背后，一块巨石栖在断崖上，像老鹰欲飞，让全村子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尤其在那段漫长阴晦的地震时期。金洞坡在村口的上方，有一个金洞子，大得可以摆几十桌酒席。金洞坡有蛮坟，学大寨掘出的，白骨，石板，青砖。青砖上有神秘的暗花。传说有女鬼从蛮坟出来，白天住在金洞子，晚上游荡在青杠林或胡山林家的苎麻地里。桅杆坪立着两根石桅杆。

走倒八字的“撇”上山，要经过大柴林，会看到柴林里一种叫青皮凹一种叫门针刺的树，要走一段草米子路，要爬三级青草坡。青皮凹和门针刺都是常绿乔木，在青杠树都落光叶子的冬天，多少有几分惹眼。门针刺长在悬崖上，远远地伟岸。青皮凹单青油油的皮便足以招人爱，别说柔滋滋的木质了。爱就是伤害。我们拿青皮凹做拐杖，砍地牛。地牛在保管室的三合土地上转，鞭子在我们手里挥舞。


◎通往后山的小路

青草坡是我们的天堂。舒缓，宽阔，美丽。七里香开的时候，水查子红的时候，在青草坡打滚儿，在野花间奔跑，感觉自然是天堂了。在没有见过草原之前，青草坡就是我的草原。还有那三道当年河水按照自己的轮廓塑造的弧线，在鸟语花香里延伸。踩着那些看似飘渺其实是覆盖了青草的土坎的弧线摘七里香和水查子，过的就是神仙的日子了。我不知道是否有


◎桅杆坪

人在仙境一般的后山野合过，我也不曾听说，但我猜肯定有。白云碧空，青草野花。野合不再只是情欲的电光雷闪，更是爱情的原始仪式。

走倒八字的“捺”上山，要经过桅杆坪，会看见那两根石桅杆，会看见石桅杆后面长满灌木荆棘的老坟。

站，即或是坐在梁包上，最好看的是环绕后山的涪江，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却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风景。筏子和筏子客是风景中的风景。筏子顺流而下，绕过崖背后，折过菜包石，冲进锅砣漩，漂过帐子崖，向东，向南，向北，再向东。

站在梁包的西边，悬崖就在脚下，江水就在脚下，筏子就在脚下。我们像平常站在岸边一样唱着童谣骂筏子客：“筏子客，滩上歇，那边湾湾里去不得……”筏子客当然听不见，他们正忙着掌舵扳艄过险滩，碧水

化着白浪，把他们吞进去又吐出来。

最开眼界的是看公路。公路白白的，在竹林里时隐时现。看公路就是看汽车。汽车稀少，望穿双眼才看到一两架，且眨眼就不见了。

我们最想看到超载的汽车，像打屁虫一样，在皇陵庙爬，屁股上冒着烟，号哭着，十几里路都听得见。

我曾经在后山上，与我的一个堂兄兴奋地指点着那一道道神秘的山川。堂兄告诉我，我们省之所以叫四川，就是从这四座山四道川来的。那时我刚刚发蒙，一点不怀疑。我油然而生一种伟大的感觉——四川，对于我抽象得如同月球的四川的得名，居然有我们后山的份儿。

更大的自豪感来自对北方的眺望。后山向北渐次抬升，直到远方神秘的莲花状的山峰。缭绕山峰的迷雾是莲花绽放流出的花蜜。从莲花到后山是一条龙，龙尾夸张地抬升到了两三千米的海拔，而脊背一路低下，直到龙嘴子伸入江水。

北方在远方。北方在触及到天空的莲花巅，远方在莲花背后的背后的背后。一架前苏联的运输机撞在莲花上，落在了花瓣里，二十七位潇洒倜傥的俄罗斯帅哥变成了花仙子。不是传说，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悲剧。

北方的北方是哪里？远方的远方是哪里？还是我那个堂兄知识渊博，说莲花山背后就是北京，说站在莲花山就能听见北京的鸡叫。我爱北京，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却不知道北京离我们这样近。

红军废弃的工事早已坍塌，被青草覆盖。石头上面长满青草。土壕的轮廓还在。七里香和水查子在轮廓上绽放，摇曳，让我们时常把有关红军的电影镜头剪接到后山。我时常想象红军在后山奔走的情形。春天。著名的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青杠林茂密阴森。七里香开了，水查花开了。后山青青。枪声划破水查花洁白细碎的衣裳，子弹穿越七里香雪白或玫瑰红的腰身。政府军来了，红军被迫撤到对岸。政府军占领了后山。


◎母亲在后山青杠林

炮火封锁了涪江。后山在摇撼，死亡肯定有。

然而，后山提供给我的死亡蓝本并不是烟云中的红军或政府军，而是我们村自己的人。桅杆坪的老坟林是蓝本的扉页，吹吹打打的葬礼是蓝本的正文。石桅杆是扉页的标志，不是死亡的象征。鸡屎藤、臭老婆子、黄荆子、狗儿望这些灌木丛和藤蔓才是死亡的象征。不要说钻进老坟林，就是走到桅杆坪，我们的幼小的不谙死亡的身子都会颤抖。净身、裹尸、装棺、作别、送葬、下葬自然是正文的细节。但正文的情节却不在这些，正文的情节在胡玉国和我的那个堂兄身上。

堂兄偷过一回车德英家园子里的蒜苗，被我大爸吊打。是个月夜。堂兄的哭声与求饶声漫过竹林，漫过了整座后山。堂兄找了对象。本村的。记得大哥问起这事，婆婆的回答是“黄瓜还在起蒂蒂”。黄瓜起了蒂蒂，黄瓜开了花花，黄瓜结了果果。但黄瓜早蔫掉了。堂兄死了。死在桅杆坪的金槽子里。

胡玉国是个帅哥。个子，五官，气质，都毫无例外地帅。又上过初中。胡玉国跟河对岸一位女子谈恋爱。那女子也靓。腰身，脸蛋，头发，都毫无例外地靓。那女子坐在胡玉国的床上，织着毛衣。我跟几个小伙伴在窗洞偷看。胡玉国看见了，不骂我们，只是笑。胡玉国是我们村第一个开拖拉机的人。胡玉国把我们村的土豆和梨运到江油去卖。胡玉国把河对岸那个女子变成了妈妈。可是，胡玉国也死了，死得比我的堂兄还早。胡玉国坐在九胜的拖拉机上打瞌睡，栽下去了，被车轮轧了。一个下雨天，胡玉国被人用拖拉机运回村子，血和泥水混在一起，惨不忍睹。

村里的人一次次上到后山，砍柴，放牛，种地，打猎，挖金，又一次次下到村里，但最终还得回到后山。记忆里最早回到后山的是得了肝炎被赶出家门的胡玉荣、白胡子老汉儿胡玉林、当过几年生产队长的胡玉清，然后是我的大爸王生厚、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任忠坊、死于非命的胡玉国和王金勇、参加过川西剿匪的一把手胡玉元……

对岸

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也涂改着我
我在流动
我的影子站在岸边
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

——北岛·《界限》

我最早注意到的不是对岸，也不是此岸，而是创造彼此两岸的河流。河流叫什么，我好些年都不清楚。念书了，才知道叫涪江。但能写对“涪江”的“涪”，已经是进县城念初中的事了。河流绕村而过。向东，向南，再向东，向北，再向东。这个绕，差不多是个半圆。我们的村子就在这个半圆里。河水清澈，但未必见底，有深潭，有险滩，有漩涡，有急流。河里时常有筏子漂流过。筏子，包括筏子客，是我记忆中最早有诗意的事物。“筏子客，滩上歇，那边湾湾里去不得；筏子客，吃不得米，吃了

米，要镇底；筏子客，吃不得面，吃了面，要碰烂；筏子客，吃不得油，吃了油，要啃球。”最后一句自然是骂人的话。躲在河坎的桐子树上，或坐在河滩的大青石上，一边目送筏子从河心漂过，一边唱着歌谣骂筏子客，该是多么惬意的童年。很多时候是筏子队，五六架到十几架不等，场面可谓壮观。我们不知道筏子及筏子客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我们知道他们要经过许多急流，许多深潭，许多漩涡，才能到达他们要到的地方。我们还知道，每漂一回，他们当中总有人要葬身鱼腹，永远到达不了他们要到的地方。

在我们村子东边总是有太阳升起的一个叫障子岩的山崖下面，就有一个叫锅砣漩的巨大漩涡。锅砣漩是筏子客的鬼门关。我不止一次看见筏子在历经一个胆战心惊的险滩过后，没有能冲出锅砣漩，被漩涡巨大的回旋力控制，在沸腾的回水里打转，直至解散成一根根木头。筏子上的人一个个跳下水，奋力挣脱漩涡的纠缠，游向岸边。我不止一次看见有筏子客最终没能挣脱漩涡，沉没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诅咒了“筏子客吃不得米”才让他们遭遇如此不测的。


© 对岸

不管冬夏，总有筏子在我们村前的浅滩搁浅。筏子搁浅了，筏子客便脱得精光下到水里，一齐嘿嗨嘿嗨地喊着号子推动筏子。恰巧，河边洗

衣裳或淘菜的女人看见了，而且看得一清二楚。河流虽叫涪江，但毕竟只是岷山里的一条河，并不像真的江那么宽阔浩淼。站在岸边，就是对岸的人的胡子眉毛也能看清，何况那些球甩甩的筏子客只是在河心。看见了，女人便站起来，两手叉腰，骂筏子客“不要脸”。有的甚至站上鱼嘴或大石头骂。骂的时候，并不拿手去遮住眼睛，而是任凭眼睛在筏子客红黑红黑的身上烧。女人骂了，还觉得不解恨，又捡起卵石往河心扔，一边扔一边还骂：“老娘打断你龟儿那根葱，看你二回还敢不敢脱？”女人毕竟是女人，哪里扔得远石头。石头在远离筏子的水中落下，筏子客停了手头的活路，傻傻地笑。女人这才知道害羞，端起筲箕或木盆，风快地跑了。

坐在河坎的晒簟里看河那边埋死人，算是我的眼睛第一次落在对岸。对岸是我童年的第二世界，也是我理想的甚至梦想的不可捉摸的世界。对岸是一匹随着河流略微卷曲的山。站在岸边，必须将头转动一百八十度才能看完那匹山。那是一匹没有名字的山，但山上的各个部位却都有它的名字。石人。陶家山。母家山。梅子坪。道角。大湾。三岔子。长崩流。陈家。青玉……像所有岷山里的山一样，对岸的山接近山峰的少部分是森林，下面大部分是开垦后的坡地，颜色也因此有明显的差异。山村房屋因地势而坐落。有单家独户，坐落老林边的。有错落有致，分布沟谷山脚的。也有三三两两，隐没山坳丛林的。

埋人的队伍从道角出来，向东，再向南。向南就是上山。上山的路是典型的羊肠小路，曲曲折折。进了青杠林，再进柏树林，最后亮在一片黄土地里。露在外面的羊肠小路雪白，扬起的尘土也雪白。正是干燥的仲春，太阳也雪白。送葬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唢呐也雪白，哭声也雪白。到下午，等我再沿着那根羊肠小路看上去，就看见了一座孤坟。石头垒砌的。插着雪白的花圈。坟前烧着火。升起的青烟把坟和整匹山、甚至整个天空都融在了一起。

看着这些，我突然生出一种欲望，想知道对岸那个被埋葬的人是谁；想知道对岸都住着些怎样的人，他们都有着怎样的姓氏；想知道对岸的山上都有些什么，它们都有着怎样的颜色和味道。我甚至想知道山背后是怎样一个世界。

我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也涂改着我……

我们的村子正对着对岸的山。我们各家各户的门也都正对着对岸的山。我们开门见山。我们的牛羊鸡犬也都开门见山。不只我想知道对岸的山，我们的家畜家禽也想知道对岸的山。对岸的山不只是激发我的欲望和想象力的世界，很可能也是激发我们那些家畜家禽的欲望和想象力的世界。不然，我们家的一只鸭子怎么会游到对岸不再回来了。

一个白太阳的一天，外婆坐在门口李子树下的断墙上，边做针线边跟我讲起对岸的山。外婆也不知道对岸的山叫什么名儿，外婆也只知道山上某些地方的名字。每一个有名字的地方不是一个村子就是一家或几户人家。外婆最爱唠叨的是陶家山。陶家山是对岸山上最著名的地方。陶家山出过一个县长。

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村口，仰头就能看到陶家山。一片坡地。几户人家。稀稀拉拉的树丛。头上是老林，脚下是断崖。冬春白雪皑皑。夏天一片翠绿。我们河坝的麦子都蒸成馍了，陶家山的麦子还在扬花。“别磨蹭了，日头都落到陶家山了！”“赶快回，白雨在陶家山来了！”陶家山是我们村太阳落山的山。陶家山是我们村山雨欲来的山。

听外婆讲，陶家山真正的山雨来自1935年的春天。红军从我们村渡江，直奔陶家山，杀富济贫，吃大户若干天，并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

权。一个在陶家山出生、并长到二十九岁的叫陶思锐的男人，抛弃刚娶进门的媳妇毅然决然跟红军走了。关于陶思锐参加红军的传说有几个版本。有人说他是在大湾的雪窖用砸马刀一口气砸死了五个地主，当场得到张国涛的奖赏才参加红军的。有人说他是在古城赶场临时参加红军的。也有人说他是被红军拉去当背夫才参加红军的。新编县志给陶思锐列了传，说“陶思锐历任红三十军电台摇机班班长、中共第十八集团军三八六旅电台支部书记、硝盐厂长……参加过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1949 年 6 月随解放军进军西北，负责押送弹药。12 月跟随解放军六十二军入川，途经离别十五年的老家，学习大禹过家门而不入，说‘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不回家’”。

陶思锐是 1956 年转业后回乡当的县长。当了县长的陶思锐每天必喝一公斤白酒。陶县长是 1973 年死的。是喝酒喝死的。上世纪七几年的一天，我跟陶县长的一个隔房孙子去过县城陶县长的家，喝过两瓢凉水，吃过半截甘蔗。老衙门。黑。潮湿。但气派。柱子高大而讲究。双扇扇的门，单扇扇的开。我没有见到陶县长，只见到陶县长的夫人。一个病恹恹的老太婆。想必陶县长已经死了。后来听说，那病恹恹的老太婆只是陶县长的一个夫人。陶县长还有两个夫人，一个在陶家山，一个在成都。这个病恹恹的老太婆是陶县长的原配，就是他跟红军走之前娶的那个。陶县长走后，改嫁了陶县长的一个堂兄，并生了好几个儿女。陶县长衣锦还乡后，又抢了回来。

我的外婆一提起陶县长就抹眼泪。红军过的时候，我外婆也刚刚嫁到我们村。我外婆的男人（不是我外公）及男人的父亲都去给红军做背夫了，而那个拉他们去做背夫的人正是刚参加红军的陶思锐。做背夫回来不久，我外婆的男人和他的父亲都打摆子死了。我不明白，我外婆的那个男人为什么不学陶思锐去当红军。没准不但不会得什么“寒老二”，还能混个什么县长市长当当。我自然是不可能见到我外婆的那个男人，我

也没有听外婆描述过那个男人。我不明白，是抛弃新婚妻子当红军的陶思锐可爱，还是舍不得我外婆舍不得家的那个短命的男人可爱。

我外婆后来又结了婚，但不再是嫁人，而是填房。填房的那个男人便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姓袁，但填了房就改姓李了，因为我外婆先前那个给红军当了背夫就病死了的男人姓李。我妈自然也姓了李。我的父亲虽不是填房，却是“抱儿子”，又跟我妈改姓了李，我们自然也都错误地姓了李，直至今日。


◎站在对岸回望我们的村子

最先代表我到达对岸的是我扔出的石子。看见我扔到对岸的本来是属于此岸的石子，在一阵蹦蹦跳跳过后躺在了对岸的青草里，我便在心头默默地说——我要到对岸去！我要到对岸的山里去。我们村的几个游泳高手，时不时都要游到对岸去，在对岸的石头上睡上一会儿，再游回来。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对岸，不在乎对岸的山和山上的事物。他们只在乎游泳，只在乎在婆娘女子面前脱光，在水里逞能。

我第一次到对岸是公社把石灰厂建在我们村之后不久。石灰厂弄了条木船，天天过河运石灰石。坐在船舷上，把手放进碧绿的水中，心头憧憬着即将要踏上的世界，眼

睛看着手指制造的小碧波，感觉到的该是怎样的愉悦和激动。神秘的愉悦和略带恐惧的激动。为了搭石灰厂的船到对岸去，我不知偷了多少我们家园子里的葱葱蒜苗贿赂石灰厂的摆渡人。

站在对岸回望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村子不再是我在此岸看见的模样。而身在对岸看见的对岸的村子，也全都变了样。我感到巨大的震惊和惧怕。我想，哪一天我真的爬上了我向往的对岸的山，那山肯定也就不再是我在我们村子里仰望的山了。我甚至怀疑我的向往也会消失。在对岸看我们的村子，我感觉特别的陌生。我居然不知道村东那排椿树是哪家的，村西竹林掩映的木房子又是哪家的。我的眼睛甚至找不到我们家房背后那条唯一上坡的路了。当然，陌生里也有从未发觉的美。葱浓的竹林。竹林掩映的石墙和瓦屋。雪白的保管室。雪白的土路。一色的青杠林。蜿蜒但流畅的河岸线。我萌生了更大的冲动，我不知道爬上对岸的山、站在它的各个部位回望我们的村子会是什么情景。

由于石灰厂渡船的对外开放，我很快就去了对岸的山，去了对岸山上的很多地方，而且是多次。当然，不是以回望村子或爬山为理由去的，是去背柴扯猪草的。

我首先去了陶家山。我看见了红军废弃的工事。石头四处滚落，野草长得比人深，蛇皮缠在枯树上，蜈蚣肆意爬行。掀开石头，还能捡到子弹壳。让我吃惊的是，在陶县长当年住过的房子里，在一张玻璃板下面，我看见了陶县长当年参加黄埔军校培训的老照片。而让我震惊的是，陶县长怎么穿着美国鬼子的衣服，戴着瓜皮帽，而照片上的那位女兵漂亮得简直就像电影里的女特务。我忘了我是不是隔着玻璃亲过那个女特务。我还去了陶家山东侧的大湾。就是传说陶县长开杀戒的地方。巨大的泥石流留下的谷地。香稔子和豆格渣长得特别茂盛。香稔子是一种香草，我相信它就是就是屈原《离骚》里说的蕙。沾过它的手，再洗都是香喷喷的。而豆格渣的优势不在气味，在形体。它的娇嫩，它的丰满，它

的水性，是能让我们的眼睛生情的，是能让即将进入青春期的我们的心迷乱的。还有野生的荞麦。苦荞和花荞，一样地茁壮，一样的娇艳。不管是绿的叶子，紫红的苔子，还是粉红的花，都让我们兴奋不已。如果说陶县长是对岸的山的传说，那么这些精灵一般的夏天的草本植物就是对岸的山的童话。

我也去了三岔子。也是很多次。三岔子没有传说，只有险恶和血腥。三岔子是两条巨大的沟谷搂抱着的一位美女。那美女就是肥沃的火地和火地里生长的药材。美女的脚下是一条陡峭的雪白的崩流。叫长崩流。长崩流是人工开凿的，用来流放木头的。站在长崩流底下仰望头巅的美女，看见的却是像鸟一样飞翔的石片。我的大哥曾经就被飞翔的石片击中过耳根，昏迷了三天。长崩流是一张裸露的吃人的嘴。被吃的人脑浆迸裂，血肉模糊。我听说过很多有关长崩流吃人的故事，亲眼看见的只有一回。死者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的木头被卡在了长崩流的一条树根上。他去撬。木头撬走了，人也跟着木头走了。花岗岩一般的苦桃木都被摔得皮开肉绽，人能不粉身碎骨吗？

有关三岔子的更大的噩梦涉及到我自身。那是一个冬天。三岔子的雪淹到了小腿。大人们在看药人的木房子里烤火，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外面玩雪。看药人的儿子扛着枪回来了。看药人的儿子是个莽汉，五大三粗，腰上拴着葛麻藤。看药人的儿子进屋就说，没打到，那野毛子奸得很！看药人的儿子顺手把枪倒立在门边。看见枪，我们便不再玩雪了，都过来玩枪。有人想把枪背在背上显摆，有人想把眼睛放在枪眼上看枪筒里究竟装了啥。我没挤进场合。我从腿缝儿看见了扳机。我产生了拿脚去踩动扳机的冲动。我想听扳机啪嗒啪嗒响动的声音。我把脚伸进了腿缝儿，踩动了扳机。枪响了。

在陶家山和三岔子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村子只是一幅图画的一角。涪江在我们的脚下，村子在我们的脚下，村子背后的小山也在我们脚下，


◎对岸，障子崖

只有远方茫茫天际一座耸立着三座主峰的山敢与我们平起平坐。据说那就是著名的摩天岭。

在村子里看对岸，对岸是我向往的世界；而当我站在对岸的山上看到更为广阔更为壮丽的世界的时候，我自然有了更大更强烈的向往。从对岸的山向南，向北，向东，向西，再向西，再向南，再向北，再向东……再到对岸去，河的对岸，湖的对岸，海的对岸，就能够抵达世界的任一地方。然而，这也不过是地理的对岸，地理的世界。我心灵的对岸呢？

我要到对岸去。这时，对岸已经不再是地理的对岸了。这时，对岸已经成了彼岸。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村子还在，对岸的山还在，但曾经为我创造出对岸的碧绿的河流却被疯狂的采金毁灭了，干涸了。

我不知道，一条干涸的河流还有对岸吗？

三处水磨坊

水磨坊，或者水磨房，在记忆的沟回转悠，吱呀吱呀，飘散着面粉和炊烟的味道。水磨房，突出水磨和房子。磨盘，磨心，磨眼，磨齿。花岗石（我们叫麻子石）。阴阳两扇。阴在上，为木架篾绳控制。阳在下，固定在水轮轴上，受水力驱动。所谓转悠，所谓吱呀，都是阳盘的事，最多涉嫌到木架，水磨转动，木架摇晃。摇晃就唱歌。阴和阳，地和天，女和男。

我偏爱水磨坊。水磨都是一个样，不同在一个"坊"字，里面包含了十八般手艺。先是水磨的建造（磨石的选择，磨眼磨心磨齿的打磨，衔接磨扇的木轴的选料和加工，支架的构思和捆绑），然后是附件的打造（面桶——一色柏木，倒梯形，沾上面粉光洁滑腻。上面平摆的两根木棍也是柏木的，箩筛（我们叫箩儿）在木棍上滑行，面粉纷纷扬扬水银一般铺满面桶。箩儿——宽篾的圈，丝或亚麻的纱，手工的钉铆简洁牢靠。"坊"字真正的妙，还在水磨坊这个作坊可供发生的全部细节。开闸关闸，磨盘调试（调老或者调嫩），喂粮扫面，存面去麸，返麸子再磨。水磨坊，就是把麦子、玉米、荞子制作成面粉的作坊，简单的制作里，包含了劳动之外的用心。

水磨坊从遥远的进水开始，到遥远的出水结束，中间利用水的落差，

让长满青苔的水车旋转，水车带动磨轴和磨盘，让粮食在磨盘的咬合中细化，细化成适宜于我们肠胃和口味的面粉。


◎水磨坊都是一个样，不同的在一个“坊”字

长石坝的水磨坊

背着淘洗晾晒干的麦子，穿过竹林盖，爬上岩子头，翻过桂香楼，走公路，到水观音，便能看见长石坝的水磨坊了。路上遇见背夹背的婆娘女子，一头白面，准是从水磨坊回来的。满眼瞌睡，但精神很好，说说笑笑——回家可以蒸白面馍馍啦！头道面，二道面，三道面，你知道吗？麦子进膛，箩出的第一道面粉，就是头道面。头道面就是精粉，白得像“海洛因”。二道面三道面就是箩过的麸皮再磨而成的面粉，稍微显黑，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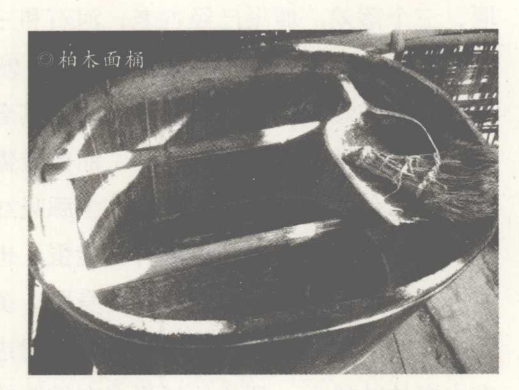
维生素B丰富，可以治脚气。海洛因蒸的馍馍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啃着刚出锅的馍馍在院子里跑，欢天喜地。二道面三道面蒸的馍馍大人吃，夹着豇豆熬土豆，别样的口感。孩子们爱好，太黑了，狗屎，不吃。

长石坝的水磨坊在涪江边一片巨大的枫叶形的田坝当中，有水稻、麦子和玉米林掩映。木架，草顶，板壁。笔直的堰渠从田地的深处来，满满的水泛着青波，触摸着肥沃的水葵的根。偶尔有向日葵独立堰盖，朝桂香楼低头，金黄得扎眼。一栋水磨坊，两栋水磨坊，一共三栋。一条堰，三个落差。堰渠已经古老，河石和三合土垒砌的堰身长了野草、青苔和水葵。堰底是青沙、卵石、锈板，碧水流过，或急或缓，波光粼粼。不时有灌木悬在堰渠，伏在水面，美其名曰水麻叶。那是多么性感的植物，伸展的枝条，修长的叶片，曲美带锯齿的叶边，色情的红果子，十七八的水色。孩子们喜欢拿舌苔去舔吸红果子上的水珠，渗透了果实的蜜液，酸酸甜甜。拿叶子搔自己脸蛋，也是一种很美的意淫。夏天，水蛇在堰渠自由游泳，尽显美女的身段。美女的影子也在水面，传达着水性的旋律。偶尔有蛇在交配中忘情，滑进水磨坊，从木槽飞流直下，缠在水车的叶轮上。那样的情形多在倦慵的午后，水磨闲着，散发着面粉的余味。

我跟外婆多在黄昏时分来到长石坝的水磨坊。如果从桂香楼数过去第一栋水磨坊空着，外婆就放下粮食，叫来磨主子，开门，过秤，打磨课，我就开始消磨时间。天黑了，该睡觉了，我并不情愿跟着外婆走这么远的路到水磨坊来，虽然现在看来，水磨坊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诗歌意象，而且还可能发生现今时代已经失却的情事。我是被迫的，受制于父亲的绝对权威，为外婆搭伴儿。

水磨悠悠地转动起来，就像古老的时钟。夜深了，或者月黑风高，或者月光皎洁，外婆靠在磨盘上，将堆在磨盘上的粮食以一种她早已习惯的均匀推进磨眼。外婆的样子酷似一个精密的机械装置。望着磨盘上小

山一样的粮食，想着夹背里口袋里还有没有倒出的粮食，我完全失去了耐心，纠缠着外婆问“什么时候才能推完什么时候才能推完”。“还早着呢。”外婆的回答简明，她的心在水磨上，在白花花的头道面上。“我宁愿不吃馍馍，也不到水磨坊来熬夜。”我趴在外婆的腿上哭。外婆开始箩面，嘭咚嘭咚，嘭咚嘭咚，充满老年的节奏和面粉的柔性。水磨吱吱，木架咯咯，箩儿嘭咚嘭咚，一部水磨坊的完全交响曲。独白出来，不像银幕的话外音那么清晰，是窃窃私语，在磨坊里，充满夜晚和面粉的双重暧昧。外婆为我讲的故事像一床藏着白糖饼干的棉被，让我在吃过饼干之后温暖地睡去。睡梦中我抓住的是稻草，咀嚼的是腾飞的面粉。


◎柏木面桶

运气并不都是如此的好，第一栋水磨坊已有好几家等在前面，而第二栋、第三栋也早已排起列子。外婆什么都经见过，她的耐心是六十年炼就的金丹。放下粮食，打开一个精小的布袋，她开始装水烟。划亮火柴的时候，我看见她脸颊的沧桑里有一种大度的“慢”。

有时一等就是一个通宵，但不能不等。天亮的时候，我从睡梦中醒来，外婆还在帮人箩面，扫膛，装面，过秤。我们推完磨，往往已是中午。由于有过充足的睡眠，我在水磨坊的上午是愉快的。天不是要黑，而是要更亮，这让我在异地获得了难得的踏实感。我在水磨坊外面玩耍，顺着堰渠逆流而上，去别的水磨坊找同伴，或者独自躲在水柳下面看水蛇交配，或者在便桥上看风如何在远处吹起磨主子女儿的花裙子。外婆一次次把我叫进磨坊，我一趟又一趟跑出去。进水堰里的水是以什么姿态来的、出水堰里的水又是以什么姿态走的、水里都浮了些什么、水闸是

怎样控制水磨的、碧绿的水沿水槽飞流直下为什么会变白，等等，都是我需要观察回答的问题。我看见流水借木槽冲击到水车叶轮，水轮旋转，旋转又带动木制轴承转动。这样的发现令我兴奋，令我隐约感觉到一种物与物之间的机巧。水麻叶长在木槽边，长在出水堰的石墙缝，长在阴暗潮湿的磨池，挂满水珠，本来鲜红的果子在暗影里显得殷红。水闸边有水荨麻，有艾蒿，茂盛过人。我藏在艾蒿和水荨麻丛中，听见外婆在磨坊里唤我的名字。

水磨坊是磨面的作坊，偶尔也兼作别用。偷情和上吊。大勾子婆娘就在长石坝的水磨坊偷过刀儿匠。大勾子婆娘是个在人面前笑呵呵的女人，她打的哈哈让每个男人颤抖，她夜晚的悲伤又是任何男人无法安慰的。偷情多选择磨坊闲置的时节。两个人在红苕地里已经约好，“晚上推磨”。并不同路，而是一先一后。水磨坊里没有别人，关上门，两个人喂粮，两个人扫面，两个人箩面，两个人亲嘴，两个人摸，两个人痛快地干那活。水磨在吱呀地唱，磨坊外面的虫子也在唱歌，没准山边里的狗也在唱，面粉扑腾起来，充斥在空气里，冬天里还有柴火，还有呛人的柴烟。上吊自然是一个人的决断。背着粮食来到磨坊，早早地给了磨课，水闸抽了，水磨也在转，就是不往磨眼里喂粮。磨盘空转的声音和着嘤嘤的哭泣的女声，在午夜显得格外悲凄。水声也在，一种习惯了的干扰，就像舞台的黑色幕布，遮掩着绝望的女人，让她得以安心在水磨坊的横梁上了结自己的痛苦。其实也不是多大的痛苦，只是丈夫的一次不忠，只是革委会主任对自己奶子的一次侵犯。

我不曾亲眼见过偷情和上吊，我只听人说起过她们的名字，平常碰见，也没有把她们当坏人看。一座新坟凸现在上学的路边，有孩子告诉我是个女鬼，在长石坝的水磨坊吊喉死的。我对鬼没有兴趣，我的兴趣在外婆推磨的时候，悄悄地溜出去，把水闸抽过来，把木槽的水突然闸断。外婆在磨房自言自语，怎么不转了呢？怎么不转了呢？刚才还好好

的呀。我赶快又抽闸放水，让磨盘转起来。那样的时候，我有一种快乐，有一种隐秘的控制事物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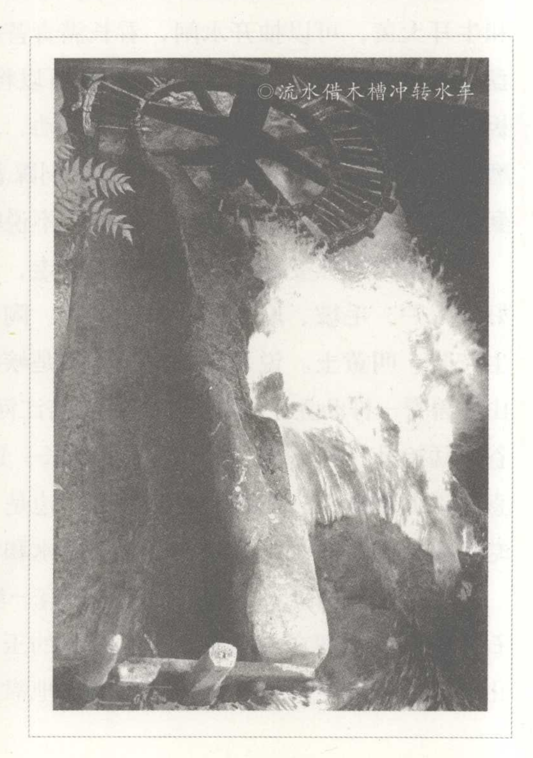
短坑里的水磨坊

短坑里是一片老河滩，有草根、地枇杷、羊巴莱和沙金。地枇杷爬地生长，果实掩藏在叶丛里，是我们美味的水果。草根是我们的甘蔗，在沙坑窖过，水分充足，回味甘甜。羊巴莱是一种灌木，属高山遗落植物，低矮、顽固、卑贱，很可能是植物界的大熊猫。短坑里还有一座坟——四五块河石，两三片破布，没有通常坟的形体，更别说墓碑和朝向了。埋的是婴孩，属于乱葬。乱葬是毫无讲究的。沙石下的破布里包裹的是两个婴孩——一对双胞胎，我的堂兄王金德家的老大老二。从1968年到1975年，足足有七八年，我每次路过短坑，路过那对没来得及取名的双胞胎，都要亡命地跑。特别是天麻麻黑的时候，裹尸的布片被河风吹起，缠在羊巴莱的枝条上飘扬，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

短坑里本来没有坑，为了修水磨坊才挖了一个坑。坑，既是水磨坊的机房，也是采集水力所必须的设计。只是一天，全队出动，修堰（进水堰和出水堰），挖磨池，砌墙。磨盘是多日前打好的，铁一样的麻子石。石匠在挑水路打磨，我们在后山上都能看见听见，只是看见的和听见的不一致，锤子打下去，声音总要拖后半拍。这样的情景让我们觉得滑稽可笑，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明明锤子已打在凿子上，声音却总要过些时候才能听见。水磨坊的房子是事先做好的，楼板也是合好的，盖房子的稻草和篾条也是准备好的，包括水车轴承之类的装置。基础做好了，磨房架子便在嗨哟嗨哟的号子里和密密麻麻的篾绳的牵引中起立。盖顶、装篱壁、铺地板。锯子锯，刨子刨，锤子敲得叮当响。安装和调试磨盘是

卖眼水的活路，需要手艺，有专门的木匠负责。“开水，开水！”“抓一把麦子过来，没有麦子玉米也得行！”水磨开始转动，吱吱呀呀，唱的是同一首歌。磨口吐出面粉，也吐出石粉。歌是新的，嗓子和嘴巴是新的，心子和胸腔也是新的。磨架上的新篾绳里，夹着两个柴块做成的调阀，紧或者放，半转或者一转，足以调整水磨的老嫩。

我没有去短坑里的水磨坊推过磨。短坑里就在我们村子前面不远，外婆不再要我搭伴儿。即便去，也只是捎饭或者捎话，打一头就回来了。在我的印象中，短坑里的水磨坊很荒，草根、地枇杷和羊巴莱都离它很远，堰渠里什么都没有，水麻叶、水荨麻、艾蒿、水蛇，光光的，只有水和石头，只有偶尔漂浮的死鱼。磨房四周也没有植物，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短坑里水磨坊的荒是坚硬的、高亮度的，在冬天是一种冷，在夏日是一种燃烧。我总是在清晨或傍晚放驴的时候顺便闯进水磨坊，摸一手残面，碰一头蜘蛛网，兴趣来了，也拿手推推磨，取下箩儿在面桶上筛，或者干脆抽了水闸，让磨盘轰隆空转。


◎流水借木槽冲转水车

短坑里的水磨坊是个短命的水磨坊，深秋修建，第二年夏天洪水到来便一抹溜光，水磨坊没有了，堰渠也没有了，只是磨盘还在——发洪水的头天夜里，有人卸了磨盘，抬到了挑水路的花生地边。发

大水的时候，比如75年、76年、81年，我看见过许多水磨房，有的已散架为木，有的仍完整无缺，漂流在滔天的洪水中。有一两回，磨房里还有人在呼喊，巨大的泥浪盖过，人去磨房空，销碎一抹惊魂。大洪水过后，河滩呈现出大片质地色泽奇异的沙床，有放牛娃经过，捡到好些南瓜米大的沙金，再弄些沙去水边淘，淘得黄斑斑一片。

拱桥沟的水磨坊

70年代初，我们见到拱桥沟的水磨坊，水磨坊已经是聋子的耳朵了。只是要比聋子的耳朵好，我们可以钻进去，扯磨盘上的刷把签、苦麻菜和牛耳大黄，可以抽开水闸，看长满青苔的水轮飞转，看老朽破落的磨盘在运转中抖落蝙蝠的粪便。我们还可以将水磨房作为藏猫猫的避所——板壁已经坏透，见外面有半截腿杆晃动，立即从篱笆的坏洞爬出，躲进磨房后面的石林或者蒿草——小心，别踩着水荨麻和蛇。水荨麻会劐人，劐得人腿上生亮泡；蛇自然不用说，不说咬，单单触到，就没魂了。

拱桥沟自然要从拱桥进去，往里走，十几公里深，两边的半坡上有好些人户，毛坡、麻子地、赵永生家、陶华家、王光荣家，里面有一个生产队，叫黄土。说是拱桥沟，其实是峡谷，流水挖掘的峡谷，两侧的山像兽脊一样凸立、绵长，一直拖到涪江河谷的冲积地带。过了黄土，峡谷迅猛抬升，谷更深，山更险，水更长；过马家，穿大石板，上磨刀梁，直至深山老林。一边是“虎见愁”，一边是“鬼见怕”，四峰五峰，白雪皑皑。拱桥沟汇集了山峰峡谷所有的溪水和泥石流。

水磨坊在两红岩。进沟四五里，有一坝子，为几块瘦长的田地编织，石头垒砌的田埂在碧绿的水稻、肥壮的玉米或者艳丽的苦荞掩映下，虚化为缥缈的黛青线条。水磨坊就在田地靠外的边缘。玉米正在受精，花

粉弥漫，散发着生殖的气息。苦荞开花的时候，水磨坊无言地停歇着，沉寂破落里呈现出时间的沧桑。娇嫩丰艳的苦荞花的红白和水磨坊腐朽的黛青，诉说着星移斗转的残酷和事物的衬托之美。蝴蝶飞舞，蜻蜓飞舞，春天的燕子和蜜蜂飞舞，夜晚的蝙蝠飞舞，环绕着水磨坊的腐朽，追逐着水磨坊的糜烂。

我们从沟口进来，或者从沟里出来，扯猪草、背柴、捡核桃、打板栗，我们放下背篼，跑进水磨坊，有的推磨，有的捅鸟窝，有的捉蝙蝠，有的爬在地板上透过裂口看磨池的机械装置——多么神奇啊，不再是常见的平式水车，而是立式，形体也要比平式的大若干，气势也要恢弘得多。磨池已经古老，石墙都已看不出石头，被青苔严严实实地覆盖，石缝长满水蕨、水葵、水麻叶。水槽好些年没有供水了，但渗透进的细水从未断过，潮湿依旧，水荨麻长在木制水槽里，茁壮得滋润，滋润得性感。水麻叶照样有果子，而且比在长石坝看见的要大、要红。有嘴馋的顺着水槽下去采摘，被水荨麻蜇起了连浆大泡。也有遇见蛇的，在下面扯嗓子喊妈——蛇缠在水车叶片上朝他吐信子，信子上挂着白沫。

听大人把拱桥沟的水磨坊叫陡立磨，怎么也不明白，是"陡立"还是"斗笠"；是水磨的某种装置保持着"陡立"的姿势，还是推磨的人必须戴斗笠，还是立式的水车像一顶斗笠。可以见得，拱桥沟的水磨坊是一种古老的样式，废弃愈久，遗风愈浓，感染力愈烈，暗示着它曾经吱吱唱歌的风度和听歌人的清苦或者欢愉。

一栋古旧的水磨坊的废弃本身只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个案，但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却是一个迷。是太远了，还是效率太低？是发生过什么比偷情和上吊更缺德或更恐怖的事，震慑住了人们，还是什么水妖逆龙控制了水磨坊？破旧是站不住脚的理由，破旧

可以修复，村子里有那么多的能工巧匠。听大人讲他们去拱桥沟陡立磨推磨的情形，就觉得非常浪漫，真的戴斗笠、提马灯，没准还唱点什么段子。不过那是民国，解放了，大跃进了，拱桥沟的陡立磨就废弃了。

拱桥沟的水磨坊不在水磨，也不在“坊”，而在陡立的样式，在废弃的姿态。水磨只是两扇磨盘，“坊”也早已是过去时，只有陡立的姿势依旧，只有废弃的大度耐人回味，不是艺术，但远胜我们今天怀旧造假的矫情的艺术。我们在拱桥沟的水磨坊表演《杜鹃山》。我喜欢柯湘。我扮演雷刚。我被称为“女娃儿那头的雷刚”。我站在水磨坊前面的大青石上唱道：“见伤痕往事历历涌上心/受苦人/肩上压的都是豪绅……”

水磨坊就是这样，在昔日的河岸沟谷，在已逝的雨季和黄昏，呈现出枯水期的唐诗宋词的意象。意象里有我们孩提时候的影子，有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最悠闲的时光。在记忆的结晶里，水磨坊是艺术，是颓废与感伤，是怀念与纪念。水蛇、水麻叶、水蕨、水荨麻和麦芽的味道，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静物或情境，而是从我身体里抽象出的独特而长久的基因。

长石坝的水磨坊消失于1979年大坪电站的修建。我去县城上初中路过，远远望去，水磨坊所在的田地，早已变成热火朝天的工地。我的母亲站在水磨坊曾经的位置喊我的名字，怎么听都感觉是外婆的声音。拱桥沟的水磨坊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但消失是肯定的。我记不清我是哪一年最后到过拱桥沟的水磨坊的。没有目睹拱桥沟水磨坊的消失，就一直感觉它还不曾消失。这样的错觉让水磨坊的荒芜与美丽永久地偏安于我的记忆，哪怕我的感官和生活在所谓新的时代早已变得庸俗、迟钝。

生产队

生产队是一块伤疤。瓦房石板房是突起的疮痂，家畜家禽是寄生的蛆虫，石墙是裸露的筋骨，泥路是纤维化的肌肉，掉在地上腐烂的樱桃、李子、苹果和梨是新陈代谢的产物。就像所谓散文，伤疤也有概念的大和小，广义和狭义。大散文是指诗歌以外的所有文体，包括小说、戏剧，小散文就是我正搞的这种非情节的文学。我们平常说生产队，仅仅是在说生产队所在的自然村，诸如房舍、圈道、竹林、保管室、晒坝、拖拉机、牛马驴和晒坝边老朽的樱桃树上挂着的半截钢管（我们叫它锺）。其实，生产队的实质是人和田地，人种田地，收庄稼，交公粮，分口粮，把农副产品换来的钱分红给各户（八分或一毛二一个劳动日）。附着在实质上的是红色的泡沫和滑腻的蛙皮，是水泥口袋和日本尿素口袋。愚昧的浪漫主义，极端的政治抒情，看似形而上学的文化覆盖，实则是原始的人性泄密。阶级斗争的风浪拍打着社员劳顿的大胯，情欲转化成兽欲（以呼口号、揪斗的举止）。生产队的田地牵扯到别处，且与邻队的田地犬齿交错，想必涉及到民间史。大盖头、中堰里是生产队最远的田地，已经伸进竹林盖生产队的腹地。我们去大盖头拾麦穗，等于是去竹林盖拾麦穗。秧水从竹林盖的田里流出来，再流进我们生产队的田，我们在感觉到奇怪的同时便也感觉到了公社。民间史就像打断了骨头的腿杆，骨头


◎生产队是一块伤疤

断了肉还连着，肉割离了筋连着。我们生产队居然有保管室在竹林盖生产队，生产队收了稻子麦子并不运回去打，而是在竹林盖打。打了不说，还晒，还归仓。在路上被人追打，就拼命地跑，跑进生产队在竹林盖的保管室。围墙，木楼，木门，三合土晒坝。蹲下来喘气，看见了生产队的人，心就落地了。围墙就是租界，追赶者万不敢冒然闯进，只好在围墙外面打狗驴子转转。生产队还涉及到知青、药地坪、坝坝电影这些边缘的东西。知青来自县城，也来自成都。男女都有。药地坪是生产队在老林砍的火地，海拔两千多米，种药种包心白种甜萝卜。我吃过包心白和甜萝卜，味道一流好。电影在大队或公社放，生产队全体出动，零零星星去，浩浩荡荡回。生产队是一个洋葱，第一层是水泥口袋或尿素口袋的自然村落，不算水泥和尿素。第二层是人，种田地的社员，搞“斗批改”的社员；念书的娃娃，在玉米林里摹仿性爱的娃娃。第三层是拖拉机和粪车，拖拉机进城找副业，粪车进城拉大粪，保持了城乡联系。第四层是知青，面上是明明白白的人，背里却是不安定的元素，前卫，暧昧，有时是教条的符号，有时是本能的符号。第五层是坟地。青杠林，青杠坡，灌木丛，七里香。

院子

院子就是房子。两种元素：瓦房和石板房。瓦房人居，石板房畜生

居。从对岸看，院子是青杠林下边的一排菌子。不是红菌子和鸡蛋清，而是青杠子儿。灰灰的，透着黯淡。生产队保管室在正中，雪白的石灰墙很抢眼，晒坝里金黄的谷子很抢眼。保管室把村子一分为二，西为上院子，东为下院子。上下院子又各有三个小院，上院子有李模清家院子、胡宇林家院子和胡清林家院子，下院子有胡山林家院子、王生喜家院子和哑巴家院子。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任忠坊家是移民户，在保管室旁边，不成院子。竹林、樱桃树、石墙是比瓦房还要抢眼的景观。瓦房是村子的疮痂，竹林、樱桃树和石墙便是医治疮痂的药膏。竹林四季都是婆娑的，盛夏最翠。盛夏，樱桃吃过了，枝叶却依旧繁茂。香椿是渴望天空的树木，在屋脊上空形成秀丽的几何图案。怎么看村子都是隐约的，瓦房、石墙、混了石头的土路。河风像一根绳索，操纵着村子这个巨型皮影。忽闪忽闪，时明时暗。河风有河水的功效，也有灯盏和夜幕的功效，让村子在变换中演绎着光学。河风也有刀子的虚无的锋利，以不见血的方式为我们的眼睛找到了最深的视角。


◎ 铁锺

胡山林家院子已成幻象——我个人记忆的幻象，但它的高大与腐朽还时常在梦境里侵扰我。胡山林家院子一定是某个大地主的杰作，开间和高度都显示出超凡金钱的魅力指数，就是从中梁垂吊下来的蛛丝

也是空前的粗壮和绵长，吸纳的人间烟火能熏死若干蛛丝的制造商。堂屋里的黑也很著名。火熏的黑和不见天日的黑。黑来自积尘和门窗的关闭。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几乎称得上伟大的门窗从来都不曾开过。可以想见其腐朽的程度。蛀虫在柱头椽檩里横行，主人全然不知。主人已经改换，心思不在安危。蛀虫就在眼皮底下，他们也不会在意。竹林树木是朽屋的第一蒙蔽，烟尘是第二蒙蔽——包括亮瓦上的落叶、鸟粪、尘土，门窗是第三蒙蔽。第四蒙蔽是我们的眼睛。瓜藤爬满栅栏，离老屋的黑有着简短却暧昧的距离。瓜藤鲜亮，与栅栏背后的麦子、水稻、苕藤、玉米保持着统一的风格，却与老屋和栅栏形成了对比——生命与非生命。秋天很快就过去了，瓜藤连同身边的植物干枯了，慢慢接近了堂屋的黑。周边的庄稼被收割后，剩下的枯藤成了栅栏的一部分。我忘不了栅栏外面那棵正当年的杏树，它把我的欲望抽成了钢丝。我坐在树上偷杏吃，从不见开过的伟大的门突然双扇扇地开了，出来一个尖尖脚老太婆，眼睛里满是旧社会的仇恨。

胡宇林家院子与我们家一墙之隔，它的侧影差不多刻在了我的视网膜。我爬在墙上喊林犬，爬在墙上看胡玉国修拖拉机，爬在墙上偷吃樱桃，院子的侧影就跑到我眼睛里了。胡宇林家院子像胡山林家院子一样伟大，柱、梁、檩、椽、楼和开间，还不腐朽。最伟大的要数燕儿窝式街沿，搭得下两张大桌，做作业或打扑克。燕儿窝式街沿，屋檐下的挑梁上果真有燕窝，两个，巨大，很对称的。燕子来来往往忙碌，我们也忙碌，她们（在我眼里，燕子都该是女的）的叫声带给了我解应用题的灵感。胡宇林家堂屋也黑，但黑得要比胡山林家好，掉下来的阳尘的烟火味也要淡。他们的楼很高，清一色的松木，我跟在林犬屁股后面爬木梯上去再不敢下来。松木楼板上面放着我们家没有的核桃花生。我们吃着花生揭了头顶的瓦，看见了天。

胡宇林家院子包括了一把手家和玉儿子家。一把手算个人物，打过

黑岩洞（黑水战役），在城里有过一个女人。一把手的手不是在黑水战役中没的，而是在战争结束回来——他藏了颗手榴弹回来，去龙嘴子炸鱼，没来得及扔。一把手是胡宇林的侄子，战争结束后一直寄居在胡宇林家，两间房子，门就开在燕儿窝式街沿旁边。记得我跟林犬进屋去听他讲伪军李承晚，还迈不过门槛，要过爬。一把手家隔壁就是玉儿子家。我们在灶门前听一把手讲李承晚，听神了，便说："莫非你见过李承晚？""那还用说？李承晚被金日成抓住后，一直当反面教材让我们吐口水。"一把手把断手的截面拿到灶门口去烤，粉红的伤痂像鸡屁眼儿一样。好些年，一把手家的大门外都放着一个烫猪的大黄桶，一把手家的萍总是与隔壁的玉在里面"结婚"，多数时候上面都盖着簸箕。

哑巴家院子和胡清林家院子萎靡、潮湿、肮脏。常年的泥泞让我们望而生畏。有一阵，我甚至为那些生长在院子里的果木惋惜。那么柔顺的枝条，那么漂亮的花，那么浑圆的果子，怎么就长在了那么邋遢的地方？胡玉华家的"抱儿子"从黑屋里出来，披头散发坐在屋檐下的石凳上，青鼻涕淌过了河，河一开一合，鼻涕滑进了河道。青鼻涕、眼屎、颈项上的垢甲要远比院子本身的不洁恶心。我只有在追逐一只猫或青蝉的时候，才大起胆子闯进这两家院子。雨季过去了很久，积水还没消散，青苔像地毯一样一直铺到墙根，蚊虫肆虐。我滑倒在院坝当中的泥泞里，手里抓住的是一泡醣鸡屎。青蝉飞进了哑巴家高圈，我钻进去脑壳高望起寻找，小蜘蛛吊进了嘴巴。这只是院


◎胡宇林家院子

子的外部，虽已渗透出内部的毒素，但还不是剧毒；在我的感觉与想象中，内部的剧毒在换儿子或者哑巴的房间：大木柜、篾笆床、黑蚊帐、烂土墙、蜈蚣、跳蚤、虱子、发霉的破鞋、民国时候的阳尘……我终究没有敢进到他们的房间，我一直怀疑他们房间的空气里有看不见的能致人于死地的毒素（至少能致人的审美力于死地）。

社员

生产队的人都叫社员，我们未成年人叫小社员。“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我们真是这样。蓝天，镰刀，太阳，麦穗，牛粪。喜欢。我们去打青，把满山遍野的青苔（此青苔非彼青苔）割回来倒在生产队的茅坑里，青苔浮在粪面厚厚一层，我们一个个站上去，都承载得起。青苔就是春苔，青杠苔，黄荆苔，水仙苔，蕨苔，广东苔……几乎是每一种植物的苔。苔就是当年生的新枝，色青，质水，易腐烂。我们打青，看见了七里香。我们叫七里香刺藜子花。一架架，在陡坡上，蔓延得极开。花白或粉红。“人家不夸自己夸，脑壳上戴朵刺藜子花。”我们总是用这一句韵文打击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伙伴，主要是女伴。我们集体自卑。

作为小社员，我差不多参与过生产队的每一种劳动，插秧打谷、割麦打麦、挖粪背粪、捆草晒草运草、抬田改土、刨水看驴。晒草的动作潇洒，将草把提起一甩，草就立在田里。田已经翻耕，土块巨大，增加了晒草的难度。晒草的技术难度在空心与稳当。空心才能通风，稳当才能久晒。完成技术全在那一甩。抬田改土的政治主题飘浮在空气里，就像涪江里漂浮的死鱼。红旗，标语，鸡公车，鸡啄米的闹钟，雷管，火

药，《人民日报》。我睡在石墙上歇气，总是觉出戏剧的气味。评工分是每一天劳动的尾声。黄昏，黑暗一点点降落，在我们的眼睛里织成灰色的抹布。我们夹杂在大人中间，听记分员念一个个熟悉的名字，然后听社员们评议。决定工分的是年龄、性别、成分、表现和人际关系。我们十一二岁，虽也能背挑扛，工分却是一口价，三分。河风吹啊吹，有足够的北方味道。



我最喜爱的劳动是打麦。打麦分手工和机械化。麦子晒干了，铺在晒坝或晒簟里，用连枷打。连枷在空中翻转，像斑鸠的翅膀，投在麦秸上的影子也像翅膀。连枷打麦有私有制的嫌疑，节奏与场景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机械化打麦是生产队的盛典。标志是两座大山，不是太行和王屋，是麦山。收割的麦子运回来，码在保管室里和保管室外面的屋檐下为一座山，脱离了麦粒的麦草堆在晒坝外边靠近牛圈猪圈的地方为一座山。盛典的音乐是打麦机的响声，它让麦场所有人的说话都变成无声电影里的镜头（或者是声音部分出了故障）。我们能做的只有一种，就是抱麦草。打麦机不断地吐出麦草，跑慢一点就堆起了。我们跑啊跑，把麦草抱上越来越高的山头，还得把没有打干净的麦穗捡回来。草山挨到了树梢，挨到了竹梢，我们伸手轻易就摘到了苹果。咬一口，又酸又涩，扔了。我们在草山翻筋斗。我们在草山打洞，让自己消失。干久了抱草的活，我们便不想干了，我们想接近机器，我们想喂麦。用镰刀把麦捆割开，在案板上

铺平，送上传输带。看着传输带将麦子带进机器，我有一种难言的激动。大人是决不让我们喂麦的。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将自己的手喂进齿轮。打麦机在运转，腾起的麦壳和尘埃弥漫着整个晒坝，女人们包了帕子，还是被尘埃化了妆。我老是幻想在打麦场约会，与一个发育较好的女子分吃青苹果。

张连国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胡山林的女婿，入赘的女婿。我们叫“抱儿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球儿子硬成火炮子。”张连国吊在嘴上的一首山歌，下两句是：“哪个女娃子不让开，起麻子炸成几搭子。”张连国唱起山歌挑粪挑水推鸡公车的时候，谁能想到他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龙嘴子学大寨的时候，女知青黎抗美总爱问张连国：“昨晚上跟胡玉萍睡成一架床没有？”“没有，她一进睡房就把门反闩了。”张连国在前面倒土坎，他手里握的柏木杠子粗大白亮。“那你想不想啊？”黎抗美满脸涨得通红。“咋不想？可她老汉儿说还要等两年。”张连国把木杠插进开裂的土层，使劲地拗。旁边有人开玩笑问，张连国，你总摸过？张连国不答，放下手头的木杠，望着坎下的人傻傻地笑。他的笑里是满足。张连国还是民兵排长，公社、大队、生产队开批斗大会揪人的时候总少不了他。“把地主老婆子王赵氏揪出来！”主席台上话音未落，张连国一个箭步就到了王赵氏身边，手已经伸到了王赵氏的衣领。“把右派分子戴正友揪出来！把地主分子王生厚揪出来！把富农分子张少芳揪出来！把走资派曾德光揪出来！把反革命分子何长青揪出来……”张连国斜挎着步枪，戴着旧军帽，一次又一次地揪人，他像是真的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胡山林家的火炮子响了，张连国结婚了，但胡玉萍并没有被炸成几搭子。在冬水田里，在路口核桃树下，在学大寨改造出的花生地里，我不止一次听见张连国向未婚青年传授婚姻的秘诀。张连国把他老婆胡玉萍的身体赤裸裸地描述给别人，把他与胡玉萍在床上的细节无遮无拦描述给别人，张连国欢喜地笑，露出整排漆黑的烟熏牙。

我的大爸王生厚也是社员，却是戴了“地主分子”帽子的社员。他总是被剥夺开大会的权利、看电影的权利、参加周总理和毛主席追悼会的权利。别人在三合土坝子里听报告、吃红苕干、编背篼搓草绳，他却要上老林背柴，除非要揪斗他；别人进城在新广场听王洪文致悼词，他却在生产队挑大粪；别人抬着长凳去看电影，他却一个人脱了衣裳在饲养场为生产队劈柴。大爸是黑名单上的人，公社的广播早已把通知传到了各家各户。大爸有过一个女人，死了，是个瞎子。大爸跟“高头婆婆”过，跟“高头婆婆”一起挨批斗。“高头婆婆”就是王赵氏。大爸挨了揪斗，脸上还是笑，走过路口的时候照旧与社员同志们打招呼。揪斗过大爸的人见了大爸，脸上也是笑，像是刚从舞台下来，根本没在乎戏里的事，比如张连国。看多了台上台下，真觉得开大会是一出戏，大爸之流的坏人就是戏中人。大爸在自留地里种包心白，松土、除草、灌粪，包心白长成了男孩子的光头，割回来与腊肉熬了吃。“包心白，包又白，找个婆娘莫出息（xie）”。大爸看见剃光头的男孩，总爱摸着男孩的脑壳说。他说的比唱的好。摸着男孩子光头的时候，大爸一定想起了他的包心白。大爸有几次挨揪斗，不是因为成分，就是因为包心白——大爸把包心白种得太出众了，个个都结实得像村姑的小屁股，干部社员一看，阶级觉悟就不打一处出。大爸是个掌墨师，除了在批判会上亮相，还在立房子的现场亮相。大爸既是一个灰色的孤独的符号，又是一个受人敬重的手艺人。在一个无人的午后，我潜入过大爸的工具房，看见过各式各样的木工工具，刨子、锉子、锯子、锤子，单刨子就有好几种，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我见过大爸出扁担，在樱桃树底下搭了马凳，先是长页刨，再是跟头刨，几袋烟的工夫，就把一块木板出成了一条柔韧的扁担。跟头刨短得栽跟头，刨起来灵活自如。要调整刨页的深浅便是拿锤子敲打刨子的头尾，深浅最终由用力的轻重敲打的次数决定。

地震

地震要来的信号最先被石墙洞里的蛇获悉，但蛇不与人通灵，它们钻出来在月光里爬行，我们并不理会。地震要来的信号被秧田的青蛙获悉，青蛙的皮肤开始过敏，青蛙满田满夜晚地叫，呱呱呱，呱呱呱，已经反常，我们却不能破译它们的真实代码。生产队刚刚照上电灯，电压还很低，光亮比煤油灯好不了多少，蚊虫反常地飞，我们却看不明白。对于天，地算不了啥，无论你地要怎么震，震成汪洋大海，天也无动于衷，所以地震要来的那个晚上，天空晴朗如青石板，闪亮的星宿像镶嵌在石板上的狗金子。涪江绕村流过，水声与蛙鸣混响，对岸的山脊铁桶一般卷曲、耸立，直抵天空。

地震与死亡无二，轰隆，哗啦，一秒，几秒，当生产队重新沉静下来，便听得见尖叫、奔跑、吆喝、哭泣和石墙的倒塌。我一丝不挂站在前院的竹林里，抱住一根竹子。父母、婆婆、二哥和妹妹也各人抱住一根竹子。“要抱老的，要抱老的！”父亲在旁边叫，“抱嫩的会断。”电灯已经熄灭，月光在我们突然恐慌的眼睛看来模糊得像糨糊，我们看不清我们怀里的竹子的老嫩，我们谁也不敢松手，生怕松手之间发生地陷，没个抓拿。十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没有发生地陷，父亲第一个松开竹子，跑到茅坑边撒尿。父亲撒尿的声音让我们回到了日常生活的情景，同时也让我们镇静了许多。我们跟着松了竹子，但没有离开竹林——这是父亲的指示，竹子根连根，就是发生地陷，变成了海子，竹子也不会散开，而会像筏子一样搭救我们。

广播响了（奇怪，地震没能破坏广播），紧急通知，所有的人不准在房子里睡觉，都要到生产队的晒坝去，先搭抗震棚。公社的声音。公社就是上面，上面出声了，我们有了魂。队长在樱桃树底下吆喝，说是要开什么碰头会，父亲出去了。父亲回来了，拿了斧头镰刀，连夜砍竹子

砍椿树，搭抗震棚。马灯和手电筒派上了用场。马灯挂在任忠仿家的梨树上和胡玉华家的樱桃树上，手电筒在路口忽闪。我们跑到晒坝里，生产队保管室的广播还在响，“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斗私批修”是我听得最清楚的。

地震还是影响到了天，半夜天就变了。阴云。大雨。冷风。洪水。晒坝有限，抗震棚有限，“地富反坏右汉奸特务走资派”不准住抗震棚——对于我们生产队，被剥夺住抗震棚权利的便是我的“高头婆婆”王赵氏、我的大爸王生厚和我的二妈张少芳。不知为什么我们全家也没有住抗震棚，而是住在自家厅房的篾篷里。父亲把我们从别人家的抗震棚叫回去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被生产队遗弃了。雨没完没了地下，到处都生了青苔发了霉。马灯整夜都挂在大门外樱桃树上，双扇的木门双扇地开，一有余震我们就尥起蹶子往雨坝里跑。二哥摔坏了膝头，我摔掉了门牙。

大河一直在涨水，不是特大，保持着较大的状态，连根树在河里翻，猪牛羊在河里翻，水磨坊在河里翻，解放军的帽徽领章在河里翻。张连国已经变消极，不出工，不捞柴，不揪斗地主，他只想胡玉萍，只想吃一口女人再死。胡玉元一直乐观，“该死球朝天”代替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一只手照样去龙嘴子捞柴。他的那个肉棒棒赤裸裸的，伤痕赤裸裸的，发红，沾了雨水，看得我们心惊肉跳。“该死球朝天！”说起更大的地震，胡玉元很是不屑。“老子打黑岩洞都该死，该死球朝天！”他说的是1950年剿匪。传说胡玉贵一家把猪娃娃都煮了吃了，等死了，但只是传说，说亲眼看见过的人其实并没有看见过。不过，胡玉贵的小儿子小猫猫嘴上的猪毛又像是证实了这个传闻。反正，好几家人都不出门了，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也都吃了，都要发生地陷了，地都要变成汪洋大海了，再省就是傻瓜。我们孩子家不是很知晓这一切，我们捞

柴，也时常捞到鱼，只是不再把捞到的鱼拿到城头去卖，而是吃了。我们捞得一山山的柴。1976年8月23日上午，洪水上涨得疯快，河滩已经无法捞柴，我退到前半年学大寨刚垒的石墙上，哗啦，又地震了，石墙倒了，我栽进了沙地。7.2级。十一点三十分。

地震、阴雨、洪水和对地震的恐惧让生产队停顿、发霉。几乎所有的玉米在成熟前便被吃光。土豆、水粑粑和豇豆成了我们的主食。一山山水捞柴成了我们的财富。天空压得很低，唯有的变化是乌云的厚薄和雨水的多少。桐子树底下的一泡屎，天天都是新鲜的，直到发出鹅黄的芽。传闻黄羊和虎压垮了几座山，积了几个海子，一旦震开，中坝场和绵阳都要洗白——言外之意，我们生产队就不用说了。

就像后来的大熊猫，地震让我们进入了北京和外国人的视野。有一天，我们看见了飞机，几乎是擦着我们房背后的山梁飞过的，我们清楚地看见旋转的螺旋桨和从机舱扔出的东西（我们开始以为是飞机拉的屎，接着以为是压缩饼干，后来以为是鸟，等飘到稻田里才确认是传单）。飞机降落在了县城方向，很多人都撵去看，张连国，胡玉国，胡兴全，胡玉元……我没有去，十七八里路，等跑到，飞机早飞走了。我捡了一大抱传单读，是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慰问信，红色和白色。我不激动。要真是压缩饼干，我才激动。

在地震的阴影里，毛突然死了，阴影一下子转化成了黑纱黑孝套黑衣裳黑幕黑遗像。唯一不黑的是用秋蚕茧编织的白花。

农 事

拣稗子是富有艺术味道的集体劳作。七八月的雨季，天空阴郁但却洁净，缠绕着对岸山峰的云雾潮湿而轻盈。江水涨了，但还不至于泛滥。

泥泞的田间小路上满是脚印。蚯蚓在脚印里翻转，蝴蝶栖息在大拇指上。社员站在稻田里，以包围的姿势在拣稗子。“我们一定要打好这场歼灭仗。”队长王生喜一边掏着裤裆一边说。不知是稗子还是虫子钻了进去。稗子大多高出水稻，抽出的穗也与稻穗截然不同，很好认。男社员拣稗子慢，身后总有被遗漏的。女社员拣稗子又拿手又愉快，说说笑笑，偶尔还捉蝴蝶、拣蝉蜕。男男女女在稻田里，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从赵家园园到大盖头，只看得见上半身。要是云层突然破开，出了太阳，头上便又齐刷刷戴了草帽。草帽上的红字很显眼，不是“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斗私批修”。擦黑回来，一人一背稗子。稗子是毒草，毒到了不能喂牲口不能倒进圈踩粪，只能堆在江边，让它自个儿腐烂。

“双抢”是生产队密度最大的活路。抢种抢收。收麦子，种玉米、插秧。麦子黄了整个河谷，河风吹来翻金浪。要是不及时抢割，遇上雨水，也会发霉，发芽。竹林盖的麦子收归竹林盖的仓。第一步是收到凉房子底下。割，捆，运输。百分之九十的人力，百分之十的机械力。板板车和拖拉机。不是夜以继日，也是披星戴月。中间打尖儿，老茶树熬的水，老胡豆熬的米汤。我们抢着喝，喝胀了，倒在桑树的阴影里睡。蛇在旁边的堰渠里游，我们的梦被毒辣的太阳晒裂了口，淌出来好多口水。车德英、张少芳、安华珍、胡玉秀、邓开英、龚秀珍、胡生林……她们脱了外衣，只穿着汗衫。汗水打湿了她们的胸口和镰刀，太阳把她们的脸晒得像刺藜花。她们哺育过好几个孩子的奶子拱在汗衫里，与身后收割后的麦地保持着同样热烈的沉默。张连国放下镰刀伸起腰，点燃一支纸烟，又在想床上的事。这一次他想的不再是胡玉萍，而是成都知青黎抗美，他已经尝过胡玉萍的滋味，他认定城里的女人与农村女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打麦总在艳阳天。男人，女人，小孩。声音已经被打麦机封锁，你就是对你想的女人说最下流的话她也不会听见；但你说了，会很满足；她

看见了你的口型，也会很满足。打麦场是最适宜调情的场所，喧嚣、公开、临时，在传输带旁边偷偷摸一把别个女人的奶子，没有人会太在意，在沙漠一样的新麦粒中揩女人的油，连女人本人都在梦想。打麦场也像是个舞台，允许演政治片，也允许演生活片，只要不够三级，问题就不大。打麦场公开，就是有冲动，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冲动，不像在庄稼地里或房子里，故事一旦发生，便收不了场。

插秧没有什么情调，一腿一手的泥，蚂蝗也会作怪，一直爬到你的那里才张嘴。麦田关了水，犁了耙了，田埂也糊得溜光了，捆成把的秧苗丢在水面上，桑叶依旧绿，依旧阔，社员下了田，栽出一行行的秧，稀疏，但绿。这个时候，插秧有了点意思，田野有了点意思，生产队的社员有了点意思，进了山水画。

桑叶绿了，阔了，生产队准备养蚕了。准备包括腾房子，扫地、打阳尘、抹灰、摆放蚕架；包括洗刷簸箕、晒簟，它们一旦被放在蚕架上，就是蚕宝宝的家。也包括消毒。戴口罩的男人背着喷雾器走进蚕房，一只手举喷头一只手加压，药雾弥漫在蚕房里有一种医院的气味。女人在一点点退却，不时发出尖叫。不晓得喷雾器里兑的是什么药水。养蚕人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漂亮的爱干净的女人。身上臭烘烘的女人会熏死蚕子。有臭女人不信邪在月夜潜入蚕房，次日一定看得见簸箕或晒簟里有蚕子死去。养蚕便可以不去背日头过山，躲在凉房子里做轻巧活路，摘桑叶也都在早晚。蚕种由公社配给，刚拿回来叫毛毛蚕，色黑，类似秋天的黑么子。细碎的桑叶撒在毛毛蚕上，没看见吃，却看见了吃过的缺，听见了吃的声音。在我的印象中，毛毛蚕总是在一夜之间长大变白的，它们还是幼蚕，很年轻的个子，很年轻的嘴脸，很年轻的气味，但它们变白了，肉感了，它们吃桑叶的响声越来越像下毛毛雨了。爱干净的女人早晚都在摘桑，大背大背的，她们走路的样子有些扭捏，惹得没有养到蚕的女人在背后吐口水。养蚕的女人在保管室外面晾桑叶（蚕宝宝沾不

得露水和雨水），桑叶上的露水亮晶晶的，硕大，足以让一百只蚕宝宝窒息，而她们扭摆的屁股和毫无依托的奶子足以让包括我们这些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小男孩在内的男人心动。

蚕子以几何倍数增长，一簸箕变成了几簸箕几簟，桑叶的需求量也大增，不几天，田埂上的桑树都变秃了。蚕子又肥又大，贼亮，吃桑叶的声音也有了暴力倾向。刀子。割。拣老蚕需要全体行动，把大捆大捆的油菜杆放上木楼，再把拣好的老蚕放上油菜杆。油菜杆不够，麦秸杆也可以。拣老蚕多在晚上，换上三百瓦的灯泡，一双双手在簸箕和晒簟里忙，婆娘娃娃，沉默或笑骂，蚕子成熟了，要睡了，它们不晓得了活着的乐。我不曾看过老蚕在油菜杆上睡眠的情形，不晓得它们被“请”上“树”之后是否还要行走，不晓得它们吐丝是一根一根还是一把一把，我看见的全是一个个雪白的蚕茧，挂满了“枝头”。我知道蚕茧里并非空空如也，而是有一个蚕子的遗体。蚕子的遗体安详，但丑陋，据说蚕茧站的人爱油炸了吃。我不知道在蚕茧与蚕蛹之间是否还存在一个第三者，比如美艳的蝴蝶，但我知道那些喜吃蚕子遗体者是丧失了想象力和信仰的人。

摘蚕茧便是跳丰收舞，早晨或傍晚，喜悦始终是主旋律。蚕茧成了生产队的经济作物，不再与蚕宝宝有关。剩余的蚕还在簸箕里，养蚕的女人眼里已没有了蚕，蚕茧遮蔽了她们的视力，异化了她们爱的本能。养蚕的女人哭泣的时候，一定是蚕子病死了，她们猩红的眼睛里有自己都不懂的悲伤与疯狂。她们把一簸箕一簸箕的死蚕倒进茅坑，肥硕的绿苍蝇寸步不离她们。喷雾器与男人再次亮相蚕房。“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住在蚕房隔壁的知青只是在背诵古文，与蚕事无关。

1976年秋天，第一拨秋蚕刚刚上“树”，毛就死了。一下子，蚕茧的用途不再是卖钱，而是编制白花。除了养蚕，农事全部停止。我们成天在保管室做白花，每人一朵，不只为自己做，还为城里人做。知青是老师，社员是学徒。秋雨绵绵，桑叶生了锈病，蚕子死得多，产出的茧也

发黄，编制出的白花也是屁黄屁黄的。每个人都含着眼泪，他死了，天都哭塌了，别说人。我们把白花戴在左胸，从9月10日到18日。那一年秋天，政治牵涉到了农事的内部，蚕子意外地成为了牺牲品。

大盖头

大盖头在竹林盖。正确的读音是大盖透。涪江的下切与拱桥沟的冲积留下的低岸，被老祖宗因地制宜开成了梯田。上学的小路穿过梯田，一直延伸到沟渠里。没有核桃树、桐子树一类高大的乔木，只有被人工修剪得规规矩矩的桑树。走在大盖头的人只露出个脑袋，太阳毒辣的时候，那脑袋便在燃烧。站在竹林盖保管室外面的竹林边看不到大盖头，但看得见走在大盖头的人的脑袋，忽闪忽闪移动，像是浮在水上。一个人从沟渠里过来，到了杨凤春家门前，晃荡在核桃树背后，身体分明是全的，男女、衣裳的款式与颜色、头发是披起的还是盘起的都看得一清二楚，但一到大盖头就只现个脑壳，多数时候是半个脑壳。

社员在大盖头打谷子，人是错落的，梯田夸大了透视的效果。在麦子和谷子黄之前，大盖头是错落的绿；收了麦子和水稻，大盖头是错落的空旷。六月天我们在大盖头拾麦穗，从一块田跳到另一块田，我们身上燃烧的火苗也是错落的。张连国在上面的田里唱骚歌，女知青黎抗美在下面的玉米林里拉屎，骚歌传到了黎抗美的耳朵里，大盖头有了色情的意味。金黄的稻穗依偎着苦楝木拌桶，汗流浃背的社员坐在田埂上喝大碗茶，打谷的声音停止了，大河的水声清洗着人们沾了谷壳的耳朵。社员对打谷声一致的翻译是：捆草——吃球，捆草——吃球。

看见大盖头围了一大堆人，便挤拢去看。一个死人躺在地上，两个老头儿正把他往一条铺好的草席上捧。旁边站着城里人，一个憔悴的年

轻女人在啜泣。有水不断从死人的嘴里鼻孔里耳朵里流出来，流在草席上一滩滩。打开一匹白布，开始裹尸，一人裹，一人帮忙。我本能地后退了几步，还是闻到了尸体腐烂的恶臭。我认识那两个裹尸的老头儿，都是竹林盖的刀儿匠。我多次见过他们杀猪，见他们裹尸还是第一次。那天下午，我在大盖头一直坐到擦黑，望着装有黑漆枋子的板板车走过中堰里，上到桂香楼，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感伤，死亡由此走进了我的感觉与冥想。

地名的外延决定了大盖头底下的河流也叫大盖头。一条废堰，几山巨石，几窝茅草。再就是险滩。两条险滩，分流两岸，中央是一块有着铧铁形状的沙洲。涨大水的时候，沙洲总会被淹没；洪水退去，总有木头和动物尸体搁浅。上学路过，总能看见有人脱了裤子凫水过去，占了木头，再一根根钉上钉子用绳索漂牵过来。站在沙洲上的男人显得很渺小，但火窑裤却很显眼。我看见一条水蛇在险滩畅游，她的那个畅啊简直就是速度与妩媚的合谋，她不时抬起头，扭着碎花的脖子回望，眼神里有妖的美丽与邪恶。

又一次在大盖头看见死人。一块红布在沙洲边的水里时隐时现，走近便看见了屁股和半截露在河沙外面的腿。人已经聚集。铁姑娘——正在专业队战天斗地的女民兵从沟渠里一路狂奔过来，肩上挎着三八式步枪。“我的同学，他是我的同学！”铁姑娘没有眼泪，只有惊讶，“他是在城湾里洗澡被冲走的。”一个高中男生，胡须刚刚变浓，就被跳河鬼找到了，变成了沙洲上的红窑裤。张连国自告奋勇，脱得只剩内裤——也是条红窑裤，要去沙洲拖死人。铁姑娘不领情，她要自己凫水过去，亲手把她的同学领回家。铁姑娘脱了长裤，没脱衬衣就跳进了急流。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铁姑娘游泳技术好得惊人，一排排自由泳（我们叫扯尥巴子）过去，就拢了沙洲。铁姑娘把她的同学拖出水，坐在他身旁，眼睛却望着大盖头。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我知道她在哭泣。三八式步枪挂在桑树

上，没有人知道里面是否装有子弹。

口头禅

“又莫人把路撬立起”。药地坪是生产队海拔最高的外延。砍火地，种


◎大盖头

药材，种包心白，种甜萝卜。小孩打吃过大人背回来的包心白和甜萝卜那天起，就琢磨着上药地坪。大人上地坪也要“上街打铁，一天到黑”，别说小孩，所以每当有小孩吆喝要上药地坪，大人便说：“又莫人把路撬立起？”小孩听得出是反话，只有在生产队外面的青皮树底下嫉妒的份儿。然而，大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忘了，通往药地坪的路还真是立起的。从桂香楼上梁，坡度就超过了六十度，从箭豁垭上马家上磨刀梁，坡度差不多接近九十度。立正正的草米子路，穿上草鞋戴上脚钉也打滑。羡慕药地坪，向往药地坪，别人是为了吃，我是为了看风景。你想想，站在高到了天的山峰看底下，看生产队看大河看公路和公路上的汽车，该是

怎样一番景象。高到了天的山上自然有不同于河坝里的树木、菌子、野花野果和动物，亲眼看看亲手摸摸，又该是怎样的滋味。至于说站在药地坪遥望北京城，我倒情愿把它当成一个神话。

鸡叫头道，大人们便起了床背起东西出发了。我们连石墙和樱桃树的影子也看不见，黑像墨汁一样充满夜晚。想从公鸡的打鸣找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也是妄想。早上起来，大人的床早已冰冷，他们正走在通往药地坪的路上。有一两回，我头天晚上便打死也不上床。我准备好了我的小背篼，甚至还装上了没有封皮的《狂人日记》。我在黑夜里追赶大人，哭着嚷着。大人停住脚步，咆哮着："走啊，你走啊，又莫人把路撬立起？"前面是水汪汪的黑暗，传说中的女鬼随时都有可能牵着裙边出来，我怎么敢走？

与"又莫人把路撬立起"相匹配的是"又莫人请个爪手子把你拉到"，但想象力不及前者。

"大河又没有闶（kang）盖盖"。生产队的地主分子就我"高头婆婆"和大爸两个，批斗小会总是翻过来炸牛皮翻过去牛皮炸，单调没劲，富农女子张少芳便候补上台。张少芳为了降成分从城郊嫁过来，没想到成分还是上去了。"把富农分子张少芳揪出来！"张连国小跑过去，张少芳全身已在筛糠。"少芳婶婶，你莫怕，我不会把你弄疼的。"张少芳真是怕疼吗？张少芳被揪上台，粉白的肌肤变成了惨白。"少芳表嫂，你态度好点，少受点罪，往后这样的时候还多。"贫协组长胡清林把嘴触在张少芳的耳根上说。张少芳是个女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准备，也悟不出个名堂，只晓得哭。蒙了泪的张少芳像沾了水的泥菩萨，里里外外都瘫软了。其实，批斗小会更像一出社戏，并没有像广播里说的那样"既要触及肉体又要触及灵魂"，在我们孩子眼里，群众的声讨好比是配合剧情的响应，并不代表群众的思想感情。然而，张少芳却不以为然，她的感受要深邃和绝对得多，每次"陪斗"之后，她都要寻死卖活。张少芳的家

人乃至全生产队的人都不拿她的被揪斗当回事，她自己却已经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雨季，秧田埂上的泥泞有政治的粘滑与邋遢，巨型蚯蚓在腐烂的麦草里横行，稻苞虫已成气候，张少芳提着破鞋一路小跑，露出的小腿惨白见荧光。“我还有啥子脸见人？我还有啥子脸见人？”秧田过后是花生地，张少芳坐在花生地边的磨盘上呼喊。细雨。湿风。乌云。洪流。张少芳脚上自带的泥泞。组画的底色是绿，葱绿，绿到了墨。也有小块的翠绿，在花生地的边缘，或者在篱笆背后的菜地。白有三种：张少芳脸庞的惨白、小腿的洁白和远处河雾的乳白。乳白是背景，惨白是主体，洁白是眼儿。“少芳婶婶，你要想开些，这年头，也只有想开些哟。”头几次寻死，自然有人劝阻。张少芳不听劝阻，奔河而去。洪水还不够凶猛，但已是泥浆，张少芳站在水边，两眼茫然，把一个凄惨的背影留给了全队社员的眼睛。劝说无效，呼喊无效，拉扯无效。“去死去死去死，大河又没有阋盖盖！”王生平第一个放出这句话。“去死去死去死，大河又没有阋盖盖！”张少芳的两个儿子跟着放出这句话。张少芳开始涉水，一步步涉水，向着急流，她的背影是我们熟悉的视死如归的背影。张少芳停下了，坐在了水里，水漫上了她的腰，且只漫上了她的腰，她嚎啕大哭：“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去死去死去死呀，大河又没有阋盖盖！”王生平在岸上吼。他过过鸭绿江，押送过阵亡士兵的尸体，也没有能把自己婆娘的成分降到中农的水平。

与“大河又没有阋盖盖”相匹配的是“吊喉找大树”，同属于祝死辞。

“但球疼。”有言在先，把此话当粗话的人是伪清洁者和无知者。

“嘿，晓不晓得，张连国当了民兵排长？”“但球疼。”“听说任忠仿家招平在一个叫九0三的啥子背密厂矿造导弹！”“但球疼。”“今年王生喜家宰的过年猪最大，给国家交了任务都还剩一百五十多斤。”“但球疼。”“生产队就胡宇林家日子过得匀净，每个月要吃四回肉。”“但球疼。”“还是长青娃找的婆娘周正，胸脯子肉鼓鼓的，脸盘子粉彤彤的，生起娃娃

做起活路都不赊三欠二。”“但球疼。”

“但球疼”是一个绝对否定句，看起来否定的是某些具体的事件和现象，实质上否定的是存在本身。好但球疼，坏但球疼，幸福但球疼，痛苦但球疼，什么都但球疼，一切都但球疼。

但球疼像一条麻绳，只要连接到你的神经，就能把上面的拖到下面，让众人平等，让众心平衡。但球疼的心理不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但球疼的哲学是虚无主义的哲学，但球疼的气质是洒脱不羁的气质。但球疼的背后有小农意识，有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有死亡意识。

任忠仿参观大寨回来，坐在路口的樱桃树下把婆娘女子的耳朵都吹立起了。太阳从树枝树叶的罅隙透进来落在滴满鸟粪的石板上，晃荡着毒辣。核桃正在收浆，青色的丰腴里透出不易察觉的暴力。“我参观了大寨回家乡呀，大寨的娃娃都有这么高啦……”任忠仿一边唱一边伸出手比画。“但球疼。”长青娃背着冒闪闪一背稗子走过来说，稗子上还歇着只麻雀。任忠仿看看长青娃，吃一口纸烟，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

“虎头山上炮声隆，苏修是个屁爬虫。”长青娃在路口唱，稗子上的麻雀飞走了。

与“但球疼”相匹配的是“但屁疼”，力度要轻得多。

知青

知青无知。第一个从县城来的知青的灶打在胡玉贵家的屋檐下，每次架火，总是架不燃，屁股翘起吹啊吹，看着大冒小烟，可马上又熄了。他煮的饭一定很难吃，稀饭像干饭，干饭像稀饭，菜就更别提了，猪草——住在对面的邓开英尝过一筷子就是这样说的。哑巴每次过路，看见他围着灶台团团转，都急得快说话了，昂昂昂，还摇头，还

跺脚。哑巴的摇头意味深长。知青托着碗在胡山林家前面的路口一边喝稀饭一边唱“洪湖水浪打浪”，我把脑壳伸过去看，看见了鱼——是画在碗缘的。他出过工么？我没看见过。我晓得他姓李，初中没毕业，穿劳动布工作服和小管裤，形象和装扮都是工人阶级的，看不出一点知识分子气质。他唱歌吗？我从来没听见过。他住在胡玉贵家，胡玉贵家的房子又矮又黑，我不晓得他是怎样受得了的。倒是好几次看见他在桂香楼的公社医院擦蓝药水——最不幸的是一天他的脑壳在门楣上碰了六个青包吊着。

接着来的知青叫张明向，父亲是西门外养马的，却要有知识得多。他拉二胡呀，在胡玉华家屋檐下，咿咿呀呀，歪搭着脑袋，眯着眼，美死了。天天收工回来，都坐在夜幕里制造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声响。都跑去看（不是听），看西洋景，他不在意，他拉呀拉，弯弯绕绕，自己大凡也顺着弯弯绕绕走失了。我仅能听懂一曲：“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



◎胡玉华家老屋

不能买；割上了二尺红头绳儿，给我扎起来——扎呀么扎起来”。雨季，张明向不出工，从早到晚地拉，没一人看也拉，边拉边唱，那感伤啊，我现在都不懂。知音知音，说的就是音乐，就是张明向。

女知青李正秀来了，住张明向隔壁，张明向有了知音，有了一个听二胡的人。李正秀清秀，长头发掩映的脸苍白，眼睛怎么就没有少女的干净与热辣，而有一种很是与那个时代合拍的忧郁。张明向在黄昏里拉《二泉映月》（我猜想），李正秀在黑暗里落泪，并且身子发软。二胡拉到深夜，声音越来越低沉，直至呜咽。夜晚让曲目变调，让年轻的生命又空洞又深远。我不曾在夜晚看过张明向演奏，但我想见得到李正秀在啜泣之后投入音乐家怀抱的情景。雨季的阴暗，比1976年来得要早。青苔，或者水葵，当然还包括腐水上肆虐的蚊虫，都是他们年轻的存在的见证。雨水洒在石墙上，水沫飞溅，闪烁的光亮胜过太阳。一泡泡被雨水打得散乱的鸡屎，是二胡呜咽的理由之一种。

张明向与李正秀同居了。这样的传说叫我们振奋。当二胡演奏转移到破败的木屋时，我跟任九胜爬上了胡玉华家窗外的椿树。炎热的午后，床上空荡荡的，并未见得我们想象的场景。演奏还在继续，转动的单扇的木门暗示着知音的心情。

张明向很快便回城了，意外而不正常。应该是深秋，院坝的青苔干枯了，却依然再现着雨季的情境。风干的鸡屎已成遗迹。社员们围拥在胡玉华家房前欢送张明向。气氛是热烈的，类似于婚嫁。临走的时候，张明向站在干枯的青苔上拉了好几曲。张连国抬来高板凳让他坐。外面路口有车等着。我坐在靠近竹林的断墙上远远地听，感觉到的全是大人的神秘。

张明向走后，李正秀消失过一段时候才复现。李正秀与张明向正式结婚后回过生产队，我在胡玉华家门口看见过几张水果糖纸——但没再听见过二胡。

成都知青黎抗美说话的口音像刀锋，削薄，擦音有浓重的口腔感，那刀不是用来杀戮的，倒像是用来削水果或剪裁丝绢的。成都音是黎抗美最洋的地方，多年之后我遇到一位成都知青出身的英语老师，仔细观察过他的发音，他的发音要比我见过的任何地方的人讲究，吃饭的“饭”，算了的“算”，只要有“an”，不管是需要嘴唇聚拢还是后拉，他都发得一丝不苟，而且每个细节都讲究到了极至。再则便是她身上体现的大大咧咧，潇洒，甚至放荡。黎抗美走路总像是在蹦跳，夹道的樱桃树和桑树时不时总能得到她的抚摸，歌声飞扬，而且是爱情的，惹得生产队的小母驴脸红。我们不时悄然跟在她的屁股后面，观察她，模仿她。在龙嘴子抬田改土现场，黎抗美成了所有女青年的中心，挖土、刨土、推土、运土，都愿意贴近她。她一边刨土一边讲成都的厕所不分男女，只是翻转门上的纸牌，有男孩想看女孩解手，故意把男的翻成女的。讲到兴头上，黎抗美停了手头的活，拿锄把撑着身子，眼珠在身边的人脸上滚。身边的人也停了活路，望着她，她们的身体已经有了欲望，只是还不曾满足过，她们渴望着。黎抗美哈哈大笑，她们也哈哈大笑，只是她们的笑慢了整整一拍——女孩入厕了，褪了裤子蹲下，男孩却没有勇气看了，一直屏着呼吸等女孩完事离去——不晓得那厕所有几个蹲位，要是再进来一个女孩，或八个女孩，那男孩可就惨了。

黎抗美的老爸开了卡车来，卡车开不进生产队，停在桂香楼。黎抗美跑到桂香楼接老爸，我们跑到桂香楼看卡车。我们看见了黎抗美哭，趴在她老爸肩头。半新的十轮卡车停在天堰底下，黎抗美变成了个小姑娘，在吃老爸给她带的糖果。黎抗美的老爸开着卡车来，我们才晓得有一条路从成都一直通到我们这大山里。

黎抗美住在任忠仿家里，可以算是组织照顾。我在大柴林捡棉花兜，镰刀割破了拇指，父亲把我带到了她跟前。她的寝室狭窄黑暗但紧凑整洁，霉味里也有香味。她的小药箱层次分明，像是矮人国的人住的房间。

她抓住我的手，消毒，敷药，裹纱，捆胶布。我感觉到了一个成都女青年的体温和气息。她弯腰的时候身子贴到了我。

在大哥屋里看见一架望远镜，就偷出去看对岸。边调整焦距边看对岸，对岸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大哥回来知道了，动手打了我。大哥初中毕业进了专业队。黎抗美也在专业队。“哪里来的那玩意儿？”父亲问大哥。父亲生怕大哥跟国民党特务有瓜葛。1949 年，有不少国民党溃军消散在岷山，1958 年还发生过空投事件。“黎抗美的。”大哥红脸涨脖子地说。“老子要你离她远些！”父亲说话时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条蛇。父亲的话在我听来，黎抗美才是国民党特务。我到了青春期，才发现自己听错了父亲的话。在那个年代，跟女知青好是很危险的，如果发生关系，那就更背时。

草药

夏枯草。胡玉培总是在找夏枯草。在大柴林，在大盖头，在龙嘴子，在梁包上，在林犬家土墙上，在我们家草楼子上……我不知道夏枯草是做什么的，我不晓得胡玉培找夏枯草做什么。刚才，我在”百度”搜索了“夏枯草”——“清肝明目：主治肝火上炎，目赤肿痛，眩晕头痛；配伍养阴明目药，又治阴虚肝热，目暗珠痛。今用于治肝火型高血压。消肿散结：适于痰火凝结，瘰疬，瘿瘤。目前用于淋巴结炎，淋巴结核及淋巴肿瘤。”我晓得了，胡玉培的弟弟胡玉荣得了肝炎，胡玉培找夏枯草为弟弟医肝炎。

肝炎是传染病，胡玉荣被赶出了家门——也许是自愿出来的，在金洞坡前面的一块空地上搭了棚子住。上学路过金洞坡，我们总爱爬上长了一人深的艾蒿的石墙去看胡玉荣。棚子没有门帘，胡玉荣睡在棚子里，像一条死狗。我们偷了王生喜家园子里的萝卜丢给他，他看也不看我们。他

的饭碗放在棚子外边，里面总是剩着几颗米，夜晚要是要下过雨，碗里一定有水。有娃娃往胡玉荣的碗里扔土巴，胡玉荣看见了，也不管。我不扔。低矮的棚子，肮脏的铺盖，凌乱的稻草，破烂的衣物，胡玉培的夏枯草，蚂蚁、蜈蚣和四脚蛇，构成了一个肝炎患者的生活场境。太阳很红，核桃树和桐子树很青，前面河滩上学大寨的高音喇叭很响亮。晚上听大人说，胡玉荣吃米面都不消化了，吃啥拉啥，早上果然看见胡玉荣拉的屎，一堆米。有时看见胡玉荣已经在呀气了，像是马上要死；有时又看见他像是好人，坐在核桃树底下拿剩饭逗虫虫。每每那时，我就会在心头默念，虫虫虫虫莫吃胡玉荣的东西，他有肝炎。

胡玉培找到夏枯草了，活的，拿在手里像把猪草。我们撵着去看，一直撵拢胡玉荣的棚子。作为一种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夏枯草对于我们是陌生的。我还看见了花穗，难以描述（百度词条：由几圈十几圈宿萼与苞片组成，每圈有对生苞片两片，呈扇形，先端尖尾状，脉纹明显，外表面有白毛。每一苞片内有花三朵，花冠多已脱落）。胡玉荣已经丧失咀嚼能力，胡玉培替他咀嚼。胡玉培把夏枯草连叶带花喂进嘴咀嚼，青色的药汁流到了嘴角，嚼好再吐在一只缺碗里，给胡玉荣吃。我还看见胡玉培的眼泪，也许是被夏枯草的苦味冲出来的，也许不是。

胡玉荣死后，很少有人敢接近他的坟，我们是连金洞坡也不敢接近，至于夏枯草，我是连名字都不愿意提起。

隔山翘。跟王生喜在短坑里放牛，王生喜嘴里老是咕噜："吃了隔山翘，一天硬八道。"便晓得了隔山翘，晓得了隔山翘是医什么的。那时我不满十岁，还没硬过。我从未见过隔山翘，至今也没有见过，它有这样的魔力，我只是惊讶。我猜想过它有怎样的茎、叶、花果和根须，有怎样的颜色、形状、浆汁和气味。我把它想成鸦片，有罂粟花一样的艳美，可我却从未见过鸦片。是什么东西把隔山翘和鸦片联系在了一起？

差不多整个1976年冬天，王生喜都不曾在生产队露过脸，我怀疑他也去大寨了，实际上他上了药地坪，不是种包心白或挖药，他是挖隔山翘去了。谁需要隔山翘？谁想（敢）一天硬八道？听说是那个姓李的知青，我惊呆了，原来在他工人阶级的外衣下面隐藏着那么一副肮脏的灵魂。我还是不明白，他那么年轻，简直还是一个孩子，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硬？后来听王生喜自己说，他并不乐意上老林去，但知青需要啊，知青是毛老汉儿派来的，毛老汉儿刚刚走，他不能过河拆桥。从此，碰见王生喜，我们都叫他隔山翘。“隔山翘隔山翘，你在吃饭啊？”“隔山翘隔山翘，你在挑水啊？”“隔山翘隔山翘，你一天硬八道！”王生喜解了腰间的草绳，挥着镰刀来追我们。我们疯跑，跑进黄荆子笼笼里或油菜地里。王生喜一边张牙舞爪一边又在笑。


◎赵家园园

很久没有看见李知青了，他的灶台罩上了垮辣子（特大号）背篼，成了猫狗的阳台。李知青回城了，是非正式回城。王生喜不挖隔山翘了，开始挖夏枯草，还动员了胡玉培，给李知青挖。李知青得了肝炎。“李知青得了梅毒。”胡玉贵悄悄地在我们耳旁纠正。我们不晓得梅毒和肝炎哪个厉害，但我隐隐约约晓得梅毒与女人有关。看见夏枯草，便想到了口嚼的情状，想到了将咀嚼过的青色糊状的夏枯草敷在生长梅毒的部位的情状。这样的想法里有快感也有负罪感。

坝坝电影

无法计算电影的密度，到底一周几部一月几部。

太阳落坡的时候，我们的兴奋达到了高潮，已经抬着板凳空着肚子过了金洞坡。什么电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见高挂的电影挡子（银幕），看见挡子上有人人儿跑。

坝坝是大队的坝坝和公社的坝坝，都是三合土的。公社的坝坝专门开大会。大队的坝坝三用，晒粮食，开大会，放电影，周边总是堆放着麦草、豆草、桑条和石头。石头是搬来当凳子的。夜幕降下来，人从各个生产队聚拢，吵闹着，吆喝着，坝坝被人占去，变得黑压压，像一个巨型蜂包，一排排的凳子一排排的石头就是蜂包里的格子（我们叫牙舌子）。石头上铺了豆草，温暖有柴火味。

不晓得电影啥时候开始，连搁放映机的桌子都还没搭，别说发锅炉了。等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夜色浓重，像一张摊开的烧焦了的锅盔。时间也摊开了，也焦了，还微微卷曲，让我们感觉到坡度。我们去藏猫猫，几个藏，一个找，在陌生的地方，在人缝里。大人们来，在人堆里喊，我们的小名被一声声拉长、放大、诅咒，然后被扔掉。好不容易等到放电影的人揩着油嘴出现，搭了桌子架上机子，却忘了倒片。锅炉发起了，电灯雪白，才哗哗哗倒片。“妈哟，白天在chua（有音无字的一个词，动词）球？”等急了的人在骂。片子倒完了，革委会主任又拿起话筒讲话，讲形势，讲农活，讲安全。正片子前面还有《新闻简报》。有个《新闻简报》里的人拼命在喊“毛主席——喝茶，毛主席——喝茶……”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到五筋头。

我很难说喜欢样板戏，《红灯记》让我接二连三打盹儿，《智取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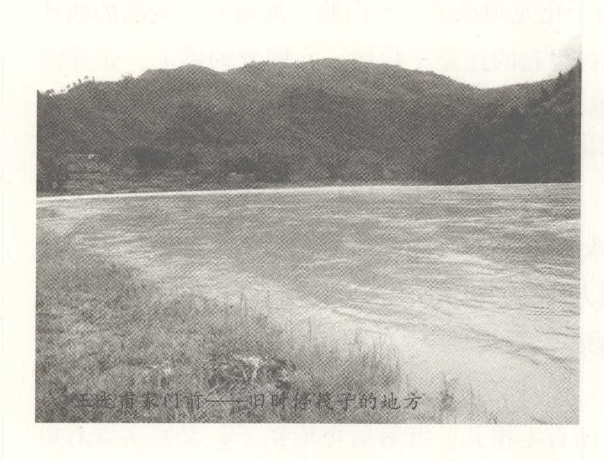
山》太假，杨子荣穿的披风太新太伸展，但我至今都记得这样的唱段："住牛棚盖草席，芭蕉根来充饥，两眼看穿天和地，孤苦伶仃无所依，剑蚂压在石头底……"故事片是我们的最爱，《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铁道卫士》、《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平原作战》。我尤爱《闪闪的红星》和《渡江侦察记》，开口闭口"我胡汉山又回来了"，"下次不要照手电，如果共军发现，大炮一轰，连老子一块儿下大江喂鱼"。我也看过根据鲁迅作品改编的《祥林嫂》和《药》。我们都喜欢看《南海风云》，里面的于化龙帅呆了，小白脸，海魂衫，美丽的西沙群岛。如今看到唐国强，我想起的还是于化龙。在回家的路上，张连国把"闪闪的红星"说成"你嫂嫂的红星"，王生喜把"杜鹃山"说成"肚皮山"，车德英把"奇袭白虎团"说成"骑起白马看"。张连国和王生喜的意思都晓得——骚。

有两部电影一直挂在大人的嘴上，但从来没见放过。《雨淋猪》，《英雄不怕白跑路》。晓得是哄人的后，也去哄比我们更年幼的。"三哥，今天晚上放啥子电影？""雨淋猪。"看坝坝电影，自然要遇到淋雨。雨小，可以顶着放顶着看；雨大了，便只有暂停。有人给放映机打伞，也上了电影挡子。打伞的是女的，还有毛根儿。我看看电影挡子，又回头看看电影机子，一束强光射出去，密密麻麻的雨滴分明得很。因为雨，因为机器故障（我们叫扯拐），跑两三晚上看完一部电影是常事。我看《平鹰坟》就跑了四个晚上。在对岸的高坝。已经通了铁索桥。因为隔河，高坝一直是异域，天天看着，脚却很少踩着。第一天晚上下雨，瓢泼桶倒的。第二天晚上锅炉坏了，修不好。第三天晚上刚开始就烧片，片子弄顺雨又来了，又瓢泼桶倒。

看坝坝电影是生产队唯一的精神生活，也体现了自由与快乐的元素，但这样的自由与快乐，并不是我们的选择，面对注射了可疑思想、知识和情感的电影，我们有面对太阳或者黑夜的被动。不是我们选择了坝坝

电影，是坝坝电影选择了我们。如果说坝坝电影真带给了我们自由与快乐，那一定不在看了什么，而在看本身（求知欲、好奇心、解放感），在地理的转移（黄昏的落日、归林的鸟、天际的火烧云），在看电影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石灰厂


◎王选甫家门前——旧时停筏子的地方

大而言之，生产队是封闭的静物。王金德的板板车、胡玉国的手扶式拖拉机、三两个知青的来来去去和大河里筏子客的过往代表了生产队与外界的沟通。筏子闯过险滩，冲出漩涡，有着披荆斩棘的激昂气势；筏子客在雪白的浪花里隐现，火红的内裤与对岸悬崖上的火二拐拐相映成趣。筏子客从上游来，去往我们不知的地方。我们在岸边放驴放牛，筏子客是我们的风景，也是我们的“露水伙伴”——筏子来了，一架一架，我们看筏子，看筏子客，筏子客对我们笑，我们便很满足，便不孤独。我们也骂筏子客，无缘无故地骂，我们不恨筏子客，我们还捡了石子儿打筏子客。筏子搁浅了，筏子客下到水里拗，他们脱得光胴胴，那玩意儿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也不恨，我们只是“讨厌”，我们唱着自编的儿歌齐声骂：“筏子客，滩上歇，那边湾湾里去不得……”每每那时，筏子客就停了手头的活，朝我们笑，

笑着笑着便龇牙咧嘴，吓得我们拔腿便跑。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筏子开始在王光甫家门上停泊，好几十架，首尾相连遮了大半边河。我们大着胆子爬上筏子，从一架跳上另一架，一直到河中心。水浪鼓荡在筏子与筏子的连接处，筏子在摆动，我们觉得刺激又害怕。

我们家在夜晚偷偷给筏子客卖过青杠木，在柴林砍了，走桅杆坪运到王光甫家门上，五分钱一斤，收入十分可观——卖烧火柴每斤仅一分二厘——但也十分危险，要是被人看见告发，就是搞资本主义，就要同"地富反坏右汉奸特务"一起揪上台批斗。那样的夜晚总是没有月光，父亲连手电也不敢照，我们差不多是摸着行事的，真他妈"做贼"。父亲在玉米林里数钱，偶尔照几下手电，我还是想起了《渡江侦察记》里的台词："下次不要照手电，如果共军发现……"

不晓得筏子客是否真偷过生产队的某个女人，不晓得生产队的某个娃娃是否真是筏子客的种，虽然背地里都是那样传说的。看见那个女人在水边独坐，我会自然想到这个——她是在等她的野老公。看见她从她们家高圈出来，在嵌裤子，我甚至会想到她的屁股和筏子客的胴体——我不晓得我的性意识要比我的青春期早。"你妈偷筏子客！"跟那个娃娃打架骂架，我们总是这样说。我们不晓得我们从小居然这般用心险恶。

公社在生产队建了石灰厂，我们便多了一重兴趣。石灰厂的人总是有马肉吃，我在石灰厂前面放驴子，陈少富总爱站在石灰窑上吆喝："扯把蒜苗过来，给你吃马肉！"说是扯把蒜苗，其实是偷。不敢偷别人家园子里的，就偷自家园子里的。有几回，蒜苗扯来了，却没吃到马肉，说是还没煮熟，其实早已吃光。那年月的马肉真是香，整个龙嘴子都闻得到。有一两回我带了林犬，扯了蒜苗又扯了红葱，分得两块大骨头啃，肉不多但却特香。

石灰厂都是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回乡知青，他们吃马肉，唱歌，打

炮眼，放抬炮，说女人，撑船过河运矿石，运柴运煤，烧窑。我眼馋了对岸多年，终于有机会过去了。头两次，我上了渡船，被他们呵斥了下来。后来我赖着不下来，他们硬把我抱了下来。那时我们还没吃马肉，还没建立传统友谊。经常给他们扯蒜苗，经常把脑壳拿给他们摸，我们便建立了传统友谊，他们请我上渡船，还准许我扯油索摸竹竿。我过到对岸，爬上菜包石，跑到道角里，回望我们生产队，感觉真是开眼界。看他们找矿石，打炮眼，装炮。提前躲在远处看他们点炮，捂住耳朵，然后看炮响，看炮把石灰石炸得飞起来。

烧出来的石灰堆在石灰窑前面的沙地里，依旧保持着矿石的模样，但性质已经全变，如果与水相遇，性质会再改变一次——我们拿了石灰放在水里，石灰很快燃烧起来，看不见火焰却看得见烟雾，感觉得到巨大的热量（陈少富捡了几块大石灰放在脸盆里，放了鸡蛋，加水，后来鸡蛋就熟了）——后来在化学课上看演示实验，才知道石灰的学问便是碳酸钙（石灰石）变氢氧化钙（生石灰）变氧化钙和水（熟石灰）。

石灰厂毁于1981年的洪水。洪水只卷走了厂房，石灰窑一直在，像个遗迹。后来窑里窑外都长了草，我时常牵了驴子去吃。一块沙地，一个岩包，几行桑树，一汪清水，一个废弃但依然呈石灰色的石灰窑，一笼笼青草，一匹黑色的年轻驴子，一个露水打湿脚背的乡村少年，构成了石灰厂的遗像。

生产队早已不在。生产队还在。不在了的生产队埋进了时间，埋进了记忆，经历过梦魇一般的岩浆运动，转变成了一个人的石油、天然气或固体矿藏。我慢悠悠地写，慢悠悠地开采，从涉及到地质变迁的深处，一点一点挖掘。还在的生产队只是方位、柴林、田地、地名、所剩无几的老房子、所剩无几的人。

胡玉国死了，张连国还在。胡玉国死在生产队解体之后不久，他买

了拖拉机先富了起来，他在别人的拖拉机上打盹儿，栽下去，被后轮子碾烂了脑壳。张连国今朝有酒今朝醉，一直穷，曾经作为他的未婚妻的胡玉萍已人老珠黄，为他生了两个女儿，长女东华子八年前神秘地死了。胡清林死了，胡该林死了，王生厚死了（我大爸），胡玉华死了，任忠仿死了，安华珍死了，车德英死了，胡玉元死了，张连珍死了，汤子玉死了，胡玉贵死了，李模清死了（我父亲），王生平（我二爸）死了。张少芳还在，早已信佛，改吃长素。李知青不知去向，张明向不知去向，李正秀不知去向，黎抗美不知去向。

我回到生产队，回到的已经不再是生产队，道路看似没变，太阳看似没变，金洞坡还叫金洞坡，大盖头还叫大盖头，但当年的好多人都不在了，都上了桅杆坪，当年的好多奶娃娃也不在了，去了江苏和广东，石墙拆了，樱桃树死了，保管室和晒坝废弃了，任九平家和鲁成加家修了楼房，水泥路通到了各家各户，从下院子走到上院子，遇不到一个人，唯有尚未荒芜的田地证明着某种与生产队相关的存在。生产队的解构发生在我走出涪江谷地的1981年秋天，包产到户，集体被取消，自由劳动在被取消三十年之后重新回到了每一件农具和每一处庄稼地。


◎树，或者木头

一个村庄的疼痛

疼痛的村庄躺在岷山脚下的涪江边上。

一些山，一些水，一些房子，一些石墙，一些树木，一些田地，一些人，一些畜生。还有一些坟地。没有人知道这个村庄在这岷山深处躺了多少年，但可以肯定，是涪江的一次泛滥、岷山的一次撼动造就了这个村庄。

我出生在这个村庄。我的整个童年都发生在这里。我最初的皮肤、毛发、血、心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都是这个村庄给予的。纵横交错的石墙，石墙边婆娑多姿的樱桃树，农历三月房前房后成熟的樱桃，以及早晨沾满露水的鸟鸣和摘樱桃的人的喧闹，构织起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田园图画。房背后满坡的青杠林和雨后青杠林里的红菌子是我童年所有幸福的象征。冬夏秉性截然不同的涪江，以及躺在江边的大青石上望星空的经历培育了我全部的想象。

我生命中黄金般的童年都是在村庄竹梢摇曳的残阳里度过的。

我并不是为了去另一世界寻梦而离开这个村庄的。我的梦就在这个村庄。我是为了不当农民才离开的。离开村庄，很快就忘记了村庄。像所有的忘记一样，我的忘记也意味着背叛。在贫穷愚昧的岁月我失落了黄金，我不想在对黄金的追忆里再失落白银和青铜。有二十几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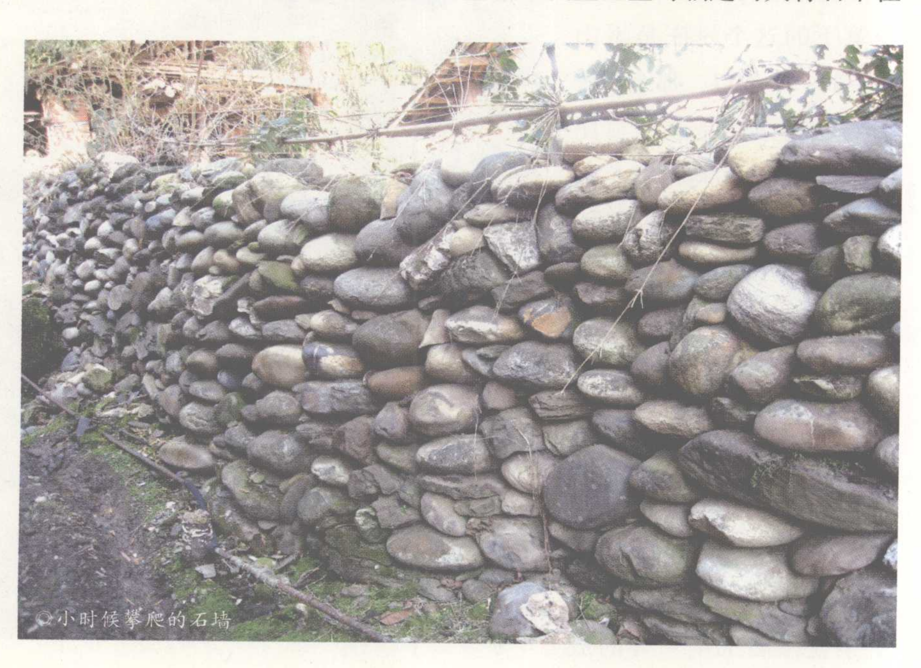
我把我的童年和我的父亲母亲一同搁置在了记忆之外的村庄，我的遥远的村庄。如果说偶尔对村庄的记忆是我的处女作，那么我的处女作是单薄和唯美的，很快便被充满反叛的现代、甚至后现代作品替代了。

我走了，并不意味着这个村庄就不再有故事。

包产到户了，我的堂兄王金德不再“驾驶”板板车进城拉大粪了，张连国的大女子东华从云南打工（也有说卖白粉）回来被人害死了，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任忠仿得肺气肿死了（记得他吃烟特别厉害），我小时候经常头上生疮的妹妹金慧大学毕业当了局长……

然而离了我，这些故事便不再与我有关。

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村经历，是我背叛村庄的另一原因。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疯狂的淘金毁坏了涪江河床，滥伐林木引发的洪水割弃了大片的河岸，使记忆中村庄优美的曲线面目全非。我望星空时躺过的大青石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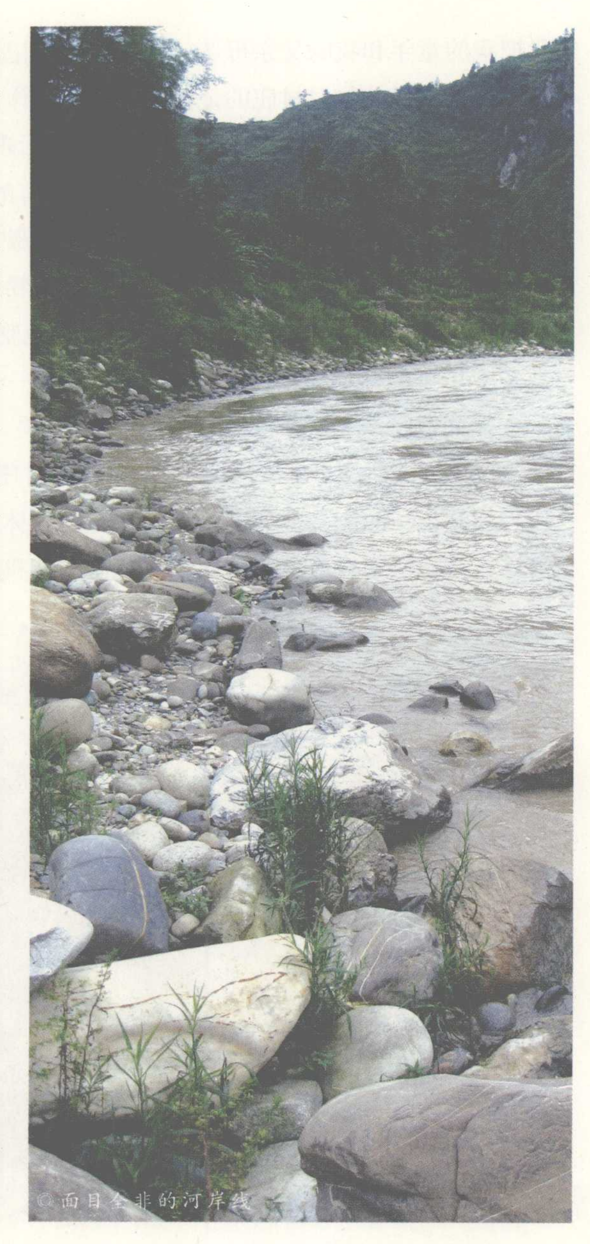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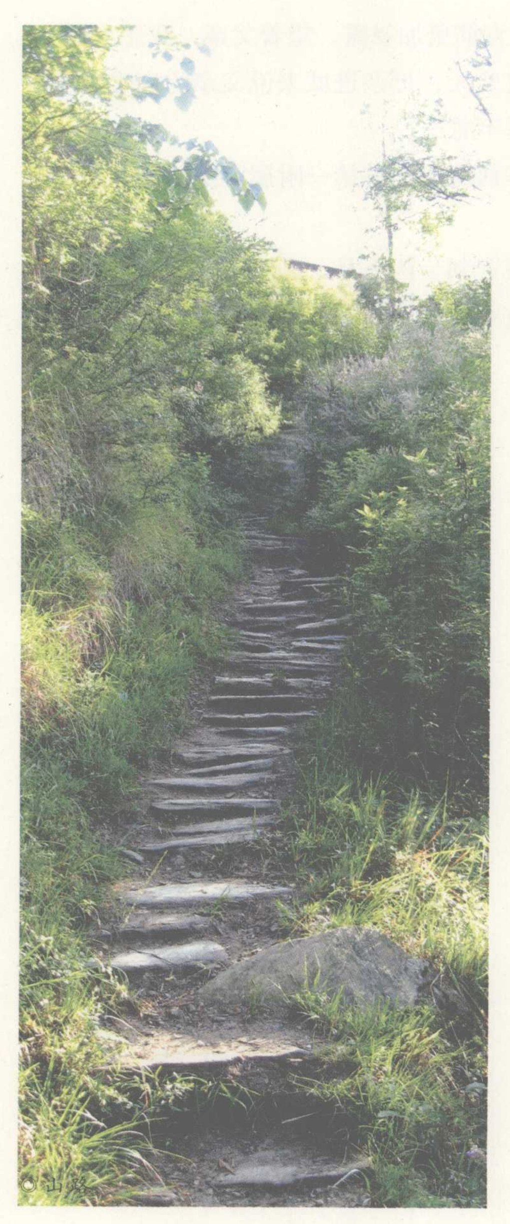
◎小时候攀爬的石墙

了，我曾引以为神奇的架牛胎衣的桐子树不在了，村姑用以锁眉的一种叫“目梳”的节节草不在了。

再次惦记起这个村庄并感觉到她的疼痛，是在我的父亲被诊断出癌以后。可以说，得了癌的父亲或者父亲的癌就是这个村庄的疼痛。就我的理解，一个村庄是一个地方的伤口，所有村庄都是地球的伤口。如果说我笔下的这个村庄是岷山丛中的一个伤口，那么我得了癌的父亲便是这个村庄的伤口。村庄的呻吟和痉挛都源于我父亲肝区的剧痛。

村庄姓胡，与我们家族并无血脉的联系。对于这个村庄，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外来人。父亲虽出生于所谓有产者家庭，但没等他长大他就失去了那些所谓的财产，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像高玉宝一样的放


◎面目全非的河岸线


◎山路

牛了。稍大一点，便跟人下江油背背子。父亲凭着顽强的生存本能和血统遗留给他的智商，将人生的路越走越宽广。有好些年，就实力和威望，父亲还真是这个村庄离不了的人。村里的人服他，外村的人也服他。

在中国的农民里，父亲还算是个优秀的人。一米七的个头，端庄的五官，结实挺直的身板。小时候看父亲一边铡马草一边唱《敖包相会》，就发现了他的那么一点点情调和风流。五十过后的父亲是村庄里最显赫、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发达的妹妹为他买了普通农民想也不敢想的名牌西装、名牌皮鞋和金戒指：差不多有十年，父亲一直过着起床就听收录机喝早酒、傍晚就嗑着瓜子儿散步的悠闲日子。

上世纪末的一个下午，我在东门外农行拐角处突然碰见了父亲。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胆结石，已经检查了，正在保守治疗，靠吃中药排石头。本来就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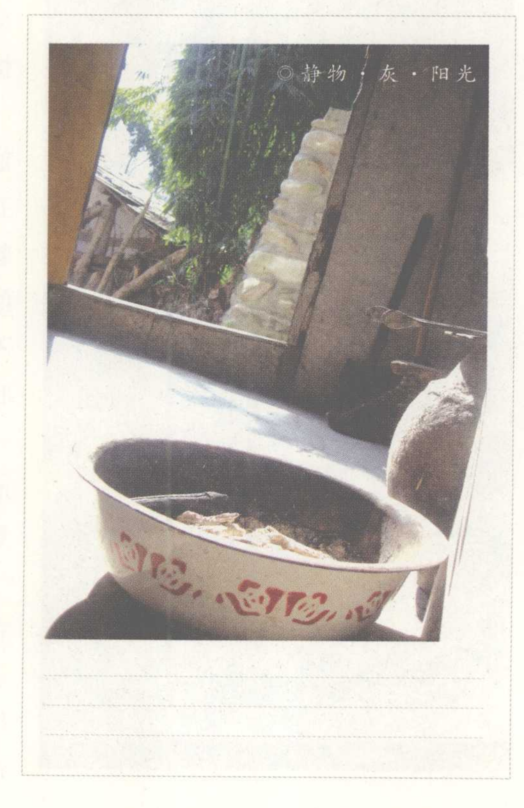
瘦的父亲更黑更瘦了，脖子上的青筋更加暴露。望着父亲，我悲凉顿生，竟然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没过几天，母亲进城来说父亲的病吃了药不应，疼凶了，晚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新世纪开始不久，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父亲被一位姓麦的年轻医生诊断为癌。

父亲在这个村庄的居住期被宣判为两个月，两个月之后，父亲的居住便只能是另一种形式了。但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父亲仍顽强地活在这个村庄里。

（文章写到这儿，便因事搁下了。等再坐到电脑前接着写，我的父亲已经被埋葬了15天了。）

我在想，除开洪水下切的河床，被开垦的破碎的山坡，被采金者挖坏的河滩，以及得了癌的父亲或父亲得的癌，这个村庄其实是非常美丽的，就像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村庄一样。就是今天，河岸的轮廓虽被破坏了，但连绵起伏的远山的线条依旧是那样柔美。


◎静物·灰·阳光

2001年最后一天的正午，我走在通往这个村庄内部的土路上所目睹的麦田是异常精致的。霜融化后的水露浸润了麦苗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叶片，

其滋润极富感染力。麦田各具形态，一绺绺，一条条，白净纤弱的田埂像是组成葬礼进行曲的那些音符，为我预支出大笔的悲痛。在冬日阳光里，在青青的麦苗间，光秃秃的桑树是神秘的灰色，枝条体现出的骨感与田埂的那份纤弱达成了一种伤心的和谐。

◎父亲晒太阳的木楼

与我记忆中的村庄相比，这个村庄的格局并无什么变化，改变的是它的一些细节。

一条石板路穿过整个村庄，纯粹河石砌成的一摞摞石墙分割开各家各户，石墙边长着高大婆娑的樱桃树，与石墙合围着人户的是大笼大笼的竹子。

穿斗式木房子少了，砖混房多了。小时候正年壮的樱桃树老了，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年轻变种的樱桃树。记忆中美丽敞亮的菜园子没了，有的是长满椿树和一种叫“臭老婆子”的荒芜的板地。就是看似没变的竹子也悄悄地开花了。像吃了催长素的椿树一根根立在房前屋后，早已大而无用。

背叛我记忆的还有村庄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宁静。

这是元旦前一天的正午，除了虚拟的麦苗拔节的声音，村子里便没有任何的响动。我不知道人都到哪里去了，牲畜都到哪里去了。好多房门并没有上锁。我在这空城计般的宁静里感觉到了那么一点惶恐，一点诗意的惶恐。在这包含了几多落寞


◎ 稻田

的诗意里，我终于觉出了陌生。当村东光光的梨树下一位戴眼镜的少女用陌生的目光看我的时候，我真是惶恐得要逃跑。

阳光白花花的，宁静死一般地从瓦蓝的天空散布下来，聚集在这岷山深处的小村庄，浸透着村庄的每一物件。竹林寂寞的鸡，老房子上倦慵的猫，菜地里形单影只的狗，仿佛都只是些标本，没有丝毫的"生"音。

在这样的感受中回家看望得了癌的父亲，陌生突然成几何倍数增长。这陌生里有遗憾，有悲哀，也有梦的混沌。在突然广大起来的混沌里，死亡与虚无是唯一能分辨的体验。

透过别人家的屋顶，我看见了我家位居高处的木楼，还有木楼后面大片的竹子。竹子开花了。这又是一个陌生。这个陌生像巫婆的嘴，比满村的宁静更让人感觉不祥。

抬头看见在木楼晒太阳的父亲，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但我又不能说我没有感觉。阳光透过因为开花变得稀疏的竹梢，洒在父亲干盐菜一样的身体上和烂皮鞋一样的脸上。父亲坐在背篼上，半闭着眼，他的样子让我想起哪年端阳挂在门枋上的早已干枯的艾草。父亲没有发觉我，像是也没有发觉阳光。



父亲没有了时间。是癌盗走了他的时间，是贪婪致命的元素坏死了他的器官，是烂棉袄一样的死亡覆盖了他的钟点。

我没有叫一声父亲。不是我叫不出来，我是深深地怀疑着我的父亲。

在过去的一年，在我的心里，在我对父亲深深的怀疑与批判中，父亲是这个村庄的疼痛，是这个村庄剧烈的唯一的疼痛，也是我的深刻的疼痛。如果说这个村庄是岷山乃至地球的一块伤疤，那么，我的得了癌的父亲便是这块伤疤的一次致命感染。

白花花的阳光是白花花的青霉素。

白花花的阳光医治不了我的父亲，二月里的樱花也医治不了。父亲明白这个，父亲便不想等了，在樱花开的前几天走了。

如今樱花开了，花瓣像当初的宁静一样飘满了整个村庄。父亲死了，已经在土里躺了十五天。然而凭我的直觉，一个春天，一次花开，一个人的死亡，是不能医治一个村庄的疼痛的。

我的父亲死了，但癌还留在这个村庄的泥土里。




◎挂面房

一个疼痛过后的村庄

泥土和时间在掩埋我父亲的同时，也掩埋了父亲留在我们心里的疼痛，掩埋了村庄里所有的人对剧痛中的父亲的恐怖的记忆。

死亡结束了一个人的疼痛，也取消了一个村庄的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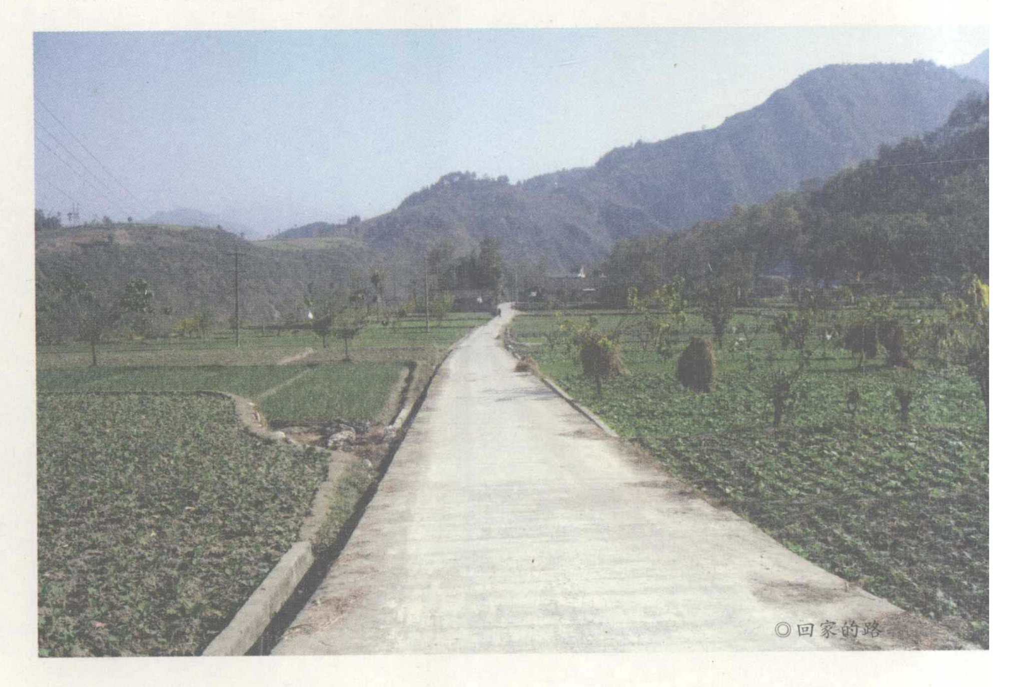
我再一次走上通往村庄的土路，已是春意盎然的三月。呈现在眼前的不只是春天的风景，还有另一种天意的图画。疯长的麦子不再是薄霜下睡眠的韭菜，早已长成关节茁壮、叶片修长的竹子，内部正孕育着一场美梦般的怀胎。油菜极度地张扬着个性，不仅把花开到了顶峰，而且让叶子也阔绰到了极至。油菜花是上天最容易获得张扬的植物的一种，短暂但却登峰造极的灿烂和丰艳，将繁华演绎成了简单的色彩和气味。碧绿和金黄淹没了阡陌交通在冬天制造出的那种洁白的纤弱与缠绵，光秃秃的桑枝所预支的悲伤早已被肥沃的桑叶吸吮，转化成了对蚕和丝绸的联想。

远山的绿是对记忆中疼痛的覆盖，漫山遍野的野花成了对曾经严肃的忧伤的轻讽。樱桃花已经凋谢，叶子遮蔽了枝丫。小樱桃青得有些色情。石墙还是石墙，但却在浓郁的春意中失去了冬天的冰冷和沉重。春风无声地穿过木房子，在残花幼叶上印下了那么多美妙的痕迹。阳光依旧嘹亮，依旧质感，只是少了冬季的干烈与寂寞，多了细腻与潮湿。天

空除了蓝，少了因疼痛而生的皱纹，多了绿的春色。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乃是这春天的阳光与天空没了任何的负担，纯粹是一种自然元素的呈现。

疼痛过后的村庄，像疼痛时一样宁静，但这宁静却不再有任何的寓意和色彩。

落叶的季节过去了，房子和院落都干干净净，偶尔飘落的几点花瓣并不影响村庄的整洁，反倒让洁净多了几丝春意。没有了我的父亲，这个村庄便没有了疑虑、恐惧和阴影。没有了我的父亲的疼痛，村庄也没有了疼痛，轻快得像潮湿的河风。乡亲们在埋葬我的父亲的同时，也埋葬了我父亲用过的器具、埋葬了对我的父亲的记忆。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她烧毁了所有属于父亲的东西，包括那些父亲从未接触过的。像乡亲们一样，母亲也害怕留下父亲的病菌，留下父亲的气味和对他的记忆。



◎回家的路





现在好了，阳春三月，父亲一个人睡在远离村庄的泥土里，（谁知道睡在泥土里的杠是什么？谁又知道我的父亲真正在哪里？），像地下的一块石头，一截树根，不再影响村庄里任何的人和事，包括一只狗或一棵樱桃树。父亲的坟背后是一片青杠林，还有松和柏。松柏下的高坎上到处攀援着七里香。

现在真的好了，空气里飘着柏香，石墙的石头只是石头，没了一点墙的意思。鸡就是鸡，狗就是狗，构成房子的砖和木头也只是砖和木头，开了花的竹子也只是开花的竹子，整个村庄也只是村庄。唯一能与我的父亲的疼痛联系起来的是几个扎着长辫子的村姑，她们背着喷雾器从村里出来，手上提着农药。她们说麦子生了锈病。我不知道麦子的锈病是否与我的父亲有关。

如果说木楼、石墙、樱桃树、竹子、喷雾器、村姑等构成村庄的每一物件都是语言，那么这些语言都只是孩童的语言了，山是山，水是水，同一个层次，同一个世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的疼痛竟能让一个村庄跟着疼痛，而一个人的消失又能使一个村庄如此地祥和美丽。

怀念与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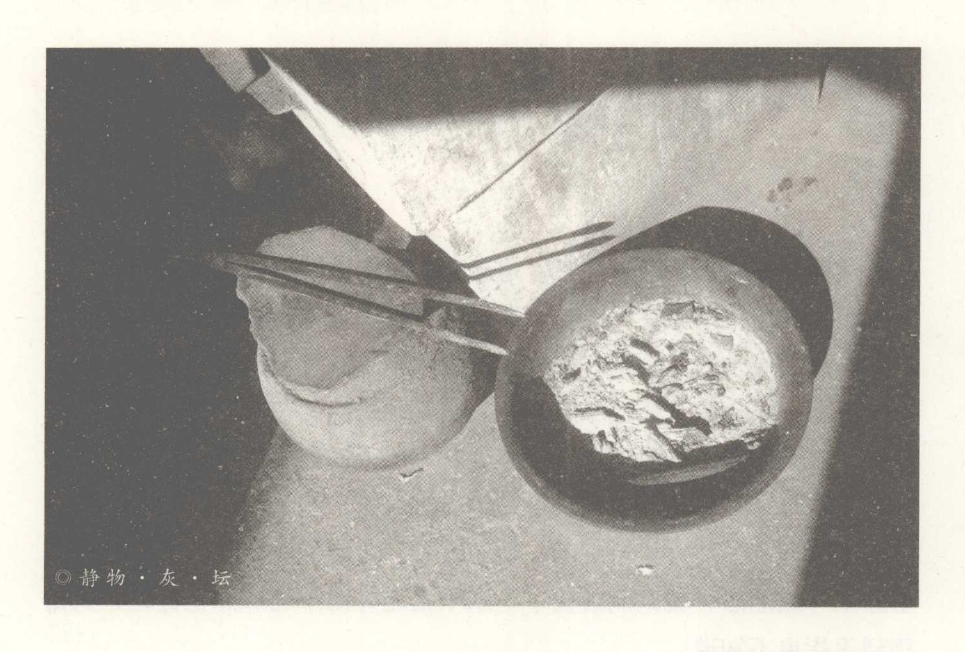
1

从即刻往回走，走过昨天，走过前天，走过四百五十六天，就会再一次看见我的父亲躺在一口松木棺材里，整个人都枯萎得不像人了，像枯花，或者像木乃伊。棺材停放在堂屋的两条高凳上，盖子翘着，斜着一道缝儿。人们就是通过那道缝儿告别我亡故的父亲的。棺材上系着一道红，底下燃着一盏清油灯，前面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烧着纸。烧纸的有我的母亲和妹妹，大哥和二哥，也有亲戚。我依旧记得我母亲和妹妹烧纸的样子。跪着。半跪着。继而蹲着。母亲的悲痛已有所缓和，眼里除了一点茫然，就只剩疲倦了。从千里之外回来的妹妹在打盹，火苗舔到手指也不知道。

起先我也烧过纸，但我不明白这烧纸的意义，就去里屋打麻将了，只是趁下桌撒尿的时候顺便丢几张纸在锅里。我知道，母亲给父亲烧纸是因为父亲一生都对母亲好，爱母亲，虽然这爱是旧时旧式的，不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的自由之爱，但毕竟是爱，有本能，有责任，有礼数。我也知道，妹妹所以给父亲烧纸，是因为妹妹对父亲好，真心的好。妹妹给父亲买金戒指，买名牌衣裳。妹妹拿钱给父亲治病。然而我不明白，那

些平常并不在乎父亲的人，为什么也要给父亲烧纸，而且还要下跪。我不明白，是不是人死了黑的污的都没有了，留下的都是光亮。

往回走的路是时间隧道，也是乡间土路。走过麦苗，走过菜花，就走进了我父亲的村庄。走过青皮树，走过石墙，走过一排排樱桃树，就走进了我父亲的院子。乡亲们停下了所有的活路，都聚在院子里，帮的帮忙，打的打牌。都是熟脸门儿，见了，都不张扬，只是问候。“来了？”



◎静物·灰·坛

“来了。”“你也来了？”“来了。”虽也是逢酒遇席，但毕竟不是喜酒，毕竟死了人，该避讳的要避讳。新柴已经划好，堆在房子当头。边口肉搁在门板上，厨子拿把黑青的刀正在剖切。豆浆已经下锅，新柴燃出的火苗舔着锅底，豆腐已经成形。雪白的米在蒸笼里膨胀，稻谷的气味飘进了在竹林晒太阳的老人的鼻孔。他们裹着军大衣，个个德高望重。春色春意在石墙外面，却过不了石墙。酒席就这样继续，热闹就这样继续，直

到看好的期。也许三天三夜。也许不止三天三夜。

热闹是别人的。忙才是我们的。只是忙。麻木的忙。少有悲伤。帮忙的是个别，大多是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是明明白白的。乐在暗中。因为忙，加上热闹，加上父亲是久病，加上平素与父亲情意的淡漠，我们做儿女的也没有把父亲的死往心上搁。死有什么？见惯不惊。重要的是把死者送走。正确的。声势浩荡的。这是死人的脸面，更是活人的脸面。

2

除开这四百五十六天，我已有的全部生活都是与我父亲在这颗星球上共度的。掐指算来，已近三十七年。其中最初的十三年，我们同在一个村子一所房子。我吃他的饭，花他的钱，读他的书，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过后的六年，虽然我还吃他的饭，花他的钱，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但只是偶尔。我离开了他的村庄，离开了他的房子，只是假期回来，接受他的再教育。之后的十八年，我工作了，不吃他的饭不花他的钱了，我们的共度成了天各一方，只是逢年过节在一起。但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在一起，我仍得看他的脸色。在世人眼中，我父亲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福的人。但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感觉中，在我力所能及的判断中，我父亲则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缺陷，绝非缺胳膊少腿，是看不见的。甚至也绝非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毛病，而是不为普通人发现的、藏匿极深的人格的缺陷。这缺陷，非常类似于末代帝王和变异水果的缺陷，有基因的原由，也有环境的因素。

应该说掌管我父亲的身体的基因还是不错的，它给了我父亲一个一米七的个头（作为南方男子已经不错了），一张轮廓分明、五官端庄的脸，一头黑亮柔顺的头发，一个挺拔的腰板。同时，还给了我父亲一个好使的头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我父亲的两个兄长都没能逃脱疾风骤


◎我们，和我们的父亲母亲

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洗礼，而同样作为地主子女的他，却能毫发不伤，幸免于难，并且还有能耐背地里搞到吃喝。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他经受住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考验。父亲坐在门槛上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享了多年的清福。那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都把书读出来了，甩脱了“农皮”，大哥和妹妹还弄了芝麻官什么的当，妹夫的生意也正做得红火，不要银子往自己钱袋子里淌都办不到。抽着妹妹买回的红塔山，看着竹林里跳来跳去的麻雀，我父亲说这话的口气是自豪的，甚至是得意的。他该得意。他有得意的本钱。这本钱不是我们，而是他“打鬼随鬼转”的为人处世的灵丹妙药。那段日子，我父亲的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在我的记忆和感觉中，我父亲的形象恶劣但却鲜明。他从路口石墙外的樱桃树底下走过，咳嗽的声音让我们哑然。他在窗外斗锄把，或者划竹子，黑红的脸膛时隐时现，额头和颈项上的青筋暴出，像隐匿的小蛇。他哼着小调在木楼下做木活，推刨的声音干净利索，刨出的木花儿雪白喷香。他进厨房拖起把菜刀，向神龛上的主席像划去。主席穿着毛料衣裳，坐在太师椅上。主席是两个。煤油灯的光线很暗，看不清哪边是哪个主席。他不仅看清了，而且分清了。他拿他做木活的尺子和墨笔在两个主席之间划了条线，举起菜刀，把他们割开了。他挥刀前说：“接班人死了，坐飞机死的，想往苏修跑，结果飞机莫油了，栽啦。”大哥说：“毛主席就要老了，他马上就可以接班了，他跑到苏修去干什么？”大哥的话音未落，他反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比较响亮。大哥正站在神龛前面的晒簟里为他掌灯。先前，他梦见自己坐在一辆从柬埔寨开往越南的列

车上。

他坐在矮桌旁喝酒，眼睛不在杯盏，也不在碗碟，而在房梁的亮瓦上。竹子随风摇曳，亮瓦时明时暗，他的眼睛也时明时暗。暧昧，依旧可以叫暧昧。他的手指甲在桌面的缝隙里抠，油垢像肥沃的泥土被翻出，散发出古老的香味。“把收录机关掉，老子想安安静静地喝酒！”他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不关！我想听音乐！”我说，我也不看他。“音乐？死声淘气的，也叫音乐？叫哀乐还差不多！”他一个人干了杯，再斟满。“能说哀乐不是音乐？”我起身欲走。“老子叫你把录音机关了你就关了！老子听不惯，跟死了人似的！”他转过头，盯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毒。“不关，我就想听跟死了人一样的音乐！”我转过身，盯着他，目光锥子一样。我也在我的眼睛里放了毒。“录音机是老子买的，老子有权不要你听！”他砸了酒杯和那只拿酒杯的手，玻璃钻进了他的肉，血流出来混在了酒里。我感觉酒里有毒，他的血里也有毒。

3

我对我父亲的记忆开始于那些阳光洒满露珠的早晨。那时候的阳光掷地有声，像沙砾，落在树梢上能压弯树梢。那时候的露珠晶莹剔透，硕大圣洁，承载于肥硕碧绿的樱桃叶。还有桑叶和青杠叶。那时候，天空时常蓝得像地中海，手伸进去，手也染蓝了。但天再蓝，阳光再粗糙，却不觉旱，不觉烈。有风，凉凉的，潮湿。那时候多白雨，看着看着，就从房背后、山那边、河对面下过来，一霎，或者几霎，嘎然而止，干练。水质纯净，张嘴可饮，味道甘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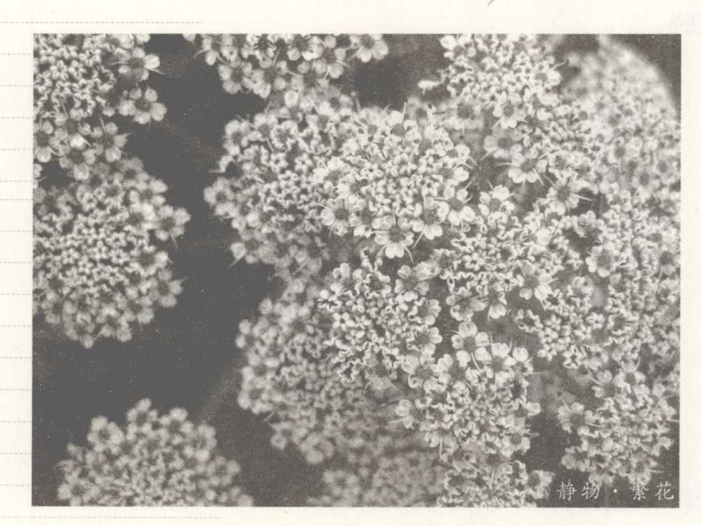
在如此天然纯粹的阳光雨露里生息劳作，我父亲却没有丝毫的快乐和幸福。至少在我看来没有。我父亲总是板着脸，从不开颜，仿佛他的脸不是真的脸，而是一个面具，一个固定了表情的面具，木头或塑料做

的面具。然而，我父亲的脸不是面具，是真的脸，除了不会笑不会慈祥，除了“板”它还会愤怒，还会咆哮，还会像狮子和老虎张牙裂齿，双目喷火。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生来都惧怕父亲。惧怕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影子。父亲个高，干瘦，脸膛黑红，额头和脖子青筋绽出，每每发怒，青筋都会在黑红的肌肤下滚动，颇像藏匿起来的幼蛇。那些流淌着我父亲的血的小蛇仿佛也是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就属于了我父亲，属于了我父亲的血液、骨头、情绪，属于了我父亲的心胸和品性。随着我父亲的生长，那些蛇也在生长，毒力也在生长。那些蛇把它们的毒力传到了我父亲的眼神，传到了我父亲的声音，甚至传到了我父亲的发端。

我们惧怕父亲，就躲避父亲，尽量不与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父亲在桌上，我们就都不上桌，要么围着灶头，要么聚在屋檐下，要么干脆端着碗去到路口，坐在石墙上吃。干活的时候，我们也不跟他在一起，他在东，我们就在西，他在北，我们就在南，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也不喊他，只管走我们的。我们更没有愿意跟他在一个床睡觉的，仿佛跟他睡了就会丧命，不丧命也会像《吃人婆》里讲的，被他吃掉脚趾手指。有一两回，家里来了客人，我父亲命令我跟他睡。没有人能想象那样的夜晚我有多痛苦。我蜷缩在我父亲的脚底下，尽量不去挨他，好象挨了他就会被他吃掉。

我们对父亲的惧怕不是想当然的。我们对父亲的惧怕来自父亲的凶狠与恶毒。在对我们的教育上，父亲一贯奉行“黄筋条子出好人”的方针。打人成了我父亲的日常事务，挨打成了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每天的功课。我父亲打人的密度和力度与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无关，只与他的心情有关。我父亲在打人上善于借鉴。最让他自得的借鉴是陪打。没犯一点错误，也得陪犯了错误的挨打。我父亲把这叫着“陪杀场”，其意义在于“打柱头惊扇磴”在于“杀鸡给猴看”。我父亲不喜欢在打骂人的时候有人回嘴，凡回嘴者，必罪加一等。因此我们挨打的时候，不

管心头有多大的委屈、冤屈，都气不敢出，必作虔诚的低头认罪状。长此以往，我父亲自然就成了凶神恶煞的化身，举手投足，甚至连咳声嗽放个屁，都对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构成了威胁。比如我们本来在院子里耍得好好的，本来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只要一听到他的响动，便立即归依佛法，腿肚子还一个劲地打颤。我母亲把我们的恐惧样叫做“老鼠子见了猫”。父亲从来不与我们说笑，更不与我们玩耍，他与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打骂，训斥，恫吓。


◎静物·繁花

我小时候经常尿床，而妹妹爱生黄甲疮，时常在麦子扬花的时候钻进麦地打滚，据说麦子的花粉可以治愈黄甲疮。大哥二哥都是早熟品种，小学成绩极好，初中就分心了，暗恋那些同样早熟的女子去了。我们四姊妹各自的劣习，没有少给本来就善于抓机会的父亲借口。对于爱尿床的我的处罚，是不让去上课，顶着床单或被盖，在太阳底下曝晒。对于大哥二哥的处罚要重得多，打骂不说，还要长久地跪，不准吃饭。谁叫他们犯涉及“生活作风”的错误呢？谁叫他们醒事得那么早？妹妹小，又是唯一的女孩儿，只是偶尔挨几个并不响亮的巴掌，且大多打在肉漉漉的屁股上。即使“陪杀场”也只是跪跪而已，走走过场，并不像我们陪着挨真打。对妹妹的宽待，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父亲唯一善良的地方。

我父亲也有不在家的时候。出门做木活去了，上老林挖药去了，或者进城卖樱桃让亲戚留下过夜了。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四姊

妹该有多高兴啊。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我们获得了解放，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说我们想说的，做我们想做的，吃我们想吃的（只要有）。我母亲习惯了我们归依佛法的样子，不喜欢我们的自由化，把我们这种父亲不在时的放纵叫做“猫儿走了老鼠子反阵了”。每每那时候，每每我们“反阵”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希望我们的父亲永远不回家啊。我心底甚至生出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希望我父亲死掉。我们深知，我们父亲的存在，是对我们的自由和快乐致命的威胁。

4


◎窗外

凌晨四点，有人在灵堂喊开孝了。我舍不得我的手气，说再搓儿把开孝也不迟。大哥发火了，说日期是先生看好的，依先生的还是依你的？母亲哭了，说看在你们睡在枋子里的老汉儿的面子上，都出来开孝，等把你老汉儿送上了山，看你们咋个搓！

我出去了。灵堂里闹闹嚷嚷，人密密麻麻，像是开大会。好多亲戚都拥在我父亲的棺材旁伺候我父亲。我父亲棺材前的香火正旺。先生开讲了，说得唾沫横飞。孝是从大哥大嫂开起的。大哥大嫂首先下跪，再包孝帕。孝是“拖拖孝”，土白布的，从头一直拖到脚。包孝帕的时候，大哥一本正经，大嫂和包的人却嘻嘻哈哈笑了。旁边的人都跟着笑了。我也笑了，把眼泪都笑出来了。戴了孝的大哥大嫂像是变了个人，样子实在滑稽。笑过，轮到了二哥二嫂。又是一阵笑。二哥干瘦，“拖拖孝”把他衬托得像根豆芽。轮到我时，我没有像大哥二哥那样完全地下跪，而只是半跪。妹妹说我是怕把新裤子跪脏了。妹妹说错了，我是心不诚，不

愿跪。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跪得还不够吗？为活人跪了，又为死人跪，我不愿意。

等戴了孝的人齐刷刷站起来，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拖拖孝"，长长的，拖拖的，惨白惨白的，加上哀乐，悲伤，悲凉，悲哀，悲怆，悲痛。先生继续讲，依旧是唾沫横飞。先生讲的什么，我是一无所知，我相信在场的人也都是一无所知。

盖棺了（我们当地叫掩棺）。按规矩都得与棺材中的人见上最后一面。母亲见了，我父亲的两个兄弟见了，几个亲戚和村人也见了，大哥二哥见了。他们还说了话。我母亲说的是，老头子，这下你倒好哟，一走百了，丢下我不管……我母亲突然悲由心起，扶棺号啕起来。我没有要见我父亲最后一面的意思，我想象得起一个患肝癌死的人躺在棺材里的模样，我甚至想象得起一个今日尚活着的人日后死了躺在棺材里的模样。但就在掩棺前的一瞬，我改变了主意，我上前见了我的父亲。父亲真像一具木乃伊啊，脸只剩一搭黑皮，手杆只是两根小棍，穿了若干套新衣裳的整个人只是一个稻草把。

我哭了。我感觉到一股悲怆从我的血液和骨头里窜出来，封锁了我神经上所有的光亮。这悲怆属于我的父亲，更属于棺材里那具木乃伊，属于所有消失了的、正在消失和将要消失的生命。

5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意志在控制我父亲，不让他成为一个善良的、慈祥的、宽厚的父亲，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意志，甚至不止一种，是好几种，就像那些决定着一棵樱桃树的意志，一种决定树叶，一种决定树枝树干，一种决定树皮，还有决定花、决定果实、决定种子的。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究其血脉，发端于当地一个悠

久的土司族系。土司姓王，1225 年至 1953 年存在于龙门山、岷山丛中。始祖王行俭，早在 1195 年就来到了这山中。是考中进士来的，做的是判官。王行俭是扬州兴化县人。也即是说，我父亲的血脉来自扬州。我不知道我父亲的血脉跟扬州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父亲的血脉是什么时候怎样从土司家族分支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叫王国彦，死后葬在一个叫桂香楼的地方，县太爷路过都得下轿，他的一个堂兄王国宾，做过长官司，咸丰十一年战死在岷山主峰雪包顶下的雪山梁子。在我父亲的血脉所属的土司中，最显贵的要数明代的王玺，岷山丛中唯一能与九寨黄龙媲美的报恩寺就是他的杰作。大家族的辉煌各不相同，但衰落都是相似的。鸦片呀，女人呀，金银财宝呀，醉生梦死呀。我不知道王姓土司及其支系的衰落在我父亲的血液里注入了怎样的病毒，但我知道肯定是注入了。

我父亲五岁丧父，在兄嫂手下活人，他母亲把衰败中的家交给了成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长子。说起童年，父亲的眼里尽是怨仇。1949 年来了，我父亲的母亲和两个兄长相继被打倒。为了生存，父亲十三岁就进了我母亲的家门，撑起了一个家。因为我母亲所谓的家，也只是两个孤儿寡母。

没有人关心过我父亲，爱过我父亲。童年时没有，成年时也没有。父母兄长没有，儿女也没有。我不知道我母亲爱没爱过我父亲，爱的程度如何，是怎样一种爱的方式，我只知道我母亲也是一个生来就缺乏爱的能力的女人。在我的逻辑中，唯一可能让我父亲的人性苏醒的只有我的母亲，但我的母亲没能做到。我的母亲没有这样的意识。父亲也没有。在那样的岁月，那样的环境，面对的又是那样深奥的问题，当事者又是那样的两个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父亲活着时一直都是孤独的，不是身体的孤独，是灵魂的孤独。父亲阴，父亲冷，父亲恶，都是因为这孤独。

我在想，一个血统的衰败，一个绝对的无爱，是铸成我父亲自私狭


◎石阶

隘、独断专横、无情无义而又神经质的人格的意志。父亲在这样的意志操纵下执行着两个法则，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个是人不爱我我不爱人。

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是有罪的。现在，我有些怀疑了。我想，罪不应该在我父亲，也不应该在我母亲和我们。但是，我们的父亲毕竟那样过，我们的生活毕竟因他那样过，我们的自由、幸福和快乐毕竟也那样过，既然都那样了，总有谁一定是有罪的。

6

癌来得很突然，以至于父亲和我们都没有想到。癌伪装成结石，欺骗了父亲，欺骗了医生和 B 超机。

一个阳光稀疏的下午，我在县城东门外农业银行拐角处突然撞见了我父亲。本来就黑瘦的父亲更黑瘦了，脖子上的青筋更加裸露，两个蜡黄的眼睛罩着死亡。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胆结石，正在保守治疗，靠吃中药排石头。望着父亲，我后退了。我感觉父亲的身体开始腐朽，灵魂正在失散。我差不多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腐败的气息。我悲凉顿生，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再次见到我父亲的时候，父亲正按着肝区躺在合作医疗社的长凳上打滚儿，注射了针药也不管用。父亲呻吟着，滚动着，汗水湿透了全身。我从未看见父亲这样疼痛过，这样狼狈过。我从未看见过这样的疼痛。我没

有去逗我父亲，我父亲不让人逗。我只有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父亲眯着眼，咧着嘴，鼓动着青筋，挥汗如雨，死去活来。我不是无动于衷，我说：“大大，要是我能帮你疼就好了。”父亲没有应声。我不知道我父亲怎样看我。明知疼痛是不能替代的，我还这么说。要是疼痛真能替代，我还这么说吗？

在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又一次目睹了父亲的疼痛。一种无法描述、无法重复的疼痛。我父亲的疼痛撕裂了白布缠裹的时间和那么多失眠的眼睛。整个夜晚，父亲都在呻吟和嚎叫中不断地变化姿势——疼痛让他无法把一种姿势保持片刻。止痛片一把接一把地吃，杜冷丁一支接一支地打，都止不住我父亲肝痛。汗水打湿了父亲的衣裳，结晶出灰白的盐粒。

父亲如此痛苦不堪，我却依旧与他保持着距离。身体的距离和精神的距离。我不与他说话，他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敷衍。当他的器官暴露的时候，我就转过头或闭上眼睛回避。我厌恶我父亲的器官。过去好的时候厌恶，现在坏了更厌恶。接触过父亲之后，我总要去洗手间长时间清洗。我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只有义务，没有情分。

当一个叫麦刚的年轻医生和CT机共同确诊出我父亲的癌时，我和我的兄弟姊妹显得异常地冷静。我看见睡在病榻上的父亲在不断远去，像一只扁舟在黄昏离岸。小时候，我们诅咒我们的父亲死，而今当我们的父亲真的要死去的时候，我们又不那么想了，我们兄妹四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拯救我们的父亲。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坐在确诊得了癌的父亲的身旁。车过青白江，天光开始变暗。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绿色的田野。不同于涪江河谷的那种小块田野，而是广大的川西平原。桑塔纳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云压得很低，黄昏让我不断地生出幻觉。绿色的田野和灰色的瓦房从远处扑来又飞快地退去。想到父亲身体里的癌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要让他永远从我们

的生活中消失，我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对于父亲，这是他的第一次成都之行，也将是最后一次。

我真希望一切都是梦啊。

7

孟子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当我父亲知道他就要死去时，他却只是哀而不善。

我父亲的哀是所有垂死者都有的哀。惊恐。惶惑。凄楚。少言。暗自流泪。背地里低泣。父亲的哀来自人求生的本能，更来自幸福生活的痛失。父亲刚过六旬，儿大女成人，不愁吃穿，要钱有钱，要面子有面子。从成都回来，父亲就抹下了手上的金戒指。父亲知道，他这一辈子跟金银财宝的缘分完了。抹金戒指是我父亲最深的痛，而抹金戒指的父亲又是我最深的痛。父亲最最想不通的就是，上天为什么要在他正享福的时候收他，为什么不再给他十年二十年的期限。

哀之余，父亲依然继续着他的言不善。父亲的言不善是针对除开妹妹之外的他的家人我们的。主要是针对大哥大嫂的。父亲说我们三弟兄在串通一气整他，整我母亲，我们三弟兄他是一个都靠不到了。父亲说："但是我不怕，我还有两三万块钱，你们不管我，我不信拿钱还找不到人管，钱花完了，我不会问你们要一分的，我晓得自己想办法。"生命在一点点离开父亲，而我靠传统培养起来的感情也在一点点离开父亲。父亲是父亲的掘墓人。父亲不止戴着面具，还包裹着画皮，画皮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冷酷、自私、变态的心。父亲一见我们就开始数落我大哥，数落得牙齿铮铮响，说哪回哪回给别人发烟没给他发，哪回哪回请人吃饭没请他，哪回哪回给他拿了只值五六块钱的苹果蛋蛋，哪回哪回给他吃了球头子……数落变成了诅咒。父亲甚至说，他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

会放过我大哥。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我大哥竟然有要诅咒的深仇大恨。如果说我大哥真有什么坏品性，比如小气，比如自私，比如贪心，那也是来自父亲他的遗传和影响呀。

父亲对我的不善只是一种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恨。在我父亲看来，或者说在我父亲的想象中，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块钢，一块好钢。我从小功课优异，文章写得好，又是学生干部，可以说是德才皆备。然而我没有成为父亲眼里的钢，我甚至连铁都不是。我父亲眼里的钢是科长局长，是经理大款。我父亲眼里的钢是务实。而我却选择了务虚，且永不改悔。父亲不懂务虚，也瞧不起务虚。他说文章要是不能挣钱，就连狗屎都不如。父亲听说我写东西是为了给后人看，就骂我是鲜端生（我们当地旧时的秀才乞丐）。父亲一辈子打鬼随鬼转，自以为很成功，也要我打鬼随转。我大哥打鬼随鬼转了，成功了，他又瞧不起。我不打鬼随鬼转，他也瞧不起。我父亲要死了，我天天都在对他好，陪他，伺候他，和他说话，让他快乐。但我父亲不在乎这个，他依然只在乎钱，到死都只在乎钱。当我暂时拿不出他分摊给我的那份医疗费时，他又骂我是鲜端生，骂我不打鬼随鬼转，骂我不务一点实，尽务虚，弄到现在还穷得响叮当（我父亲的存折上可不是没有钱）。骂人的时候，父亲的眼睛又喷火了，脖子上的蛇又蠕动起来。

一天，我母亲告诉我，父亲说这次住院回去再疼他都不医了，他自己晓得想办法。父亲说的想办法就是自杀。我母亲说，你老子给我说，回去好好儿地洗个澡，把衣裳换了，然后喝一瓶老鼠药下去，死了，儿子们回来，也莫说是喝老鼠药死的。说着说着，我母亲就哭了。我说妈，莫听他的，他真想喝毒药就不会说，说了，他就不会喝。当着母亲的面，我说了我父亲的不是。我说了他的凶，他的恶，他的自私，他的小气，他的独裁。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得了癌之后，我们想的全都是他的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父亲在临死之前必须接受的审判。读卡夫卡时，我想

到了这一点。卡夫卡在小说里审判了他的父亲（父权和专制）。我想对父亲的评判也是一种审判。我不只一次对大哥二哥说过，要是我们都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出发，从小时候所受的虐待出发，从内心所受的压抑和恐惧出发，我们三弟兄都可以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拿手指戳着他的脊梁数落一通，并且他是绝对的罪有应得。然而，因为血缘，因为道德，我们似乎又必须取消这个审判。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审判父亲是大逆不道的。

8

我父亲没有像科学预言的那样很快就死去，而是苟延残喘了一年有余。反复地住院，从不间断地吃药打针，从不间断地补充营养，是他的生命赖以延伸的保障。我父亲不想死，他在等待奇迹。

然而，我的父亲没有奇迹。我的父亲不配奇迹。在自以为是的奇迹消失之后，我父亲睡在发黑的蚊帐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面目也完全改变了。站在父亲的床边，我从不喊他，我只是默默地望着他，或者悄悄地帮他。死神已经靠他那么近了，说话又有什么用？我甚至连悲痛也没有了。一个雷电火闪、凶猛如虎的人竟然被癌吃成这样，我对生命还能有什么感慨？

父亲三天没吃饭了，他吃不下，稀饭水果也吃不下，他说他想起有些东西就打颤，想吐。他说的是肉。父亲说他药也不想喝了，前几天中药熬好都没喝。父亲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变得不真实了，不像是他的声音了。父亲的舌头也像是大了，在嘴里拤不开。父亲像是真的要走了，人已开始恍惚，整夜嘴里唧唧咕咕不知在说些啥。我们要他再输些液，他坚决不输。他说药吃了几箩篼，液输了几大桶，钱花了几大捆，反正是医不好了，再医也医不好，不如几个三下死了，免得既折磨活人又折磨死人。父亲躺在蚊帐里，说出了他的绝望。我站在一旁，变成了哑巴。面

对死亡，生命竟然如此脆弱。我知道这是上天在制造我们的时候就安排好的结局，我知道这是造物主对生命的高贵与快乐的讽刺。

父亲自杀过三次。一次是拿剪刀劐腕动脉，一次是拿菜刀割颈动脉，一次是吃安眠药。都没有得逞。吃过六十二片安眠药的父亲躺在木楼上，鼻子里还有几缕游丝。六十二是他的岁数。木楼上的屋子很小，窗户紧闭，光线暗淡。好在房梁上的亮瓦刚洗刷过，还能透点天光进来。屋外没有太阳，屋里光线惨白。父亲没有了一点阳气，面色蜡黄，眼睛微闭，只是偶尔虚开。父亲已经认不到人了，水喂到嘴边也不知道咽。父亲没有了咽水的力气。母亲以为父亲这一回如愿以偿了，叫我扯下他床上的蚊帐。我没有扯。我知道，扯了蚊帐，父亲的最后一点魂就会像麻雀一样飞走。

我没有想到，医科教授也没有想到，甚至我父亲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生命竟然与我们、与这个世界如此地依依不舍，如此地缠绵悱恻。

9


◎老家老屋

盖棺论定了。太阳出来了，疼痛结束了，春天也来了。我父亲睡在密封的生漆棺材里，永远地属于了黑暗和宁静。沾了

春的阳光从竹梢落下来，落在我父亲的棺木上，落在送葬的人的头上，无比地干烈和嘹亮。没有风，没有哭泣，只有习俗制造的肃穆。

盖棺定论是一个简短的仪式。棺是早在黎明前就盖了。论也由我前一天在电脑上定了。人们停留在竹林的土路上，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似乎不可省却的、我父亲生前一再乞求的仪式。我在给予我父亲的定论中说，我父亲“虽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身上却有着并不普通的品德、才干和气质，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社员，一个好人”。

仪式是我父亲最后的逗号。我父亲的句号在一个叫大柴林的山脚下。送葬的人们走出竹林，走上了通往我父亲句号的土路。阳光白花花的，鞭炮声白花花的，纸钱白花花的。枯木光秃秃的，挂不住一绺阳光。春天来了，枯木就要发芽，但枯木还没有发芽，零星的残叶在阳光中颤抖。青菜晒着太阳，椿树晒着太阳，送我父亲上山的人们都晒着太阳。唯有我父亲在停驻的漆黑的时间里，再也晒不到太阳了。我的一个叫王金德的堂兄说：“太阳真好。”他说的不是我们有太阳真好。他说的仅仅是太阳本身好。他说的是天气，与他自己无关。他说的不是他的感受。就算他说的是他的感受，对于我父亲又有什么用？他是活人，我父亲已经死了。

坟墓是一件艺术品。棺材是一件艺术品。还有那些器皿，那些禁忌，那些碑文和雕花。倘若我父亲能留住一些时间，成为木乃伊，我父亲也是艺术品。我父亲在棺材里。棺材在坟墓里。坟墓在山岗和严格的方位与尺寸里。山岗和严格的方位与尺寸在我父亲生前的选择里。



◎大柴林，父亲的

黄土流下来，再流下来，一点一点掩埋了我父亲的棺木，掩埋了我父亲，掩埋了我对我父亲的记忆。我目睹了这一情景。太阳、蓝天和乡亲们也目睹了这一情景。铁锹在手，泪水在流，疼痛在心。曾经，我们是那样地诅咒我们的父亲死，而今他真的死了，我们又是这样的揪心。

现在好了。写下这些文字，我和我父亲所有的缘分都了结了。怀念，或者审判，都是一种交待，一种了断。我在怀疑我父亲的同时，也深深地怀疑我自己。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漫长的集权与专制历史的国度，作为一个集权与专制的受害者和反思者，审判父亲是耐人寻味的。

现在真的好了。我父亲一个人躺在远离我们的泥土里，不再威胁到我们的自由、幸福和快乐。我们兄弟姊妹，包括我母亲，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见了面，都不再提起他。我们挣钱，花钱，睡觉，即或偶尔思索，都不再涉及他。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只是我们。

我的老母我的疼

正月初六。天气阴郁。一个人回老家看母亲。涪江河谷的田地很荒，大山和天空也都很荒。母亲是在我家过的年，刚走两天，我又操心起她。还在年里，母亲就一个人回乡下住，我心里不是滋味。我买了柑和梨。这些年，每次看母亲，都不是为了让她吃上什么穿上什么，母亲不缺吃穿，妹妹妹夫给了她足够的钱，我去看她，就只是想看看她，陪她烤烤火，晒晒太阳，散散步，说说话。阴郁罩着母亲的村庄，包括母亲上了锁的木门和铁丝上晾晒的衣服。

在李何香妈妈家找到母亲，母亲笑呵呵地出来，躬腰走在樱桃树下面，脸上的皱纹里全是孩子的单纯。“你还肯摆人户呢？”我也笑笑，说着善意的责备的话。“这几天不冷，我一个人懒得架火，跑到你李何香妈妈这儿来摆条！你晓得的，你李何香妈妈这么多年都一个人过，快八十岁的人了，造孽得很。”母亲匆匆赶在前面，头也不回。我留意到石墙边樱桃树上的花蕾已经炸得很开了。

给大哥二哥成了家，母亲和大大便各开门另烧锅了。我在乡下教书，妹妹在读大学。大大以“自谋生路，各奔前程”八个字修正我们的未来，母亲无言地支持。种地、淘金，供妹妹读大学，接济大哥二哥和教书的我。大大能干，有魄力，但也独断、小气。母亲一直都生活在大大的阴

影里。在我眼里，母亲从来都是大大的下饭菜，但也是大大的“贴心豆瓣”。母亲没啥主见，凡事都依着大大，差不多只是大大的一个附属。母亲似乎只会出工，收拾柴火，做饭、做菜、洗洗补补一个家庭最显细节的活都是外婆在做。也是樱桃树炸花蕾的时候，大大得了癌了走了，母亲从棺木上爬起来，抹干眼泪，开始一个人度余生。


◎母亲

母亲在老家一个人住了一年，妹妹帮老家的二哥把家搬到了外乡的射洪，二哥把母亲也接去了。不是接去享福，是接去当保姆，而且是免费保姆——母亲的开支一向都是由妹妹提供——买菜、洗衣、拖地、送饭，有时还去茶馆添茶倒水。我几次给母亲打电话，母亲都说：“我不想在射洪

了，我想回乡下老屋，一个人住。”“在射洪不是好好的吗？妹妹也在，身体不好，实在不想做事，就不做。”我安慰说。“不做？屋里那么多事，你二哥的两个儿子都在念高中，又不听话，不做咋行？”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挂了电话，想象母亲坐在客厅孤独茫然的样子，想象母亲穿过车流如织的街口的身影，我禁不住眼眶发潮。

母亲的母亲只生了母亲一个，招了大大做上门女婿。母亲的大大是个骑白马的财主，母亲的母亲只是他的一个小老婆，1948 年冤死在绵阳监狱。母亲的母亲命如苦荞，新婚不久还没有生养，男人就死了，又迫于骑白马的财主的淫威，做了小。母亲年轻时漂亮，皮肤白皙，扎两条长辫。不管有多少男人想娶母亲，但自从跟了大大，母亲便是严格地守妇道。挖沟、下种、挑粪、插秧、施肥、除草、养猪、捞柴、抬田改土，母亲样样都做，且不觉得都是磨难。母亲在承受，但并非都是重。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外婆和大大形象鲜明。外婆是善良的鲜明。慈爱，博爱，爱得细腻。大大是权力与专制的鲜明。严厉。严厉到了恶。母亲为数不多的几个鲜明形象，都与樱桃有关：站在木梯上摘樱桃，露水濡湿了睫毛。拿青杠叶遮盖篾丝夹背里的樱桃，沾了露水的手指像樱桃一样红润。在国营食堂门口，风把母亲头上的丝帕吹落了，行人把她夹背里的樱桃挤倒了。我喜欢跟母亲进城卖樱桃。白樱桃，大颗、甜，城里的婆娘最爱吃。母亲的态度好，人也长得好，干净、手脚麻利，秤又称得望。

又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好，好，我一切都好。”嘴上说好，听语气，分明就是不好。我说：“妈，关节炎又发了？五层的楼，天天爬，你可要慢点？依说你也该享清福了……”我拿脚掩上门，不想让走廊里过路的人听见我声音里的悲切。母亲说：“我还是想回来，一个人在胡家坝住，一个都不跟。”胡家坝就是我老家，母亲的田地在那里，大大的坟在那里。我说：“妈，你跟李金慧说过吗？”李金慧就是我妹妹。母亲说：“我不想跟哪个说，我就想回乡下老屋，一个人住。”在母亲焦虑的声音里，我感

应得到她的孤独，感应得到她对一个人过日子的渴望。我说："妈，实在想回来就回来，我星期天回来看你。"电话那头无声了。母亲肯定躲着在哭。想到二哥的艰难困苦，想到二嫂难看的脸色，想到母亲看见二嫂脸色内心的恐慌和不安。我理解母亲想回老家一个人住的意思。

在电话里跟妹妹谈起母亲，妹妹说看母亲自己，她愿意怎样就怎样，所有开支她管。我说大大死了，现在我们就一个母亲，顺她的心是最好的，她高兴，她健康，就是我们的福。妹妹说她是母亲的女儿，她该怎么做她清楚，我们当哥哥的怎么做她管不着。我懂妹妹的意思。大哥跟我都住在老家县城，但彼此却很少往来，大哥不是在忙他的官，就是在忙大嫂的店，我不晓得他对母亲有怎样的想法，但我知道像二哥一样，大哥也需要母亲，需要一个像母亲一样放心又免费的保姆，做饭、做家务、看门。大大临死前叮嘱过母亲，别跟大儿子过，大儿子心眼小。我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听大大的话，但我知道母亲要回乡下老屋一个人住，一个儿女都不跟，一定是对她三个儿子都非常失望。

大大得了癌，拖了整整一年，全是母亲照顾。大大绝望了，就折磨母亲，不好好吃药，不好好打针输液，不好好睡觉，几次背着母亲自杀，割腕动脉，吞老鼠药，喝安眠药。母亲曾对我说，她希望大大早一天死，要不就她早一天死。大大真的死了，母亲却嚎啕大哭，扑在大大身上，唤着大大的名字。

在街上遇见老家的亲戚，他们对我说，娘娘回来了。母亲回来了，回乡下老屋了，却不告诉我一声。我感到惊诧，感到难过。

打车回家看母亲，母亲正在门前的园子里栽青菜，见了我笑着说："这下回来住了，栽几苗菜，好吃。"以前菜都是大大种，母亲收。篱笆边的樱桃树死了，曾经可是长得极其繁盛，樱桃结得又好又多。大大得了绝症，樱桃树也得了绝症。樱桃树是大大亲手栽的。跟母亲在园子里转，帮母亲放菜秧，灌定根水，感觉像是回到了从前。从前回到老家，总爱跟

母亲去菜园子，她种菜、掐菜、摘菜，我站在旁边看，说着我读书、教书的事，说着我发表的她懂不起的朦胧诗。母亲听着，不表态，只是笑。遇到忧愁，也跟母亲说，母亲不安慰我，但我把忧愁说给母亲，忧愁就不见了。

母亲给我烧水、做饭，我坐在灶背后续火。老屋已经收拾一新，地扫了，灰抹了，阳尘打了，床铺也收拾过了。外婆和大大的遗像立在神龛上，面容依旧那么熟悉。在老屋转悠，我说妈，老屋里有股气味。“鬼的气味？好久没人住了，东西都发霉了。”母亲的声音从灶屋里传来，一同传来的还有切菜声。大大得病后，一直住这老屋。母亲照顾他，也在这老屋。大大死在老屋，葬礼在老屋举办。母亲的那一声声嚎啕也是在老屋爆发的。老屋该有多少痛苦和恐怖的记忆。现在，母亲回到老屋，一个人住，肯定会想起那一幕幕的场景，不知她是否能够承受这份记忆的重。

阳光透过开花的枯竹，照进老屋，落在母亲的脸上，像一个特写，把母亲慈祥而又衰老的面容永久地烙在了我的眼球。

去年正月初八，大大的三周年祭日。我回去了。厨房里挤满了人，案板上堆满了肉。我本能地忽视了这一切，冲破团聚的喜气，在人堆里搜寻母亲。在我的心目中，别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我的母亲，我的孤独的母亲。母亲不在，我下到二哥家的院子，下到樱桃树前面的园子，下到涪江边。母亲还是不在。热闹只在我家老屋。院子、田野、河岸的空旷寂寥是盘旋煽动的。返回老屋，在人堆里看见母亲，我悬浮的心才沉下来。我想给她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带。我知道母亲需要什么，但我无力给她。母亲带我们四兄妹去到大大坟地烧三周年。大大坟后的青杠林落光了叶子，显露出稀疏的枝桠，单调，干燥。母亲和我们都没有了先前的悲痛。

尾随母亲来到河岸边，眺望对岸。道角、青玉、三岔子、陶家山……山没有变，沟壑没有变，积雪过后，三岔子依旧像匹奔马；变了的只是

河床、人家，只是樱桃的味道，只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质地和向度，爱的质地和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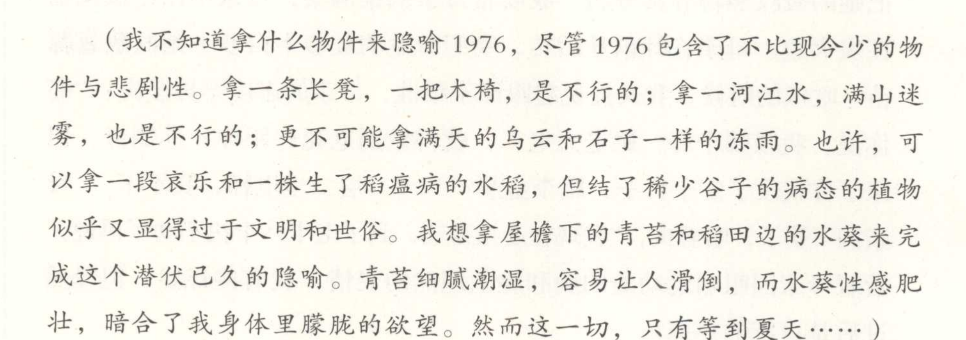
一年过去了。这一年里，我总是在想，四兄妹，差不多也都事业有成，怎么不能安顿好一个老母亲，还要让老母亲孤单地住在乡下。母亲进城，总是到大哥家，煮饭洗衣裳。有时是母亲看不过意主动要做的，有时是大哥打电话把母亲叫去的。我晓得了，总是有点愤然，把母亲接过来，陪她吃顿饭，散散步。但这吃饭散步，大多又是背着妻子。像大哥二哥家的女人一样，妻子也见不得我母亲，时不时拿脸色给母亲。我不明白，这样善良的一个母亲，这样孤单的一个母亲，她们是怎么见不得的。我又明白，是我的母亲没有给她们穿金戴银。年前，母亲对我说："你大哥问了好几回，问我鸡养大了没有，养大了捉进城宰了，以后就跟他们，他们家就缺这么个人手，请的人都不合适。"我问母亲："你自己觉得呢？"母亲笑笑说："我才不干叻，我说了我一个都不跟。""一个都不跟，总不是个办法，过两年上了七十，还一个人都不跟？"我望着母亲，心头突然生疼。"李金慧说了，她们搬了新家，就来接我跟她。我不去。二十二楼，坐电梯，我才不去叻。"母亲说"二十二楼，坐电梯，我才不去呢"的时候，倔得像个小孩。

这些天，我想母亲想得特多。六十六岁，有病，一个人住在乡下，会是怎样的感受。接连的寒流，接连的阴雨，或者漫长的雨季，我总是想到母亲一个人在乡下泥路上踯躅的情形。冷、孤独、悲凄……几次想把母亲接进城，跟我，不要她做事，不要她孤独，都没能实现。房子太窄，妻子不接受，母亲不愿意。"我就想在乡下，一个人住，一个也不要跟。"我知道，母亲坚守她的原则并非本意，并非她真的喜欢独居，她是不愿意看见我因为她和女人闹别扭，为了我们家庭的和谐，可是她哪里知道，她一个人住在乡下，我们家庭表面的和谐里隐藏着我个人怎么样的动荡

和疼痛。

母亲独居乡下，我无法猜度我的两个兄长的态度。他们一定有些责怪母亲。他们都两头不见天地忙仕途忙生意，他们不可能太多地琢磨母亲、把母亲当成他们的至亲至爱。他们或许会觉得母亲太自私。妹妹对母亲好，有钱有孝心，但妹妹身在外乡，居住又太前卫，母亲去了不方便也不习惯。我有闲，时常惦记母亲，照看母亲，但这惦记与照看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天空愈见阴郁，老屋愈见阴暗。母亲不断地往灶孔里塞柴，火光把她的皱纹照得异常分明。我要帮母亲摘菜淘菜，母亲不让，按我坐在炭火边。母亲在灶前灶后转，唠叨着她的红萝卜白萝卜她的葱葱蒜苗。吃饭的时候，我又提说起跟谁不跟谁，母亲的态度不再坚决："那你说，我跟哪个好？跟老大老二？就得做到老死；跟你？你倒好，但跟了你就没了安宁日子；跟李金慧？二十二层，坐电梯，我不干。"母亲搁下筷子，嚼着肉，"我现在还扭得动，到了七十八十扭不动了再说。"看着母亲因咀嚼运动着的脸和脸上坦然的表情，我有些释然，但释然过后是更沉的疼痛。



1976·青苔，或者水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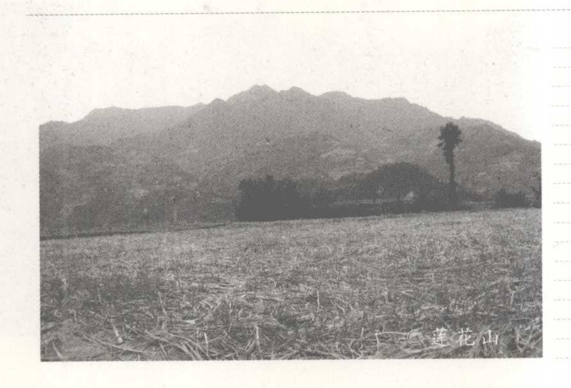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拿什么物件来隐喻1976，尽管1976包含了不比现今少的物件与悲剧性。拿一条长凳，一把木椅，是不行的；拿一河江水，满山迷雾，也是不行的；更不可能拿满天的乌云和石子一样的冻雨。也许，可以拿一段哀乐和一株生了稻瘟病的水稻，但结了稀少谷子的病态的植物似乎又显得过于文明和世俗。我想拿屋檐下的青苔和稻田边的水葵来完成这个潜伏已久的隐喻。青苔细腻潮湿，容易让人滑倒，而水葵性感肥壮，暗合了我身体里朦胧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等到夏天……）

1月1日。雾霭缭绕岷山。涪江河谷萧瑟。低温。灌在麦苗上的粪水，转眼就结成了冰。村庄裸露在山脚下落光叶子的椿树林，偶尔袅娜的炊烟与雾霭混在一起，加重了天气的阴郁。手持粪瓢的女社员在立着光秃秃的桑树的田野深处张望，头上的棉帕掉了下来也没察觉。挑着粪水走在田间小路上的男社员嘴里哼着山歌，肩上的扁担发出的紧迫的咯吱咯咂的响声把山歌撕得粉碎。



◎静物·水葵

大石板。一个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峰。三瓣莲花中最小的一瓣。我随大哥二哥来到了迷雾朦胧的莲花中。我没有嗅到莲花的芬芳，也没有闻到亿万年前山峰形成时弥漫的岩浆的气味，我只是尝到了飘飘洒洒的冻雨的味道，只是感觉到了地冻天寒的冷。大哥二哥在丛林里砍柴，我在一旁搓手跺脚。我十一岁。冻雨包裹了我，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冻成了冰棍，身体结了层冰壳。山脚下是荒凉的黄土地，是看不见底的壕沟。黄土坡上王光荣家的房背上冒着青烟。我开始嚎啕。我冷。我疼。我稚嫩。我要到山下去，我要到王光荣家石板房里去烤火。北风呼啸，吹散了我的哭泣。冻雨飘飘，冻结了我的眼泪。


◎莲花山

1月8日。腊八节。昏暗的早晨。尿湿的被窝。我在寒冷的颤抖中醒来。透过厨房油灯的光线，隐约看见敞开的后门和门外平铺的墓碑。六点十分。公社的广播准时响起。木楼口，靠左的梁柱上，红油漆漆过的小木盒开始唱《东方红》。我多次爬上楼梯，站在楼口，将耳朵贴在喇叭上，听里面说话。在我的感觉中，里面就是毛主席，就是北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全世界。小木盒沾满阳尘，布满蜘蛛网，但声音依旧嘹亮。已经有过的很多中午，或者下午，小木盒带给了我足够的欢喜。“长桂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通知，今天晚上，在桂香楼放映电影战斗故事片《渡江侦察记》。”广播员是本地人，“ang”和“an”不分，习惯把“上”说成

“善”，把“香”说成“仙”，把“放映”说成“饭引”、“渡江”说成“渡尖”。当然还有《闪闪的红星》、《奇袭》、《地道战》。六点三十分。“新闻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准时开播。我半坐起，掀掉尿湿的床单，把下半身埋在棉絮里。望着后门外微露的天色，拿手捉住尚未发育的小鸡，恨不得把它连根拔掉。“周总理死啦，周总理死啦。”父亲边穿衣裳边从睡房出来。感情是惋惜的。周总理死了，周总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周总理可是诸葛亮啊，周总理死了，国家就更难办了。”父亲在火塘里穿袜子。火塘刚架上一些木叶，火光冲天。


◎大园子的核桃树

婆婆煮好腊八饭，父亲先盛了一土钵准备给大园子的核桃树吃。核桃树正当壮年，一到夏天，就遮蔽了大半块园子，能收两大背核桃。父亲拿着斧头，大哥端着土钵，二哥、妹妹和我跟在后面。斧头在核桃树的旧伤疤上砍出一排排新伤口，大哥用木勺把腊八饭喂在伤口里。伤口渗出的白浆与腊八饭混在一起，让1976神秘而又恶心。

我要像大哥二哥那样穿有皮带扣的裤子。我不想再穿“球打伞”。穿“球打伞”爱牵“盐口袋”，总有大人开玩笑，把石头丢进去。在王光才家后院，二哥对我说：“把我碗里吃剩的荞面吃了，我给你一个弹弓。”我说：“我不要弹弓，我要你那根有皮带扣的黄裤子。”我们刚从王光才家的自留山砍了青杠柴出来，坐在后院吃荞面。荞面硬邦邦的，没有一点油。等太阳出来照在碗里，我已经吃光了二哥的碗底子。想象穿着二哥有皮带扣的黄裤子走在邓老师的目光里，我再吃不出荞面的苦涩了。

在长桂小学的苹果林把青杠柴卖给校长老婆时，我没有看见邓老师。邓老师也许进城了，也许回江油了。要是邓老师在，我宁愿把柴送给她，一分钱不要。

揣着卖柴得到的五角七分钱，穿过乱石窖，走过杨凤春家门上，走过大盖透，走过三秦庙，我特别珍惜拥有五角七分钱的美好感觉。我清楚，一回到家，就得如数上缴。

2月5日。农业学大寨初见成效。龙嘴子的千年河滩被炸药、雷管、鸡公车、背篼、黄土、成都知青改造成了沙地。队长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英明啊，他说人定胜天，就人定胜天了。"队长说话的时候已是黄昏，社员们正坐在石墙上评工分，最后一窝土豆刚刚种上。石灰厂的木船在涪江里过来过去，运送着矿石。涪江依旧丰满，碧绿的江水流淌在古旧的河床里，像穿着布衣的少妇的身体。身体制造的河岸线带着身体本身的欲望，使眺望的眼睛迟迟感觉不到黑夜的来临。寒风乍起，乌鸦在空中盘旋。拌有毒药的花生米装在保管室的铁桶里，过几天就会被种进沙地。凶多吉少。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铺满春雪的沙地上看见一只只死鸦。队长说："今天晚上公社有电影，记录片，《周总理粉碎不朽》。"有人笑了，有人黑脸了。"不是粉碎不朽，是永垂不朽。"成都女知青黎抗美纠正说。队长笑道："说错了，没文化，是永垂不朽。"队长含着烟袋。

2月23日。清晨。风把泥窗上的报纸吹得哗哗响。报纸上的林副主席在随风抖动，让人想起吹奏中笛膜的颤动。随着颤动的还有枯干的竹叶、初春的阳光和挂满花蕾的樱桃枝。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了这些。撩起蚊帐，我还看见毛主席。在我床头的泥墙上。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握着把收起的雨伞，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山冈和云雾。他的脚下有花。矮小。像是杜鹃。毛主席去安源。安源就是杜鹃山。我看过样板戏《杜鹃山》。在两红岩，还演过《杜鹃山》里的雷刚，跟女生一派。毛主席高大，英武，但身材苗条挺拔。他年轻。表情坚毅。握成拳头的左手表达着他的坚毅。

毛主席身上有点点血迹，已经发黑，那是我和二哥用巴掌消灭长脚蚊的战绩。蜘蛛在他的上方结了网，阳尘和三两个被蜘蛛吸空的苍蝇挂在蜘蛛网上。

3月8日。樱桃花刚开过，我又梦哭了。我隐约记得有一辆汽车要载我走。婆婆打了我的屁股。是真打，打得我屁股清痛。我醒来，呼吸依旧急促，泪水还挂在腮帮上。

（1976年的春天是隐蔽的土豆花、繁茂的扁谷草和隐约的饥饿。土豆花在龙嘴子，在短坑里。紫色。像鸢尾花，像蝴蝶。土豆扎根的虽是贫瘠的沙地，却也是处女地。充足的农家肥和适宜的春雨让土豆生得苗壮、叶阔、花艳。扁谷草在河岸上，像生错地方的水稻。碧绿、粗糙，却富有纤维，非常适宜于水牛宽阔的舌头和机械的胃。我们的饥饿是一个秘密，先在我们家大园子的苎麻地里，尔后转移到了前院竹林边的马厩。苎麻茁壮水淋，叶子阔大，它承载露珠的气氛足够让我们当时饥肠辘辘，过后念念不忘。父亲在一夜之间挖出了苎麻的根，让婆婆磨成面粉。我们兄妹四人吃出了苎麻的苦涩，却没有吃出其中的名堂。在我们家的马厩，我看过无数回驴子吃豌豆，我的喉头跟着驴子的喉头蠕动了无数回。在驴子满足食欲的过程中，饥饿的我却没有丝毫的嫉妒。倒是有一天，当我发现我们吃了好几回的豌豆饼其实是驴子的配给，我感到了耻辱。）

4月2日。中午。没有米饭，没有馒头，没有锅盔，更没有饼干。我们去了学校背后的沙沟。没有洪水。全是洪水冲刷过的沟壑。梅的裤子垮到了脚后跟。我看见了。上午下课的时候，梅已经脱过一回，站在课桌上喊："看到看到，我脱裤子了！"

什么叫"三项指示"？什么又叫"反击右倾翻案风"？邓老师教我们说："以'三项指示'为纲是黑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纲"是什么？邓老师说："纲就是鱼网上最大的那根绳子。纲举目张。"我问邓老师："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以"三项指示"为纲？"邓老师一

个箭步上前拿手捂住我的嘴说:“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呀,你千万别问。”邓老师脸色煞白。

下午。开大会。“反击右倾翻案风”。校长也说以“三项指示”为纲是黑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大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批斗一个大队小学的老师昌富。昌富走上台,主动低下了头。有人喊“娼妇婆娘,娼妇婆娘”。昌富是个男的,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十八九岁的光景。他讲恋爱,跟公社小学一位女老师,三天两头往公社小学跑。他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看见有人在往昌富身上扔土块,我也扔了一个。邓老师看见了,过来揪了我的耳朵。邓老师像是哭过。昌富是她的同学。

4月5日。清明的第二天。未上生漆的柏木棺材。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我坐在棺材上吃剩饭。花圈。北京。市长。吴德。广播讲话。“一些没有安好心的人。”“一个戴眼镜的坏人。”阴谋。“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首都工人民兵。平息。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严正声明。杉木楼梯搭在楼口,等着攀登。我坐在棺材上,拨着土碗里为数不多的米粒。上年,棺材里还是满满的稻谷,而今已空无一物。过了今年,棺材里又会是满满的稻谷。棺材是婆婆的。婆婆什么时候睡进去我不知道。有一次,婆婆睡进去又出来了。棺材是我们家的家具。“北京又在闹事。”穿着小管裤旧军衣的大哥从外面回来说:“有人借悼念周总理想阻碍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哥读初三,爱跟成都知青操。我从棺材上下来,想起了“以‘三项指示’为纲是黑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广播还在响,说着重皮子话。我多么希望广播里说的不是那些高深莫测的话,而是通知公社坝坝里要放一个战斗故事片。

黑暗从外面进来吞噬了大哥、妹妹和我。也吞噬了广播。婆婆在大园子里掐菜。

(四年后,我知道了广播里讲的“反革命事件”其实是群众自发悼念

周总理。四年后，我在县城影剧院看了背篼剧团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并由此记住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诗抄。十年之后，还是清明，我的婆婆睡进了那口等了她三十多年的棺材，再也没有出来，而从棺材里舀出的陈谷子已经生虫。）

4月24日。樱桃快熟了，挂满枝头，红亮亮的，叫人见了喉咙发痒，感觉如同后来见到漂亮性感的后街女孩。站在院墙上，甚至就站在石板路上，伸手就能摘到樱桃。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伸手把枝条拿下来，将嘴凑过去，含住樱桃。樱桃在嘴里挑逗我们味蕾的时候，露水也在亲吻我们的眉梢和鼻梁。为了吃到最向阳的樱桃，我们爬石墙，爬房背，爬草垛，爬树。最向阳的樱桃最红亮，最大颗，最甜。

“车家湾的李子，长河湾的女子。”我们大队的土特产。还有就是胡家坝的樱桃。胡家坝就是我们生产队。我们生产队的樱桃闻名县城。白樱桃。颗粒大。甜。阳春三月，城里女人修长白嫩的手，挑剔的眼睛，漂亮的网兜，含着白净牙齿的娇艳的嘴唇，为我们的樱桃增色添辉，而我们的樱桃所得的宠幸则直接体现在分分角角的人民币上。

4月25日。星期天。清晨。我在梦中跟邓老师坐在水磨上吃樱桃，父亲叫醒了我。揉了揉眼屎，我，猴子一样爬上了树。父亲母亲大哥二哥早已在摘了。二哥在树上，大哥在房背上，父亲在木梯上，母亲在高凳上。母亲用“勾达子”把头上的红樱桃勾下来，一手拉着枝条，一手摘着，旁边枝条上就挂着竹篓。隔壁的金勇哥也在帮着摘，他正骑在一棵高树的枝丫上搓手，他的手沾了露水，皮肤过敏了，发红发痒。就是不见我的邓老师。摘樱桃不同于收别的水果，要选红透的摘。屁红屁红的、黄的和青的得留在枝头护着，红了再摘。摘樱桃不能勒，否则到手的只是一把水。也不能脱把，脱了把樱桃很快就会翻乌，不好卖。

5月2日。我把清树的樱桃给邓老师拿了去。邓老师坐在寝室外的苹果树底下。苹果已经有指头大。草绿色的灯心绒上衣使邓老师有些隐蔽。

“清树的樱桃，给你的！”我递篮子过去的时候，发现邓老师眼角有泪痕。“谢谢你，我最爱吃樱桃。”邓老师看了我一眼，没笑。“清树的，最红，也最甜。”我说。看见我的樱桃兜在邓老师怀里，我感觉特别满足。

更大的满足是看邓老师吃樱桃。先拿温开水清洗。红亮水淋的樱桃被邓老师修长的微微有些失血的苍白的手指送达同样有些失血的唇间，继而在她粉红的但一定又是黑暗的舌间消融。吐出的核儿清白带一点鹅黄。我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她吃。她城里人的斯文让我惊讶而开眼界。“你哭过？”我忍不住想问。邓老师没有理我，仍然一颗颗吃着樱桃。她分明是听见我的问话的。“你哭过？”我走过去挨着她的身体。“小孩子家家，别管大人的事！”她望了我一眼，没有我想要的目光。其实，我的身体只是挨着了她的衣裳。“我看见他了，他来了。”我说。“是他把你弄哭的。”他是邓老师的男朋友，个子高得像电线杆，我们叫他“高大汉儿”。路过操场，我看见“高大汉儿”在投篮球。“别说了，再说，我不吃你的樱桃了？”邓老师生气了。

我提着空篮子从邓老师那里出来，看见“高大汉儿”正坐在校门外玉米地边上抽烟。我真想从玉米林里包抄到他背后，劈脑袋给他一石头。

5月5日。大哥说五月是“红五月”，节日最多，有“五一”、“五四”、“五七”、“五一六”。我的“红五月”只是樱桃红，只是邓老师的脸红。只可惜，邓老师的脸一天比一天白了。我发觉，邓老师的脸白跟恋爱有关。

我在上学的田埂上说错了话。本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以‘三项指示’为纲是黑纲领”，我说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黑纲领，以‘三项指示’为纲是红纲领”。我说反了。

“说反了就是反革命！”校长指着我的鼻子说。“交给我处理吧，校长，小孩子家家，说错了改正就对了。”邓老师一直在给校长赔笑。“大是大非问题，你处理得了吗？”校长像是从我身上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老师说：“毛主席说，一个人犯错误是难免的，但只要有勇气改正，

就是一个好同志。”我立即改正说：“以‘三项指示’为纲是黑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我把“红”与“黑”说得特别重特别清楚。

校长摇着头走了，我跟邓老师回到了她的寝室。“高大汉儿”已经走了。床上的花铺盖依旧像我最初看见的那么纯洁。但邓老师的脸色却永远没有了最初的红润。

（我不知道这些纤细的文字是否能唤起1976的气味。1976可不是纤细的。农科所的玉米挂红须了，我们上学放学天天都看见。肚子再饿，也不敢去掰一包烤了或煮了吃。我们知道那是搞科学实验的。截止到五月，对我而言，1976的气味就是冻雨的气味，土豆花的气味，苦荞面的气味，樱桃的气味，邓老师的气味和青玉米棒的气味。对我而言，1976就是绕我们家门而过的涪江。发源于岷山东坡。春天和初夏，河水平静碧绿，就是涨桃花水泛起的波浪也是柔情甘冽的。“白片子”在黑瓮潭游泳，“红尾巴”在水边嬉戏。雪包顶没有雪崩，只有太阳照射后融化的汩汩雪水；岷山一带没有暴雨，只有潮湿的云雾和恰到好处的零星小雨。然而，这只是1976的春天和初夏，汛期尚未到来。河床是空阔的，洪水注定会行满她的每一凹处，涂改她的线条和颜色。野性。岂止是野性？暴虐注定会凸现。1976在被地下的岩浆浇灌，在无声地膨胀，血管在高温的挤压中开裂。1976，涪江的脆弱，我们的脆弱，政治的脆弱。）



◎我的小学

6月1日。每个生产队都在收麦子。割。捆。运。打。风。晒。我们的儿童节。没有新衣裳，只

有干净衣裳。红领巾特别的鲜艳。都说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革命先烈有那么多鲜血吗？全国有多少红小兵就有多少条红领巾。何况还有那么多面红旗要染。1974年我加入了红小兵。“批（pi）林批（pei）孔，批（pei）林批（pi）孔”。一个普通话的批，一个四川话的批。1974，我歪戴着帽子走上批判会的主席台，在哄笑中开始发言。“林彪和孔子是一条藤上的两个毒瓜”。班主任老师替我写的发言稿。我们公社小学的学生早已在操场坐好阵型，唱了好几支革命歌曲，大队小学的学生才依次排着队唱着歌走进来。他们个个面黄饥瘦，皱巴巴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他们没带板凳，只好坐事先搭好的石头。小溪汇入了大河，大河汇入了海洋。操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的节日，被政治涂抹。但欢乐依旧在我们单纯而愚蠢的心间。

我又一次获得了奖状。县一级的奖状。我睁得圆溜溜的眼睛又一次在全县光荣榜的铅字里找到了我的姓名。铅字的姓名，我的姓名。我感到无限的自豪。我不知道我的姓名变成铅字意味着什么？团县委、县妇联、县总工会、县文教局。四个公章。盖了四个县级公章的奖状该有多么珍贵和神圣。

焚烧麦秸的烟雾飘进了校园，我们嗅到了烧新麦的清香。我的舌苔在暗自蠕动。主席台变成了舞台。苹果已经有乒乓大小。靠近主席台的一树苹果叶受了领导讲话的感染开始发红。“拔萝卜，拔萝卜，我来帮您们拔萝卜……”我扮演萝卜。一个老婆婆在地里拔萝卜，怎么也拔不动，几个红小兵看见了，上来帮她拔。

（我年年获得的奖状都贴在我家堂屋神龛上的篾壁上。县级的居多。也有校级的。奖状差不多覆盖了全部神龛。荣誉就是我的神。1979，我得了最后一张县级奖状，奖状上盖的还是那四个公章，只是“红小兵”改成了“少先队员”。我的所有的荣誉都在那面虚设的神龛上，都在一张张烟熏发黄扑满灰尘的被糨糊撑得僵硬的纸张上，直到1988年春天二哥新修房屋拆除

老房子。神龛及其篱壁被二哥做了燃料，我的那些曾经滋养过我心灵的荣誉也在散发过可怜的热能之后化为了灰烬。）

6月6日。我再一次梦哭。二哥说我边哭边在喊“安徽”。安徽。安徽是什么？这一回，婆婆起床的动作迟缓了些，我的梦哭延续了很久。安徽是一个爱发大水的省。安徽的爱发大水跟我有关吗？我的尿床！一辆囚车开过来，我被塞了进去。投狱，或者劫持。后面有人追赶——我的亲人们，我的世界，我的存在。随着囚车的远去，我在告别我的存在，在一点点离开我的存在。安徽！安徽！安徽是我的存在吗？安徽能够让我继续存在吗？安徽可以让我回到我的世界吗？

不是安徽，而是婆婆戴着顶针的巴掌让我回到了我熟悉的世界，继续了我的存在。

7月3日。大哥从外面回来，带着刀、三角带、钢筋，气势汹汹地说：“我非取他一只手不可！”他是谁，我不知道。大哥脸上有血。我不敢问。大哥把刀插在神龛上，玩着三角带。我看清了，那是一副连接柴油机和打麦机的皮带。“敢抢老子的女朋友，吃了豹子胆了？”大哥低着头自言自语。我几乎不敢看他。大哥有了女朋友，是公社小卖部何聋子的女儿，说不上漂亮，但高挑，也穿小管裤。谁要抢大哥的女朋友？大哥班上的几个男生一一从我脑海里过，我还是不能确定。我最关心的是大哥是否跟她的女朋友睡觉。晚上。大哥的班主任老师来到了我们家，说大哥不能升高中了，我们家成分高，他又耍朋友，还争风吃醋打群架。

7月28日。记忆空白。广播说，唐山大地震了。唐山在哪里？

（河流——涪江从上游流下来，带着虚美的波光。波光里有天色，有两岸的景色。阴郁或者灿烂、雨丝或者阳光在水里被折射、衍射、辐射。再晴朗的天气，上游都有隐约的迷茫，还有被山崖石嘴挡住的看不见的地段。河流到了近旁，变得宽广而真切。急流也有，漩涡也有，缓水也有。但水都是摸着石头流淌的。缓水一带的石头是卵石，河床也均匀平

整。滩头有巨石，浪花飞溅。漩涡在陡崖的下面，河水的摩挲是销魂的。村落在远处，在密密的竹林里，在隐隐的沙地边，在高高的山冈上。也有在对岸的。晒场，风车，房门上挂着的红辣椒都清晰可见。炊烟飘散。渡船在岩背后，偶尔才横行河中。船夫站在船头，握着篙。遇雨则披蓑衣戴斗篷。滑轮在油索上哗啦哗啦跑。这是七月，已到汛期，但河流还是温柔的，河水还是驯良的。涪江——河流流到这里，1976年7月，1976还没有断裂的迹象。灿烂但却柔情的阳光，河岸上扁谷草上的晶莹的露水，对岸半山腰潮湿的雾霭，后山青杠林里性感的野菌，预示的依旧是过去日子的平静与平常。秧子一插上就返青了。稻田的蛙鸣没有丝毫异常。任何地方都看不见青苔。只有水葵，在即将进入稻田的堰渠和稻田的缺口处生长。肥嫩的茎，水淋的叶，满天星一样的碎花，浓缩了它全部的青春。

事实上，我们的1976从1月8日已开始破裂。7月的唐山大地震和朱德的去世，加剧了她的破裂，并在裂缝里撒了好几吨盐——不是为了消毒，而是为了疼痛。我的1976从8月的下半身开始破裂，先前的饥饿、噩梦、暗恋、梦呓都是对即将来临的破裂的掩饰。破裂，说的是内在。外在只是阴暗，潮湿，泥泞，只是对阳光的彻底丧失。我听见碎片在里面响动，感觉到撕裂的疼痛和血流的冰凉。我和我的1976是一个摔碎了胆的保温瓶。)

8月16日。晚。二十二时零六分。大地震突然光顾岷山，震波穿透了正在往木桶里撒尿的我的身体，穿透了屋外的院墙和樱桃树。我提着裤子慌乱地跑出房子，站在竹林里经受大地的持续摇晃。瓦在黑暗中滑响，掉下屋檐。村里村外的石墙在倒塌，此起彼伏的响声加剧了我内心的恐惧。垂下的天幕本来是要在黎明重新敞亮的，大地震却给它打上了封条。大哥上老林了。二哥和妹妹像是睡了。婆婆在我床边剁猪草。1976开始摇荡。只是瞬间。但摇荡的感觉却一直持续到今天。“赶快把竹子抱

住！”父亲指示。“竹子是根连根的，就是摇成海子，也可以当船。”我抱住一根竹子，不敢松手。妹妹还在床上。父亲冲进屋，喊着“金慧”。地震虽过，但瓦片还在落，檩子椽子还在响。父亲说要是摇上八级地震，地就会裂缝，沉陷，变成海子。我不知道眼前的地震有几级，不知道院坝是否裂缝。

我的想象力开始演绎父亲的地震常识，而且极度地张扬——大地震是从远处来的，而不是从地层冒出的。大地裂开了口子，水稻陷落了，青蛙陷落了，汽车陷落了。河床裂开了口子，河水灌进去，河流干涸了。对岸的山开始崩塌，填满了河床，堵住了裂口，河水重新蓄起，淹没了村庄。我抱着一株竹子，在海子里飘。像我一样抱着竹子的还有我的二哥和妹妹。樱桃树在海子里时隐时现。猪、牛和驴子在水里翻滚。根连根的竹子，我的诺亚方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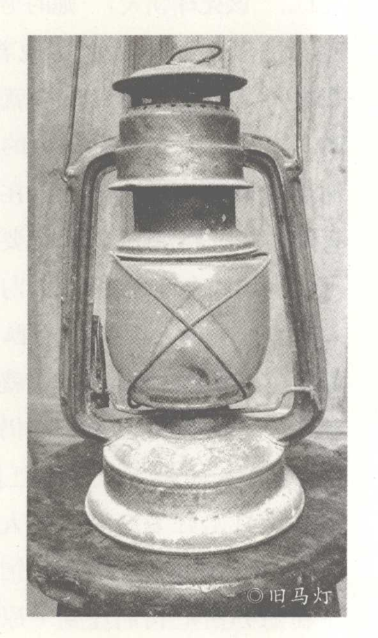
想象过后，是黑幕般的乌云哗啦啦遮住了刚才还是繁星闪烁的夜空。天空无疑是多了什么，世界无疑是多了什么，我的心里无疑是多了什么。震后的沉寂在我的想象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生产队晒场方向传来的喧闹。樱桃树还在，园子还在，稻田还在。河水还在流淌，急流的轰响不绝于耳。“肯定哪个地方遭了！”父亲煞有见识地说。我们已经遭了，但在父亲看来遭得还不够，房子没有垮，地没有沉，河流没有阻隔，人没有死。“哪个地方遭了？”我哆嗦着嘴唇。父亲的回答是，西方。

那一夜，我们没有上床。我们先是在晒场集聚，谈论地震，尔后坐在稻田边听蛙声。那天夜里，蛙都沉默了，只有个别无知者在欢歌。我脱了鞋，拿赤脚去引诱蛙，却触到了水葵。背后的晒场开会一样热闹，人们在搬木头，砍竹子划竹子，扛晒簟，搭抗震棚。电灯是不想了，马灯来来去去，电筒在路口招摇。有人捧着煤油灯行走，熄灭了又点，再熄灭，再点。午夜时分，广播响了，传达出上级的声音和党的指示。

我最终在我们家厅房的晒簟里睡了一夜。双扇的门双扇地开。加足

油的马灯挂在门外的樱桃树上。婆婆通宵未眠，坐在门槛上站岗，以便地震时唤醒我们往外冲。

雨水像地震一样来得突然，疯狂，而且经久不衰，拉开了长达一月的雨季的序幕。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中雨，小雨交替进行。地震是一泡大便，雨季让大便横流，倍加恶心。生产停止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我们的家园还在。我们的抗震就是搭棚子，就是不在房子里睡觉。我们的救灾也只是爬上房子，把瓦盖好。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吃的。小麦还有，但得磨成面粉，总不能老吃炒麦烧麦。河水暴涨，磨坊已被冲毁。米肯定是没了，田里的水稻尚未扬花。唯一可靠的就是青玉米，园子里、田边地角都是，弄回家也方便，烤，或者煮，还可以在手磨上磨过，做水粑，秸杆可以喂牲畜。婆婆和母亲整天就是掰青玉米，在手磨上磨青玉米，做水粑。父亲是记分员，自然是跟队长他们上第一线。至于他们的第一线是什么，我一点也不知晓。因为下雨，河里又涨水了，淹了河滩，我的工作便由放驴转移到了捞柴。别的河段都是捞浮柴，只有我们的龙嘴子可以捞沉柴。浮柴必须要涨大洪水才有，且洪水一过就没了。沉柴则不然，洪水有，稍微涨水也有，洪水过后能捞很久，直到河水变清。


◎旧马灯

正如我父亲所言，这次地震的中心在西方，在一个叫松潘和黄羊的地方。震级是7.2。我们这里并不是震中。更大的地震并没有来，只是都在传说更大的地震，而且震中就在我们公社的桂香楼。甚至有人说震中就在我们村口的青皮树底下。青皮树是我们村子的标志。人们在传说，但并没有慌乱，即使

有恐惧也藏得很深。孩子们依旧在“藏猫猫”、扯猪草、捡水捞柴，大人们依旧在割牛草、放秧田水、掰玉米、除稗子。“该死球朝天。”随处都能听见社员宿命但却豁达洒脱的自白。有传说整座岷山都要沉陷。从松潘草地到江油平原，从甘南藏区到茂汶羌寨，都会变成海洋。有新媳妇开始哭泣，她的娘家在岷山之外。她像是在涪江的滔天浊流里已经看见了灭顶的死亡。“该死球朝天。”她的男人喝着家里最后的白酒劝说着。余震不断，预示着大地震就要到来。有人拿出家里最后的清油煎炸最后的米面。有人在半夜偷偷宰了乳猪吃。“反正要死了，不如做个饱鬼。”有人向队长检举了偷宰乳猪吃的，队长警告说，谁个再偷宰家畜，就是破坏“抗震救灾”。新媳妇仍在手磨边哭泣，泪水流在水粑上，把水粑打出好多窟窿。男人还在劝：“大地震还早得很，国家正在想办法把我们迁到平原上


◎旧手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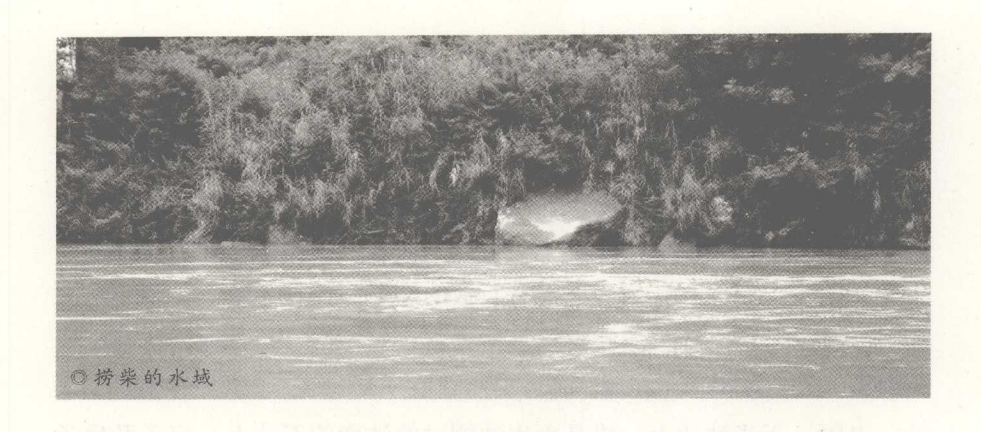
去。”新媳妇说：“真的？那我们就迁回我妈家，免得给国家添麻烦！”新媳妇不哭了，拿从未有过的生动的眼睛望着男人。

潮湿。泥泞。垮掉的院墙、没垮的院墙都长满青苔。樱桃树、李子树上也长满青苔。石板路上也满是青苔。从第一场暴雨开始，院坝里的积水就不曾干过。屋檐下不仅生了青苔，还长出了水蕨。连门槛都潮湿得生了菌子。泥泞在任何一段没有石板的路上。无处下脚。下脚不是泥浆飞溅，就是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本来就没有吃饱，再加泥泞折磨，走一段路，人就软瘫了。在泥泞处，突然看见一大泡屎，会禁不住颤抖。恶心。丑陋。玉米地边上，或是雨水冲刷过的洁净的石头上。房子及房子里的东西都发了霉，火塘里已经升了火，以烤鞋袜衣裤。柴烟混合着霉味，屋子里的空气让人反胃。

“一亮一霎，石头也要泡垮。”雨就这样下着。统一了节奏。没有止境。土层早已浸透。红苕地，玉米地，花生地，都膨胀了。后山也浸透了，泡垮了，前所未有地生出山泉。石头都泡软了。我们的村庄，我们的田地，我们的树林，我们的岷山，我们的世界，我们的1976变成了一块海绵，暗含着无限的雨水。雨水透过我们的身体，把我们本来是坚硬的惶恐也泡软泡胀了，融化了，横流在无望的泥泞里。

（我的1976的秋千在8月的地震中找到了动力，并借雨季的手臂达到了超乎想象的高度。垮塌的院墙，午夜的喧嚣，青蛙的沉默，无休止的雨水，水性的青苔与水葵，哭泣的新媳妇，眼珠背后的恐惧，路边的大便，暴涨的洪水，广播的声音，都是秋千上的物质。这些物质的足够的分量，使秋千获得了最大的振幅，使我们这些秋千上特殊的物质获得了惊叫。愉悦是秋千的。属于我们的只是紧张。如果链条断裂，我们将命运如何？）

从海洋涌来的暖湿气流滞留在岷山，带来了无尽的降水。天意。想象中，雨水从天空倒下来，浇在雪山草地，浇在森林，浇在田地里，通过径流，集聚在溪流沟壑，最终汇入了涪江。涪江在雨幕里变得洪大而


◎捞柴的水域

暧昧。脱去云的衣裳，剥去雾霭的纱，便看见涪江怪异地奔放和淫荡。野性。阴冷。潮湿。神秘。平日空阔的河床满了，气势犹如咆哮的雄狮猛虎。洪水携带着上游的木头、家畜野兽、磨坊房屋、活人死人、瓜果腊肉、军衣军帽，席卷了我们沙地里尚未成熟的玉米花生和椿芽麻柳。巨浪将被呛死呛昏的鱼成堆地送进稻田，送进玉米地。遍体鳞伤。不时有娃娃鱼在泥浪里翻卷，在稻田边呀气。开始还有人捡了鱼回去吃，到后来也没人要了。没有油，再好的鱼肉也难以下咽。

大洪水过后，河床焕然一新。但焕然一新里有难言的酸楚。大寨田变成了乱石窖。河坎齐刷刷倒塌，一大边秧田、玉米地消失了，几人合抱的桐子树不翼而飞。漩水掀翻了挑水路薄弱的沙坎，把一两户人家悬在了河岸上。木头在乱石滩堆积如山，但没有人敢动。广播里在反复强调，谁敢发混难财谁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再说，大地震就要来了，谁还稀罕那些吃不得的木头？

大洪水过后是一次次的中小洪水。浮柴浮物没有先前多了，但沉柴却多了起来，而这样的沉柴是允许私人打捞的。白天，属于生产队的劳动力不得打捞沉柴，如果打捞，也是要被判作破坏“抗震救灾”，至少被判作“搞资本主义”。夜晚有人捞沉柴。马灯，或者手电。雨一霎一霎，

火把是不管用的。我不属于生产队的劳动力，我有捞柴的权利和自由。沉柴想象不到的多。不仅有陈柴，更有新柴。连根树充斥了缓水区域。死水里一摞摞的柴棒，让我们探索的脚兴奋不已。浅滩上，大小不等的树木时隐时现，勾引着我们的眼睛。队长见一个孩子居然能捞到堆山塞海的柴，便动员劳动力都来捞。别的生产队见了，也都来捞。这下，龙嘴子人山人海，尤其是出柴最多的水域，差不多人镶人。用我们自己的话说，“跟插玉米包包一样”。有站在岸上的，有涉水的，挤成一团，柴网挨柴网，柴网挂柴网。沉柴被捞上岸，堆成山。一个生产队一山。

岷山在雨水的长久浸泡下开始瘫痪。潮湿已经不是用来与被褥、衣物、心搭配的，而是用来与岩石、钢铁、我们的骨头搭配的。青苔不再是水边墙脚的地毯，而是成了我们的舌头和全世界的地毯。22日。凌晨四时四十九分。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大地震再次来临。我们像是等待已久。震级为6.9和7.2。震中不在桂香楼，也不在我们村口的青



◎捞柴网

皮树底下。震中依旧在西方，在松潘和黄羊，在岷山主峰一带。岷山没有变成海子，地甚至连一条缝也没裂。院子还是院子，只是多了一堆堆水捞柴，多了肥硕的魔芋、茂盛的苎麻和横行的蚰蜒，多了院墙进一步垮塌的石堆。瓦再一次从屋檐掉下来，砸在青苔和水蕨上。“地动，地动！”婆婆大喊着，但睡在门边晒簟里的我没有听见。我捞了一天的柴，午夜才回家。妹妹揉着眼睛翻出门槛时，地震已经停止。木房子只是在中度扭摆。木盒子的广播在响，但不是说话，而是晃荡。新媳妇不再哭泣，挽着提桶走在给男人送饭的路上。

（河流——涪江从上游流下来，流到8月下旬，在大地震的撕扯下，不仅使岷山出现了裂隙，而且使1976——我的1976也出现了裂隙。对于岷山，裂隙好比大洪水刷新过的河床；而对于世界，对于时间，对于1976，对于记忆，裂隙只是微损的古瓷器上隐约的丝缝。不清晰，但足以致命。1976。国家的裂隙。我个人记忆的裂隙。）

8月28日。雨停了，天高了，地远了，但依旧没有太阳，且像是永远不再有太阳。铅灰的天，铅灰的地，铅灰的视线。世界的色调。冷。静。漠然。激烈过后的抑郁。河水陷落，但沉柴不断。大人已远离河流，消失在了重新摸上手的暧昧的农事中。我和几个像我一样尚未沾染上阶级的孩子守在河边，继续打捞沉柴。

上午，从村东障子崖上面的铅色的天空过来一架飞机，屁股上还在下蛋。能够清晰地听见飞机的响声，看见螺旋桨的旋转。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这样清楚地看过一架飞机。飞机几乎是擦着斩子崖过来的，像一只老鹰，但没有老鹰矫捷。我丢了柴网，爬上高岸，仰望着飞机，心头浮出久违的喜悦。“飞机！飞机！毛主席派来的飞机！”有孩子奔跑着喊，激动远胜于我。我也开始奔跑，朝着飞机的方向。我跑跑看看，看看跑跑。飞机越过我们的头顶，去了西方。“毛主席派来的飞机，怎么不给我们投压缩饼干？”我们感到茫然。飞机飞过岩背后，飞过涪江，消失在

了县城方向。

飞机消失了，东边的天空出现了鸟群。大鸟。红鸟。没有飞翔，只是在飘落。我们再一次丢了手里的柴网，朝岸上奔跑，朝东边奔跑。“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有人呼喊。我看见所有的人都在朝飘落的鸟群奔跑，从锅砣漩，从三阳盖，从龙嘴子。鸟群降落在了村口的稻田里，有人跑到了鸟群里，张开手拼命地抓。“压缩饼干！”多么神奇的物品。据说，吃眼屎大一小块，喝了水，也会把肚子胀破。我在跌破膝盖之后，终于跑进了落满红鸟的稻田。我抓住了一只红鸟——哪是什么鸟？哪是什么压缩饼干？不过是一张红纸，上面印着字——慰问信。党中央、国务院的慰问信。稻田里，田埂上，桑树下，大人小孩都在捡慰问信。读慰问信。没有失望。有的都是不亚于捡到压缩饼干的兴奋。慰问信，人们精神的压缩饼干。有人捡到一张，有人捡到一大抱。我在稻田中央看见了水葵。好多的水葵。组成一朵特大的向日葵。茂盛的叶。肥硕的茎。水淋的花。往常，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么美妙神秘的水葵？难道是在地震后的雨季突然生长出的？看着这些水葵，我呆楞了，慰问信掉在了稻田的积水里。我感觉水葵跟大地震和漫漫雨季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我又跟水葵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8月的裂隙延伸到9月，成了裂谷。我陷落在裂谷里，见不到太阳，见不到蓝天，见不到我美丽的邓老师。）

9月9日。黄昏。雨后的铅色。婆婆在厅房撕玉米。我和二哥、妹妹在从龙嘴子往家里运柴。每运一回，我便要在婆婆撕下的玉米壳里打滚儿。“天看着看着就黑了，赶快再运一转！”婆婆对打滚儿的我说。我一骨碌爬起来，正要走，广播响了。“好久没看电影了，莫非今晚上有电影？”二哥说。我没有答白。我有一种不测的感觉。我回来，站在楼梯下，望着楼口柱头上的红色小木盒。我在仔细听。听不懂。二哥、妹妹也听不懂。“有电影！有电影！”妹妹在欢呼。我打了妹妹一巴掌。广播开始放


◎二哥、妹妹和我

音乐。低沉。缓慢。我们太小，太幼稚，听不出悲哀，不晓得是《哀乐》。广播又开始说话，提到毛主席。我的心突然被提到了嗓子眼儿。噼噼啪啪，我一溜烟爬上楼梯，将耳朵触在了广播上。我听明白了一个成语。永垂不朽。“毛主席死了！”我转过背站在楼梯上对底下的人说。“毛主席死了？莫乱说！”二哥望着我。我说：“肯定是毛主席死了，你们听！”果然，广播说了，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还站在楼梯上，我就哭了。二哥、妹妹也哭了。二哥说：“毛主席死了，地主老财又要回来了！”妹妹说：“我害怕，地主老财有狗腿子，狗腿子有枪。”在我们看来，毛主席一死，“胡汉三又回来了”，资本主义又要复辟了，父亲会变成杨白劳，妹妹会变成喜儿。

天更加昏暗。院墙外樱桃树底下有人影晃动。“地主收租来了！”二哥说。“还有背枪的狗腿子！”妹妹说。不是戏言，不是幻觉，当时我们真是那样感觉的。恐惧在我们心底攀升。电影、图书、学校给予我们的对历史对世界的解读就是这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红纲领。”天黑了。但在我们的感知中，是天塌了。

（地震。淫雨。洪水。青苔。水葵。泥泞。周朱的死。……如果这些

只是让 1976 的秋千荡起来的物件，那么毛的死这一行星撞地球的能量则是让秋千的链条断裂的极限。秋千断裂了，或者歪耷在一边，倒出了所承载的全部物质，有形的无形的，或者干脆双链齐断，秋千连同承载的什物一并砸在地上，砸得稀烂。我们可就在秋千上啊……）

9 月 18 日。在苍松翠柏之间，见到了邓老师。邓老师有些憔悴。身旁是毛的巨幅遗像。毛主席红光满面。神圣而又肉感；比较起来，邓老师要渺小得多。"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默哀三分钟。"哀乐声声。有人低泣，继而恸哭。多人低泣，多人恸哭。苍松抖动，翠柏颤栗。

广场。华表。六百年前的寺院。长了青苔和水葵的汉藏佛文。万人大会。白纸黑字的挽联和标语。特大号的高音喇叭。空洞的王洪文的致词声。黑压压的腿。一色的蚕茧白花，一色的黑布孝套。低泣恸哭之余，便是雀静，鸦静。只有王貌似老态的声音。嘈杂，断裂，而后彻底熄灭。喇叭的故障。死的寂静。

有人在寂静里放了一个响屁。大大的响屁。哗然。被哗然感染的哗然。像高出人海几丈的华表。坚硬，但却孤立。

10 月。云开雾散。太阳出来了。"化悲痛为力量。"翻天覆地。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我们举着小红旗，齐声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邓老师为胜利忙碌着，脸上多了红晕，也多了黑褐的斑块。她的肚子开始微微凸起，行走也略显笨拙。在谱天同庆的胜利的欢喜之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悲伤。是谁把我的年轻漂亮的邓老师弄成了这样？"高大汉儿"？肯定是"高大汉儿"！在响亮的口号声里，在秋风刮起的尘埃里，我感觉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破碎。吱嘎。吱吱嘎嘎。暧昧，但却绝对。我感觉疼痛。我想我永远斗不过"高大汉儿"。我想邓老师已经属于了他。我想我是再也不能找回我的年轻漂亮的邓老师了。

记忆与想象的招贴

红旗路97号

我家的表叔数得清。数一，就完了。我家的表叔住在红旗路97号。

红旗路，却没有一杆红旗。要看红旗，还得拐进何家巷，去中学，或者退到衙门口，去县革委。距离红旗路最近的红旗，就是中学操场上那一杆。但它差不多已经被风扯成了面条。

红旗路97号。九块活动板墙。一扇木门。一间九柱穿斗式木房。五个火柴盒一样的黑暗的小房间。一个天井和一棵广柑树。包括两个老人、一对夫妇、两个小孩、一个独身女人和一个简易厕所。还有寄宿的十三岁的我。

红旗路97号堆满蔬菜。蔬菜是从郊区表婶的娘家运来的。当初还带着我熟悉的乡村的气味，但很快便开始腐烂，散发的热气熏得我课本上的单词都变了味。蚊帐上的蜘蛛也受不了那腐烂气息，昏迷在了肮脏的柜子上。蔬菜过后就是卤肉。整整两年半，我都置身于卤肉的气味中。一盆盆卤肉放在灶台上，柜子上，案板上。一块块卤猪头、卤猪嘴、卤猪排、卤猪脚放在秤盘里，然后被快刀斩小，放进方便袋。在漫长的五香的诱惑里，我无论怎样食欲大增，也只有咽口水的份。不敢去动卤肉，我

就动了床头立柜上瓷盆里的卤油。我把凝成块的卤油拌在从学校端回的热米饭里。卤油融化了，米饭亮晶晶的。我在黑暗的屋子里偷偷地进餐，食欲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表婶在隔壁骂："死老鼠，又偷吃老娘的卤油，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我并不觉得表婶是在指桑骂槐。我一如既往地偷吃卤油，并把偷吃过的痕迹弄得纷乱模糊，使它更像老鼠所为。

在卤油浓郁绵长的五香里，我的青春期排山倒海地来了，弄得我措手不及。在漆黑的房间里，我开始幻想比卤肉更美的事物，并在被窝里一次次表达。意想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壳里呈现。我是多么渴望那些我所有幻想到的情景都成为我身体的经历啊。在潮湿的幻想里，我弄脏了自己的身体，却没有感觉在犯罪。

刺激我青春期的还有午夜的叫喊。表婶的叫喊。深度的夜晚，肤浅的梦，我心仪的女生坐在几何的角落对我笑。她是一只花蜘蛛。她的笑



◎仅剩下的红旗路97号

里有最早的色情。我靠近她，却没有任何的肌肤接触，她的妩媚已经让我满足。表婶突然的叫喊撕破了几何，撕破了我心仪的女生的衣裳。我没有看见什么，我的表婶表叔的什么，我的女生的什么，我至今都没有看见。我的表叔早已退休，我的曾经叫唤不停的表婶也老态龙钟，而我的女生也早已去了美国，摇曳在我残破的那么一点记忆里。

叫唤过后，红旗路 97 号几天里都是哭泣和怒吼。这样的怒吼与哭泣可以在许多家庭找到版本。我的表叔卷起被子带着两个孩子逃跑之后，表婶喝下了老鼠药。又是深度的夜晚，又是肤浅的梦，又是我心仪的女生妩媚的笑。我的表婶叫醒了我。“给我端碗冷水，给我端碗冷水，我不想死啊！”在表婶绝望的哭喊中我摸索着到了厨房的瓦缸。叮叮当当。我碰翻了碗。我找不到拉线开关。我端着一土碗冷水摸到表婶的床边，看见表婶的嘴巴鼻孔都在流血。表婶一口气把土碗喝了个底朝天。我的青春期的身体不能自已地筛动不停。

离开红旗路 97 号后，我回去过一次——最后一个老人走的时候。我的表婶给我打发了一身衣裳。衣裳是用葬布缝的，洗过一水，便成了皱皮柑子，裤子缩水成了窑裤。

我再也没有进过红旗路 97 号，就是从门前过，也只是偷偷地朝里面扫几眼。里面依旧黑黑的，像是更加阴暗和神秘。

现在，红旗路改成了西街，红旗路 97 号改成了西街 97 号。但红旗路 97 号的门面还在，房子还在，只是被旧城改造砍掉了三五米,只是已经不再属于我家的表叔了（听说我家的表叔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把它卖了）。

红旗路 97 号，现在的西街 97 号是一家刀削面馆，生意火爆，但我却不曾光顾过一次。我不知道房子背后的天井还在不在，天井里那棵广柑树还在不在。其实，我完全可以去光顾一回，趁机遛进去看看。

新广场

因为广场上两根与报恩寺同样古老的华表，新广场成了报恩寺的一部分。报恩寺有六百年了，新广场则不到六十年。我最早记得的新广场长满了野草野蒿，两根华表（我们叫石桅杆）在日晒雨淋中也生了青苔和水葵。冬天野草枯凋，新广场空旷寂寥。太阳照在衰草上，照在华表上，新广场更加的空旷寂寥。盛夏，野草野蒿疯长，广场成了名副其实的荒野。

传说中的新广场是一块空地，两根华表奠定了空地的全部意义。宣统年间，涪江发大水，水淹了新广场，淹了一大半华表。和尚打开报恩寺的山门，坐在门口石条上洗脚。

新广场最早没有院墙，与外面相通，只是前面临街有一个戏台子。民国时候的戏台子，后来的主席台。外面不是街道集市，外面是沙地。很大很大一片沙地。沙地被栽种着一行行桑树的细长的田埂分割开来，像一张草图。夏天沙地里蔬菜茂盛，桑枝肥沃，冬天则只是点缀着些微足以忽略的菜芽，桑枝也光秃秃的在北风中发抖，显得荒凉而又萧瑟。沙地中央有三间木房子，背西面东，给沙地添了几分乡村气息。我很多次从老城出来，穿过报恩寺北侧的杀牛巷，在强烈的骚气和血腥里下到沙地。现在想来，冬天，斜阳，枯树，细微的菜芽，宁静的木屋，依旧是一幅简明的乡村图画。


◎我到新广场开过两次万人大会

新广场的“新”来源于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人们从天而降来到广场。武斗。斗私批修。批林批孔。学大寨。在成千上


◎今天的“边城”早已不“边”

万的意气风发的脚步下，在惊天动地的口号中，在大幅标语血红的光照里，新广场的野草野蒿夹着尾巴溜走了，就连华表上的青苔也自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新广场的“新”就是这样来的。斗争。批判。洗刷。踏上一只脚要它永世不得翻身。

我到新广场参加过两次万人大会。毛的追悼会和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在不到二十天里，两次走十几里路，像羊子一样被吆喝到新广场的指定区域，默哀或者高呼口号。新广场在沸腾。新广场的“新”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钻进了报恩寺的山门，钻进了古柏的亏空，钻进了我们纯洁但却愚昧的意识，钻进了古墙根癞蛤蟆的身体和沙地里蝴蝶的梦魇。

今天的新广场完全成了报恩寺的一部分，成了“国保”，打起了围墙，拔光了野草，铺满了花岗石。铺满花岗石的新广场便是崭新的了。偌大一个广场，立着两根华表，没有草，没有树，只有坚硬的花岗石和花岗石反射的毒辣辣的太阳。我不知道这样的新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在我的想象中，或者说在我的希望里，新广场有草，有树，有石板路，有林荫，有水洼，有蛇，有癞蛤蟆，有蜻蜓，有蝴蝶……与六百年的古寺保持着绝对的和谐，甚至能够给古寺的伟大与神秘一种艺术的掩映。然而想象只是想象，希望也只是一个文人可怜的艺术理性，只有权力的意志才是铁定的。

今天，当操着各种语言各种口音的人拥进新广场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几分兴奋，也有几分难言的隐痛。伟大神秘的报恩寺无疑会为来访者制造出伟大神秘的记忆和想象，但我敢肯定，新广场不能，铺满花岗石的新广场不能，缺乏生命气息的新广场不能。

新广场北面的沙地现在是万元楼、运输公司、客运站、地税局住宿楼、房管所、工人俱乐部以及过去的粮食局汽车队现在的太婆肥肠、过去的城建委现在的环卫所。

龙安

逆时间的河流而上，走过几个时代驿站，便到了龙安。龙安是一座边城。边城虽小，城门却有五座。东西南北中。穿东城门，过武庙口，上衙门口，一直往西，一袋烟的工夫，就进了西城门。西城门有古城墙相连，一直连到刀锋一样的军事要塞北山。南面是奔流的涪水，北面是险峻的北山。北城门和南城门只是一座古城必须的摆设。至于中城门，想必就是牌坊一类的标志性建筑了。

无须想象，只须记忆（不是一个人的记忆，是历史的记忆），我们就能回到龙安。龙安像边塞的山水简明。衙门（州衙门、县衙门、土司衙门）。寺庙。警察局。学堂。营房。石板街。瓦屋。石板房。参天大树。青苔。龙安极美，极富诗意——涪江在这儿拐弯，弯出一大片开阔地，掩映着碧绿的野草和灌木、水杉和红桦。杉木房掩映在水杉和红桦林里，出入着政府的骑兵部队。

边城自然是野地，是国家的边疆，绕城而过的涪水也是野水，连空气也是很少被人呼吸过的野气。白雪总是覆盖着涪水南岸的六重山，紫外线格外多的阳光晒也晒不化。云在空气中不是飘而是流，无论白云还是乌云，都只是纯净水。

龙安先前的名字叫“安老”。涪江河谷的一片荒滩。住着古代氐人的后裔“贝”。“贝”崇拜野鸡翎，好酒，能歌善舞。1389年，一位薛姓“州长”为了“开疆拓土”，沿涪江河谷一路追杀，将“贝”赶进了岷山深处，并把州城迁到了“安老”。史书上没有记载“迁都”是否引发过流血冲突，但我想，流血是不可避免的。“贝”是极富血性的族人，有人掠夺他们的土地，侵占他们的家园，他们不可能逆来顺受。流血和归附很可能是岷山丛中最早的肮脏。

1389年到1430年，薛州长一直忙于侵略和垦荒，顾不上修筑城池，龙安不过是用木栅围起的一片营地。木栅外绿草萋萋象，啃吃萋萋绿草的战马膘肥体壮。

想象或对电影场景的记忆能够为我们再现1430年筑城的情景。筑城使“安老”丧失了蒙昧和浪漫，永远成为了汉语的一个音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古城自然城有古城的规格。古城为砖城，高一丈八尺，周长九里三分。城门五个，东西南北中，迎晖，通远，清平，拱宸，地平。东西两关设迎恩、镇羌二楼。“迎恩”就是迎浩荡之皇恩，迎东方的红太阳，“镇羌”则不外乎是镇“贝”。九里三分长的城墙便是为抵御“贝”筑的。

在依然健在的记忆和传说里，龙安一直保持着明清古韵。巍峨的城墙蜿蜒在北山，残留着战争和历史的痕迹。城墙和涪水闭锁着古城，也闭锁着久远的传说。府志上“开疆拓土，兴学化夷”的文字仍弥漫着落定的尘埃。驱逐、屠杀、奴役等一切激越而残酷的事件已化为书页，血迹褪败。惨叫和呐喊熄灭在了时间最黑暗的部分，侵略和教化被时间孵化成了浪漫而感伤的民谣。穿斗式木架青瓦房有序地掩映在南北二山的葱茏里，透出平民的古朴和恬淡。城门依旧开关，花儿和尘土般的人儿依旧进出，只是多了鸦片，多了现代的枪炮，多了外面世界的传说。狭窄的石板街，长满青苔的屋脊，曲折潮湿的泥巷，幽灵一样闪过的穿旗袍的女人，涪江上荡悠悠的索桥，给龙安染上了古朴神秘的边地风情。

今天的边城早已不“边”，古城门古城墙也大多毁了，钢筋水泥统帅了一切。石板街、青瓦屋、木板房、草巷子，只有靠想象与记忆去捕捉了。唯一幸存的西城门和几段残破的城墙，也很少再被目光和记忆光顾。这些曾经鲜活的边城的器官，现在却只是个别多愁善感的游子怀古的借代。


◎城门洞


◎残破的古城墙

西城门上一直长着了野草和灌木，残留着边城的野性。可是有一天，城门上的野草和灌木被拔光了，光得什么都看得见又什么都看不见，青砖和石条也被处理，像成了盗版。

1943 年的一天，西城门见证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龙安参议员周松因贪污烟土并参与杀害松潘县县长被政府军由松潘押解阆中监狱，途径西城门，周松对押送他的兵士说：“到我老家了，别跟这么紧，往后退一点。”兵士后退了。周松挺胸抬头，目光飞扬。家乡父老一片欢呼，以为周松当了高官，正被护送过境。

土司衙门

一院楠木大宅。压扁的“口”字布局。几分破败，几分古色古香。天井长了青苔和水蕨水葵，始终是潮湿的。一排排双扇楠木大门，永远是单扇地开。大晴天，阳光从装饰讲究的格子窗射进屋，尘埃也会飞扬。但尘埃似乎比阳光更古老，在飞扬的姿势里发散出历代土司的气息。屋角

的蜘蛛也古老，硕大，智慧，编织的网络像一张张篾条簸箕，土司落在上头的目光已经化为一只空空的蝉蜕。

在我的记忆里，土司衙门从来都没住土司，只住着陶县长的遗孀。小脚。驼背。折叠的皱纹。苍白的手。掉光牙齿的嘴巴。我总觉得，一个老太婆住这么大一院房子，不是资格，是受罪。想必陶县长在的时候，院子里还有几分人气。毕竟是县长，毕竟有很多追随者。而县长无止境的酒瘾酒量，让院子里一定没有少飘荡酒香酒臭。陶县长是红军过来的，他说喝一公斤就喝一公斤，他说喝一市斤就喝一市斤，他说喝到天亮就喝到天亮，没有人敢阻拦。他说喝死，于是就喝死了。

隐约记得我在土司衙门住过一夜。大哥当兵走的时候在那里度过了一天多的好时光。我们在石水缸舀水喝，在天井里嚼甘蔗，在无比大度的木床上翻跟斗。

我也是土司的后裔，却与土司衙门无关。我是先前土司扔出的一颗苦荞种子，生在了别人的地里。与土司衙门有关的是历代土司，他们是土长官司和土通判，他们是王玺、王鉴、王瀚、王文渊、王钺、王枋、王华、王瑶、王维度……直到末代土司王蜀平和王金桂。王玺是最为理想主义的，也是最为著名的，他两次应明英宗的邀请进京，被故宫的气度和魅力震惊，担当着杀头之罪带回了故宫的图纸和工匠，在岷山里修造了报恩寺。

想象超出了记忆，描画出穿官服戴官帽的一代土司。毛笔在宣纸上运行，意志在岷山里流淌，一次征战正在蓄谋，一次清剿正在决断。有人牵出白马，有人装备行头。土司老爷要去水牛寨围剿“贝”的所谓叛乱，要去岷山主峰雪包顶拜山，要去黄羊寨清剿白莲教的残兵。这个土司叫王国宾，去了，再没能回来，他战死在了雪山梁子。

我不知道陶县长的遗孀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只知道土司衙门是什么时候拆的。土司衙门拆的那天，我正随全班同学去影剧院看《冰山上的

来客》。阿米尔，冲啊！就这么一声，土司衙门就散架了。土司衙门拆除后，木料被作为文物拿去报恩寺修了观音堂，腾出的地皮建了招待所的住宿楼。在官方的正式文件里，观音堂就是土司衙门。

贝

贝现在叫白马人，官方叫白马藏族。贝戴盘形圆顶并缀有荷叶边的白色毡帽，帽顶侧边插有一枝或几枝纯白的野鸡翎子。编发，梳理成十几根小辫，再统一为一条大辫，饰以海螺。女贝穿“祥马”，男贝穿“春纳”，都为中间开缝的长袍，白色，汉人叫“裹裹裙”，由岷山出产的苎麻织布再手工缝制。女贝喜好挂鱼骨抹胸，在腰间缠古铜币。贝男女老少好歌舞，嗜酒，尤其爱狂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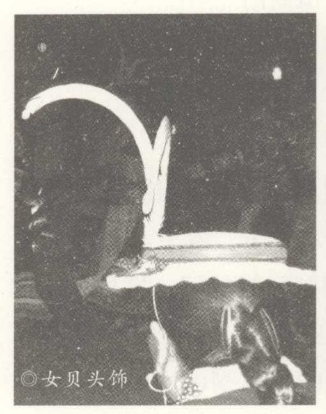
贝不是藏族，而是古代氐人的后裔。有费孝通、孙宏开等专家学者的考据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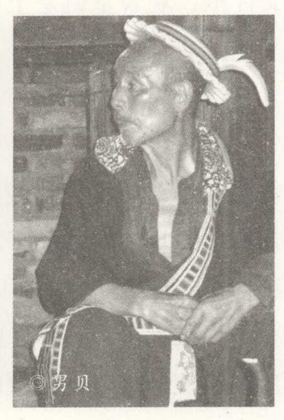
1964 年 10 月 6 日下午，毛泽东和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合影时， 偶然注意到了女贝尼苏，问道：“你是什么族？”尼苏说：“藏区的藏族。”毛泽东看了看尼苏缓慢地说：“看穿着、人的面目，你不像藏族。”据说，纪录片《光辉的节日》有这个镜头。


◎贝好娘张俐

我接触的第一个贝叫阿波珠，汉名叫李光明。个子不高，块头不小，特别是那张脸，简直就像是岷山深处的地貌的呈现，乔木灌木河谷山崖草地雪山，应有尽有。我们都从乡下来到县城读初中，

读一个班。一个晚自习，这个阿“贝”把我叫到了寝室，要我给他背上的浓泡疮擦药。这个贝背上的疮真大，像熟透了的桃子，正登峰造极地绽放。我们的阿“贝”爱唱歌，天生的男高音。在操场上，在教室里，在厕所里，在床上、街上，在学农的坡地，阿“贝”的歌声总是像空气一样跟我们的耳朵在一起。就是当着女生的面，再唱也不害羞。但究竟唱的什么，我们是一点都不清楚。哦哈哦嘿咿呀……像牦牛在吼，像盘羊在叫。阿波珠跟我一起上了师范，又是同一个班。现在，我还记得穿裹裹裙的红脸膛的阿“贝”在校门外的铁轨上学着《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的人耳朵贴着钢轨听火车的情形。师范毕业，阿“贝”回到了岷山深处，教那些小贝。阿“贝”娶了他们部落最漂亮的女子，并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一天，我带几个诗人去贝的寨子玩，阿“贝”喝醉了，叫了一群贝姑娘过来，要诗人们见识。贝姑娘们一上来就唱起歌跳起舞喝起酒，并逮住一个戴眼镜的诗人筛糠，吓得那些在大都市习惯了声色犬马的骚人即刻作鸟兽散。


◎女贝头饰


◎男贝

贝从司马迁的笔头来到《史记》，从《史记》来到陇南陕南川西北甚至川西坝子，来到纷乱的魏晋南北朝，找到了难得的真空地带，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颠峰之后，出产了一个叫李世民的皇帝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之后，贝便成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背影，直至被历史彻底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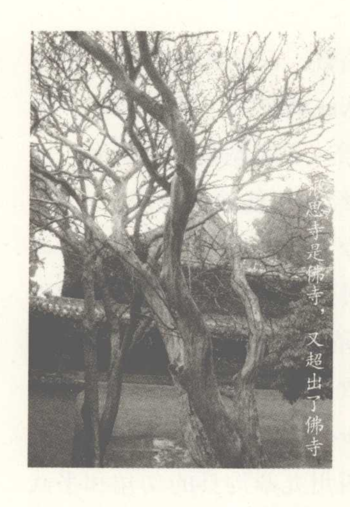
贝到哪里去了？氐到哪里去了？我想，杀戮，汉化和吐蕃化，是贝消亡的原因。今天岷山深处的贝，就自称是从江油来的。蜀汉时候，诸葛亮要贝让出一箭之地，贝答应了。谁知诸葛亮一箭就射到了火溪河。江油今天的“蛮坡渡”，很可能就是汉人对贝曾经的居住地的歧说。

今天的贝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曾经叫贝。今天的贝也不叫氐，叫白马人。今天的贝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今天的贝属于藏族。土改的时候划归的。很多专家学者考证，贝不是藏族，贝就是贝，贝是氐人的后裔。政府也争取过。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争取了几十年，报告打了几箩筐。最高政府回话了。维持原族，可以进一步研究，待成熟再定。今天的贝有近两万人，分居在甘肃文县的铁楼、四川九寨沟县的勿角和平武的白马。今天的贝说“藏话”，也说汉话。穿裹裹裙，也穿牛仔、西装、夹克。喝匝酒，也喝白酒、啤酒。唱“藏歌”，也唱流行歌曲。跳朝盖跳圆圆舞，也跳迪斯科、华尔兹。

今天最漂亮的贝姑娘要数嘎尼藻。高中毕业便唱歌。丰满。野性。纯朴。歌喉赶得上韩红，相貌不亚于章子怡。嘎尼藻的父亲叫尼尕，当过乡长，是百万富翁。每次听彝人制造，我就想到贝也应该有贝制造或白马人制造或氐人制造，我就想到嘎尼藻这个贝姑娘，这个贝姑娘完全可以深造，完全可以去北京去纽约唱。可是，嘎尼藻只在岷山里唱，只在县城唱，只在县政府的团拜会上和旅游团面前唱。这个贝姑娘啊，该有多么可惜。

报恩寺

大人提起路边的一堆乱石，总爱说：“那是长瓜的坟，有一年大年初一，长瓜跟几个小伙子进城去报恩寺转星辰车，把腿杆轧断了，没钱医，断腿生了蛆，长瓜就死了。”我没有见过长瓜，想象不到像冬瓜还是像西


报恩寺是佛寺，又超出了佛寺

瓜，像丝瓜还是像苦瓜，只想象得到长瓜穿了新衣裳，拿了压岁钱，兴高采烈进城的样子。

第一次听说报恩寺，便是这样地与一个人的死连在一起。后来去了报恩寺，总想到那个长瓜，那个丝瓜或者苦瓜。

星辰车就是转轮经藏，高高的，一座木塔，上头雕了几十条飞龙。十几吨重的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孩子就能推动，不能说不神奇。今天走进华严殿看见星辰车，我都还在想，那么窄一绺缝，长瓜的腿是如何落进去的。我只能感叹长瓜的腿太纤细了。

在我的记忆里，报恩寺一直是开放的，有人看守，不收门票。春节最闹热，我们穿了新衣裳新布鞋，理了新脑壳，拿了一毛或两毛的新钱，都往城里赶，往报恩寺赶。大人进报恩寺看千手观音，我们进报恩寺转星辰车。我们转星辰车，大人总要吩咐，千万注意，莫学长瓜。

在城里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两个同学住在报恩寺。一个叫王耘，一个叫张睿。王耘高个。苗条。文雅。说话细声细气，特别温柔。张睿是我的好朋友何功暗恋的对象。很多次在傍晚陪何功到报恩寺看张睿窗子里透出的灯光。我对报恩寺的印象便是在何功的暗恋中得到加深的。记得张睿有一颗龅牙，当时正用钢丝拴着。我不知道何功暗恋的是不是也包括那颗龅牙。有一回去报恩寺，看见张睿的父亲正在山门里的一张八仙桌上画华国锋的像。今天我依旧记得那种上世纪70年代末特有的情景。空气里有朽木的气味，也有政治的气味，但政治的气味是喜悦的。当时的华胖嘟嘟的，红光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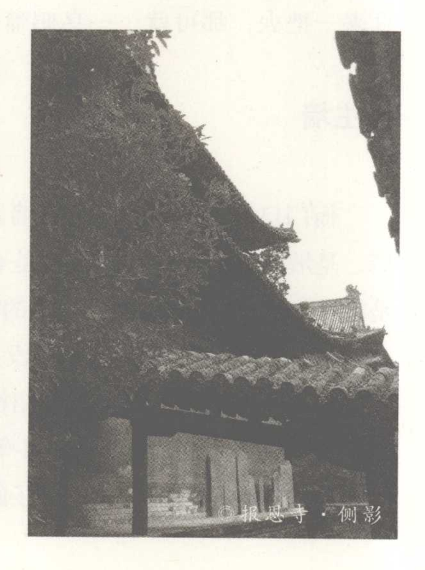
除规模小些以外，报恩寺和北京的故宫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修造报恩寺的工匠里头就有修造故宫的。唯其如此，报恩寺从晒不到明朝

的太阳那天起就变得暧昧起来，滋生出许许多多政治浪漫主义的传说。报恩寺的暧昧也许就是笼罩历史、笼罩人心的暧昧。

报恩寺涉及到王玺——它的缔造者。人们知道报恩寺，却不知道王玺。王玺是岷山里最早的土司，血脉来自那个扬州兴化的进士王行俭。土司专门“司”贝。府志说王玺“髫龄时有丈夫志，弱冠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不知真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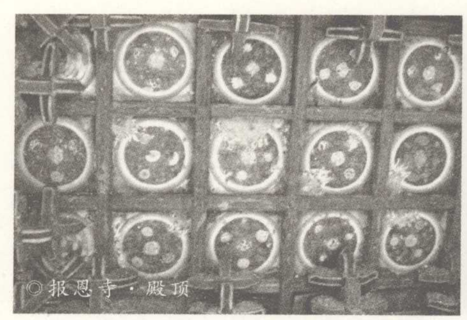
报恩寺的设计是在王玺手上完成的。报恩寺是佛寺，又超出了佛寺，多了那么一丁点儿佛寺以外的东西。王玺不是不懂佛寺规格的人，他让佛寺修得违规，这里面肯定有他个人的东西。不是一种难言的东西，就是一种浪漫的东西。这种难言或浪漫像转轮经藏一样雄伟，又像万佛楼一样幽暗。佛寺修得超标，有人举报到了皇帝那里。举报者很可能是王玺的顶头上司、爱女人更爱江山的薛姓知州。但皇帝早已拿王玺当朋友，不以为然，潇洒地批示道：“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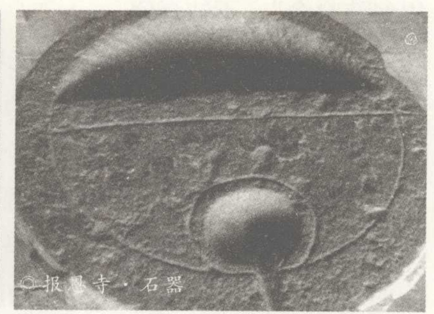
我总是不厌地去报恩寺。在我的感觉中，报恩寺不是佛，不是艺术，不是权力，而是一个睡眠，一个五百多年前就呈现了的睡眠。在这个睡眠的巨大的阴影里，我一直妄想嗅出点什么，一点几百年前的什么，一点王姓土司血脉的什么，一点佛的什么，但最终一无所获。


◎报恩寺·侧影

有一年冬天，一位诗人朋友来岷山，我们喝醉了酒，在明晃晃的太阳里游进报恩寺，在金水桥指点，在万佛楼挥手，在华严殿转星辰车。腊梅正开，诗人把鼻子伸在腊梅里，呼出的酒气把腊梅都熏醉了。

过去的报恩寺是省级文物，现在是全国文物。过去由文管所经营，现在出租给了一个成都老板。保护，还是开发？争论到了白热化，主意交到省里拿。省长批示，保护与开发并重。报恩寺火了。门外大巴一片，门里香火弥漫。层层叠叠的快门，把千手观音的每一寸肌肤照得透亮。噼哩啪


◎报恩寺·殿顶


◎报恩寺·石器

啦的香火烧得老板笑眯了眼，可是，可是也烧得人捏了一把汗，要是哪天，真来一把火，那可就……乌鸦嘴，我闭上。

民主墙

衙门口有一堵墙，叫公告墙，也叫招贴墙。我叫它民主墙。其实不是墙，是坡街上的一道长坎。先是石坎，后来抹了泥，再后来抹了水泥。墙是老墙，民国时候就有，顶上的青苔和野草也像是民国时候长的。

第一次看见那墙，墙上便没少招贴，但还能看见一点墙，一点水泥。大小字报。知识分子向县革委招待所奸商发出的炮弹。口号。语录。政府公告。讣告。法院布告。阶级斗争专栏。法院布告最抢眼。尤其是“严打”时期的布告。从上到下，一排子鲜红的×。强奸犯杀人犯居多。少年犯居

多。农民犯居多。成天都有人挤着看，还有戴老光眼镜的瘦瘦的先生读出声音。后来什么时候，招贴铺天盖地了。铺天盖地的招贴，使民主墙注水一样地肥胖起来。依旧是讣告。政府公告。法院布告。但多了海报，多了五花八门的商业信息，多了冷枪暗箭。揭露某某权贵霸占良家妇女的。披露某某权威串通当地黑社会的。透露某某招标暗箱操作的。但都绝对地匿名。喊冤，在民主墙喊；骂官，在民主墙骂；逮猫（找妓女），在民主墙逮（但要等到半夜。不是在墙上的招贴里逮，而是在墙根逮）；甚至要表达跟自己最心仪的人干那活的愿望，也在民主墙表达，像厕所文化那样，像阿Q对吴妈诉求的那样——“我想跟你困觉”。这些，种种民主墙所传达的，很快就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的谈吐，家喻户晓。

民主墙是小城官方与民间共同的媒体。

出太阳的时候，阳光照在化亮纸和毛笔字上，使成堆的阅读暗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下雨的时候，民主墙湿淋淋站着，所有的眼睛都远离了，孤独，岂止孤独？黑的和红的墨汁和着雨水流淌，像粉饰者的眼泪，新贴的或过期的招贴开始卷曲、脱落，像有罪的头颅。这样的时候，民主墙别说民主，就是连墙也不是了。这样的时候，民主墙倒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愁女或怨妇，甚至有几分被强暴的女子的惨相。雨总是伴着风。风掀开了民主墙的裙子，却揭开不了民主墙的秘密——几十年的招贴结成了被子，护卫着那些早已污染早已发霉的“民主”，而那些“民主”多半又是由传递死亡的讣告编织而成的。

民主墙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被推倒的。推倒民主墙的那个人姓文。他搞旧城改造。民主墙所在的位置，现在是天诚大药房、雪毛线、安踏专卖店和窈窕服饰。今天，很少还有人记得起那样一堵顶上长了野草的街墙；今天，民主墙的全部便只有我的想象与记忆了。

初始的世界

蓝色，黑色

一对乡村男女在1965年初春的一次亲热，注定了我的面世。这之前，已经有三个男孩因他们的亲热而生下来。只是第一个男孩生下来七天就夭折了。

我想象那个1960年代的初春出奇的冷，而那一对男女青年又特别的饥渴和惶恐。

我最初置身的世界是岷山、龙门山间的一个小村子。依山傍水，竹林掩映。山是小山，是主峰分离出的一支，并早已沉陷，长满青杠树、柏树和一种叫黄荆子的灌木。水是涪江，绕山而过，夏秋泛滥，冬春枯落。急流、险滩、漩涡比比皆是。石墙，篱笆，竹林，香椿，樱桃，构成了我对世界的原始记忆。尤其樱桃，花是这个村子的村花，果是这个村子的村果，树是这个村子的村树。涪江冲积而成的肥沃的田地是上天给予这个村子的馈赠，涪江一次次泛滥冲刷出的沙金则是这个村子意外的福分。很多年，大约在我八九岁之前，这个村子是我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世界。驴子和河滩，桑椹和锁眉草是我的世界的唯一的诗意。

我对世界的扩张源于两种方式：听故事和上学。故事来源于我亲爱

的外婆。我的外婆是我的世界不多的爱人。入睡前，外婆总要给我讲故事。我的睡房也是堆放猪草的地方，床前总是堆着小山一样的猪草。外婆总是一边砍着猪草一边给我讲故事。好些夜晚，我都是呼吸着猪草的气味在外婆的故事里睡去的。《吃人婆》恐怖，但那位大姐姐不乏智慧；《夜明珠》神奇，满足了我的幻想；而《赵巧送灯台》则培育了我理想主义的气质……我不知道我的外婆是从哪里听来这些故事的，是从她的外婆嘴里听来的吗？我不知道我的外婆的外婆是不是也边讲故事边砍猪草。刀砍到了外婆的手，血染了青青的猪草，我自然是不知道的。

故事的另一种开始涉及性。这样的故事当然不会出自我的外婆之口，而只能是出自我的小伙伴之口。我的小伙伴告诉我，某某和某某在某某家柴林里交换着看下身，某某和某某在某某家木桶里脱了裤子结婚。

与我的世界靠近的还有恐惧。向来和我要好的小伙伴与我反目为仇，带领一帮陌生的孩子翻过我家院墙，来攻打我家大门。我和妹妹顽强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落荒而逃。他们心狠手辣，面目狰狞地拿石头砸我家大门。眼前的恐怖很快与外婆故事中的妖魔鬼怪有了照应，并扩充了我的想象。



◎ 婆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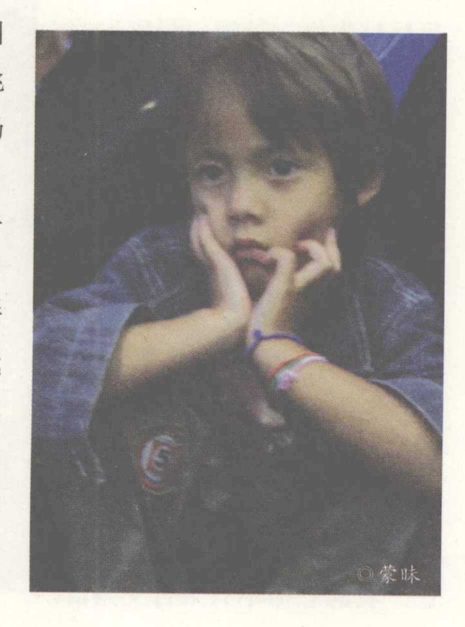
更大的恐惧来自我从来不笑的父亲。恐惧是我的世界里埋下的第一个伏笔，也是给我幼小的生命涂抹上的第一道阴影。我的恐惧不只来自父亲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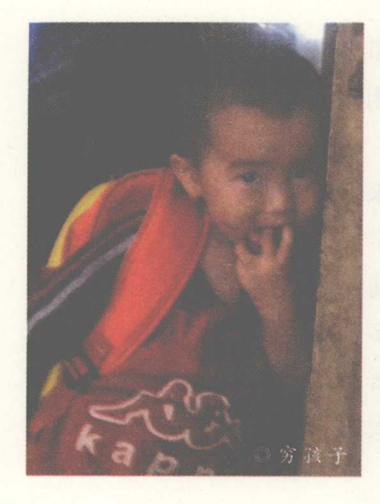
瘦黝黑的面庞和燃烧的目光，还来自他整个人时时透出的淫威，来自他面颊和颈项绽出的青筋。在我的记忆和感觉中，父亲总是本来地高高在上，本来地独断专横。也许在父亲看来，我是他生养的，就是他手里的泥人，天经地义地归他捏。父亲让我很小就知道了生命的卑微和自由的可贵。

蒙昧的内心

上学之后，我的世界得到了扩充。尚是少女的邓老师成了我的世界里最耀眼的明星。邓约莫十八九，个子不高，麦麸色的肌肤，穿一件草绿色灯心绒上衣，长睫毛围拥的眼睛就像是栅栏里的鹿子，腰身也是极为动人的。邓是我的世界里绽放的第一枝花，她促成了我最初的审美，也启蒙了我睡眠的性意识。

像所有乡村小学一样，这个叫长桂小学的校园里有苹果树、核桃树、梨树，有一个泥土的操场。操场东面的那棵老核桃树是最有意思的，漂亮的邓就是在它浓密的树阴下手把手教我跳舞的。小学校虽然简陋，但不失纯朴。然而有一天，当我拿着邓写好的发言稿走上主席台时，我隐约闻到了一种软性的火药味。我在对林彪和孔子没有丝毫了解的情况下，居然宣判他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我歪戴帽子口诛笔伐的样子，惹得大家哄笑不止。我不知道


◎蒙昧



我的形象和大家的哄笑意味着什么。

走出村子，我的世界被拓展到了一个极大的境界，至少获得了一个极大的境界的轮廓。在学校背后的沙沟，我第一次看了女生梅的身体。同看的还有我的几个小伙伴。是梅主动脱了给我们看的。类似的展示还在教室的课桌上发生过。虽然梅的身体光溜溜与婴儿并无两样，但展示本身是刺激的。

我的世界的嫉妒之草是从邓恋爱之后开始生长的。邓的对象很高，也很帅，是长城特殊钢铁厂的，我们叫他“高大汉儿”。他喜欢打篮球，每次来，我们总在简易的篮架下看见他的身影。他每每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刮起一股风，吹得我们偏偏倒倒的。在我迷幻的幼小的心里，邓一直是我的，而现在被“高大汉儿”占去了，我的内心该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奈！“高大汉儿”时不时地出现，惹得我的嫉妒像连绵的群山一样沉重而没有边际，而我嫉妒的主峰总是针对邓变化的脸色和情绪的。我发现“高大汉儿”的出现改变着邓的身体。至今我也不明白，一个乡村孩子，在那样一个年代，怎么就有如此敏感、细腻的一颗心。

和嫉妒一同光顾我的世界的还有屈辱。何大汉儿偷了我的一只自制乒乓球拍，查出后，却背着牛头不认赃，还以大欺小打我。我的乒乓球拍明摆在他的手里，可就是没有办法拿回来。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并无道理可讲。另一次是刘群芳把我晾晒在窗台上的一只塑料凉鞋穿在了自己的脚上，硬说是她的。我脚上的另一只凉鞋已经证实了，老师和家长也出面了，可她就是不承认、不退还。刘是牛高马大的女人，前些年见到，样子和神情简直就是祥林嫂第二。刘群芳终将那只凉鞋据为了己

有。至今我也不懂，她为什么单单要喜欢那么一只鞋子。

我的世界更大的阴影在我自身。我尿床。尿床本来是一种病，但我的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我是怕冷或者怕鬼。在这一点上，我的外婆要善良得多，她不仅知道尿床是一种病，还找来猪尿泡炖了给我吃。尿床带给我的污辱是难以启齿的。挨骂挨打是家常便饭，要命的是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尿床，尿床总让我在我暗恋的邓面前无地自容。邓是那样的洁净美丽，而我的身体和意识却已经被污染。多少次，得知邓要来家访，为了不让她知道我羞辱的秘密，我总要长途奔袭，回家收拾起我的晾晒在屋外的尿布。在与邓相处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再尿床。

世界的反面

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转我的世界的。我发现，就像一块半埋在沙地里的卵石，我的世界也有两个面。正面是蓝天、江水、河滩、阳光、驴子、樱桃、游戏和邓，反面却是粗糙、潮湿、腐烂、恐怖和光团一样的蚂蚁。透过那些蚂蚁忙碌的身影，我看见了地狱的轮廓。

我真正发现地狱是在政治和地质的风波结束之后。就像空气一样，政治的风波让我们无法躲避。最初的记忆是黑暗中父亲手里的菜刀，晃过之后，墙壁上的林副主席便从毛主席身边消失了。然后就是批林批孔。不知歪戴帽子口诛笔伐的我算是一个什么角色。我们小孩子天天唱着批林批孔，批林批孔，我们把第一个“批”唱成普通话的“pi”，把第二个“批”唱成四川话的“pei”，再颠倒过来。我想，这肯定是我们四川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独创。接着是周死，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天安门事件”，是毛死，是粉碎“四人帮”。我们小，我们不懂事，大人叫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大人叫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就像是半天云里的口


◎上学的小路

袋，任大人去装政治的风；但我们是漏的，我们留不住风，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只能从我们这儿过个路。

地质的风波是7.2级的大地震，就发生在我们村子所在的岷山和龙门山交界的断裂带上。虽然我们没有被毁灭，但地震造成的恐慌却使我们的内心一片漆黑。强震发生了三次，传说中桑田变沧海的大震随时都可能来临。与恐慌一同到来的还有长久的降雨、洪水、泥石流、饥饿和无止境的绝望。雨时大时小，半个月没有间断，山洪在房前屋后行驶。没有人知道地震什么时候还会来。夜晚，我们睡在堂屋的晒簟里，屋外的马灯通宵地亮着。余震使我们随时从睡梦里惊醒，跑出房子，站在雨中。雨水流在脸上，我们不哭也是哭。我们是多么的无助啊。樱桃树发霉了，坍塌的石墙发霉了，房檐和石板路都长出了青苔。我们的身体也发霉了，我们的心也长了青苔。



◎见证过我青春期的一棵树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睡在玉米壳里，广播响了，我听见了哀乐，听见了成语“永垂不朽”。地震差不多把我的世界变成了地狱，而毛却在这个时候死了。我的世界的最后的太阳落了。在我们孩子的但又是政治培育的想象中，地主逼租来了，狗腿子跟在后面；“刮民党”打回来了，一路杀人放火；鬼子进村了，嘴里喊着“八个呀噜”……在我们的逻辑和想象中，毛死了，地球就不转了。

这是政治和地质的地狱。动荡，潮湿，无知，长满青苔。我也有阳光明媚的地狱。晴空下的一次葬礼，涪江边春光里的一具腐朽的尸体，或是冬日后山坡的一座旧坟，都是对我的阳光的地狱的启示。下午，或者早晨，在一间熟悉的木屋里醒来。房间渐渐明朗。一束静止而又普通的阳光照出了圆圆的泥窗、灰黑的蚊帐、脱落的画报、笨重的柜子和卷口的弯刀。我在哪里？我是谁？屋子是那样的陌生。恐惧突然袭来。我明白我不知道。似梦

非梦，似醒非醒。我感觉我就在地狱里。恐惧像潮水漫来，湿透了我。我在罗嗦。屋外是静谧的，竹梢在晃动，阳光在摇曳，公鸡在打鸣，外婆在门外自言自语。秋叶一样的光团在帐顶摇动，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终将死去。这种意识瞬间吞噬了我往后几十年的光阴，睡在床上的幼小的我似乎眨眼就垂垂老亦。

青春期

1978 年 9 月。我的世界延伸到了县城。从此，独立与城市成了我世界的必不可分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进城之后有了第一次梦遗。那是一个雨夜。我也因此结束了尿床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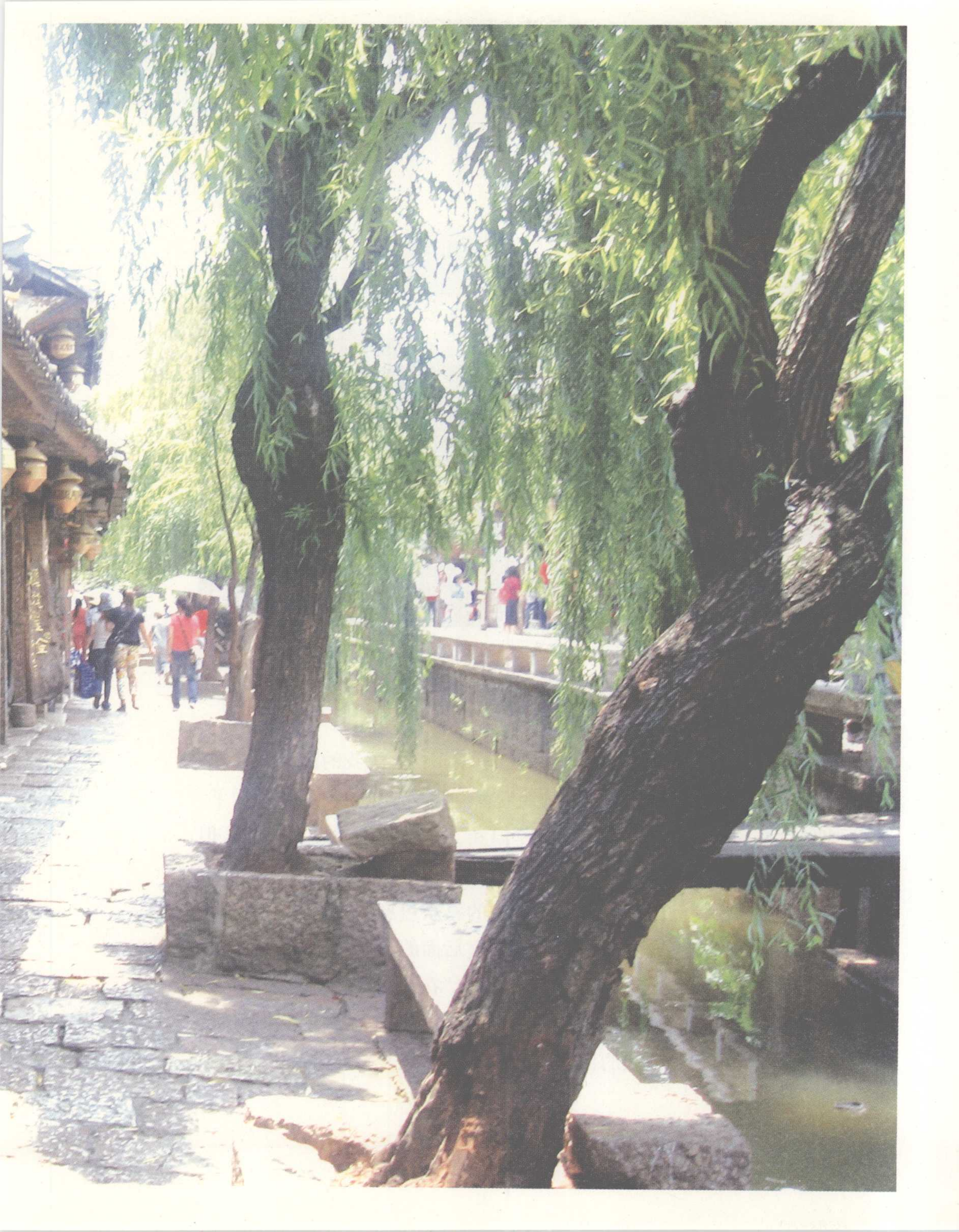
前半学期，我受到了城里老师的歧视和侮辱。因为一件小事，我的班主任李骂我是“土包子”，而我的同桌她则无缘无故地打掉了我的一颗门牙。当我期中考试的成绩名列前茅时，我又受到了城里老师和同学的



◎ 山溪



◎ 午后




◎夏

追捧。我幼稚但却敏感的心最早察觉到了城里人的阴险与势利，同时，我也从此堕入了这个世界。

青春期的身心萌动让我在初一的第二学期喜欢上了我的同桌女生红。红也是初一才进城的，个子高挑，已经发育。我早已记不得红的模样了。现在想来，红一点也算不上靓，她只是温和，肯给我借橡皮和圆规，但在那时，她却是我眼里的西施。我的喜欢除了与她的善良、温和、大方有关，更是缘于她发育良好的身体。在我的喜欢包裹下的是性。我和红在尚未拆除的抗震棚里背英语单词，在教室后面的小河打水漂，在蔬菜社沙地的桑树下看蚂蚁搬家……我们都有过“在一起”的感觉。我们是蒙昧中的夏娃和亚当。这是光彩的一面。不光彩的一面是性。性的不断发育让我一天天沉溺于臆想的快感。我的臆想当然是针对红的。

杰是随父亲调任从绵阳转来的。杰来的时候很小，一脸奶气，到初二，突然壮实了，青春痘和小胡子也长出来了。一天傍晚，杰在纪念碑堵住我，说他要跟红耍朋友，警告我别再打红的主意。杰还给我发了一杆"大前门"。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大前门"。其实，我与红早已连话也不说。我只是暗恋着。我不知道红是否感觉到。无数的夜晚，我独自在油灯下把想要说给她的话写在纸上，再在灯焰上烧掉。在我朴素的幻想与感情中，在我越来越强烈的臆想里，红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我不知道红是否接受过杰的感情。我也不知道红最终接受了谁。听说是个东北人。东北人可都是活雷锋。我喜欢红，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念完初中，我就读师校走了。红上了高中，改了一个有女人味的好听的名字。红薇。红大学学的是地质，现居成都。

唯美的裸睡

1

先是想象力野草一样疯长。1976年。我跟林犬躺在红军废弃的工事里，瞎想子弹是如何穿透桐子花打中正在三杨盖耕地的牛的屁股的。红军和政府军在涪江两岸射击，弹壳落满羊肠小道。我还想象结了壳的牛粪里如何伸出缩头炮。缩头炮当然是我们在《南征北战》里看到的美国造。

接着就是身体的发育。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但有一点我清楚，我要成大人了。我的下身不再光溜溜。有一天林犬告诉我，他想石成蕙了。石成蕙是高年级的女生，也是我们长桂小学最漂亮的女生。最关键的是她发育了，有了女人的胸脯和屁股。我问林犬是怎么一个想，林犬脸红得像膏脂，没回答我。其实，我知道林犬是怎么想石成蕙的。林犬是像我一样想石成蕙的。身体。他的身体。我的身体。石成蕙的身体。我不只想石成蕙，还想王梅孙芳，想我的年轻漂亮的邓老师。她们都有女人的身体，以及身体散发出的迷人的气味和光线。

我的身体最初的快乐并非来自第一次勃发。没有勃发，只有冲动。微弱的冲动。1977年。雨后宁静的夜晚。我淋了个落汤鸡回来，脱得一丝不挂躺在蚊帐里。我没有想石成蕙，我想邓老师了。放暑假了，邓老师

回江油了。我想邓老师，但不是想邓老师的身体，我想她身体外面的草绿色上衣，想她黑眼睛里温柔的光线，想她额头和颈项的麦麸色。我的“想”出了问题，出在身体上。比邓老师的目光漫过我的身体更有力。我的身体颤抖了，分泌出微量的散发着青草味的蜜一样的东西。我感觉，快乐就来源于那个颤抖，来源于那些陌生的微量蜜液。

身体最初的快乐像播撒的种子，很快就在我们的身体萌生起来，后来就变成漫山遍野的灌木。在短暂的冒险之后，我跟林犬已经很善于经营我们身体的快乐了。我们知道有一桩罪行叫“强奸”。我们想王梅，想孙芳，想临队的女知青罗，也只能是想。我们在田坝的桑树上找到罗，罗正在吃桑果子。我们的身体想罗，嘴上却只敢逗她说：“吃桑果子，雷打乌嘴子。”我们专门惹罗骂。让罗骂，我们的身体也是快乐的。


◎静物・花

2

我跟林犬在岩背后扯猪草。水葵花，水麻叶，水蕨子。嫩得出水，肥得流油。还有焖头花，一种开紫红淫艳的小花的蒿类。鼻子接近花丛，人会发晕。岩背后是一条岩堰，像红旗渠，底下是涪江。江心是急流，江边是碧蓝的漩涡，江岸是河水和时间联手打造的岩石的盆景。油灯。面盆。鱼缸。观音菩萨。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最后一股寒流过去，桐子花开了。1978 年。我跟林犬褪了裤子躺在面盆里。不是我们要找快乐，是

快乐找到了我们。桐子花落在我们赤裸裸的漫着春光的身体上，让暗处的欲望混乱而汹涌。我们身不由己地把玩着快乐的开关，直到欲望之花在大汗淋漓的尖叫中萎蔫。

至今，我也不愿意说出那个词语，那个与心理学有关的词语，哪怕是说出那个词语的一个近义词。这不关道德，只关美学。1978年9月。我带着青春期的身体进了县城中学。不同于乡村的颜色催促着我的快乐。干干净净的女生。裙子。披肩发。雪白的牙齿。媚眼。偶尔的一部爱情片（比如《冰山上的来客》、日本的《生死恋》）。我的同桌是个早熟的女生，时常取笑我的乡音土语，还拿她的腿来压我的腿。她的眼睛里有个钩子，总是把我的身体勾得热乎乎的。我看见她把血糊在了板凳上。我没有给任何人说。她的身体真好看。脸蛋。眼睛。嘴唇。她特别大方，给我借整块的橡皮。我们在抗震棚里相互抽背英语单词。她的身体里是个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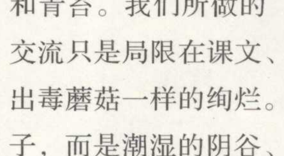
不用上《生理卫生》，我已经知道男女关系是怎么回事。我不再相信女人是用腋窝生孩子的。我知道了精子和卵子，知道了受精卵，知道了交配。我知道，如果拿我快乐的蜜液跟女人的卵子结合，是可能制造出一个孩子的。1979年春天。我暗恋起我的同桌。她早熟的身体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我。我时常在夜晚把爱恋的话写在纸上，反复默念，再像地下工作者撤离时处理文件那样在油

灯上烧毁。1979 年，我步入了性的花园。雪白的樱花李花，淫艳的桃花，金黄的油菜花，有毒的焖头花。我在花丛里臆想，花瓣落满了我破旧的衣裳。破旧的衣裳包裹着我单薄的身体。单薄的身体里却已经萌生了生殖的欲望。从 1979 到 1980，差不多每隔一个晚上，我都要受肉欲的支使，把我的身体跟我同桌的身体想在一起。身体的快乐让我销魂。红旗路 97 号。充满卤味的漆黑的房间。我的身体的夜晚的居所。性的花瓣在我肮脏的被子和床单上洒落，像猫狗的爪痕。没有人知道我的臆想和手对身体所做的这一切。

3

《冰山上的来客》和《生死恋》里的男女之爱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道德颂扬，而我渴望与臆想的则是身体的肯定。在与女生的交流中，我的身体在一天天斟酌欲望。不是火苗、铁钉和石炭酸，而是樱花、李花和青苔。我们所做的





交流只是局限在课文、单词、公式、定律，但荷尔蒙在背叛我们，制造出毒蘑菇一样的绚烂。我熟悉我的身体，不是出故障的肠胃、恶心的疹子，而是潮湿的阴谷、茂密的森林、勃发的气象，以及身体的普遍性感

和猩红的欲望的色泽。

女生的身体是什么？透过女生宽松的衣裙，很难看见我梦想的可能的曲线。不涉及乳房，单单长发掩映的后颈窝的一小块深色肌肤或衣领下露出的些许胸脯，足以让我心动神摇。乳房，要是真有乳房呈现，我的身体不知会承受怎样的震荡？女生发育良好的臀部的轮廓是形而下的臆想的源泉，而她们的花容月貌则给人形而上的玄想。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以为上天给我身体就是要让我检验女生身体的成熟和美丽的程度。我甚至看见我感觉器官上的刻度，一一显示着我熟悉的女生身体的得分。

时不时的目光接触放出的电荷，给予我的体验不是触到高压的痉挛、

◎虎牙 · 蛇梅儿草

疼痛和晕厥，而是触到三十六伏以下的电压的快乐和温暖。微电在身体的浅层通感，身体最深沉最隐秘的地带只有鱼群游过。偶尔的肌肤接触，则是物质的安慰。异性的物质的安慰。湿润，带着瓷感。

储存在我神经末梢的电荷，到了夜晚就变成了高压，在红旗路97号燃烧。板壁外街头的喧闹、天井里猫狗的叫唤、卤肉的芳香和表叔表婶的“枕头风”火上浇油，让我不得不用早已习惯的臆想脱去女生的衣裳，将幻化的女体崇拜。

4

阳春三月，我跟在一位女子身后去往一片松林。1983年。那女子走在我前面三四米处。她没有叫我跟上，我也没有叫她等等。我们完全可以并肩行走。出了校门，就是麦田和油菜花，没有人认识我们。那女子在我前面走，与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我看着她的臀部，包裹在纯白的紧身裤里的臀部。我跟着它，看着它。它那有节律的运动让我的荷尔蒙汹涌澎湃。从火车站到热电厂，再过涪江便桥，我都这样一直跟着，跟着她青春的臀部。阳春三月，她一身春装，她的身体最大限度地张扬着青春和肉体的迷惑。

在路上，在松林，在我被荷尔蒙洗刷的眼里，她的身体是一个仙境。

我知道仙境也会有微量的污染。我知道那女子也会有几天的经血，也会有汗液分泌，也会吃喝拉撒。然而，那个阳春三月，我跟随那女子发育到极限的摇摆的身体，走过了二十几里地，只感觉她的身体是一个仙境。一个非人间的仙境。黑披发。韵律实足的腰身。会说话的眼睛与臀部。身后的曲线。侧身的曲线。生龙活虎的性……我们没有说爱，没有说身体，哪怕整片的松林再没有一个人。阳春三月。我们铺了报纸，拿出零食，拿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们躺下，但身体互不相干。当雨



◎她的身体也是个仙境

点落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九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靠得近了些，但距离通电仍有很长的里程。也许那女子是爱我的，也许我正爱着那女子。但这样的爱必须与身体无关，否则，我们就可能面临深渊，一个少女和一个少年身体的深渊。

很多年过去了，那女子的身体对我依旧是一个迷，虽然这个迷早已被别的男人打开、识破，虽然我也打开、识破了对于某些人而言依旧是迷的别的女子的身体。我想，不同女子的身体应该是不同的迷。我想，不曾被打开、识破的女人的身体才是一个仙境。仙境被打开、识破了，就变成了地狱。

偶尔我也想，在那个阳春三月，在那片松林，假如我听从荷尔蒙的召唤，去打开那女子的身体，得到的会是什么？

5

一个身体就是一个宇宙。身体所包含的元素和奥秘，也是宇宙所包含的。性是身体的美丽之所在。灵魂是身体有毒的花蕊。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体，无论安置在丛林沙滩还是床笫，都是造化之造化，就是上帝也会忽略她在时间中潜伏的部分，只留心她的身体。先是质感的肌肤，性的曲线，电流辐射的波光。然后是性的集中营。乳房和髋。臀。腰腹。长发落下来，酣畅淋漓。面部是灵魂集居区，足以提升性的纯度和柔软度。

一个身体究竟是什么？性别的差异，器官的不同，阴阳的互补，无不体现出造化的神秘与伟大。一个女体与一个男体结合，便可能诞生一个新的身体。无中生有。我敢说这是宇宙的全部奥妙。上帝注入我们身体的冲动与快乐，则是无中生有的保证。身体是神圣的物质，而年轻漂亮的女体是神圣的物质的花朵，所携带的电荷可以直通男人的无意识。

宇宙是非常有层次感的。细胞，构成细胞的元素，比构成细胞的元素更神秘的可能的物质，器官，身体，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处于宇宙层次的最中央，微观与宏观的两端都是没有极限的。

6

冬日的黄昏。灰暗。1992 年。在肮脏的充满水蒸气的双人浴室，我第一次全面地见识到女人的身体。水流过她处女的肉身，在我的目光洒向她乳房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呈现的是一个仙境。这个仙境算不上美丽绝伦，但却承载着我自青春期以来全部的臆想。

我总是把拥抱一个女人或被一个女人拥抱当成我生命的极至的抚慰。女人一定是我心仪的女人，一定有母亲、妻子、恋人、大自然的多重身

份，有饱满、宽厚的胸脯，有温暖的体温和泥土的体味，有本能的接纳和慈爱的抚摩。与她体贴，埋头她的双乳，肉欲化成了春风春雨，灵魂在回归，像一粒种子落在滋养过它的泥土里，而又催促着再一次的萌芽。

在我看来，和一个兼容了世俗与理性的美丽的女子相拥，永远是生命的最高享受。这世俗里有人伦天伦，也有动物的快乐原则；这理性里有完美主义者的想象，也有对神界的攀升。进入一个世俗与理性的完美女子的身体与内心，就是进入仙境。潮湿的迷雾里有挺拔的山峰，有冰洁的暗河，有幽深的溶洞，有开满不知名的小花的草地。我们在仙境里迷失，被物质的美妙俘虏，就像被死亡的红指甲从肉体抠走灵魂。

我知道，像万物一样，女体也是一种存在，之所以给人无限遐想，完全是因为它具备造化的美学特征，同时又与欲望相连。得不到的爱情是最神圣的爱情，得不到的女人是最完美的女人。“得不到”给予了我们虚幻，给予了我们对现实爱情和女体的修补。

7

阳光灿烂的午后。寂寞的梧桐树。斑驳的光影。2003 年夏天。一位穿连衣裙的女子出现在德民诊所。灵魂明显地浮在脸上。面庞骨感，脸皮特薄，特白，有尖尖的下巴，有异类的光泽。目光是林黛玉的，但剔除了病态。身材窈窕，匀称，不乏女性特征。她碾药、抓药，或站在柜台前观望，灵魂都是浮在眼眸的。她的乳房和臀部不是特别丰硕，但绝对结实。在夏天的倦慵的午后，她的性感毫不逊色于她的灵魂。

同样的午后，同样的倦慵的梧桐树。在距离德民诊所不到百米的少妇皮具店，店主斜依在钢制椅上打盹，衣领下垮，露出半边乳房。店主是无与伦比的美女，以纯棉牛仔裤和衬衣把她成熟的身体衬托得货真价

实。她的灵魂淡薄，庸常，不如诊所美女那样幽暗绵密，但她肉体的美高蹈，酌满了迷人的性感。

走在街头，我的眼睛总是与这样的女子的身影勾结。说是身影，其实是身体。是曲线，是张扬但却节制的性感，是符合我审美情趣的形体、颜色、气味。甚至眼睛可能与想象结谋，走光她们的衣裙，将她们身体的性感部位推向唯美的极至。

我喜欢裸睡。唯美，自由，尽享身体的存在感。我在夏天午睡时经常走光，让目光停留在自己的身体。我的双腿修长光洁，腰腹结实柔韧。我喜欢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符合美学原则。我可能自恋，甚至自娱，但这并不是一种过错。身体，蕴涵了肉体与人文气质的身体，内含了高贵灵魂的身体，难道不该是我们的至爱？

70年代早些的一个下午

乡村的下午，可以由太阳决定，由农活决定。一两点，两三点。没有城市钟点的准确性。6月，或者7月。不会是8月。没有副热带高气压的闷热潮湿，没有秋老虎的毒辣。有太阳直射的灼热，也有树阴摇曳的爽透。“双抢”已过，秧子返青，玉米开始挂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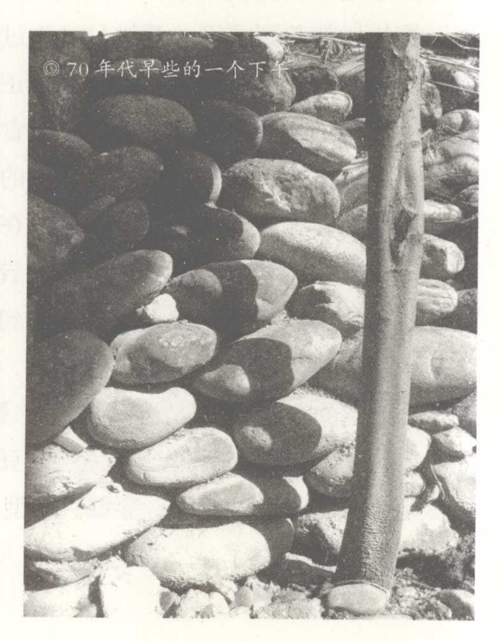
天，无遮无拦，远离太阳的部分碧蓝。接近碧蓝的是椿树的巅尖、障子崖的岩峰、三岔子背后刀刃一样的山脊和偶尔盘旋的老鹰。天空没有维度，却又有着无穷的维度。人们时不时投给她的一瞥，是对她维度的丈量。太阳的白茫茫的光辉，是她维度的初现。没有繁星，繁星在午后孩子可能的睡眠中，在浪漫知青可能的记忆里。实话说，除了老鹰麻黄的翅膀和山边洁白的云朵，再没有事物在天空展开。天空，作为那个下午的苍穹，没有阳尘，没有蛛网，没有树阴或竹枝的摇曳。

对岸。太阳已经偏西。青玉、石人在燃烧，三岔子、陶家山已布上阴影。刀刃一样的山脊开始积云，开始让遥远的感官凉爽。阴沉下来的三岔子，回复了她神秘阴险的面目。守药人关上了小木屋的门，开始生火。猎人走在从老林返回小木屋的路上，肩上的枪筒里还装着镏子。陶家山的树梢在摇荡，从太阳下凡的风逗得她们够呛。

由远及近，从山上到河坝，道角里的太阳依旧满满的，辣辣的。有

穿红衣的女子从晒场边一直走到障子崖下面的人户里。红衣女子戴着草帽。晒场是三合土的，一面房子，三面柏树。房子是保管室，篱壁上挂蓑衣，隔河看过去好像一只雕。红衣女子经过的时候，那雕似乎还动了一下。红衣女子走在石墙里，从西往东，只看得见她的上半身。石墙里是沙地，长着玉米。玉米刚开始挂须。看得见一条长辫在红衣女子的草帽底下晃荡。两个男人坐在菜包石上吸烟，面前放着自制的炸弹。

急滩，软水，漩涡，沙洲。急滩礁石林立，白浪飞溅。水一旦脱离“群众”，也会变色。软水区崖岸边多漩涡，水长，水深，也更蓝。菜包石的漩涡最多，障子崖的漩涡最大。筏子，筏子，一架接一架，下滩头，闯漩涡，出软水。艄——筏子两头控制方向的活动长木——入水部分像把巨桨。浪花吞没了筏子，再吐出来；浪花吞没了筏子客，再吐出来。吐出来的筏子客只穿着红窑裤，肌肉疙里疙瘩的。筏子如火如荼过了，但只对于筏子所经过的水域，只对于筏子客自己，对于田野、村庄、社员和椿树，不过如麻雀飞过。


◎ 70 年代早些的一个下午

此岸是一块半圆的冲积平原。古老，肥沃。河床连年下切，在河岸上形成了高高的沙石坎。站在坎上看去，那个下午的河岸线无比的明朗、流畅、立体。青藤、茅草、桐树使河岸线呈现出水的质地与灵性。河流。河滩。河坎。层次分明，形态、颜色各异，但又在同一阳光的背景中统一。往上游看，高蹈，雄伟。往下游看，酣畅淋漓，曲折飘逸。有人

端着饭碗，站在峻峭的河坎，边拨饭边往河里看。看见了鱼，或类似鱼的石头。搁下碗，顺着挑水的石板路下到河边，脱了裤子，涉入水里，摸起一条白鱼或一块白石头。有人爬在靠西的河坎上，捣鼓崖上的灌木叶和青藤，脚下是万丈锈石悬崖。悬崖上的灌木摇动，隐约可见一段弯曲的脊背，类似猴子或者黑熊。

6月或7月灼热的下午，大多数人都消失了，至少是人声和人影都消失了。世界只有一种颜色，就是碧绿。秧苗是世界的主体，玉米做着陪衬。隐藏在秧田里的青蛙、癞蛤蟆和即将变成青蛙、癞蛤蟆的蝌蚪是那个下午隐蔽的存在。还有秧田深处堰渠缺口腐烂的麦秸底下的蚯蚓，卷曲的稻叶里的稻虫，田埂桑树上羽翼明亮身体发青的幼蝉。太阳还有几竹竿。田野、村庄、树木都出奇地静，空气搅合着炽热的阳光在流动，携带着鱼腥味的凉风在炽热的阳光里穿出好些暗道。

然后是石头铺就的路，石头垒砌的墙，石头围成的圈。石墙通往哪里，樱桃树就栽到哪里。樱桃早已吃过，树上只剩郁郁葱葱的叶子。两月前吐在石墙缝的樱桃核已经萌芽，正长出豆芽一般细嫩的胚。家畜家禽要么在圈里回嚼，要么在院墙上觅食，要么在竹林乘凉，姿态都十分地低调，很容易被忽略。房子是木头的，穿斗式结构。有人午睡，有人在厅房划出青青的篾条编背篼，有人在收拾锅碗。

一个女人背着喷雾器走进院墙，告诉坐在磨盘上抽烟的男人，挑水路核桃树底下站着个陌生人。男人说句“我去看看”就出去了。女人放下喷雾器，进屋在瓦缸里舀了瓢凉水，一口气喝上。女人脱了外衣，现出十分破烂的汗衫和一对发达的奶子。脚步声，说话声，男人回来了，领着个陌生人。“给这位城里大哥煮点胡豆米汤。”男人对女人说。女人望了一眼陌生人。真是城里人，穿戴、发型、皮肤。“找了几天了？这么热的天气，找到也怕臭了？”男人给城里人倒了一盅白开水。城里人坐在门

槛外面的石条上，不停地煽着手里的纸扇。扇子上有毛主席的头像和语录。“有啥子法？他要在这个时候找死，做儿女的，也只能尽到孝心。”陌生人端着开水说。间或听得见从菜包石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到底是咋个起的嘛？非要跳河？”男人坐在门槛上。“还不是因为挂黑牌游街，面子受不了？”陌生人开始喝水。

胡豆米汤还没晾凉，院墙外就有人喊“找到啦找到啦”。城里人、男人、女人丢下碗都往外跑。太阳到了陶家山。“找到了，在中脊上！”一个人拿着竹竿在院墙外喊。不用指，都已经看见了，在河中央沙洲边的浅水处，飘浮着一条红内裤。再看，就看见尸体了。腿，脊背，脑壳。匍匐的姿势。村里的人一下子都钻出来了，齐刷刷站在河坎上，对着沙洲的死人指手划脚。猫也出来了，狗也出来了，也望着红内裤，但没有出声，神态是倦慵的。太阳已经开始变色。绚烂，虚幻。对岸全是阴影。城里人正凫水过沙洲，光光的身子被夕阳染成了金黄。有人已涉水去到沙洲，正拿绳子捆绑着死人。死人出了水，被翻到正面，怎么看脸都是模糊的。阳光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红内裤在褪色。

太阳落了。起河风了。70 年代早些的这个下午开始谢幕。河坎上的人依旧齐刷刷站着，目光齐刷刷投向对岸正在包裹的尸体。雪白的布匹，雪白的沙洲。田野开始翻卷，先是桑枝桑叶玉米林，继而是秧田。一色的墨绿。

九寨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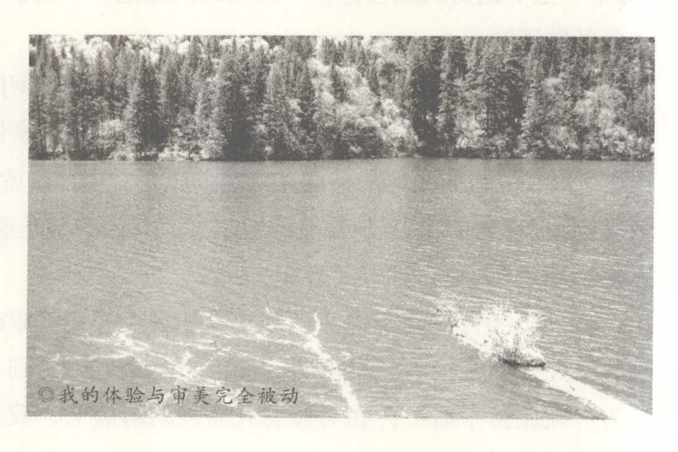
看见很多人在路边买土豆和嫩玉米，我就晓得他们是去九寨沟。他们从大巴出来，戴着墨镜，拴着裹肚子。他们是外国人，是城里人，是外省人，有精致的肌肤、表情和语言，或者有异国的海拔和性感。我在窗户里读小说，不时侧目望望。大巴发动机的声音煽动起空气，让我想起1976年的地震。地皮的震颤是能量消耗的结果，副作用却是九寨沟的不断氧化。

我从报恩寺前面走过，看见积木一样散布的大客车、小汽车和挎着照相机的虫子一样的人，就知道报恩寺只是他们顺路采摘的一朵野花，他们最终要去的是九寨沟。我所在的山这边是东线，从成都起程，途经广汉、绵阳、江油、平武，翻过海拔3300米的杜鹃山，跟白水河走，就到了九寨沟。走西线，同样是从成都起程，途经都江堰、汶川、茂县、松潘，翻过海拔3690米的弓杠岭，九寨沟在岷山的阴部以贞女的外表静候你，你得有一颗不会发着高原反应的心脏。另外的线路都不属于主线。一条是从兰州下甘南，入川，反走红军路，过草地，翻雪山，在川主寺并入西线。一条是走陕西翻秦岭到昭化，转白龙江而上，过文县，在双河并入东线。还剩一条航线，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到松潘漳腊机场落地，

再坐汽车，翻弓杠岭。

我在岷山这边，踮起脚尖看九寨沟，看见的依旧是这边的森林、这边的积雪和罂粟花，并未见到传说中的寨子、海子、女子。1988 年 4 月 30 日。碧空如洗。春阳明净和煦。我歪坐在破烂的客车里，看沿途风景。破烂的客车在毛路上颠簸，腾起漫天烟尘。春风不度杜鹃山。海拔上了三千没有美。野花还在她妈妈的肚子里，嫩芽还在她爸爸的小腿里。荒。美只在残破的雪线，只在山峰坚硬的轮廓，只在遥望甘南获得的空寂远大的湛蓝。1988 年，没有东线西线，没有柏油路水泥路，也没有三百元一张的门票和蚁拥的旅人。四十块钱的往返车费和二十块钱的吃住包揽了我的整个旅行。

在夜晚进入九寨沟，对于我的眼睛九寨沟依旧是个处女。只有从车窗透进来的寒气，让我觉出几分处女的冰雪气质，也是贞洁的肌肤的气质。我呆呆地望着车窗外的月亮。月亮依偎着墨色的山峰，参照着我们的运动和存在。我在心里默念着杨炼的《诺日朗》："经历过最深的夜 / 忍受了最残暴的光明 / 它记得鸟声灼成最后一道创伤 / 树根缓慢地扎进心里，它学会对自己无情……"破烂的客车把我载入九寨沟最为隐秘也最为纯洁的部位——日则。一间小房，几十床棉被，一排排脱光衣裳的身体。没有洗漱。身在九寨沟，却又与九寨沟隔绝，犹如与热



◎我的体验与审美完全被动

恋中的女子同室分睡。不为道德，只为时间。我居然睡着了。不晓得我是怎么睡着的。先是月亮挂在红松上，继而是月光洒在窗棂上，再就是蓝马鸡扑打翅膀。箭竹海就在身后。

1991年夏天去九寨沟，九寨沟已经是少妇了。有点火爆，有点不拘小节，也有点邋遢。衣服上的褶皱和裙边上的色斑暧昧到了色情。伍卫、雷兴霜、刘强夫妇和我。大摇大摆从沟口步行进去，在芦苇海坐下来喝酒。一瓶五十八度的沱牌，一人一口。刘强免了，要照顾妻子。雷兴霜一口喝下二指宽，由此被伍卫剥夺了喝酒权。剩下的多半瓶，我和伍卫，两人轮饮。边饮边脱了鞋，挽起裤腿，在芦苇丛里濯脚。有小鱼过来啃脚丫子，痒痒的乐。虽是旱夏，但九寨沟的水和水汽依旧很丰盛，把眼前的芦苇海养得翠生生的，把眼前的芦苇养得翠生生的。海子被芦苇分割出的线条既是河岸线也是“海岸线”，有着哈达的柔软和藏女眼波的清纯。据说芦苇海的至美在深秋，金黄的芦苇，金黄的夕阳，倒影在海子里，金黄的风，海子也是金黄的。金黄里忽闪着红叶，美有了象征。然而我目睹的是夏天的芦苇海，芦苇正值青春，茎叶都发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花蕊粘腻，散发着最纯净的生殖的气息。海子饱和，水汽饱和，“海岸”上下植物的颜色饱和，天空的湛蓝饱和，我们在这等饱和的世外之美里借酒解乏。

不到树正海都走不动了。大晴天的上午，九寨沟明白得一丝不挂，连转经轮上本来模糊的文字也分明了。我们绕过树正寨口的水磨房，在木栈道上踯躅。也有飞跑的，比如刘强的少妻，但很快就叫唤起来了——高山反应，出鼻血了。本想找点诗情画意，找到的却是麻烦。都太分明了，连阴影都是清晰的。

我们已经置身九寨沟，已经置身仙境，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和肌肤已经被九寨沟的元素沁透，却没有一个人感觉到，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在旅游手册上，在对概念九寨沟的解读上，我们偏执地认为九寨

沟只是诺日朗、珍珠滩和长海。而1988年5月的诺日朗和珍珠滩我是见过的。我花五元钱租了一双水靴，到了珍珠滩瀑布的中央，叫唤了两声。伟大的碳酸钙，与时间合谋创造了这地理的美。5月的诺日朗显得枯瘦，像病恹恹的林黛玉，怎么看也与杨炼的史诗扯不上。我转而又想，我看见的1988年的诺日朗，杨炼看见的或许是侏罗纪的诺日朗。无论怎么看，无论是冬天银装素裹的诺日朗，还是夏天苍翠间披丝流乳的诺日朗，呈现的都只有阴性的美了，区别只在北方的飒爽和南方的妩媚。

清晨醒来，天已大亮，我突然被置于九寨沟，像一出戏突然被掀开帷幕，整个人都像是新生。1988年5月1日清晨。首先是肌肤对高原寒冷但却潮湿的水汽的感觉，继而是寂静——铺天盖地的高海拔的寂静。太阳出来了，阳光洒过来，我看见弥漫的水汽，看见寂静中针孔大的空隙。从寂静里溜走的二氧化碳气已经融入淡蓝的雾霭。阳山分明，阴山分明。栈道、行人分明。松林分明，野花分明。海子分明，“海水”的层次和“海底”的沉积物分明。我从阳光里出来，走进阴影，走进我一个人的审美的孤独。箭竹海。熊猫海。五花海。日则沟高端的水域，高端的美。恰如其分的造化，精致、绝美。尚不属于景点的概念。刚开的岩路堆满石片，打造打磨刚刚开始。1988年，我二十三岁，艺术造诣停留在理念上，感觉系统原始隔膜，通透只在臆想里。在九寨沟行走，时而岩路，时而栈道，我的感官都交给了九寨沟，我的体验与审美完全被动了。美是客观的，九寨沟的物件，物件的形、意、神。那些扑腾的蓝马鸡，在“海底”静止的朽木，那些亦幻亦真的多彩的水波，那些不住地流逝却又永远不变的瀑布。镜海，诺日朗上方的水域，张艺谋在《英雄》所取的外景，广大，朴素，水与植物完美地共生。木板桥一直搭拢水磨房。我视这个名气不大但却情趣盎然的海子为西施，并为她脱离了组织。我不知道我在她的石榴裙下逗留了多久，我只知道她的广袤、丰富、隐秘和低调无不再现着一个古典美女的德行。她的前面是空前绝后的欲望——诺

日朗，但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永远只在欲望的边缘。

从与镜海柏拉图式的恋爱中脱身，我并没有产生要寻找组织的冲动。事实上，我必须找到组织才能回家。但有了如此充满细节的九寨沟，回家已算不得什么。我的冲动是要去长海。我不知道长海在哪里。等到从骑卷毛羊的藏女嘴里打听到长海，太阳已经偏西。我要到长海去，长海是九寨沟外置的肾，储蓄着纯洁的力比多，还有那棵枯干了顶梢的老人松，还有远山的残雪和悠闲的白云，都是我要去的意义所在。我要到长海去，我要站在长海的岸边，把我的身影倒在冰冷的湖水里，让感官冷却。我穿过则查洼寨，绕过成群的卷毛羊，看见了干枯的下季节海。一路上没有游人，只遇见从长海出来两三架汽车。车里有人向我挥帽，眼睛已经是看过长海的了。

无独有偶，1991年我也没有去长海。因为是自助游，沟里全靠步行。重温1988年接触过的海子和瀑布，获得的感受是寡淡的。水就是水，植被就是植被，色就是色，钙化滩就是钙化滩。刘强的妻子没完没了地流鼻血，弄得大家没了心情。在诺日朗过夜，跳锅庄，吃烤羊，与北大的几个学生谈海子，总觉得牵强附会。是否去长海让我们争论不休。我是主张要去的。我1988年错过了去长海，1991年不想再错过。雷兴霜也主张去，还说来九寨沟不到长海，好比登峨眉山不上金顶。但最终取胜的是刘强冷淡而科学的反对："就那么一个塘塘，就那么一塘塘水，一棵树，有什么好看的？"伍卫有力地支持着刘强的理论。不是用虚无的旅游观，而是集资预算可能的赤字。坐在则查洼寨木楼上看从长海回来的人、回来的车，希望他们能从长海为我带来点什么，希望能从他们看过了长海的眼睛里发现一点什么，嗅出一点什么，哪怕是几粒高原咸水湖的盐。然而我很失望，男男女女搂搂抱抱，或者仰着头咕噜咕噜喝矿泉水，像是已经忘却了长海，或者根本就没有到过长海。我喜欢看年轻的旅伴在九寨沟亲密，如花的身体在如画的风景里妖冶招摇，情愫是绿色的，欲望

是绿色，隐秘的潮湿与海子底下的静谧十分吻合。

九寨沟就是这样。翠海，叠瀑，雪山，传说，藏寨。我的九寨沟就是这样，进进出出，孤独深切的浸润和走马观花的张望，再加两次对长海的错失。什么时候再去九寨沟，这些年我时常问自己。在电视和碟片里看见秋冬的九寨沟，也能觉察到她深厚的别样的美。越来越多的人把九寨沟比作童话世界和天堂，我不觉得过分，只觉得概念。生病的日子，或者预感到死亡的时候，我格外怀想九寨沟，我甚至妄想那一天，有人将我的骨灰撒在九寨沟。悄悄地撒在镜海的灌木丛，水磨房侧边，章子怡在《英雄》里掠过的水面。前面就是诺日朗，我的些许骨灰顺水漂流，融入“牧羊人的孤独被无边起伏的灌木所吞噬”这样的诗歌里。

在去九寨沟的东线，我看见路越来越好，车越来越多，车开得越来越快。我也看见车祸，本来是去一个比喻的天堂，结果却去了真的天堂。1992 年 7 月，岷山暴雨，东线瘫痪，万人被困旅途，多辆汽车被泥石流掩埋。不少往来九寨沟的旅人，连同记忆被永远留在了岷山河谷。我目睹了旅人滞留县城的情景。惶恐。凄惨。九寨沟的风光在看过的人的眼睛里漆黑，在没有来得及看的人的想象里也漆黑。一黑黑了很多年，至少在东线。2003 年深秋，一辆从九寨沟回成都的捷达在白马路栽入堰渠，一位博导三位博士命丧黄泉。看过就死，死而无憾。我想九寨沟再童话、再天堂，也没有这等魔力。2004 年 10 月 10 日上午九时，一辆由重庆开往九寨沟的大巴在鬼招手一段 U 型弯道冲入涪江，二十一人死亡，四人失踪。我在电视里看见通过一位女警官的玉手展示的遗物：一串钥匙，两把水果刀，一支口红，一支眉笔，两个发夹，一只旅行鞋，一本《莎士比亚诗选》……我哭了，那些具体到生活细节的物件，本来是要被带往九寨沟的。本来是要描了眉，施了粉，涂了口红，搭乘环保观光车深入九寨沟，看水叹水，看山叹山，在绿箭口香糖清新的气味里吐出一连串“哇色”的。找到尸体的家属抱着尸体放声嚎啕，四位失踪者的家属，只

能在出事地点烧几张纸，点几柱香，对着黄荡荡的江水吆喝几声。

我走了九寨沟的西线。2001 年 9 月。都江堰，汶川，理县，鹧鸪山。我走的是大九寨。西线路况不比东线好，车祸更多。2001 年 9 月 23 日，一辆中巴与一辆桑塔纳相撞坠入十二米多崖下的岷江，十二人死亡，五人失踪，其中有十六位香港人。2004 年 9 月 19 日上午八时四十分，一辆载有三十五人的亚星大巴坠入二十米下的岷江，十六人死亡。还有很多。因为看九寨沟，死伤的情形可以想见。车上鹧鸪山或弓杠岭，我侧目下望，森林在几百米的脚下，四周只是草甸，点缀着残余的杜鹃花。司机或车况稍有闪失……不敢想象。粉身碎骨是唯一横在我神经上的词语。


◎正在变干的五彩池

我与诗人蒋雪峰在翻过雪山走过草地之后，来到九寨沟。2001 年 9 月 11 日。从川主寺到九寨沟，我一直在睡梦中。弓杠岭的高度居然没有让我的梦发着恐高症。然而，当我与雪峰被九寨沟的青稞酒和北京的二锅头弄得神魂颠倒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恐高症瀑发了——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着火了，倒塌了。“这个特技演得真他妈逼真！”看着凤凰卫视重复播放的镜头，我对雪峰说。雪峰已经在总统套房的大床上鼾声如雷。镜头里，警报声响成一片，人群乱成一片。不粘。是火焰和灭火剂的干冽。

九寨沟口有了都市的意味——豪华的宾馆，宽大的加油站，小气的草坪，具体得让人生烦的服务。1991 年来的时候，还是河谷，还是藏寨。在纯粹的大自然里杀出这么一绺都市，简直是煞风景。但人性注定就是煞风景的——商家要赚更多的钱，旅客要享受更舒适的服务，地方政府要“借鸡下蛋”。雪峰很担心九寨沟的水干了，沟口这些房子成为文物。窗外是瓢泼桶倒的大雨。我泊在死海一样的沙发里，好半天才听清主持人的陈述——恐怖主义、自杀性袭击、本·拉登，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后来的永远的“9·11”。九寨沟近在咫尺，长海近在咫尺，我们却没有了要去的意思。在我们的感觉中，九寨沟的美已经是一种概念，水、山、雪、树都是概念中孤立呆板的必将灭亡的元素，而美国双子星的巨创给予我们血液的震颤才是具体的刺激（说不上悲也说不上乐——我们是否还有良心）。

我天天看着进出九寨沟的车、人，看着从九寨沟飘来的云、飞来的雁，忘却了九寨沟的美。只有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我与九寨沟置于同一气候笼子，我又才能够通过气流和想象的涡轮触摸到九寨沟的轮廓。九寨沟最细腻最敏感的部分正在衰老。九寨沟真的是天堂，是童话世界，但不是我们的天堂、我们的童话。九寨沟是山，是水，是树木，是大熊猫，是蓝马鸡，是色彩，九寨沟便是山的童话，水的童话，动植物和色彩的童话。一千三百多年前，松赞干布东征松州，把甘肃阿尼卿山下强悍的河曲部遗落在了九寨沟，也把俄洛女神山的传说遗落在了九寨沟，九寨沟便成了河曲部人的天堂。不晓得河曲部人是否说过九寨沟是天堂，如果说过，一定是因为他们与九寨沟相处的和谐。我们说九寨沟是天堂，除了我们骨子里残余的一点点河曲部人的和谐意识，更多是我们对我们居住的世界的失望。

李白的青莲

青莲在修路。不晓得是修第几回。现在的口号是:“要致富,先修路。”我却以为未必。路修到哪里,哪里就完蛋。植物,动物,空气,李白。要是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生的也罢了,可毕竟不是。青莲的房子已经拆过好几次、后退过好几次了,这一次又在拆,又在退。我知道李白家的房子早已不在,剩下的他妹妹月圆的粉竹楼也是清朝道光时候重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是李白家的房子保留至今,是绝对不会后退的。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也叫李青莲。可见,青莲是源于李白的。李白家是迁移户,先是从甘肃天水迁到中亚碎叶,再从碎叶迁来青莲。李白是从几岁开始喝青莲水吃青莲大米呼吸青莲空气的。可以见得一个说着“外国话”在匡山瞎逛的少儿的李白,一个在青江边的漫坡渡垂钓的年少的李白,一个在田埂上背诵诗经和楚辞的豪迈的李白。青莲在江彰平原的西南缘,那时候,涪江和青江制造的肥沃还不曾被消耗多少,少许农家肥便足以让水稻和小麦丰收(决不是今天农药和化肥带来的那种可恶的丰收)。李白吃着近乎野生的大米饭,喝着近乎山泉的井水,呼吸着近乎哥伦布之前密西西比河畔那样的富氧空气。氐人的血液,碎叶的原初观感,在青莲流水流风的滋养下抽出诗歌的勃发枝条。一绺如云的平原,滋润、宁静甚至封闭,为一个带中亚口音的少年的羽翼提供了至

纯至真的元素（类似古希腊为丘比特的翅膀生长发育提供的元素）。

走在尘土飞扬的青莲，或者坐车路过尘土飞扬的青莲，我再无法想象那个真实的李白的青莲。李白的青莲早已破碎，被钢筋水泥和旅游战略铸成了另一个李白（我在太白碑林看见的花岗石李白——这个旅游经济的李白与唐朝李白没有关系）的青莲。从李白迁居青莲到李白诞辰一千三百年的2003年，地球公转了1295圈，自转了472675圈，可以说青莲在地球公转的1242圈内都没有多少本质的变化：飞过一行行大雁的蓝天，舒卷的白云，碧绿的稻田和粘稠但却寂寥的蛙鸣，偶尔撒一回野的江水，葱茏的匡山，通往洗墨池的洁白或被野草野花覆盖的小道……然而，从1242圈开始，特别是在第1251圈里，李白的青莲变了样，李白的青莲也被纳入了一个国家赶英超美的梦幻行动，最直接的效果是，田里的水稻无人收割，烂在了土里，匡山的树木被砍光了，山坳江畔耸立起一座座小土炉，流淌出与床前月光相悖的钢铁垃圾。从地球公转的第


◎青藤 · 阳光

1271 圈起，李白的青莲开始遭遇世界性的打量、篡改和现代化。道路在民国时候的基础上拓宽，房屋一改旧时的穿斗式木结构，雨后春笋一般成了钢筋水泥的炮楼子。泥土失缺了养分，天空被从火电厂和水泥厂飘来的黑粉尘覆盖，动植物的身体里充塞着工业元素，江水枯涸或者泛滥，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塑料制品……李白的青莲，在钱袋子的文明里突然失落，像一叶扁舟不经意被漩涡吞噬。

我第一次到青莲，青莲已经在食用日本尿素，但从容貌上看，青莲还是李白的青莲。田野广阔，视野辽远，蓝色的雾霭飘逸、潮湿。房屋紧凑古旧，竹林掩映。正值早晨，骑自行车穿越江彰平原，一头雾水。太阳被雾霭过滤，显示出月白的质感，好多的水汽附着在太阳的脸上眼睛上，制造出一种流光缤纷的忧伤和柔弱。我顺着李白走过的小路摇着铃铛拐进竹林，太阳已经露真容，将雾霭撕得粉碎，挂在树梢竹梢。坐在竹林深深的院子里，已经感觉不到李白的气味了。青莲虽是青莲，唐朝已经久远，二十五岁出走便不再回来的李白，把浓烈的个人气味留在了别处（包括诗歌）。不晓得李白为什么不再回来，是害怕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是压根就没把这么个故乡打上眼，或者是真的乐不思蜀？李白要是真有一个反叛乡情的人格，我倒会感觉欣慰，那样，古人李白就超脱了古人，做了唐朝的现代派。

青莲在李白尚未涉足之前，一度是古代氐人的领地。蛮坡渡便是一个例证。蛮是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称。2005 年 11 月 29 日下午，李白的青莲尘土飞扬，机器轰隆，被拆除了一半的房屋开膛剖肚，裸露的钢筋水泥透视出无趣的物质。民工的外科手术深入到了青莲的内部，翻腾出李白时期的红土、沙石和竹根。而古代氐人的青莲，除开昏乱的阳光、修一级公路时废弃的拱桥和赤露的河床，依旧残存着秦汉时候的地平线和天际线。红岩子还是红岩子，从蛮坡渡看过去，她的轮廓、她所能带给人的想象一定也仍如从前。只是如今的空气质量打了折扣，能见度低了，

看不到红岩子身后更远的山脉和河道了。只是江水越发枯竭，河道越显空旷、荒凉。废旧的河堤上的长茅也干枯了，孤单地举着干燥的花絮，见证着生命存在的悲凉。对岸的巨石没有变换过，巨石编织成的河岸线也不曾变换过，模样一定全等于古代氐人看见的模样，全等于李白眼中的模样（当然包含质地与气质）。传说诸葛亮来到蛮坡渡，要氐人给他让出一箭之地。氐人同意了，谁知道他一箭竟然射到了今天的平武县城（当时叫盘龙坝）。氐人走了，李白来了，李白的血管里不是流有氐人的血液吗？从这种意义上说，李白一家从中亚碎叶迁居青莲，不是简单的一次落户，而是回家。

我多次路过青莲，看见青莲。我多次想起李白。我记得洗墨池在匡山脚下的小路边。一口水井，水黑如墨，舀起来却清澈甘冽。陇西院就在洗墨池不远的树丛，李白发蒙的地方。想象李白当年跑来跑去洗毛笔，也许是别有用心。陇西院，书院，建造在李白之后。陇西，显然是对李白这个陇西人的纪念。李白在洗墨池旁边的田埂上遇见一位磨铁棒的老妪，不解，问其因，老妪说她在磨针。铁棒磨针的典故就是青莲制造。车过青莲，我总是将脑壳伸出车窗张望，我想找到通往洗墨池的小道，我想看见粉竹楼的模样，我想发现少年李白与磨针老妇的身影，我想目睹在竹梢飘摇的窗前施粉着妆的月圆妹妹……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李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抛下青莲去了别处（地理的别处和死亡的别处），甚至吝啬（慷慨）到没有把青莲装在他的诗句里带走。我看见的是桃花会、太白诗碑林和诗歌颁奖仪式——以李白的名义。人山人海涌向青莲，自行车堵塞了交通，小汽车编织起路栏。李白选桃花仙子，李白选桃花仙子！假如李白活到今天，他同意吗？同意将他当牌打吗？以诗歌的名义，背后却是铜板响叮当。我看不见李白，无论是在早晨的迷雾里，还是在晌午难得的明媚里。山坡上没有李白，只有梨花桃花，只有裸露的黄土和薄霜。稻田里没有李白，只有患稻瘟病的水稻和高压喷雾器喷洒的农药。

集市里也没有李白，集市的人都穿着Y西装Y皮衣，带着零钞和麻将技术，李白可是穿长袍佩短剑的啊，也许还戴斗笠。汽车一晃而过，一晃而过，多少年又是多少年，李白要是还在青莲也该出名了，诗歌也该在《星星》诗刊和《四川文学》上发表了——他至少该在《剑南文学》发组诗，没准还能得个市级省级的政府奖。

2003年隆冬的一个上午，我再次来到青莲，旁观一个诗歌颁奖。被一辆大巴吐在青莲的土路上，我与青莲一道承受着李白不愿承受的阳光与虚脱的双重昏暗。站在匡山背面石质的行草的李白诗歌里，无法感觉唐诗的意境意味。李白的诗歌在匡山上撕开一道巨大的伤口，血淋淋的，干燥，坚硬。天才的作品被石头水泥包装，尚尽了天分。天上的李白能感应到吗？我从石头与李白诗歌的结合部逃离，躲进果园凭吊李白的妹妹月圆。月圆的坟早成荒冢，说不定还是赝品，但也算是人与自然的终极融洽。在陇西院看别人颁奖，我几乎站着睡着了。我相信，李白和陇西院都不曾领受过如此的隆重与热闹。睡意与虚弱带给我了一个不甚真实的青莲。坐在陇西院门外的竹林边，背对盛大的现代而世俗的诗歌仪式，我感觉这个世界与李白隔得多么遥远。李海洲获奖诗歌里被现代主义包装的唐朝成分，算是对李白的一点补偿。

还是隆冬，还是隆冬的太阳，两年过后，我又一次来到青莲。青莲在修路。没有李白，或者李白离我们很远。月圆的粉竹楼就在路边，竹林掩映，从门外看进去有一点唐朝的意境。后人书写的李白诗对联已经斑驳难辨。门外划篾条的老人和玩木童车的小孩是唐朝的风景。说月圆不是李白的血缘妹妹而是情妹妹，明显带有媒体炒作的可耻。洗墨池还在山边，山还是匡山。跟随一位老妇走在通往洗墨池的草径上，本想她就是那个李白遇见的磨针人，谁知她居然不晓得李白为何人。公路正在建设，车辆驶过，噪音和尘土在干燥的阳光里显得格外散漫。我怀念青

莲早期公路两旁的桉树和窄窄的柏油路，就像我 1982 年在自行车上看见的一样，我怀念原初的田野和田野中的木房子（夏天的早上，青蛙背上的露珠非常显眼）。

在青莲，我还想起一个人，一个外乡人。他在李白之后的 1195 年来到蜀中龙州（州治在江油关，今天的平武县南坝镇）。他从扬州一路过来，感觉一定沮丧。从江南水乡到蜀西北边关，他一定有过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生理的和心理的。他过开封，入函谷关，穿越渭河平原，翻秦岭，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完全与五百年前的李白相向而行。不晓得他一路上是否想到过李白，是否轻吟过"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句子。现在，他就睡在李白的青莲。八百年了，他已经变得无形无象，已经跟青莲的泥土、水和空气融在了一起。我在匡山脚下的荒冢寻觅，明知不可能找到他的墓碑，我只想从空气里分辨出他的一点气味。他叫王行俭。我的远祖。李白走了，没有再返回。李白不晓得身后的这些。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都说了，当然得修路。路修好了，李白会回来吗？会回到青莲吗？青莲已经变得喧嚣，变得现代。寂静已经消失，唐朝的点、线、面已经消失，取代它们的是昏暗的阳光下飞扬的粉尘和火三轮冒出的黑烟，是整齐划一的水泥盒子钢筋楼子，是被工业分割、污染的残余的田野。在太白碑林，我看见花岗石的崭新的李白醉卧夕阳，守望着各种字体的诗刻。顺着花岗石的李白的视线看过去，青莲已经在远处了，淡远，朦胧，似乎不再与唐朝李白的青莲有关。

公园的后院

冬天常去的公园后院已经荒芜了，过去搭桌子的地方草已长到了半人深，春天开过花的李树只剩茂盛的树叶，李子早已一个不剩——我怀疑它们压根儿就没有长大过。荒芜被红墙围起来，显得完整，也得到突出。仔细打量那些构成荒芜的植物，都是些我极为熟悉的种类：狗尾巴草，铁旋草，刷把签，狗儿望，艾蒿。狗尾巴草属于发育疯狂之流，又一点不忽略细节，尤其它标志性的尾巴（其实是花和种子）柔顺到了性感。铁旋草则显示出雄性，腰身不如狗尾巴草高挑窈窕，草叶也不如狗尾巴草光洁滑腻，但它生命力也异常旺盛，特别擅长朝四下繁衍，而且以“旋”的姿势，力度又是铁的。刷把签刚长出来的时候还是很水淋的，顶着各色的碎花，茎肥叶硕，简直可以与发育到顶峰时期的少女媲美。狗儿望是一种纤细缠绵的藤蔓，喜欢缠着树枝一个劲攀沿，属于半寄生植物，开或紫或白的喇叭形花。艾蒿属于香草，年轻时候也如刷把签一样肥嫩水淋，也开颗粒状的花，年老又遭遇干旱的艾蒿显示出极度的衰弱，水分的缺失也是美的缺失，站在高高的板结的土坎上的老艾蒿简直就是单依靠身体风光了一辈子的女人老来的写照。

晨风吹拂的时候，狗尾巴草随风摇曳，她们的摇曳女人味实足，让人联想到村姑背上甩来甩去的黑辫子和城里女子行走起来多姿的腰身。

狗尾巴草摇曳的美里是青色的纯净，尤其在雨后的清晨，沾着露水，润滋滋的。如果我们的感官与理性背后还有荒芜，那荒芜也是青色、纯净的。铁旋草提供给我的一直都是铁的力度，繁殖，根须四下串连，根系发达得像男人之根的毛细血管。在后院整体的荒芜里，铁旋草是沉默的，它不如它的“女人们”显眼，但它却占据着几倍于她们的地盘。刷把签本质上属于童年记忆，在家乡的田埂上、荒坡上到处都站立着——它们真是站立着，不像苦麻菜和蒲公英那样一扑笼在地上——不像野草那样丛生，它们是群体的，却又是保持了某种距离的群体，有时因为距离过大，它们甚至是孤独的（这样的孤独往往发生在贫瘠的黄土坡）。我对刷把签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对园子里任何一种蔬菜，在我的家乡，它是一种主要的猪草，年年春天我们都要掐了它肥嫩的茎叶喂猪。狗儿望是一个借名，且是一个民俗意味十足的借名：淫绿的藤蔓缠树而上，长着小女人手掌一样的叶，开着小喇叭的花，藤蔓、叶子和花都纤柔得让人生怜爱，自然要驻足仰望，这一望，便成了“狗儿望”——要是这“狗儿望”是位水淋的像狗儿望一样纤柔的女人赐予的，我们生出的怜爱便也有她的份儿——那样略带一点轻佻的玩笑，包含了少许的健康的调情——调情在话语里是盐是糖，狗儿望一直向上的姿势便是盐和糖的具体呈现。艾蒿本来也是民俗，总是被端阳法定地挂



◎阳光总是在上午九点吞噬后院最后一抹阴影

在各家各户的门楣上。然而后院的艾蒿的民俗却被荒芜剔除了，跟狗尾巴草和铁旋草一样纯野，虽然身体上乳白的霜泥仍残留了屈原的悲愁。艾蒿的叶明明是绿里翻白的，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雪片，它们在晨风里翻卷，透出雪的质地。

热天的后院这样草长蝶飞，早已没有人涉足，甚至返回到了处女地的境地。时间可以让荒野开化，也可以让开化荒芜。我在冬日午后搭椅子的空地，早已被铁旋草和刷把签霸占了。铁旋草和刷把签的花籽招蜂引蝶，后院便成了一块被剪裁出的原野。在冬阳里打盹时搁脚的断墙也长满野草和灌木，墙石上生了青苔，又被狗儿望缠绕，几处露出的墙缝显得幽暗神秘，里面很可能就有给予了荒芜恐惧的灵魂的蛇。我没有看见有蛇在后院出没，但当我想象她风快地滑过草丛灌木丛将她的腰身摇曳得像一束压抑的情欲之花时，我的颤栗的震幅和震源的深度一点不逊色于真的看见。我看见过一条手臂粗的菜花蛇盘绕在木渡槽里晒太阳，当时我正走在渡槽上，突发的颤栗让我失去平衡从渡槽上栽了下去。我一直感觉蛇是荒野的灵魂，它的形体、速度、色彩、爬行方式和可能的触觉都显示出了强烈的恐惧的美。这美像是来得极为深远，它通过蛇凭借形体和速度打开的时间之门，带着侏罗纪的阳光和气息。

清晨在后院独坐，独享荒芜，思想甚至不去碰冬日阳光下的那些闲暇的光阴和光阴里摊开的本雅明、纪德或阿赫玛托娃。荒芜就在眼前，又是碧绿的荒芜，又洒满雨后纯净的阳光，碧绿里有疯狂，疯狂又是植物的沉静和个人思想与审美的沉静结合的疯狂。我一次次丢下本雅明和波德莱尔，走入荒芜深处，我期待着蛇从断墙出来，让草和灌木摇曳，让侏罗纪的气息弥漫，让沉静的疯狂发作，让荒芜在震颤中渗出剧毒的蜜糖。朝阳越过后院的红墙，把金粉的光芒洒在草丛，但阴影还绝对控制着后院，荒芜依旧潮湿、沉静。我站在阴阳界上，深情地迷恋着这片阴影中的荒芜——而阳光就要洒满后院。你如果将手从我身后伸过来，就能

摸到我的迷恋之根。

有好些年，冬天和初春，只要出太阳，我就一定要去到后院，一个人坐，读书，更多的时候是单纯地晒太阳。那些时候，心里死了很多东西，灰烬已经变冷，只是还堆积着，感悟和冥想的风吹来，表层虚起的部分四处散落。野草和灌木也已枯死，倒伏在墙边墙头，演绎着冬天的植物的美学。晒多了干纯的太阳，大爱开始在灰烬里萌芽，情形类似于夏日无雨的卷云。卷云在虚空的内心飘浮，四周的湛蓝肯定了大爱的颜色。上午是清明的宁静，往往带着南方的寒意，我在寒意里尤其明确，一个边缘的人，一个绝对的个我，有很多无法填充的空白，就像核毁之后的凄荒，可是轮廓却愈加地分明，海岸线（如果可以这样比喻）却奇迹般地曲折悠长。下午是昏聩的，连灰烬都失去了秩序，荒芜开始加重，但又不是自然意义的荒芜，多年来沉淀在血液和骨头的悲观、虚无、混乱、恐惧、沮丧甚至绝望像阳光一样映照了出来，像蛛丝贴在肉上——你感觉到附着的只是影子，不是那些物质本身。每每那时，后院的荒芜就显得特别空旷、敞亮，阳光洒在衰草、落叶和泥地上，像研磨过的井盐，漏进蚂蚁窝，渗入草根。研磨过的井盐也渗透到我的肌肤、骨头和自在状态下浮出的灵魂，身体与身体看管不严的孩子品尝到了温暖虚无的盐的美味。

就像我自己选择的人生和爱情，繁盛的荒芜衰败了，残留的尸体在隐约表象过夏天荒芜的极端之后，彻底地成了时间的记忆。我也成了时间的记忆。我蔫搭在椅子上，就像达利油画《时间》里那架著名的被软化的时钟。我已经净化为被剔除骨头、抽掉精血的时间。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挂在树上，圆珠笔滚落在脚边。我是连回忆的思想的荒芜都没有了。白日梦在纠正着感官，什么又在白日梦里滋生，我是如何也看不见了，慵懒的肉体借了温暖的阳光遮蔽了灵魂可能的萌芽——我怎么也要向你提起艾略特的那句诗：“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

尸体，抽芽了吗？今年它会开花吗？”那样的时候，荒芜不再是后院的荒芜，绿色的荒芜，也不再是“无”与“衰”的荒芜，荒芜演化成了阳光、倦慵、开放和虚无，演化成了我一个人的荒芜，就像一片拆除了栅栏的草原。宿命的，从季节来，进入一个人的内心，再投映到这个人看见的、接触到的、想象到的、冥想到的事物上，好比一场秋霜或初雪。

现在正是酷夏。我回到了开篇描述的繁盛的葱绿的荒芜，坐在丛生的阴影里，借了本雅明解析波德莱尔的刀锋，感受着荒芜最极端的力量。一个人割草的力量，一个人铲除灌木的力量，一个人开荒的力量。我发现我看见的、感觉到的、理解的荒芜已经超脱了古典的审美，抵达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对艺术冲动所施与的抵制并没有为我理会，我理会的只是自杀。自杀是荒芜开出的极端的花朵，它是个我生命的屏蔽，也是荒芜的表象的屏蔽。自杀是一门艺术，但这个艺术之后审美却结束了。在清晨挂满露珠的荒芜里，我总是偏执去想象一具倒伏的自杀的尸体，它有着不可思议的洁白和宁静，有着雕像的不朽的质感与姿态，它是完整的，是一个小小的荒芜的元素与巨大荒芜的结合，而不像海子和海明威那样与荒芜格格不入的自我放逐。没有自杀的尸体呈现于繁茂的荒芜，我开始关注他杀的蝴蝶，蝴蝶的生命结束在荒芜深处，姿态依旧是栖息的，它很小，小得几乎滋生不了恐惧，小得几乎成为不了荒芜的一个意象，就像我内心的那些死灰。

阳光总是在上午九点吞噬后院最后一抹凉阴，荒芜变得不可思议。我要走了。想象我在后院自杀之后的情形——尸体不是被荒芜遮盖，而是被荒芜衬托，酷似初春的荒芜里刚刚萌发的一棵嫩芽。

珍惜动物

红尾巴

放学早的时候，我们就去山羊盖钓红尾巴。胡玉兵（林犬娃），任九胜（犬娃子），胡玉勇（玉儿子）和我（瑞平娃）。林犬娃家就住在我们家的石墙那边，房子高大，燕儿窝的阶沿，柱头檩子都比我们家的要气派得多。犬娃子家是移民户，住在保管室旁边，三棵梨子树是标志，梨子熟的时候，总能吃到一两个，麻梨，泡，水多。犬娃子是个瘦猴，人精。玉儿子家住在林犬娃家下隔壁，是个独苗苗，吃罐罐饭，都说是他妈跟刀儿匠生的，都叫他妈“烂盆盆”。

山羊盖就在挑水路上面不远，几十丈高的锈石坎，窄条条的河岸，河段正置滩头，水流渐急，近水中有巨石，巨石背后就是红尾巴的天堂。

涨水天，河水混黄，红尾巴成群，而且反应迟缓。我们不再用钩，直接在棍子的一端绑上蛐蟮，放到水里哽。红尾巴吞着蛐蟮，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水桶迅速拖出水面，接入撮箕或木盆。哽鱼的效率极高，一次能哽几条十几条不等，大大小小的，在水桶里翻滚，麻黑的脑壳，红色的尾巴，肉鼓鼓的。要是有太阳一照，那红尾巴透亮，把眼前的一切

都映红了。也有漏网之鱼，落在水里，红尾巴摆摆游走了，它们是幸存者。但也未必能幸存——有的刚死里逃生，眨眼又被哽了起来。红尾巴不是没有智商，却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想必是我们的智商太高了的缘故。

我还是喜欢晴天，喜欢钓枯水鱼。河水碧绿，又透着蓝。不深的潭也透着蓝。放学得极早，挖蛐蟮的时候太阳还照着障子崖，江水里洒满夕阳，波光粼粼。或者是星期天的上午，太阳从陶家山一直照到锅砣漩，河风一直是凉爽的。鱼杆上绑一颗钩或两颗钩。还不是真的鱼钩。不是自己拿别针用火烧过后做的，就是在河边捡到的挂鱼钩。没有倒须。那时候，我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两颗有倒须的真资格鱼钩。我喜欢把鱼杆拿在手上等红尾巴上钩。我能感觉到鱼儿在游动，在观望，在怀疑，在接近，在吃食，（发现上当了）在挣扎……水流的感觉都能把握。红尾巴上钩了，我的心在剧烈跳荡。我要的就是刺激。钓红尾巴不能像钓石巴子或白鱼那样慢慢收杆，得迅速，将它们直接甩上岸。一条，有时两条，长长的，在阳光中划过，红红的尾巴和翅膀很显眼。红尾巴掉在石缝里，掉在沙滩上，还在拼命板动、跳荡。每每那时，我们都本能地扔了鱼杆，跑过去按。红尾巴非常灵性，把逃生的本能发挥到了极至，时不时还能成功逃生。我们一坡按下去，却是怎么也按不住，它身上的那种滑腻的黏液让我们束手无策。很多时候，已经抓住了，却又从指逢滑落。一旦接触水，便是红尾巴的天下，我们只有望鱼心叹。红尾巴折腾我们，抓住了，我们也不给它好的，拼命地拿它的头去撞石头，直至毙命。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只想彻底拥有它。

红尾巴的刺多而细，但肉质格外好，细腻，香。红尾巴的吃法有五种。炖汤，加藿香叶子和韭菜，盐放够，味道美不胜言。红烧，加酱，加姜葱蒜花椒面，可以过一把吃肉的瘾，但细刺不好处理。清蒸，全鱼，姜蒜盐都由口腔和鳃放入，表皮抹花椒面，洒醋，吃的是清香。火烧属于野吃，最为独到，剖开，加够佐料，外包南瓜叶子，在塘灰里烧小会儿，

味道属于极品。常见的吃法是油炸椒麻鱼，去内脏，拌以面粉或土豆粉，加鸡蛋清为上乘，慢火炸酥炸脆，但不能焦，连骨刺一齐吃，别有一番风味。

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两次还带了枇杷树生产队的秋亚来钓红尾巴，依旧在山羊杨盖。钓得不多，婆婆炸的椒麻鱼，拌以腊肉炒饭，味道至今都没有忘。秋亚念书不行，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了，后来接了他老子的班进了信用社。秋亚的老婆高大健壮，据说先是介绍给他哥哥的，哥哥看不上，秋亚就说："哥哥哥哥，你要是真看不上，那我就要了。"秋亚真要了，两个人一直过得很好。今天早上爬北山，我在大门口碰见过秋亚，还问候过，想必他早已忘了跟我钓过的那些红尾巴。

石巴子

要钓到石巴子，得放长线。钓红尾巴的简易鱼竿一般排不上用场，要排上用场，就得脱了裤子涉水。水里的石头都长了青苔（我们叫青衣子），光脚板踩在青苔上容易滑倒。手里拿着鱼竿，滑倒时没有了抓拿，呛几口水是习以为常。慌忙站起来，又接二连三滑倒，水珠溅了满脸，眼睛也睁不开。因此，带缠线轮盘的鱼竿（我们叫车杆）便显得特别前卫，有优势。站在岸上，将绑了坠石的鱼线簌地甩出去，要多远有多远，不湿脚就能钓鱼。但那样的鱼竿只有大人才配有。结密的筋竹子，微火熏烤，长时间的垂吊，单这工序就不是我们孩子家能做到的，更不要说制作轮盘、护线扣、购买几十米上百米的化学线了。

山羊盖有石巴子，但都在远水。大人（或者大孩子）用车杆钓石巴子，我们只有站在旁边流口水的份儿。石巴子金黄，或焦黄，肥遛遛的，穿在一条细长的麻柳枝上，在河浪（我们叫漾水）中起落。石巴子比红尾巴大得多，肉也要多，刺少，吃起来很感口。钓石巴子休闲，不像钓

红尾巴那么忙碌。放好线，把鱼杆往石逢儿一插，便只坐等鱼儿上钩。石巴子要大红尾巴好几倍，上钩的震动（我们叫阵仗）也要比红尾巴大好几倍。急抖，摇曳，如疾风吹过秋草。钓石巴子不必像钓红尾巴那样急速收竿，可以慢慢来，一提一拖，将线在轮盘缠好。石巴子是娃娃鱼的缩影，撮瓢嘴，吃东西不像红尾巴抿，而是像白鱼过吞，吞进肚子。等发现蒙骗，再挣扎，钢制的钩便深深地扎进肉里，加之钩上有倒须，简直是进退两难。倒须的发明，体现了人类的又一捕食智慧，也体现了人类身上恶毒的动物性。不是石巴子贪婪，是它们进食的方式如此。就是这种貌似贪婪的方式，注定了石巴子乃至绝大多数鱼成为我们盘中餐的命运。要把鱼钩从石巴子嘴里取出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不得不扯豁石巴子咽喉的肉，有时不得不拿剪刀做个手术。也有扯断鱼线扳断鱼钩的。石巴子也有逃生的绝招，那就是往石逢里钻（石巴子，石巴子，不就是贴在石头上的鱼么），钻进石逢，怎么也不出来，任凭我们怎样提拉拖扯。钓石巴子，牺牲最大的就是鱼钩和化学线。运气差了，石巴子没钓几条，几十颗鱼钩都报废了。石巴子以这样的方式跟人类较劲，不知忍受了多少剧痛。我们时常会在钓到的石巴子体内发现另外的鱼钩。疼痛是石巴子的，创伤却是动物和人类共同的，且无法弥补。

起先，石巴子只是山珍美味，像红尾巴一样，烧，炖，蒸，炸。我吃得最多的是炸，酥脆到了骨头，但缺一点吃肉的感觉。烧吃有肉味，而且是鱼肉味，细腻、滑爽，鱼味适中，不像海生鱼气味那么刺激。后来，石巴子变成商品了，从几毛钱一斤卖到几十元一斤。小饭馆和大餐厅都收卖，加工后价格滚翻，暴利。时兴火锅后，石巴子更是紧俏，价钱一路狂飙，一斤突破百元。石巴子烫火锅还真是绝美了。要鲜活的，剖了内脏依旧活蹦乱跳，下锅之后还做垂死挣扎。煮两个滚儿，筷子伸去，肉便开花。蘸了油碟，进口的感觉简直就是在当神仙——食欲的神仙。

自从石巴子成为商品，尤其是成为暴利的商品，石巴子的命运便可想而知。整个涪江上游，掀起了捕捞石巴子的高潮。最先还是传统捕捞法——钓。若干的鱼竿，鱼竿上若干的鱼钩，效率倍增。后来革新了，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革新。电、毒、炸。在一些小河小溪里，这样的革新尤其管用。每天捕捞五六斤，就是很大一笔钱了。在岷山丛中，在涪江河谷，每到涨水天或洪水过后，都会看见有人扛着一大捆鱼竿或背着电瓶背着帆布挎包，或骑着自行车，行进在捕捞石巴子的路上。没准挎包里还放着炸药毒药。电鱼多在黄昏，据说黄昏时分鱼都回家了，能够一次性族诛。

对于石巴子，我也是有罪的。不只在山羊盖，更是在阔达坝。1993年8月的一天，我受人邀约，去了一个叫仙女堡的地方钓了整天石巴子。涨水过后，太阳毒辣。我们过了藤桥，由下而上，以传统钓饵蛐蟮为诱饵，一直钓到人迹罕见的危险河段。收获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每一竿都能拖出一条石巴子，有时候还是两条三条。那天的运气真是绝了，在每一处看好的水域都能连续钓到好多石巴子，竿竿都不放空，以至于钓到最后，都有些厌倦了，完全失去了钓鱼的乐趣，把钓鱼搞成了屠杀。因为太多，那次的石巴子烧得特别难吃，味同嚼尸吃泥，每每想起，都要呕吐。那次大屠杀的报应是长达半年的中暑后遗症，头重脚轻，脸上没有一点阳气。

很久没有见到石巴子了，河水里，餐桌上，我有些想它们（当然不是想吃）；我知道它们过得不好，小河溪流都干涸了，涪江里一直在开采沙金，轰轰隆隆机器开过，河床被翻挖一新，柴油漂流，它们的家园沦陷，就算有死里逃生的，也会再一次遭遇电、毒、轰炸，被兑换成沾满病菌的钞票。

白片子

白片子属于野生冷水鱼，鳞甲细得可以忽略。又叫雅鱼，雅安大渡河流域居多

20世纪70年代早些时候，午后或者傍晚，总能看见有人在我家门前的大河里挂鱼。是挂，不是钓。是城里人。那穿戴，那脸面，那鱼竿。一个，或两三个。有踩在水里的，有站在干坡上的。我们叫他们“挂鱼子”。漆过的鱼竿上车轮飞转，坠子带着化学线嗖地跑到了河心。不但不急于收线，还一个劲地放，一边放一边收，一边收一边放，收放自如，要的是让鱼钩划过更多的水域，遇见白片子，挂上，再拖出来。洪水过后，我们总能在石缝、灌木丛、漂木上捡到挂鱼钩，还有化学线。挂鱼钩生了锈，一串串，但钢性依旧地好。化学线缠成一团，打了死结，没有人能解开。钢钩在水中漂游，白片子也在水中漂游，遇上，钢钩刺进鱼身，可以是任何部位，利用河水的冲力和挂鱼子的拉力，钻得更深，挂得更稳。钢钩没有目标地在水域探寻，便能中的，可见白片子之多。

挂鱼子在岸边挂鱼，筏子在河心漂流，筏子客扳着艄冲着浪，年轻媳妇在河边洗菜洗衣，那该是一幅多么美的画卷。

也有钓鱼子。多半还是城里人。多半是星期天。多半在枯水期。他们不像我们用蛐蟮做鱼饵，而是用浅滩石头下的水虫。他们的鱼竿更加漂亮、华丽，精密的车轮和护线扣，五彩的叶片，高级的化学线，生漆漆过或丝带缠绕过的竿，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再是鱼竿，简直成了艺术品。他们看好一片水域，放线，把鱼竿固定在石缝或沙滩，然后点一支纸烟，悠闲地吃。有的还摸出袖珍收音机听。他们连固定鱼竿码的石堆都是漂亮的。鱼竿颤悠颤悠，我们在一旁急，他们不急，那是河水冲刷鱼线造成的，并没有鱼上钩。鱼真上了钩，鱼竿急促地剧烈地抖动，他们也不急，

慢慢地放线，收线，就跟在农机厂制造零件或者在税务局做账一样。

我没有看见挂鱼子或钓鱼子弄到手的白片子，但肯定有，看他们从不离身的胀鼓鼓湿漉漉的帆布挎包就晓得。我看见的最多的白片子是在我们家的水缸里，十几条，脊背都老黄了。下午放学回家，揭开水缸喝冷水，一下子就看见了。问在门口做针线的婆婆，婆婆悄声说，你老子跟胡玉国几个炸的，可别说出去哦。我知道炸鱼，雷管、火药、导火绳（我们叫引线），装置在酒瓶里——墨水瓶也行，甚至不用瓶子拿塑料布（我们叫油绸）包裹也行——再绑上石头，以便沉底。炸一次鱼一般要准备四五炮，难免有放空的。也有弄七八炮上十炮的，狂轰滥炸，弄得好长的河段都不得安宁。恰逢农业学大寨，炸药雷管很容易搞到。二龙嘴包丫丫，菜包石，短坑，是最好炸鱼的。胡兴德用红岩墨水瓶做了炸弹，丢在二龙嘴包丫丫，炸出了晒簟大一片白片子，浮在水面上，跟倒了一背玉米棒子似的。

国家不准炸鱼，但炸了也没人管。听见大河里轰隆轰隆响，只要往河边跑，准能捡到白片子。几十里几百里的涪江上游都炸鱼，即使好几天听不见炮声，也照样能捡到。我第一次捡到的白片子就有好几斤，在水磨坊的堰渠里，鞋子都没打湿。那时我只有几岁。后来经常在河边放驴，经常捡到白片子。有的沉在水底，白糊糊的，脱了裤子涉去，一摸就起来了。有的漂流而下，白白的肚皮，黄黄的脊背，跳进河里，拿双手去捧，就进怀里了。生产队在江边砌鱼嘴，漂下来好多白片子，男女老少都脱了裤子去笼，场面该有多么壮观、经典。每到春节，河里的炮声更频繁、更放肆，白片子也更多。拿着捞鱼的网子（长长的竹竿绑着钢筋做圈的麻绳网），站在缓水处等着，一条，两条，就这样捞下去，都是肥鱼，看它白玉一样的嘴唇、油菜花一样的脊背和桨一样的尾巴，无与伦比的精致。有一年春节，父亲在短坑捡到好几条老白片子，大得像猪，胡子黄澄澄的。只可惜卖的卖，送人的送人，没饱到口福。

也有饱口福的时候。婆婆将鱼剁成块，拌上麦面，有时也拌土豆粉，加一两个鸡蛋，下到油锅里炸。微火，炸透、炸酥。可以直接吃，可以加姜葱蒜花椒再炖，也可以放在饭锅里顺便蒸一会儿。哪一种吃法都是美。就是夏天，炸好的鱼也可以存放两三天。放学回家，时常在睡房的大木柜上看见炸鱼块，装在一个大筲箕里，面上搭着包帕。虽是冷的，偷几块吃上，格外解馋。偷得的东西吃起来，味道总是特别好。浓郁的鱼味，集合了高山河谷的全部精华。也可以熬汤。喜欢藿香味的可以加点藿香，加韭菜，姜蒜花椒自然少不了。熬好的鱼汤雪白，营养几乎是颗粒的，不仅可以尝得，而且能够观感。红烧瓦快鱼比较刺激，肉感，麻辣烫；加豆瓣酱加豆油，大蒜可以略多，下酒下饭都适宜。那时没有味精，但味道照样的鲜。清蒸也独具风味，佐料都放在剖开的肚子里，出笼后肉是肉刺是刺，主调是清香，很纯的高海拔的清香。蘸醋吃，一点不亚于现时的基围虾。后来白片子像石巴子一样成了商品，卖到了餐馆和火锅店，吃法自然多了，豆腐鱼，太安鱼，乌江鱼，但味道都不及旧时的好。

在河雾弥漫的早晨，或者在夜幕降临的黄昏，总能看见打鱼子在撒网。撒网，拣网，再撒，簸箕大一片。在齐腰的水里。收网显得特别的小心翼翼，把网绳压得极低，一边拖一边拣，有没有鱼手上是完全能够感应的。白片子被罩住，渐渐收关，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危险的处境，还在戏水，还在觅食，还在做爱或产卵。等它们晓得，网口已经被封住，成了瓮中之鳖。打鱼子多是有头脑的人，想玩、想吃、想钱，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好吃懒做一类。我们那一带最有名的打鱼子叫何福权，外号何懒人。我见过用拦河网打鱼的，两岸都有人，提着网顺流而下，渴望把大河的鱼一网打尽。那气势，那奔跑的速度，涉水时那不要命的劲头，人见了都畏惧，别说白片子了。拦河网，拦住整条大河的网，白片子看见这三个字，也会全身发抖。

白片子属于国家保护鱼类，但从未得到保护。情有可原。大熊猫、藏羚羊、盘羊都没有保护好，何况白片子呢？1983年秋天，洪水冲毁了岷山深处虎牙公社的农药库，白片子（包括涪江中的所有生物）遭遇了空前的劫难，死亡过半。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采挖沙金，从人工到机械化，摧毁了古旧河床，填充了深潭漩涡，让已经元气大伤的白片子流离失所，濒临灭绝。像捕捞石巴子一样，捕捞白片子也是暴利，而且容易上手，数量可观。钓、炸、电、投毒、网，方法常见。炸、电、毒，就是斩尽杀绝，“宁可错杀一千，决不让一个漏网”，漏网的可是钞票啊！白片子的遭遇就是涪江的遭遇。涪江的遭遇也就是白片子的遭遇。白片子和涪江的遭遇都是地球的遭遇——我们人自己的遭遇。

我很久没有吃到白片子了。早先上面来了客人，单位招待，总要点一个特色菜，白片子。两三个青年白片子躺在景德镇的瓷器里，眼睛灰灰的，很是无辜。每每那时，我下箸的手就有些发抖。记得一位副厅级客人在吃过白片子之后，从桌上的残物中找出一把像十字架的骨剑，很是感慨地说，这十字架便是辨别雅鱼真伪的标志。他收藏了那个十字架，说以便再吃到雅鱼时辨别真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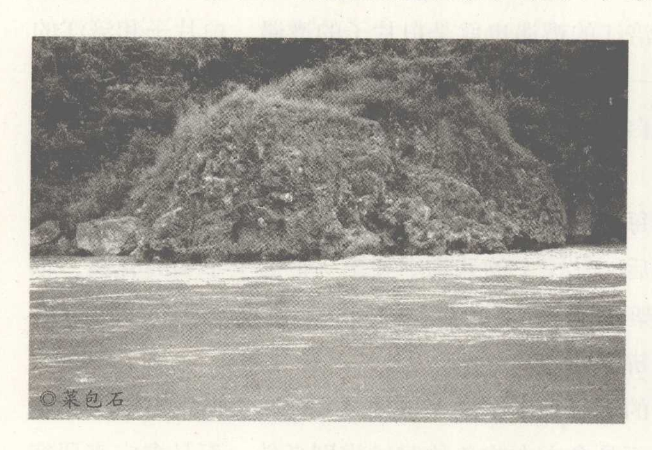
白片子的脑骨里的确有个十字架，也许是其他鱼类所没有的，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是拿它在吃鱼的时候辨别真伪，而是拿它来研究这个灭绝的物种。

娃娃鱼

不知道娃娃鱼还叫大鲵。说是两栖动物，但我们见到的都只是在水里。等在陆地上见到，早已是被捕的了，躺在乱石窖或檐沟里，脑壳上扎着镰刀，一身血泥。

娃娃鱼牵涉到三个人。第一个是胡清林。生产队的贫协组长。结过两次婚，有九个儿女，老大早当妈了，老幺还在耍尿泥巴。胡清林总是戴着斗篷，披着蓑衣，站在河边的石头上收钓鱼竿。每拉一下，钓鱼竿就弯一下。胡清林的钓鱼杆是用百里挑一的筋竹子制作的，根粗梢细，还吊在火炉上熏烤过，结节密集。记忆中的胡清林永远只是个背影。没有脸。烟雨朦胧里的背影。

胡清林捡娃娃鱼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娃娃鱼。胡清林在岩背后修堰，顺便在菜包石放了钓鱼竿，歇气的时候去收。我们小孩子跟去看热闹。胡清林的钓鱼竿上没有鱼，却遇见了一条娃娃鱼，像一根木头，足足有一个娃娃长，在河浪（我们叫漾水）边喘息。看见娃娃鱼，胡清林从腰间取下镰刀，而且是两把。我们小孩子自然是又欢喜又害怕，我们听说娃娃鱼是要吃娃娃的。胡清林不出声，我们也不敢出声。我们看见胡清林举起刀，朝娃娃鱼的脑壳扎去。可能是娃娃鱼的身体太滑腻，或者是胡清林握刀的手太晃悠，刀嘴啄滑了，但没等娃娃鱼反应过来，胡清林左手里的那把刀已经深深地啄进了娃娃鱼的脑壳。


◎菜包石

胡清林找来绳子，把娃娃鱼拖到了岩背后，一路的石头和蒿草上都沾了娃娃鱼的脑浆和血。

第二个是我自己。娃娃鱼不像我们见到的一般的鱼，也不像我们想象到的不一般的鱼。娃娃鱼身体扁长，眼睛小，四肢短。脚掌脚趾非常类似婴儿的脚掌脚板，只是颜色深。娃娃鱼有腿，但短得可以忽略。娃娃鱼有一张撮瓢一样的邪欲的嘴巴，嘴巴里有和它的肉一样雪白的牙齿。

涪江泛滥过后，总有人捡到娃娃鱼。在沙地边，在稻田里。大都还是活的，只是昏迷了，叫泥浆呛昏的。涪江发大水的早晨，父亲揭开我们被窝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起来到河边转转，捡一条娃娃鱼也好！"父亲不止一次捡到过娃娃鱼。大小不等。黑不溜秋躺在檐沟里。等空闲了，烧了开水一烫，皮就会像污垢一样脱落，现出雪白的肉。多年后在星级饭店吃瓦罐炖的娃娃鱼，才知道吃娃娃鱼是不能剥皮的，好东西尽在皮子里。

我捡到娃娃鱼那天涪江并没有发洪水。傍晚。河水碧蓝碧蓝的，微微带一点粉。河面残阳点点。我在挑水路读书，抬头就看见了娃娃鱼。在浅浅的河滩上，在雪白的浪花里。比胡清林捡到的那条娃娃鱼还要长。依旧像一根木头。我没有去惊动娃娃鱼，而是回家拿了镰刀（也是两把）和绳索。一刀下去，就搞定了。来自胡清林的经验。

也像拖木头一样把娃娃鱼拖回家。娃娃鱼在檐沟翻滚，满身是黏液和血浸泡过的尘土。两个小孩从我家苹果树上下来，苹果滚落一地。我陶醉在意外却又巨大的收获里，宽恕了他们。

剖娃娃鱼的时候，发现娃娃鱼的食管里扎着一枚特制的钢钩（像老式秤钩），塞着一团化学线。我在挑水路钓过娃娃鱼，而且被咬断过钓钩，也许那钓钩正是我的。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是谋杀？

揭开柜子，拿脑袋抵着盖板，手便摸到了筲箕里的娃娃鱼肉。油炸的，特别大块。柜子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盖好柜子来吃娃娃鱼肉，厅房里有了婆婆的脚步声。停止咀嚼，娃娃鱼肉含在嘴里，刺也含

在嘴里，恐惧和美味也含在嘴里。

娃娃鱼肉滋补，营养价值极高。吃法类似白片子。我们多是炸，拌面粉淀粉。或干吃，或清蒸，或当酥肉炖。也红烧，加自制的辣酱，味道大，肉感。熬汤也行，但肉太多，太清淡，不合我们川人口味。娃娃鱼的上等吃法是用瓦罐微火清炖，除了加调味的姜蒜花椒，还加天麻虫草等名贵药材，没有名贵药材加当归党参也可。主要喝汤。河里的精华和高山的精华同在，味道和营养都属于极品。

第三个是我二哥。二哥钓娃娃鱼不是饱口福，是为了钱。二哥钓娃娃鱼的时候，娃娃鱼已经卖到二百块钱一斤了。吃一斤娃娃鱼，等于五十斤猪肉。二哥看《少女之心》耽搁了学习，没考上大学，又瞧不起当乡干部，就在家里开拖拉机。二哥不学好，跟人偷鸡摸狗，进了几回局子，把胆给掂了，拖拉机也不敢开了。二哥成天在家里看武侠小说，父亲看不惯，给二哥娶了媳妇，分了家。二哥有了家，有了儿子，自然没了单漂的那份轻松。二哥想钱把脑壳都想尖了。

二哥起先钓的不是娃娃鱼，是白片子。白片子十几元一斤。钓、挂、网、炸。都来。二哥偶然钓到了一条娃娃鱼，卖了七八百块。得了暴利，便专钓娃娃鱼了。二哥钓到过好几条娃娃鱼，但都很小，最大的不过三斤。二哥对我说，啥时候整一条你那么大的就好了。自然不是我人这么大的，是我当年捡到的娃娃鱼那么大的。十九斤三两。可是有三千八百多块啊！

二哥没有整到我那么大的娃娃鱼，却又一次把自己整进了公安局。不是因为捕猎珍稀保护动物，而是因为破坏防洪堤。二哥在挑水路的渔嘴下面钓到了娃娃鱼，被人发现了，都去钓，二哥一气之下扔了炸药包。

二哥本来就瘦，从局子里出来，就更瘦了。二哥在局子里坐了七天，大哥找到派出所所长才把他取出来。在外地做生意的妹夫见二哥瘦成那

样，就让二哥到他手下打工去了。二哥走后，我便再没有看见过娃娃鱼，再没有吃过娃娃鱼。

大熊猫

小时候，常听人说大熊猫如何可爱，如何珍贵，读初中时在县城外的熊猫馆第一次看见，却是大失所望。脏兮兮的毛色，迟钝的步态，悲伤的表情，让我想起刀儿匠家那个吃蛔虫的瓜女子。至于国宝级别的珍贵，我自然是怎么也看不出的。把对大熊猫的第一感觉讲给同桌的女生，女生撇撇嘴说："你可以说大熊猫莫灵气，不美，但你不能说它不珍贵，一只大熊猫能换一架波音飞机，一只大熊猫能与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女生举的例子是日本和一个叫爱尔兰的国家。女生的知识真渊博。我猜女生的父亲一定是在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工作。多年后，当我在地方志上查到我们的确给日本赠送过一只叫伟伟的大熊猫、给爱尔兰赠送过一只叫娇娇的大熊猫时，我真为我当年那个同桌渊博的知识叹服。

像羊肚菌和青稞酒一样，大熊猫也是我们的出产。我们说我们这儿是大熊猫的故乡，既有一种广告意味，又有一种骄傲。殊不知，也意味着我们这儿人不咋样，要靠大熊猫来撑门面。我们这儿叫岷山，作为大熊猫的故乡要比作为我们的故乡久远得多。过去，这儿的人把大熊猫叫"白熊"，把自己的部落叫"白熊部落"。1896 年，一个叫大卫的法国传教士在这儿捕获了一只"白熊"，并制成标本，经英国动物学家托马斯鉴定，确认为大熊猫。

大熊猫吃箭竹。箭竹是我们这儿常见的一种高山竹子。小时候，我时常看见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上山砍箭竹。不是砍了喂大熊猫，是拖回来编篱笆，或者插豇豆架。在岷山里，过去的木头房子大多是用箭竹编篱

笆的，还有编楼板的。我就非常怀念旧时用箭竹编篱笆和楼板的房子，那柴火熏烤之后的颜色，犹如青铜一般。1975 年，岷山里好些箭竹开花枯死，一些大熊猫为了觅食不得不向龙门山迁徙。为此，人们后来还唱过一阵“竹子开花了，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真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大熊猫温柔乖顺，不喜攻击，又是地球上动物中罕见的活化石，因而具有非常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大熊猫仅有我国的西南、西北几个地方出产，所以被称为国宝。因为是国宝，所以要重点保护。因为是国宝，便有人要打它的主意。我不知道就大熊猫自身而言，人类的零距离接触是福还是祸。我们为大熊猫好，我们让大熊猫下山、进城、改行，飘洋过海，甚至改变生活习惯，改变传种接代的方式。我们征求过大熊猫自己的意见吗？我们考虑过大熊猫自身的感受吗？

再一次见到大熊猫是 1986 年的夏天。我在岷山深处的王朗自然保护区小住，黄昏散步，常遇见大熊猫，在泉边汲水，在树上攀爬，自由自在，没有丝毫的害怕。置身大自然的大熊猫是可爱的。虽然漫不经心，却不乏孩童的天真与机灵。

我从不进城市的动物园。我害怕动物园里那一双双悲伤的眼睛。但前不久，我破例带女儿进了一次。动物园里有猩猩、猴子，有狮子、老虎，自然也有大熊猫。猩猩和猴子快要进化成人了，有些自作聪明；狮子老虎本性难改，除了愤怒依旧是凶恶；只有大熊猫坐在一株人工种植的竹子后面，满目悲伤。

我们这儿不时有人猎杀、倒卖大熊猫皮张。当然也不时有人翻船。不知有多少大熊猫惨死于盗猎者罪恶的子弹。但一张 1990 年代的旧布告，清楚地记载了一个叫梁永政的广东人和一个叫何光海的湖南人倒卖大熊猫皮张被处极刑的案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的餐桌上，最流行的一句玩笑就是问你吃过大熊猫肉没有。当然，没有谁敢声称吃过。连傻瓜都知道，吃大熊猫肉意味着什么。这玩笑差不多能让人看见人头落地。然而，在前不久的一个同学会上，我听见好几个同学都说他们吃过大熊猫肉，绵绵的、略带酸味。70年代初期。炊事员买不到菜，就买了一坨肉。吃过才晓得是大熊猫肉。那几个同学都是来自岷山主峰雪宝顶脚下的。

盘羊

盘羊的角粗大，向下弯曲，多呈螺旋形。

我不知道盘羊属牛还是属羊。但无论属牛属羊，盘羊都只有任人宰割的命运。温顺的牛羊，总是嗜血成性的肉食动物（包括我们人类）最容易捕获的。

我从未见过盘羊，不管是活是死，但我没少吃盘羊的肉。在岷山里，几乎人人都吃盘羊的肉。在岷山里，吃盘羊肉跟吃猪肉牛肉没什么两样。每到腊月，许多人家的火炉上熏挂的都是盘羊肉（当然还有别的野生动物肉）。有一年涪江发大水，我去上游一个县采访，县长招待我的就是盘羊肉。炖的，烧的，炒的，拌的。还是夏天，县长家的阳台上已经挂满了野生动物肉。如果大熊猫肉好吃，我相信他是敢吃的。盘羊的肉非常细腻，有种冲人的山味，但那是一种精华的香，就像极品海鲜一样。盘羊的肚子是好东西，能治胃病，适宜清炖，焙干碾成面儿吃，效果更好。盘羊的蹄子是上乘的补品，微火炖上十几个小时，又粘又软，透着高海拔百草的滋味。盘羊长年在高山奔波觅食，蹄踏天麻虫草等名贵药材，药力透进了筋骨血肉。我有个堂兄在岷山腹地的藏乡工作，每年春节，总要请我去他家吃一顿盘羊肉。偶尔吃不完还要兜着走。我就是在堂兄家

吃到盘羊蹄子的。

和盘羊相比，大熊猫的悲伤就有些贵族化了。大熊猫悲伤的是不自由，而盘羊看上去倒是自由，生命安全却得不到保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自由，还是自由吗？在我看来，盘羊体验到的已经不仅是悲伤了，而是恐怖和痛苦，是悲怆。

我没有亲眼见过猎杀盘羊的情形，但我认识好几个盗猎者。他们中有以之为第二职业的农民，有以之为爱好的官员。我有一个姓袁的远房表哥，经常在农闲上山打盘羊。小时候，我们家的案板上总是时不时地冒出盘羊肉来。袁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冬天爱穿件短袄，扎条葛藤，短袄像是从未洗过，黑得发亮。我至今都还记得袁表哥扛杆歪钩子炮火走进我家院坝的模样。袁死了好些年了。死于车祸。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打死的盘羊找到他了。我还听说，岷山东坡的平武，过去有一个给县委书记开车的司机爱打盘羊，每次出车下乡，车一搁，便找当地的猎人带他进山了。每次都大获全胜。上山打猎，见者有份，战利品自然是归包括书记在内的人共享。而绝妙的是，每次出车回去，这嗜血的司机都要写一篇有关保护盘羊的报道在当地日报上发表。我就读过一篇他作的美文，名字叫《秦书记冒雨帮小盘羊找妈妈》。

盘羊大多生活在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草甸，打盘羊自然要爬很高的山赶很远的路。听我那位已故的袁表哥讲，为了打到盘羊，有时要赶好几天的路。说是赶路，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路，纯粹是在老山林里瞎钻。打到盘羊了，也无法马上将盘羊带回，得就地解剖，架起大火，将肉熏个半干。我们当地人把这半干叫“柔萎子”。路实在是太遥远太艰险了，就是“柔萎子”的盘羊肉也无法多带些回去，只能选蹄子肚子一类的好东西带。打一头盘羊，能带回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我在电视上看见过盗猎者捕杀藏羚羊的情形。许多被杀的还是怀孕

的准妈妈。捕杀盘羊的情形一定非常类似捕杀藏羚羊的情形。

我们可以想见人们追杀盘羊的情形。杜鹃花开着，雪线还在头巅。只有喘息和脚步声。偶尔还能遇见罂粟花。枪响之前，或者之后，都是大山的沉寂和山泉的呜咽。不及康熙围猎的热闹，但血腥却是过之而无不及。嗜血者大多嗜血在心，也有嗜血在嘴的。枪响之后，嗜血在嘴的立即扑赴上去，抱住身体未寒的盘羊，从弹孔贪婪地畅饮着鲜血。我们可以想见捕杀者夜晚在山岩下解剖盘羊熏烤盘羊的情形。匕首的白光、满手的鲜血、流露在肥厚的嘴唇的快感，远处老盘羊的咆哮、小盘羊的哭喊。

就是今天，在我们县城，仍有秘密兜售盘羊肉的。他们从岷山深处来，与酒店、餐馆直接交易。交易的货都是用编织袋装的。到了冬天，有人甚至用小四轮拖拉机运货出山，再分散销往绵阳、成都。春节期间，盘羊肉是岷山里大多数家庭桌上必备的下酒菜。政府也在打击盗猎盘羊的，但政府官员没有不吃盘羊肉的。前不久，我陪几个朋友去岷山采风，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为我们接风，桌上就有好几个花样的盘羊肉。

在白马寨子里听酒歌，听得悲怆的时候，总感觉像盘羊的吼叫。我不曾听见过盘羊的吼叫，便也不知道盘羊是如何吼叫的。假使盘羊吼叫起来真如白马人酒歌一般悲怆，那么它的悲怆一定是有来头的。

上游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习惯了坐在上游想象河流流经山谷的样子（过去洁净、丰满、神秘，现在污浊、枯瘦、残破），想象河流流经平原和丘陵的样子。我把河流想象成一根竹子，城镇就是竹节，支流就是竹枝。在国家地图上，这条河流看得见的竹节只有平武、江油、绵阳、三台、射洪、遂宁、潼南、合川；要是在省份地图上，还能看见更多诸如水晶、南坝、响岩、治城、青莲、丰谷、芦溪、金华这些小节。涉及文学的是青莲和金华。一个李白，一个陈子昂。两个唐人。

古蜀人是不是这条河流最早的子民不得而知，但后来的氐、羌、藏、汉都是确知的。河流与氐人的亲密有史为证，古时的江油关（现在的南坝）便是他们的废都。据说上世纪随处可见的蛮坟并非古氐人的墓葬。四壁是雕花的石板或青砖，偶有白骨残存。不是氐人的墓葬，又是谁的墓葬？

无论是在氐羌人眼里，还在古蜀人眼里，这条河都是永恒的河。雪山，森林，草原，充沛的降雨降雪，你叫她怎样枯竭？三月稍有春旱，大小雪山融化的积雪便给予补给；就是夏旱秋旱，茂密的森林也会有汩汩山泉入注。先秦时候，两岸已经繁荣，上游对河两岸看得见在清风中摇曳的桐油灯，白天有山歌对唱，下游集市轮廓分明，枯水期江面木船穿梭，挑箩筐的布衣人的倒影在水面显得异常清晰。羊肠官道，岩路和栈

道交替，穿越一片片森林。每个坐滑竿（无法坐轿子，路太窄）的官人都有一个警卫排。野兽凶猛。上午，太阳照着北山，滑竿和人时而在阴影里时而在阳光里，裤腿上的露水到中午都不会干。寂静是大山大河的本色，河水在哗啦拉甚至轰隆隆淌，但就是寂静。午后太阳照到南山，河谷起风了，寂静里多了阴森。“老爷，吼一曲！”警卫排长说，“吓唬吓唬野物。”老爷的嗓子真不赖：“七妹儿哟坐的山又高哟，莫得菜吃哩掰枕苞……”山歌响起，对岸树丛开始摇动，就是看不见东西。偶尔有背背子的，三五成群，汗在脸上修起了河道。手头拄着拐耙子，累了扎一拐，嘴里吆喝一声，“我想他幺妹儿哦”。不是怨愤，是安逸。

二十年前，我开始思量一个词，今天早上还在思量。河床。我明白了，河床不是河水睡觉的地方，河床是河的尸体。这些天，我老是坐在河边，看挖掘机在河床挖掘，看十轮卡车把河底子里的沙石拉到一个人工搭建的高台淘洗。淘金。我没有看见金，但有人看见，黄灿灿的，大粒大粒的。我看见的是被宰割的河流，水被双规，河床赤裸，机器轰鸣。我看了二十年。在上游。

在我的记忆与想象里，河流从来都不只是一条河道与一河江水，还包含了河道两岸的桐子树、桤木树、麻柳树、水麻叶、锁



◎上游

眉草、羊巴莱、大青石、锈石坎、黄土盖和山崖，包含了江水里的白片子、石巴子、红尾巴、刺磕巴和娃娃鱼，甚至包含了洪水中的磨房、残阳下的木筏和筏子客、河边淘菜清衣裳的村姑、黄昏里涉水撒网的打鱼子、烟雨里披蓑衣戴斗篷的挂鱼子和钓鱼子。乳白的水雾，黛青的山影，追逐流水的孤雁和水鸭，牧童打出的一长串水漂，男子在道角或者胡家坝长声吆吆唱起的情歌……都属于河流的谱系。

我早先看见的河流还是古蜀人古氐人感觉与观念中的河流。永远的河流。潮湿，紧密，粘腻。润滑，肥沃，完整，暧昧。河岸线延伸出去，是水的韵律，流畅的美只有年轻女子的腰肢可以比拟。润滑在河风，也在岸上的树木和野草，也在两岸女子的脸蛋和手板。肥沃在冲积而成的田地，也在石墙上的瓜藤、沙地里的落花生、土坎上的狗地芽和苎麻丛的癞蛤蟆。暧昧在雨季更在雨后的傍晚和黎明：江水微涨，齐刷刷的河雾。村子浸在河雾里，晚归的人畜浸在河雾里，菜包石和牛心山浸在河雾里，捞柴的人浸在河雾里，看河大水涨的眼睛也浸在河雾里。

我叙述的河流至少有过千百万年的黄金时代。人类还在进化的路上，与河流共生的还只有动植物。河道是造化的，在极高的位置；河岸线是造化的，散发着硫磺的气味，大颗的金子在浅水里闪耀；水之纯美不亚于今日九寨沟的水。偶有淤泥冲积的荒野，乔木灌木掩映着江水，野花在自我欣赏过后悠然凋落。

一个夏日的午后，有人遇见了河流，抛一个石子，砍一棵树，打一头黄麂子，搭一间茅屋，烧一块火地，撒一把萝卜种。人在河边行走，不时被野兽吃掉。铁对于野兽是一种威胁，对于河流却什么都不是。一小块铁能做什么？搭一座桥是不可能的，拧一条铁索也是不可能。只有艺高胆大的人一辈子能过到对岸几回。猎杀对岸的某一头肥兽，采摘对岸的某一枝野花，霸占对岸的某一个女人。泅水或跃河。葬身鱼腹者居多。人知晓了自己体力的局限，就遍尖脑壳训练自己的智力，于是有了溜索、

藤桥、木桥。有了木制滑轮，有了木制坐椅或篾筐，人骑在木椅上或蹲在竹筐里，哗啦啦就过河了。

我记得的淘金有四种：摇河浪子，钻槽子，抬明窝子，翻河底子。

摇河浪子就是直接取河岸上的沙石淘金。1980年暑假。我和二哥。天不亮就起床。我背摇篼、撮箕、提桶子、耙子、金锤金盆、木马，二哥扛金门。清早凉快。二哥挖松板结的沙石，我捡石头。二哥支门，我站在旁边看。二哥舀一提桶子水，往金门上冲，看金门的平顺陡缓。淘金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体力体现在挖、刨、运、摇，技术则无所不在，但主要体现在寻、摇、出三个步骤。金隔一层纸，是行话也是古话。金是水流带来的，水的灵验决定了金的灵验。很多时候我们淘到了好金，正欢喜，突然就少了、没了。下门、出盆是淘金的最后两道工序。下门得先舀水把金门上的毛沙冲掉，再把金沙接进金盆。多是二哥冲水，我接盆。很多时候，二哥冲掉毛沙，并不急着下门，而是走到门前躬着身子看门齿里的金。“这儿有一片！这儿有片！”二哥指着金给我看。我也在门上找，找到了也叫：“这儿有一片，这儿有一片！”二哥沉着，取出小竹筒打开，拿指甲蘸了金放进去。蘸金前，准要把指甲伸进嘴里蘸牙花。我听见过金子掉进竹筒的声音。接了盆，二哥出金，我站在旁边看。出盆真是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活路。手在金盆边抖啊抖，水在金盆里荡啊荡，沙子除


◎淘金

去了，金子浮现出来，细的如玉米麸，粗的像辣子米，在钨砂边上蚂蚁一样跑。1980年整个暑假，我跟二哥都是在河边度过的，收获是两个人的书学费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夏日的早上太阳升得快，好在我们有山的阴影。山影明晰得像块青纱，潮湿的河风吹过有种丝绸的滑腻。

我和二哥试探性的摇河浪子变成了全民性的摇河浪子。从锅砣漩到挑水路，到三杨盖到龙嘴子。金门齐刷刷支在水边，金锤叮叮当当啄着青石。鱼在深水处打望，不晓得发生了什么。1981年大洪水过后，短坑里出现了一公里长的金沙带，有放牛娃抓了一把去淘，淘得葵花米大的八颗沙金。

摇河浪子摇出了更多淘金的话题，摇出了更多深埋在时间里的有关河流的话题。瞒天过海是最具传奇的一个。Long long ago，河岸线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流畅、原始，锈坎上的桐子树和水柳比我记忆中还要葱郁。对岸人户寥寥，夏日的苍翠像海子一样迷人，而冬天的白雪又将它衬托成了荒原。村人拿各家的棉被棉衣堵水，把槽子开到了河底，淘出一碗碗的金子。槽子由此岸开到彼岸，在河底形成密集的网络。打桩、架厢、抽水是必要的工序。河底是锈板，坚硬如水泥圈梁。我们后来钻槽子看见的黑色楠木，便是瞒天过海的遗证。楠木表面漆黑，略微腐朽，但里面完好坚硬如铁。瞒天过海也有瞒不住的，发生透水事故，人被埋在河底，几个或一群。看见一堆堆的白骨，我就想到“矿难”发生的情形。传说胡宇林老汉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挖瞒天过海的高人，挖一冬不漏一滴水，金子黄斑斑一层，刨开沙，直接拿撮瓢撮。胡玉华的祖爷金子最多，装在瓦缸里，跟麸子似的。后来鸦片来了，金子不值钱了，只能换到同等多的鸦片。菜油灯在深邃的地下燃起，光亮被压抑得无比微弱，只有凝结在胸腔的人的欲望，像核能一样发着眼睛不能看见的光芒。1998年，胡玉华死了，他的唯一的儿子“地杯杯”在祖传的老房子挖地三尺，寻找传说中祖先藏在老房子的金子。


◎地河湾

我把我讲述的河流想象成一棵竹子，火溪沟便是竹子上最繁茂的一棵竹枝，而白马人则是竹枝上最耀眼的一只蓝马鸡。白马人栖息在竹子中间的时候，还不是蓝马鸡，还是伟大的氐，传说是诸葛亮的武力与谎言让他们开始了长达一千多年的爬竿运动。白马人顺着竹子爬啊爬，爬到了江油关，爬到了盘龙坝，直到钻进火溪沟的丛林。

今天的白马人还栖息在竹枝上，但竹枝已经衰败，竹叶已经枯萎，就像歌中唱道："竹子开花了，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真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白马人失去的不只是早餐。这些被考证为古代氐人的后裔，在一次次迁徙中失落的是自己。土地，文字，河流，牲畜，名字。而迁徙的过程，又从来都是被驱赶、被屠杀、被欺骗、被利用的过程，伴随他们的是流血、死亡、恐惧、衰败。如果白马人还有梦，如果梦真能传达遗传信息，白马人是能够在自己的梦里再现自己血统的悲剧的。

白马人居住地开放为旅游区之后，我多次去到那里，看他们跳曹盖，听他们唱酒歌。经济将白马人的舞蹈和酒歌国际化、商业化、通俗化。在我听来，白马人的酒歌却是与垂死的盘羊的哭吼没有分别。盘羊的遭遇，盘羊的命运，就是白马人的遭遇和命运。我在白马人的神山前伫立，注视那些赤裸的岩石和生生不息的红松和灌木，感觉到的不是它的神奇与神秘，而是一个民族顽强生存的见证的真实与完整。阳山的红松算不上参天，就像这个拜山的民族，倒是灌木显出了生命力的顽强与绵长。每

到6月，几树杜鹃花开在崖上，让我想起白马人头顶的羊毛毡帽上随风摇摆的洁白的野鸡翎。

旧时曹盖的意味是真实而深长的。今天任意复制的曹盖丢失了原本的基因，成为了单一的商业符号。跳曹盖还是旧时旧式的跳法，裹裹裙，羊皮鼓，身体，激情，但却已偏离了本质。一个民族自我的表达沦落成了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表演。神山得以幸存，取决于一个“神”字。有了森工局，有了伐木厂，原始森林变成了荒山。在白马路，除了神山，很难看见大树。在我的理解中，白马人的神山就是唐山人的地震遗址公园。我在祥树寨（jia）、厄里寨和焦西岗行走，出入一栋栋新建的木楼，嗅到的是飘浮的藏文化的气味，在汉字编织的对联旁是卖弄风骚的半裸的歌女。我不再指望闻到白马人发达的根系的气味，我只是为它的根系枯萎得如此之快之彻底感到震惊与悲愤。张俐是我在一篇叫《贝》的文章里提及到的白马女子。她的民族名字叫尼嘎早。今天已经没有人叫她尼嘎早了。张俐已经成为她正式的代词。然而荣宗尔甲就是荣宗尔甲，吉荻马迦就是吉荻马迦。尼嘎早是白马人的嗓子，她的美貌也是蓝马鸡和大熊猫的美貌。但她没有躲过来自自身物欲的追杀。尼嘎早在洒满星光的祥树寨唱背水歌，她本真的声音和性感的腰身让我心颤，但当她唱起流行歌曲，我的心颤就消失了。

钻槽子可以取更多更好的沙，淘颗粒更大成色更好的金。好些寒暑假，我在老家的木楼上读书写诗，父亲母亲都在钻槽子。我一句诗写得正飘，或一段哲学读得正沉迷，总能听见父亲从前院石墙外或后院竹林回来的声音：“见板了见板了，金出得勉强要得。”“灰大得很，四只桶打都打不叫。”“不多不多，一门有几毫毫。”见板就是见地壳，灰就是水，叫就是干净，毫毫就是毫克。金夫子有自己的行话，其意义在于避邪，比如灯和蜡烛要说红，天黑了要说夜了，垮塌要说扯，水要说灰，吃饭叫抄粉子，撒尿叫掉线子……父亲在木楼放背篼垫肩，依旧说着槽子里的

事，“下午再带几根厢木，二道尖子出口上有些粉，得撑两根牢实的。”或是：“明天继续钻，莫怕卖白工，我仔细看了沙口，紫石在多了，我敢打保票，要不了两天就会见金。”我倒在床上，诗稿落在脸上，我感觉父亲的生活和欲望离我是多么的遥远。

然而没多久，我也爱上了金子，时不时钻进父亲的“股份公司”，钻槽子、拖沙、架厢、拣石头。1987年冬天，曾家门上的麦田里出了红滩，寂寥的田野一夜间变成了热闹的工地。电线。机器。工棚。酒馆。商店。台球。妓女。找一个地主，喊几个人，筹几千块钱，请一个匠人，找十来个马尾子，一个股份公司就成立了，一口槽子就开挖了。八米十米二十米钻到地下。见灰了，丢一两个潜水泵下去。见金了，拨两三个尖子，拖出沙，摇啊摇，金子就出来了。我在父亲的槽子打过不到十二个小时的短工，分到七块四毛五。夜班。进了五次槽子，拖了三背沙，其余时间一直在槽门外烤火。金隔一层纸，挖到金的是少数，绝大多数都“亏得连裤子都莫穿的”。有想毒了的，揣了刀枪去抢（我们叫扛）槽子。文明的连买带抢，野蛮的明抢。

严冬的清晨，薄雾从河边一直铺展到山边，金槽子变成了仙人洞，机器在仙境里响，欲望不可思议。1989年夏天，曾家门上的辉煌已经成为一个个窟窿和废墟。我的神经被虚无和事件强奸，几近崩溃。我抛开书籍和诗歌回到老家，开始以淘金的方式自救。我在桑树掩映的废槽子外面找到一山金沙，与二哥在烈日下运到江边淘洗。烈日晒干了我神经上的血痂，金子止住了创痛，桑叶抚慰了恐惧。逼真的生活细节驱散了多年附着在我神经上的形而上的思想，体力的透支减弱了我神经的敏感。1989年夏天，我自己拯救了自己。

对于我讲述的那个头上插野鸡翎的民族，我的家族是有罪的。但正史却将这罪列为功名。那个考中进士从扬州过来的判官，便是托了“开疆拓土，兴学化夷，修筑城垣有功”的圣谕获准世袭的。世袭使我的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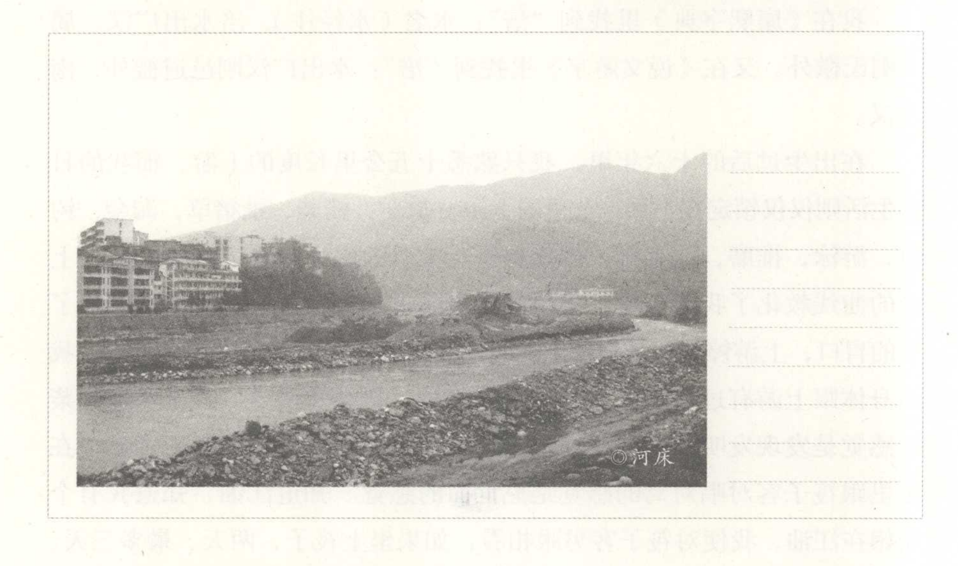
祖开始了七百三十年的土司生涯，而管辖的正是白马人。白马人是代表官府的土司的臣民，也是时时严加防范的敌人，还是他们手里随时可以打出的一张牌。像1371年傅友德来、1644年张献忠来，官府都招募过英勇善战的白马男子；像1378年、1392年、1433年、1535等若干次征战松潘北川平定番乱（藏人和羌人），都有白马人战死疆场。白马人血管里流淌的古氐人的血质偶有蠢动，不时制造出一两桩骚乱，结局自然和天下的番乱一样被克服。府志记载了1378年土司克服白马路生番、夺取番地数段、获取首级若干的历史事件。克服就是镇压。

白马人从自己的民族走失，流浪在汉藏民族的夹缝，日益变得暧昧、孤独、弱小。今天的白马人穿自己的衣裳，戴自己的饰物，也穿牛仔西装，戴金银珠宝；说自己的番话，也说四川话、普通话；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他们丢失了记忆，丢失了家园，丢失了生活方式。他们插在毡帽上的白羽毛失去了原本的光芒，成了一个标本一个象征。我不敢说这是一个悲剧，我却感觉得到它的悲剧气味。白马人跟河流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却有着某种本质的相似，只是白马人的消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河流的消解是迅速突然的。

上游。聚光灯从天空投射下来。1991–1996的夜晚。麻柳湾、浪柴湾、任家坝、菜园子、王家湾、唐河坝、仙女堡、泥鳅坝、冷青坝、青岩里、两河堡、廖家店、顶门坝、渠水、大坪、胡家坝、竹林盖、安场坝、长渠坝、鬼招手、刘家坝、老蛇湾、大田坝、平驿铺、白石铺都是暴露在光亮中的狼疮。狼疮由灯火、工棚、烟雾、人影、机器、水流、木头、机械声、金子、小姐、凶杀案构成。河流破天荒被改流，挖掘出巨大的洞坑，开出众多的尖子。人从木梯或石梯下到坑底，再钻进尖子，下到十几米几十米的板槽挖沙拖沙。马尾子背着尖勾子背篼，屁股上水淌，每拖一回沙，得爬百级以上的石梯。

我到过浪柴湾、任家坝、泥鳅坝、胡家坝，目睹过抬窝子钻槽子淘

金的每一道程序。我多次坐车经过冷青坝、廖家店、大田坝、老蛇湾，从车窗里看见过金河坝戏剧性的场景：老板或老板请的打手叼着烟卷、拿穿牛皮靴子的脚有一腿没一腿地踢着马尾子；把嘴唇画得像猪食拐（相思鸟）的小姐叉着双腿在棚子外面跟人讨价还价，凸出的胯骨与金子显露出天然的联系；换班的马尾子脸青面黑的从地下出来，周身糊满了沙泥浆，眼睛却在小姐身上打秋风；刚卸下的新机器躺在海洛因一样的白头霜里，几百匹马力就要被柴油点燃，而换下的机器在公路边的灌木丛生锈，直到雨季到来淘金暂告一段落……像所有规模劳动一样，我看见


◎河床

的淘金的内部是黑暗、冒险、贪婪、光芒、金钱、血汗、死亡、嚎啕、欺诈。老板冒险的是钱，十几万几十万投进去，没有金，便是“丢到水里，泡泡都不出一个”。匠人马尾子冒险的是命。我的堂兄王金勇就是1997年在胡家坝当马尾子死的，而我妻子的堂兄王金平也是在那一年死于青岩里透水事故的。我父亲与人在曾家门上合开的槽子死过两兄弟，至今都还在曾家门上那块麦田下面。1995年坐车从青岩里过，有人指着对岸说，

又有一个马尾子被埋了。时值黄昏，一只乌鸦掠过，我听见河滩上的灌木在风里哗哗响。1991年仙女堡的一个金槽子一次死了七个人。七个人去一口废弃多年的金槽子淘金，一个一个进去，一个去看一个，都没有出来，七个人都没有出来。第八个人进去，看见七具尸体，一具具首尾相接，匍匐在地上。传说阔达䩞瓦山脚下有一个金海子，抗战时期政府军开采过，金是采到了，但也遭遇了塌方和透水，埋了整整一个班。在阔达教书的那些年，我时常徘徊在传说中的金海子外面，看胡须髯髯的金夫子打岩钻洞，寻找海子。

我在《康熙字典》里找到"涪"：水名（水经注），涪水出广汉，属于刚氐徼外。又在《说文解字》里找到"涪"：水出广汉刚邑道徼外，南入汉。

在出生过后的十六年里，我只熟悉十五公里长度的上游，而我的日常生活则仅仅锁定在不到三公里的上游。放驴，捞柴，扯猪草，淘金，钓鱼，游泳，推磨，没有哪一样离得开。上游的水声通融了我的歌喉，上游的曲线教化了我的审美，上游的木筏告诉了我远方，上游的鱼满足了我的胃口，上游停靠的死尸诱发了我的死亡意识。1973年到1981年，我的身体跟上游有过超出五千个小时的接触。捞柴和捞鱼。在水底探到柴的感觉是发现发明的感觉，在水里捞到鱼的感觉是满足欲望的感觉，在水里跟筏子客对唱对骂的感觉是见世面的感觉。知道江油，知道我有个姨娘在江油，我便对筏子客另眼相看，如果坐上筏子，两天、最多三天，我便可以下到江油，去到中游，看见平原。邓老师是江油人，她描述中的江油有烟囱，有火车，有原子弹，有巧克力。1981年9月，我搭乘一辆拉石灰的解放牌卡车，在上游拐了五个小时，到了中游。在这5个小时里，我们很少离开过河流。涪江刚发过大水，两岸的房子、磨坊、公路、树木、电杆的创伤还没有愈合。江油关上下百里，江水奔流在狭窄的河

道里，飞腾的浪花摇动着岩崖上的灌木。雨季已过，水色返青，但水势不减。

我望着国家地图上标识涪江的蓝线，我相信地图上大多数江河都在经历涪江的遭遇。我希望她们的遭遇不是绝对的，像塞纳河、易北河、密西西比河那样。我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在地图上查找到的涪江只是一个历史的标识。

龙安下来岩(ai)对岩(ai)，

婆娘女子穿草鞋(hai)；

出门一坡山歌子，

进门一背划子柴。

山歌里有看不见的涪江，看不见的上游。

我本可以像我的先民那样与涪江仅仅保持口语的关系。但是，涪江与我同时遭遇了现代，我必须写下这些文字，写下一个上游人对上游的叙述与想象，不是以挽歌的体例，但用心却是挽歌的。

向着黄金沉沦

写作，购物，做饭，拖地，抹灰，辅导女儿，喝茶聊天——我沉陷于文学与家政，不能自拔。四十岁，我厌倦了这种让人羡慕的生活，厌倦了电脑、锅灶、文字、油腻、名气和几十几百不等的稿酬。婚姻已经搁浅，偶尔的激情无法挽救青春的丧失。不是孤枕，胜是孤枕。暗淡的灯光晃荡着麻木的睡眼，干枯的嘴唇残留着剩饭的欲望。有道德与困境守卫，我们怎样心照不宣？写作就是掘井，喝到的水只有第一瓢是甘冽的。所谓灵魂，所谓坚守，所谓审美，都是传统的定义。杜尚之后，还能有谁？厌倦现成的一切，不谈肮脏，不谈腐朽，不谈堕落和毁灭，单单一张几十年的面孔，生活如何幸福？一个人埋头做事，择菜，洗衣，移栽闲置花盆三年的兰，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人也不想理。我在自己的行为里下沉，直到双脚踩到心底。我听见嘎吱的响声。破冰的响声。心底的寒冷是从未预料到的。太阳好的日子不在了，在的只有阴沉，铅云压得极低的阴沉。无论出太阳还是阴沉，都是我所不稀罕的。我见得太多。我希望的是大雨，大风，或者大雪。它们并不常见，才是我要的诡异的天候。与世界隔阂，到底是谁的错？曾经，世界与我该是怎样地贴近，我们都一丝不挂，肉体交融，灵魂浮在石油一般的皮肤上。火苗在燃烧。火苗的蓝色里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爱的所有质量。我知道这不是世

界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世界在毁灭，而我的毁灭在先。从最深处开始的毁灭把我们分割，让美好腐朽。

活着，轨迹却是既定的，无论如何创新，都摆脱不了传统和现实的惯性。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所谓灵魂，我现在开始怀疑了。据说世界是物质的，那么灵魂也应该是物质的。物质的，就该有质量。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测得灵魂的质量。家政里包含了社会学和动物学。管理三个人的吃喝拉撒。这三个人又有血脉的关系。管理社会的细胞，挣取钞票，分配钞票，为了细胞核、细胞膜和胚芽。社会道德贯穿进来，不时搅得细胞内部天昏地黑。每一个人都先是自然的，后是社会的。成了社会的人，细胞必然失衡，必然庸俗。家政负责的仅仅是三个人的自然需求，抵抗不了各自不同的欲望对细胞的撕扯。裂缝和扭曲无处不有。表面光滑匀称，内部奇丑，是大多数社会细胞的本质。她的理想就是男人有无尽的钱，自己不为家庭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和义务，虚荣得以满足，父母兄弟姐妹衣食无忧，直至花天酒地，而最终达到马克思构思的“共产主义”状态（仅仅享受的那一半）。孩子的欲望要单纯得多，看电视，吃零食，穿名牌，要零花钱。写作包含着一种极端的妄想，也包含着社会本能。极端的妄想里有个体对时间的穿透，也有对真正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的攀摘。写作不是逃避，而是沉沦，向着贴近地壳的黄金沉沦。就其行为，写作是对世俗世界的蔑视和摈弃。真正的写作不认同世俗价值，不认同金钱、地位和幸福，只认同深刻与美。写作是抵达，或者接近。抵达或接近的是边缘、根底和末梢。可能就是被称为灵魂的境地。不一定是生命的反面，存在的异域，但肯定与生命和存在有关，好比它们的影子，但又比影子重，比影子物质。从这个意义讲，写作承认灵魂。

就本质而言，我一直生活在我的出生地。虽然也去过像上海、南京、北京那样的远方，但回想起来都如梦一般的不真实。长桂，或胡家坝。一个至今还保留着石墙、樱桃树、竹林和青杠林的村庄。我具体到人家、树

木、青草坡、七里香、石河滩、沙地的出生地。距离出生地八九公里的县城和一百二十三十公里的江油是我青春期的沃土。离出生地五十公里的南坝、水晶和阔达，是我青春的驿站。这些散发着我的汗味的驿站，也不过是我的出生地的衍生，并没有摆脱最初组成我身体的元素。不属于我的出生地的只有宝成铁路上的一些三等小站，马鞍塘，雁门坝，马角坝，二廊庙，小溪坝，双河口……火车承载着我的朦胧的身体和青春的诗歌，以一种另类的节奏行进在另类的地貌中，让我得以看见我寻找的艺术的影子。在油菜花或者红叶的映照下，我有过短暂而真实的身在异地的感觉。我回来了，就像1987年夏天的逃亡一样，本来是决心永远离开出生地，逃亡广州或海南岛，但当我从黄鹤楼下来发现口袋里的路费所剩无几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张回重庆的车票。我途经西安，见到了兵马俑和华清池，遗憾没有登上大雁塔，像韩东那样写一首诗，而后被人牢记。在夜晚穿过郑州，印象全无，记忆里只有南下路上的蛙声。南坝三年，水晶一年，阔达五年，然后就是县城，直至今天。一座山脉，一条河流，一种宗教。我的血管里一直吹着同一种风。我从小都熟悉的涪江的风。我的眼睛一直看的是同一种风景。莲花瓣的山峰，寒峭曲折的河谷，半裸的积雪，簸箕大的灰色的天。出生地的牵制，使我只能生活在梦想中。而出生地的诗化，让我可怜的梦想的花朵也纷纷凋零，所剩无几。依恋是一种本能，就像在女人的双乳间寻觅母爱的气息，但对出生地的反叛与逃离，则是生命渴望强大与永久的冲动。太熟的土地，无节制地耕耘，再肥沃也会变得贫瘠。关键的是，生死一地，欠缺足够的美丽，感受到的是宿命的悲凉。什么时候去到埃及？什么时候去到巴黎？什么时候去到阿拉斯加？选一个晒得到太阳的房子住下，可以从事的唯一工作就是思恋出生地。

能否去到他们中间？维吉尔，夏多布里昂，海明威，保尔·瓦雷里，米斯特拉尔，杜拉斯，博尔赫斯……土地测量员K，第一个浮出《尤利西

斯》的勃克·穆利根，为爱情殉难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取得金羊毛的美荻亚，垂暮之年方得爱情的费尔明娜……他们在雅典，在君士坦丁堡，在圣地亚哥，或者在巴黎、哥本哈根、埃及、俄罗斯、印度……那里有同样的水、阳光、泥土、焦虑、痛苦、沮丧、欢乐。像我和我房子四周的核桃、枇杷、雅鱼、蓟麻一样，他们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陆地与海洋在狂吻，风携带的海腥味在渲染氛围。芦苇和向日葵生长在洼地，鹭鸶飞掠沼泽，羊群在山脊像云朵。中国鸟在云层穿行，让载重卡车摇摆，也让我的耳朵摇摆。法国南部。阿尔，或者波尔多。我住在别人的石头房子里，思念出生地。岷山在四月落雪，整个涪江上游都感觉得到它的寒气。西伯利亚的寒流让感冒病毒在血液再次复活。轻度咳嗽，也让我崩溃。2020年，我五十五岁，没有永恒，没有想当然的幸福与荣耀，有的只是直线上的几米时间差。我躬腰驼背，掉光了牙，两鬓斑白，苟延残喘，但仍不肯卑躬屈膝。画家M从未见过梵高，但他认识徐悲鸿。在黄房子，M和我找到了当年玛雅丢失的手帕。没有人来访，没有人陪我喝廉价但却正宗的葡萄酒。妻子在岷山里，她喜欢热土。枣也不跟我来，她晕飞机。逃离出生地是我的夙愿，现在夙愿如愿了，我该珍惜我的偷渡。逃离出生地，却逃脱不了自己血脉的气息。东方和老庄的气息。差不多所有的下午和傍晚，我都在野外独坐，打盹或者小睡，没有梦。春天，樱花烂漫，太阳灼人，我捧着加缪的遗稿想象他的童年。阿尔及利亚，熔化的柏油路，大巴一辆辆驶过，载着法老的后裔前去瞻仰法老的灵光，一层层的时间在车身剥脱。加缪，他知道万里长城吗？我选择活着。更晚一些，2039年或2045年，依旧能步行去菜市和果市，依旧能吃肉喝酒，习惯了冰冷纯洁的钢制刀叉，习惯了不做爱的婚姻。

事实很可能是，我一直都住在岷山和涪江峡谷，住在出生地，直至死去。野樱花开了，凋败了，连野樱桃的叶子也凋败了。太阳从头巅哗啦啦射下来，看见的全是阴影。像一颗氐人部落遗落在雪山脚下的青稞，

我一直都在克隆青稞和氐人的性征。在我对世界的理解和再选择中，法国是我虚拟的归宿。苏菲·玛索，伊莎贝尔·阿珈妮，朱丽娅·比诺什，凯瑟琳·德纳芙……她们生活，又在银幕上演绎生活，好比葡萄已经够美味了，却还要酿造更加美味的葡萄酒。我敬佩北岛，敬佩那些身居海外的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在漂流中纪录感觉，同时获得对出生地的眺望。北岛，给予过我人格力量的诗人，跟神话中的人物艾伦·金斯堡和布洛茨基都有过交情。从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蓝房子，到美国密西根州的安纳堡，途经挪威、德国、巴黎、丹麦、荷兰、英国等很多地方。从特拉维夫到阿拉法特官邸，从纽约到约翰内斯堡，聆听，或者朗诵。除了获得异域文化和景观，除了感染异族血脉的免疫力和病菌，还受制于来自出生地的庞大根系的牵扯，还不得不接受神话破灭的绝望与懊恼。我知道的北岛，在世界游走，聆听、写作、正视，享受清醒的坠落和沉醉的飞翔，为了属于人类灵魂范畴的艺术。偶尔，当他的中国声音（不只是汉语的）被各色的耳朵聆听并传达至可能的灵魂的岛屿时，他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孔子周游列国，成为儒的集大成者。孔子的周游是一个国家的机密。是什么在支撑北岛？诗歌、土豆、还是葡萄酒制造的冲动与迷醉？都太沉重了。最好，漂流仅仅是个人的漂流，至多是艺术的漂流，没有政治的干系，没有个人的野心，正如在众多的山花落地为泥的时候，有那么一两个落花属于了流水，属于了平原和海洋。涪江在合川注入嘉陵江，再在重庆注入长江，流经广袤的华中华东，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涪江把岷山的气息带给了世界，但世界却感觉不到。想一想世界，想一想杜拉斯的情人和伊莎贝尔·阿珈妮塑造在银幕上的玛戈皇后，已经足够了。悬崖上的野樱花开了，对于世界，这是生活的继续；对于你我，这是活着的证据。生在出生地，长在出生地，像做一棵青稞，你别无选择。想是唯一的，也是神圣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隐秘的乡村
作者=阿贝尔著
页数=236
SS号=12173641
DX号=
出版日期=2008.05
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